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简史

〔捷〕巴拉伊卡、青希、帕莱尼切克 著

星 灿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Dr. Bohumil Bolajka
Dr. Vitězslav Tihý, Dr. ludvík Páleníček
Stručné dějiny
české a slovenské literatury

据 Státní pedagogické nakladatelství
Praha 1958年版本译出

本书原是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大学教材，论述的时限上起公元九世纪，下迄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书包括两大单元，重点在捷克文学部分，约占篇幅五分之四，斯洛伐克部分则比较简略。这两个兄弟民族在某些方面各不相同，但都经历过长达数百年的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最后都在一九四五年获得伟大的胜利。本书将告诉你，这个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如何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学中得到反映，而文学又对这一历程起过什么作用。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简史
Jiekesiluofake Wenxue Jiansh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illegible]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illegible]印刷

字数281,000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illegible] 插页[illegible]
1984年[illegible]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900

书号 10208·190 定价 1.[illegible]元

目　次

捷克部分

一　封建社会早期的文学(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初) ……………3

1　古斯拉夫文学 ……………3

2　拉丁文化的胜利和捷克语逐渐渗入文化领域 ……………5

二　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文学 ……………8

1　十三世纪初到查理四世时期 ……………8

2　从查理四世到胡斯的出现 ……………11

从开端到胡斯时期的捷克文学小结 ……………16

三　胡斯时期的文学(封建社会危机时期) ……………18

1　从胡斯的出现到利潘尼战役 ……………18

2　杨·胡斯 ……………18

3　胡斯运动时期的文学 ……………25

4　从利潘尼战役到十五世纪中叶

(胡斯运动沉寂时期) ……………31

四　封建制度中兴时期的文学

(十五世纪中叶到白山战役〔1620〕) ……………37

五　封建制度巩固与专制统治时期

的文学(从捷克丧失独立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46

1　流亡人员中的捷克文学……………………46

2　国内文学……………………54

3　民间文学……………………56

从胡斯运动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的捷克文学小结……………………58

六　民族复兴时期……………………61

1　从民族复兴初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61

复兴时期的戏剧(64)——捷克新诗的开端(65)——为人民创作知识性散文(67)——为捷克现代语言的规范化而斗争(68)——政治反动时期的民族复兴运动(70)——《王室手稿》与《绿山手稿》(78)

2　杨·科拉尔……………………81

3　弗朗季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88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捷克文学小结……………………97

七　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民族复兴文学……………………99

1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111

2　约瑟夫·卡耶坦·狄尔……………………122

3　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131

4　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140

5　鲍日娜·聂姆佐娃……………………147

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捷克文学小结……………………161

八　六十和七十年代……………………………………………………163
1　杨·聂鲁达……………………………………………………176
2　维杰斯拉夫·哈列克……………………………………………190
九　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文学……………………………………………195
1　斯瓦托普卢克·捷赫……………………………………………212
2　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德克……………………………………220
3　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226
历史小说(230)
4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233
5　卡雷尔·瓦茨拉夫·拉伊斯………………………………………247
十　二十世纪初的文学…………………………………………………252
1　彼得·贝兹鲁支…………………………………………………256
2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268
十一　两次大战之间及占领时期的文学…………………………………271
1　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伊曼………………………………291
2　伊希·沃尔克……………………………………………………304
3　伊万·奥布拉赫特………………………………………………314
4　玛丽亚·玛耶罗娃………………………………………………327
5　卡雷尔·恰佩克…………………………………………………339
6　尤利乌斯·伏契克………………………………………………348
十二　人民民主时期的文学………………………………………………357
1　玛丽亚·普伊曼诺娃……………………………………………371
2　安东宁·萨波托茨基……………………………………………382
3　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386

斯洛伐克部分

一　古斯洛伐克文学发展概述……………………397
二　什图尔时期的斯洛伐克文学……………………401
1　吕德维特·什图尔……………………403
2　萨莫·哈卢普卡……………………407
3　杨科·克拉尔……………………409
4　安德列伊·斯拉特科维支……………………412
5　杨·博多……………………415
6　什图尔派小说的发展……………………417
7　杨·卡林恰克……………………418
三　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422
1　巴维尔·奥尔扎格·赫维兹多斯拉夫……………………429
抒情诗（431）——叙事诗（434）
2　马尔丁·库库钦……………………437
3　季姆拉娃—鲍日娜·斯兰契柯娃……………………440
4　约瑟夫·格雷戈尔·塔约夫斯基……………………441
5　伊万·克拉斯科……………………443
四　一九一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447
1　杨科·叶森斯基……………………452
2　彼得·伊莱姆尼茨基……………………456
3　弗拉尼奥·克拉尔……………………461
五　一九四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466

捷 克 部 分

一　封建社会早期的文学

（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初）

1　古斯拉夫文学

在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作品产生之前很久，人民已开始唱歌，讲述神话传说，创作谚语歌谣，以表达他们对生活、对世界以及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但是，这些民间文学创作产生时没有人将它们记载下来，因此我们只能从后来一些零星的传闻中略知其概貌。

我国书面文学到九世纪才出现，这些文学与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紧密相关。公元八六三年，大摩拉维亚公国的拉斯吉斯拉夫大公邀请康士坦丁—基里尔与麦托迪兄弟二人来到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播基督教并奠定文化教育基础。兄弟二人虽然生于希腊，却通晓斯拉夫语，因为这种语言在他们的出生地索声纳城一带是通用语。

康士坦丁首创了名为格拉果尔文字① 的斯拉夫字母。那种字母在当时已非常完善，因为它能把斯拉夫语发音的

---

① 由古斯拉夫语中“语言”一词的读音而得名。

所有特征表现出来。

康士坦丁和麦托迪在摩拉维亚和邻近地区传播基督教，并开展丰富的文学与文化活动。用斯拉夫语进行的祈祷仪式得到了教皇的认可，从而使古斯拉夫语提高到一种文化语言的地位，与拉丁文、希腊文一样，属于可以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语言之列。

兄弟二人逝世后，斯拉夫语祈祷仪式的反对者日耳曼神父，促使教皇出面，禁止使用斯拉夫语做礼拜。麦托迪的弟子们只好离开摩拉维亚来到捷克，有的人则去保加利亚和基辅罗斯。

在古斯拉夫文学中，我们保存下来的除祈祷文之外，还有康士坦丁和麦托迪的传记，有时也被称为《摩拉维亚—潘诺尼亚[①]圣徒传》。这部传记叙述两位传教士的生活轶事，是古斯拉夫语在文学上日趋成熟的明证。

康士坦丁和麦托迪用来翻译、传教及举行礼拜仪式的语言，我们今天称之为古斯拉夫语。它的基础是希腊索卢纳城附近的古保加利亚语中的马其顿方言。我们的祖先不讲这种语言，但是能够听懂。古斯拉夫语成了最早的斯拉夫书面语言。

康士坦丁和麦托迪的活动对整个斯拉夫都有意义，因为由他们创造的书面语言和最早的文学作品深入传播到所有斯拉夫人之中，为他们的文化统一提供了前提。

---

① 潘诺尼亚在今匈牙利西部，那里曾有斯拉夫人居住。

普热米斯尔时期，捷克土地上从古斯拉夫文化传统中产生了第一首圣诗《主啊，怜悯我们吧!》，这是人们在教堂祈祷或捷克大公与国王举行加冕大典时咏唱的歌。歌词无疑是在乞求上帝宽恕的祈祷中产生的，它一再重复希腊文的“主啊，怜悯我们吧!”一语，后来克尔莱什才将这希腊文译成捷克文。

圣诗中保留了古斯拉夫语的痕迹，这表明它产生于十至十一世纪，即捷克古斯拉夫文化的全盛时期。

2　拉丁文化的胜利和捷克语逐渐渗入文化领域

十至十一世纪，古斯拉夫和拉丁两种文化在我国同时并存。东部使用人民易懂的斯拉夫语，西部使用人民感到陌生的拉丁语。同时产生了两种语言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但后来拉丁文作为文学与祈祷语言逐渐排挤了古斯拉夫语。原因之一是大摩拉维亚公国崩溃之后，我国与东部斯拉夫人的交往已不如过去密切，而且普热米斯尔族的大公们也支持罗马教会与拉丁文化。

封建社会早期，教会是知识的唯一传播者。在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的同时产生了第一批学校，成为教育与造型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整个艺术具有教会和宗教的特点。

中世纪的僧侣们保持着将全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修

道院院长或僧侣逝世、国王加冕等）记录归档的习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简略的记载（年鉴）逐渐发展成为对修道院甚至整个国家历史的完整叙述，最早的编年史即由此而来。

第一位编年史家和捷克史学的创始人为科斯马斯（约1045—1125）。他在国外学习之后，成为神甫，其后获得教会的高级职位。

科斯马斯在其编年史中，分别记载着"老辈们讲述的神话"、"见证人的可靠消息"，还有他本人所经历的事件。"老辈们讲述的神话"记载了捷克部落最古老的传说：关于始祖捷赫和他的人民的迁入，关于黄金时代，关于公断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克罗克）的时代，还有关于克罗克的三位女儿、特别是莉布谢和她的预言，关于布拉格的创建，关于普热米斯尔等等。其中有些传说可追溯到远古的史前时期，但它们的真实核心被大量的神话传说所淹没，后来的传说才有点历史的性质（如捷克人与卢昌人之战）。

科斯马斯顺应时代的要求，按照希腊罗马作家的模式，对最古老的传说进行了整理。

科斯马斯的编年史就其形式而论，在当时也堪称杰作。他讲得趣味盎然，爱用对话的形式，使情节更为生动。作者在讲述时引用了许多幽默故事和笑话，并善于夹叙夹议。编年史尽管用拉丁文写成，但因采用了民族题材与世俗题材，所以同当时的宗教文学大相径庭。

读懂一本拉丁文的书有时对宗教界人士来说也决非轻

而易举的事。因此，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书本内容，神甫们常常在拉丁文本的字里行间及页边用捷克文的词或句子加以解释。我们把这些解释称为诠注。这些诠注中保存着最古老形式的捷克文。它是向文字民族化迈出的第一步。用民族语言写作的第二首最古老的歌《圣瓦茨拉夫，捷克大公啊！》，也表明捷克语言已逐渐渗入到文学和社会生活之中。除《主啊，怜悯我们吧！》一歌之外，《圣瓦茨拉夫，捷克大公啊！》是中世纪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具有国歌的意义。

二　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文学

1　十三世纪初到查理四世时期

普热米斯尔王族统治末期，捷克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该王朝最后几代国王，慷慨支持文学艺术的发展，将西方骑士文化——诗歌、音乐和考究的宫廷生活方式引进我国。

十三世纪末与十四世纪初，捷克出现了对发展民族语言的文学更加有利的条件，由于上层贵族与日耳曼市民之间的经济竞争，逐渐产生一种民族意识，由于贵族对最高统治者及其宫廷日耳曼文化的反感，这种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末代普热米斯尔王族支持日耳曼民间口头文学，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捷克方面在文学上的竞争。

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之所以得到发展，还在于除了以拉丁文为文学语言的僧侣宗教界之外，贵族阶层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已不仅仅对宗教题材进行加工了。这类新作品的主人公已不只是圣徒，也有世俗人物、骑士和贵族。

我国著名的世俗叙事诗《亚历山大大帝》就描述了这样

的主人公。这是一首关于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诗作，中世纪基督教徒将他视为所有骑士美德的体现者。该诗产生于一三〇〇年左右。

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作者是谁，但他对于富裕市民的高傲态度、对农民的反感情绪、对狩猎的爱好，以及对于骑士与军事专门术语的通晓，证明他是贵族的一员。《亚历山大大帝》的作者在其作品中已表达了爱国主义思想及对日耳曼移民的反感。

对于移居捷克的外国人不断增长一事所表示的忧虑，也反映在捷克第一部诗体编年史即《达利米尔编年史》中。该书产生于十四世纪初，以其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显得出类拔萃。

与《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这部编年史的作者也不为世人所知。我们只能估计他是一位贵族，对市民和外国人满怀仇恨，颇有文学修养，对古老的捷克编年史造诣较高。直至下一个世纪，才误将编年史的作者定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达利米尔。

作者叙述的捷克史，始于捷赫始祖到来之日，止于十四世纪初期。远古史部分以科斯马斯的记述为依据，但作者也熟悉其它编年史，并照顾到民间传统，采用地方与家族传说，最后几章还从自身经历与见证人的讲述中吸收了材料。

作者对本民族及其光荣历史的热爱，在序言中已有所流露。他指责捷克贵族不关心本民族的过去。《达利米尔

编年史》的作者也明确地表现了对外国文学题材如《亚历山大大帝》的反感。

写作编年史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描述过去，而是发出紧急号召，呼吁捷克人恢复传统美德，表达对于捷克人民及其语言的热爱。热爱祖国，这对诗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的感情："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为自己的语言而沸腾吧！"这种对祖国的爱，不应因为意识到本身的各种缺点而有所削弱。因而他又规劝道："捷克人啊，自己梳洗吧，哪怕是你头上的疮疤，也别留给外族人！"他激烈反对贵族的媚外思想，警告他们不要模仿外国的道德风尚，指责他们悭吝自私，他渴望伸张正义与享受应有的权利。

作者在其著作中，表达了对封建主与日耳曼富裕市民的排挤有切肤之痛的下层贵族的观点，因此其指责的矛头主要针对日耳曼市民和所有德意志人，但对最高统治者及上层贵族也不无微词，主要指责他们模仿外国习俗。

当然，《达利米尔编年史》不象科斯马斯编年史那样是一部可靠的史料。作者对真实事件与传说常常不加区分，将自己时代的观点搬到远古历史之中，并屡屡借助于虚构的幻想。

然而《达利米尔编年史》的意义，在于作者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采用的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形式。尽管受到出身等级的局限，作者仍然在某些地方表现出一定的民主思想因素。在叙述奥尔德希赫公爵同村姑鲍日娜结婚的那一章里还为农民说话，农民对他来说要比日耳曼封建主

显得可亲些。

《达利米尔编年史》的写作风格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不矫揉造作。作者喜欢采用一些民间的巧妙成语和比喻，例如："谁想家里留财产，莫让火星沾木炭。因为木炭常着火，富人的财物也会遭横祸。"诗句长短不一，多叠韵。

达利米尔对本民族的炽烈感情，他对接受外国风尚、对祖国的敌人的反感，使他的编年史具有了现实性，若干世纪之后捷克读者仍感到它很亲切。大批的手抄本以及后来的增补与十五世纪的校订，都证明读者很喜爱它。在民族危亡的年代，它更是激发民族意识的进军号。

2 从查理四世到胡斯的出现

查理统治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同时又是标志着封建主义已陷于危机状态的最初的经济震荡时期。在布拉格和乡村，哥特式建筑、雕塑、绘画以及工艺美术等精美作品，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

查理统治时期，在文化上最重大的建树是创办布拉格大学(1348)，这是中欧的第一所大学。该大学尽管具有教会色彩①，但对捷克文化的民族化及其深入与提高具有伟

① 大学的创办须经罗马教皇同意。古代所有学校都掌握在教会手里，所以大学教师同时也都是传教士。

大意义。第一批对社会的差别与不平勇于批评的人士是由该校培育出来的。

查理四世大力支持文学创作，如历史题材的作品与传奇作品。查理时期的诗歌体传奇故事因其诗体格式艰深费解，只能适应一小部分最有文化素养的读者。用散文形式写作的传奇故事则比较浅显易懂。查理四世时期的学术文献也有所发展，如法学著作、对于百科辞典和翻译游记的最初尝试。骑士文学的异国情调与惊险的故事情节很适合上层贵族的胃口，深受他们的喜爱。

其中有的题材后来逐渐演化为民间创作（如《什迪尔弗特与布鲁茨维克》①），有的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多次重版。

十四世纪上半叶的世俗抒情诗文保存下来的，可谓寥寥无几。我们只保存了该世纪下半叶的少量抒情歌，主要是情歌。其中有些产生于民间，它们风格纯朴，感情真挚，以舞曲居多（如《宝贝啊，祝你好！》、《她曾来到你的小果园》、《绿林中》）。但大多数抒情歌则出自作曲家之手；尤其是情歌部分，具有外来诗歌的特点，常为西方国家的流浪歌手所演唱。

高等学校的学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捷克文或拉丁文的小调、诗歌和短小的讽刺作品。他们在诗歌中抨击贵族和教会，针砭时弊，同时嘲笑自身的贫困，歌颂爱情与友谊。

---

① 关于布鲁茨维克和他的神剑的传说。

《马夫与学生》一诗便是接近于大学生讽刺诗之类的作品，它准确地刻画出了十四世纪后期的捷克生活情景。作者采用中世纪文学所喜爱的争辩形式，写一个贵族老爷的奴仆、以给主子效劳为荣的马夫，与一个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牧师的穷大学生之间的争论。作者以旁观者的姿态描绘这场争吵，争吵以斗殴告终。至于结论如何，作者却未作交代。很明显，他不愿偏向争论的任何一方。这表明他对当时各社会阶层充满尖锐矛盾的形势，也感到彷徨无主。

《马夫与学生》这首讽刺诗虽然形象而又忠实地描绘了两个被剥削阶层成员的生活，但从这幅画面中看不出作者对社会的批评。他看到了社会制度的阴暗面，但又认为它是自然现象，因而并未提出解决办法。

在这种市民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品要推《赫拉德茨手稿》①。手稿里也保存了反映市民生活的若干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十诫》和《对手工艺人及市政官吏的讽喻》。《十诫》详尽地讲述各条诫律，并以日常生活为例，指出某人如何因亵渎诫律而犯罪。作者特别利用讲解第七诫（勿盗窃）的机会，指出贵族老爷与宗教界人士如何压榨穷人获取不义之财，借以致富。在结尾时，诗人将剥削者与那把勤劳的工蜂撵出蜂房的雄蜂相比。这是我国文学中革命因素的最初萌芽。

在《对手工艺人及市政官吏的讽喻》里，有一些市民、特

① 由发现手稿的地点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而得名。

别是手艺人的简略但维妙维肖的生活画面。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谴责有些行业的工匠（如铁匠、酿酒师、理发师、屠夫、烤面包师和皮鞋匠）不老实、不正直，谴责城市官吏的舞弊受贿行径。

《讽喻》与《十诫》语言生动，采用口语与对话形式，有些诗如《亚历山大大帝》还有很规则的八音节诗句，但韵律简单，这些诗作在诗歌表现手法的选择上较为谨慎，因为作者无疑考虑到市民读者这一对象，过分精炼文雅的形式可能会使他们感到格格不入。

到十四世纪，捷克的戏剧也发展起来。其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时有些寺院已开始将《圣经》中所讲的耶稣复活的故事改编为剧本，最初由牧师朗读或演唱，后来世俗人士、教师和学生也相继演出，他们将一些世俗生活情景写进了严肃的宗教场面，例如在一个有油膏商人出场的戏中，有三个玛丽亚为了给基督圣体涂油，竟买来一些擦脸油，这是用捷克语演出的。后来那些滑稽成分越来越扩大，以至严肃场面也变成了闹剧。于是教会禁止该剧在教堂上演。由此演变出一部根据中心人物"油膏商人"来取名的戏，写的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剧中主要人物有卖油膏的塞维林、他的妻子和两个仆人——鲁宾和普斯特巴克。作品嘲笑了中世纪行骗的江湖医生，描述了中世纪贫民的生活，但并未抨击社会弊端，只是逗观众开心而已。

十四世纪时，日益富裕的市民阶层的力量与自信心大为增强。该阶层的成员已不甘心于只当文学作品的读者，

对文学创作也跃跃欲试。他们的作品比贵族文学更加注意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市民文学作品采用了更易于为读者接受的手法，以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写作。这是走向文学民主化的又一发展。关心社会问题，有时甚至批评社会弊端，是这些作品的进步特色。

日益深化的社会矛盾，激起了人们对社会愈来愈尖锐的批评，加强了改革社会的热望。批评主要针对教会，因为它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封建制度的最大支柱。改革思想首先由大学教师提出，后来主要由一些民间传教士和贫穷牧师宣讲，他们成了人民的观点与愿望的代言人。

出色的传道者、社会弊端的无畏的批判者杨·米利奇的改革观点，对听众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强调指出，为了改变世道人心，必须变革社会条件。

托马什·什季特尼是米利奇间接的学生，一三三五年左右诞生于英德什城堡附近什季特尼要塞，出身于贫苦小贵族家庭。他晚年在布拉格度过，约一四〇九年去世。什季特尼撰写宗教评论，后汇编成册，其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日常问题六篇》(1376)，内有一篇值得纪念的前言。当时的大学教师指责他不是牧师，不应该用捷克民族语言论述宗教与哲学问题。在这篇前言中，什季特尼针对这一指责为自己辩护。因为在什季特尼之前，人们一直都用拉丁文撰写神学著作。

什季特尼使得民族语言开始渗入到那时为止一直由拉丁文统治的文学领域，使得在此之前一向由大学教师和牧

师主持的教育，逐渐成为本民族广大阶层的财产。

什季特尼在文章中注重道德问题，经常面向现实生活，而不只限于议论宗教，文章中也不乏对富户豪绅舒适懒散生活的谴责。

什季特尼也极为重视其作品的形式。他的语言富于表现力，他善于通过恰当的比喻，把那些由他吸收到捷克语中的不易弄懂的概念加以巧妙的解释。

什季特尼不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他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偏离教会学说；但他却是第一个试图用民族语言对复杂的宗教及哲学问题加以系统解释的作家。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为了将更高水平的文化传播到广大读者阶层中去。

从开端到胡斯时期的捷克文学小结

我国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公元九世纪，当时随着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形成了古斯拉夫文化。我国也出现了用文字记载的古斯拉夫语的最初作品。古斯拉夫文化促进了使用民族语言的最早的口头文学的产生（如《主啊，怜悯我们吧！》），这种文化的进步标志在于它使用人民易懂的语言作为早期斯拉夫书面语言，给所有斯拉夫人在文化上的接近提供了前提。

从公元十世纪起，古斯拉夫文化受到以拉丁文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文化的排挤。人民不懂拉丁文，它是有文化素

养的人的语言。但即使是我国国土上出现的拉丁文作品，也表现了作者们的民族意识：科斯马斯在其编年史中叙述了捷克最古老的历史，也记录了最古老的部族传说。十三世纪末与十四世纪初，民族语言开始日益成熟，渗入到文学作品中来，这一时期和查理四世时期一样，都是使用民族语言的文学的繁荣时期。《亚历山大大帝》是上层封建主创作的骑士文学典型，《达利米尔编年史》则是用民族语言叙述捷克历史的最初尝试。市民阶层的发展及其参与十四世纪的文学创作，使文学中出现了批评社会的因素，这是社会矛盾日益增长的反映（如《赫拉德茨手稿》、《马夫与学生》），同时，托马什的作品还表现了改革社会的努力，这些作品使得向人民介绍文化宝藏的努力在胡斯之前达到了高潮。

三　胡斯时期的文学

（封建社会危机时期）

1　从胡斯的出现到利潘尼战役①

民间传教士所宣讲的革命思想主要针对教会，十五世纪初，教会几乎占有捷克全部土地的一半。这种巨大财富引起了社会其它阶层、主要是上层封建主与市民的妒忌和人民的仇恨，因为人民正是由于教会的横征暴敛和主人强加的繁重劳役而被搜刮得一贫如洗。

在社会各阶层关系普遍紧张、与教皇的矛盾加深、宗教道德沦丧、教会风气日下之际，杨·胡斯脱颖而出了。

2　杨·胡斯

杨·胡斯（约1369—1415）出生于普拉哈季采附近的胡

① 利潘尼战役发生于一四三四年五月三日，是胡斯起义军的两派在官军挑动下发生的内讧，起义军首领普罗科普阵亡，损失惨重，革命从此失败。

辛采一个贫苦家庭。正如他后来在著作中回忆的那样，求学时期，他备尝艰苦，食不果腹，在布拉格大学获哲学学位之后，曾在哲学院短期任教，一四〇〇年被授予传教士神职。

进步教师和激进派思想家马捷伊的著作，特别是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的作品，对胡斯青年时代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在其拉丁文宗教著作中指出：教会不应占有土地，而且无权干预世俗事务。

一四〇二年，胡斯被任命为伯利恒小教堂① 传教士，当时该教堂成了捷克改革运动的中心。教堂的章程规定，（自1391 年起）传教士应本着改革的精神传播上帝的声音。胡斯的前任们已在教堂吸引和聚集了很多热情的听众。但直到胡斯上任以后，才使伯利恒小教堂真正成为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

作为大学教师的胡斯，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上。他在大学与专业实践中用拉丁文撰写的著作，同其捷克文著作具有同样的进步性。这些作品面向知识分子，想要说服他们相信新观点的正确性。胡斯从一开始就反对上层教会统治集团占有巨大财富，摈除宗教生活中的形式主义，揭露所谓的奇迹其实是骗局，等等。

一四〇九年，胡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那一

---

① 布拉格一小教堂。

年，在他的敦促下，瓦茨拉夫国王颁布了值得纪念的库特纳山法令，合理地调整了各民族在大学的选票分配比例。捷克人尽管在大学里占绝大多数，到当时为止却一直仅占一票，但这次获得了三票，而外国人仅占一票。为表彰胡斯在促进布拉格高等学校捷克化方面的功绩，一四〇九年他被选为该大学校长。

当胡斯的布道传教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他的思想的信徒日益增多时，布拉格大主教开始对无所畏惧的传道者及其友人进行粗暴的干预。大主教多次干预无济于事，便宣布将他革除教门。

由于胡斯反对买卖赎罪券的勾当，他与教会之间的裂缝进一步加深。当时胡斯的一些朋友被教会上层人物的强硬措施所吓倒，离开了胡斯和进步阵营。

教皇再次宣布将他革除之后，胡斯离开了布拉格，暂住在科齐一赫拉德克和克拉科维茨的几个好心的贵族家里。国王抛弃了他，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也回避他，只有人民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成群结队地前去听他传道。

一四一四年春，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指控胡斯传播异端邪说，齐格蒙德①传旨召胡斯出席会议申辩，并答应保证胡斯的安全。胡斯置朋友的警告于不顾，毅然前往康斯坦茨。他深信能在宗教大会上捍卫自己的思想。但他抵达不久便

① 齐格蒙德是当时新登基的日耳曼血统的国王，国王瓦茨拉夫的兄弟。

被捕入狱。会议虽然让他三次公开听证，但不允许他为自己学说的正确性进行辩护，胡斯也未能象他所期望的那样，用《圣经》的论据来说服别人。教会的代表们只要求胡斯放弃自己的学说，屈服于宗教会议的权威。歪曲事实的证人无中生有地对胡斯及其学说横加指控。由于胡斯在受到肉体上的长期折磨和精神上的斗争之后仍然坚贞不屈，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宗教会议便将他的著作宣判为异端邪说。胡斯本人于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在边境被烧死。

胡斯最有意义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论教会》。该书是对中世纪最强大的封建权势——教会的控诉与批判。胡斯认为教会的首脑不是罗马教皇而是基督，这一观点有力地动摇了教皇的权威。《论教会》一书在国外也引起巨大的反响。

胡斯与伯利恒小教堂听众的密切关系以及后来与捷克农村人民的直接联系，促使他改用捷克文著书立说。胡斯用捷克文撰写的著作的意义，在于它使捷克论说体的散文得到高度发展，并以进步思想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

胡斯在其著作《九枚金币》及其它宗教著作中，向听众与读者阐明了基督教生活的真谛。篇幅较大的著作是《信仰、十诫和主祷文释义》，对这三段基本祈祷文的阐述使胡斯有机会去考虑道德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并促使他批评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论神职的买卖》是胡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他在此书中批评了他那个时代买卖神职这种普遍的舞弊行为。

每个教会机构都必须给教皇交纳黄金。谁交得最多，谁就能得到圣职。从教皇直到普通僧侣，胡斯都无一例外地予以批判。他还描述了神甫的贪欲，据说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开怀畅饮，饫甘餍肥，尽情享乐”。胡斯认为，不仅神甫，连做父母的也因买卖神职而犯罪。他们送子上学只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对亲友能有所资助”。胡斯很清楚地知道，这种舞弊行为对身受残酷剥削的普通人民危害最甚。

胡斯以生动的语言同人民保持联系。他在放逐期间对口头语言的力量以及它对人民听众的作用理解得最为清楚。胡斯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当他还是大学传教士的时候已颇负盛名，常应邀到各种宗教纪念活动场所去进行宣讲。但他最有意义的传教活动还是在伯利恒小教堂里。

胡斯的传教布道词，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胡斯为他本身、也为他的学生和继承者的需要，编写了文集和《布道录》。他的大部分宣讲稿是用拉丁文写成，但讲述时通常用捷克语。这些讲话以其通俗易懂和思想深刻而打动人心。通过他的作品我们观察到，胡斯在思想上是如何成长的，动荡的时代怎样将他的注意力引向现实问题，而他的批评又如何一年比一年更趋于尖锐。

当时捷克农村出现了许多书面传教材料，胡斯将这些编成了《布道录》。

《布道录》在中世纪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讲解福音书的形式。胡斯的《布道录》或《礼拜日圣经讲解》(1413)标志着他的传道活动的顶峰。胡斯在专为没有文化的普通人民

所作的讲解中，经常引用《圣经》中的话。他通过向听众发出呼吁，提问，运用谚语，来使宣讲更为生动。他处处注意当代生活，指出教会的腐败和由巨大财富招致的宗教界的道德沦丧。他的思想越来越革命了。

胡斯深感自己作为人民的传教士与作家，责任重大。所以他对书面语言及其正字法等问题作了极其认真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他用拉丁文写了《论捷克语正字法》一书，此书包括一些细则说明，如怎样减轻缮写人员的工作，减轻读者的负担，通过慎重的正字法，用更合乎实际和更简单的字母上的钩、点，来简化当时复杂而又不准确的连字法。

胡斯对于祖国语言的热爱不仅表现在正字法的改革上，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尽量使书面语言接近民间的生动语言，从而大大促进了捷克书面语言的发展。他摈弃了语言中某些过时的形式，如简单过去完成时、过去未完成时，用布拉格当地的口语来写作。胡斯作为我国最早的作家之一，也很注意维护语言的纯洁性，他谴责外来语特别是德语对他的祖国语言的损害，尖锐地批评了布拉格人的这种洋化现象，认为这是缺乏民族意识的表现。

胡斯又为一些新的概念创造了新的词汇，在创造过程中对语言的有机联系和纯洁性予以极大的关注。由于他在文学发展中的威望，他的作品成了作家的语言范本，从而成为书面捷克语的基础。

胡斯明确地意识到歌曲的教育力量，所以在伯利恒小教堂安排唱赞美歌，既有古老的歌（如《主啊，怜悯我们

吧！》、《圣瓦茨拉夫》、《全能的主啊！》)，也有他整理或创作的新歌(如《光荣的国王啊！》、《善良的基督！》)，因而胡斯便成为胡斯运动歌曲的开拓者。

胡斯的大量书信使这个人物的画像更加完备了。他的书信、特别是他给康斯坦茨的友人的信件向我们表明，胡斯是为真理和正义而自觉斗争的战士，如书信中写道："请你们互相敬爱，不要让暴力压制善良，要让大家都掌握真理。"

胡斯的书信还表达了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斯拉夫意识(如祝贺波兰国王伏拉迪斯拉夫四世战胜日耳曼十字军)。发自康斯坦茨的信件，显示了胡斯在道义上的伟大，表明他是为真理、为自己的信念、为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正义而战斗的无畏的勇士。

胡斯不只在文学上，而且在整个文化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他明显地促进了使用民族语言的专业书籍与一般著作的发展。他作为语言巨匠，为语言的纯洁性而斗争，功勋卓著。作为一位作家，他使他那个时代的文学语言接近了人民的口语。

他以其自身的道德范例，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他勇于反抗中世纪最大的权威——教会，勇于审察和思考宗教学说的真实性，批判教会的具体活动，并从批判中得出结论。他依靠理智与科学研究来对抗教条权威。

同谨小慎微地对宗教教义抱残守缺的什季特尼相比，胡斯可谓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因为他善于尖锐地揭露当时

社会的不平，公开予以批判；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用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思想。他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忠贞不渝，直至英勇牺牲。

3 胡斯运动时期的文学

胡斯之死促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反抗教会，加强了改革运动，加速了人民革命浪潮的到来。城市贫民的行动最富于革命精神，在布拉格，他们开始占领教堂、教区和胡斯的对立面的寺院，派遣具有进步倾向的代表进驻那里。

在农村，早已被热情洋溢的人民传教士引上革命道路的人民开始组织起来。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上山听取传教士的热烈布道，这些传教士根据大胆的设想，向他们描绘今后社会关系的安排，指出在这种关系中将人人平等，不分贵贱。他们号召人民起来捍卫上帝的法规，团结一致反对剥削者。

但这场群众运动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必须加以组织，使其在军事上适合于革命目的。这项任务由谙熟军事实践的下层贵族和自由民接受下来，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天才军事统帅杨·日什卡。

当农村人民走上革命道路时，市民阶层却分裂为两个营垒：手工业者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还靠近城市贫民；富裕市民则倾向于大贵族。封建主之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分化。下层贵族、家道中落的自由民全部倾向革命；部分上层贵族试

图利用革命中的混乱，通过吞并教会庄园致富，或者干脆同胡斯运动相对抗。

布拉格贫民的主要代言人为杨·热利夫斯基教士。他作为布拉格贫民与手工业者的领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一四一九至一四二二年的布拉格事件[1]，后因市民出卖，被捕处死。

作为一位教士，他无所畏惧地批判当时的社会状况，不仅对特权阶级的成员，而且对商人与手工业主也进行了抨击。

胡斯军队的天才统帅杨·日什卡是胡斯运动的一位著名组织者。他制订了军事条例——一部胡斯军队法典。他要求军人遵守严格的纪律，同时又保证所有出身不同的人均享有同等权利，并要求他们履行同等义务。

在胡斯运动时期，民歌得到了很大发展。胡斯革命鼓舞民间作者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新歌曲，这些歌曲在激动人心的年代里成为有效的战斗手段。大部分歌曲虽带有宗教色彩，采用《圣经》的情节，但在宗教的外衣下，包含着政治与社会意义。

胡斯运动的许多歌曲保存在一本名为《伊斯特普尼采圣歌集》的集子中，这本歌集收录了最著名的胡斯运动的歌

---

① 一四一五年，胡斯被处死，这一事件激怒了捷克人民，抗议浪潮席卷各个城镇。一四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杨·热利夫斯基教士率领人民攻打并接管了布拉格市政府。

曲,《我们是上帝的战士》这首胡斯革命军的战斗赞歌。在战斗中,在战胜十字军而光荣归来时,战士们引吭高唱的就是这首歌。歌的序曲部分号召人们信赖上帝,上帝会帮助所有为真理和《圣经》原则而战的人;后面的章节则是对各种部队的专门军事指令,它号召战士英勇顽强,严守纪律和互相帮助。

所谓《布丁辛纳手稿》[1]这一诗歌集在胡斯运动诗歌里是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其中《捷克王冠的控诉》与《捷克王冠在匈牙利国王加冕问题上对捷克贵族的控诉》两篇作品,对齐格蒙德国王与他在捷克的追随者,即胡斯起义军的敌人表示愤慨。作者在《预言》中显示出自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称颂布拉格是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他具有反日耳曼思想,但又竭诚爱护为同一社会理想而斗争的日耳曼人。

《布丁辛纳手稿》中篇幅较长的作品还有《布拉格与库特纳山之争》。代表与胡斯起义军为敌的一方的库特纳山,指责布拉格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标新立异,而布拉格则驳斥敌人的反对意见说,事实将表明,胡斯革命会带来新生和进步的事物。

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与编年史家瓦夫希内茨(1370—1437)用拉丁文写了一首长诗,歌颂胡斯军一四三一年在多玛日利采[2]的胜利。这首歌颂辉煌胜利的《无上光荣的捷

---

① 根据当时捷克的布丁辛纳城取名,该城现在民主德国境内。

② 位于捷克西南部的一座小镇。

克王冠之歌》,是胡斯运动文学的杰出作品，是一篇捍卫胡斯革命理想的辩护词和对胡斯革命军道义力量的颂歌，整个作品洋溢着作者热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

胡斯革命运动对我国社会与文化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它作为群众运动，加速了捷克语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中的胜利。捷克语赢得胜利，成为公文、法庭审判、议会讨论及城市志等文献的正式语言。

使文化大众化是胡斯革命运动的一项主要功绩。在此之前，一直为富人所享有的文化珍品，成了人民易于接受的财富。胡斯运动给以前被人嫌弃和轻视的妇女提供了教育条件，胡斯军的妇女的书本知识甚至使敌人感到惊讶。①

胡斯运动使得中世纪基督教徒最普遍的读物《圣经》更易为人民所接受。《圣经》不仅是他们宗教知识的源泉，而且对决定与实现社会改革也常常是一种启示。

胡斯革命运动的意义超越了捷克国界，它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又是废除封建制度的初次尝试。胡斯革命的领袖与思想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的斗争不仅是民族斗争，而且具有全欧洲的意义。

因此，胡斯革命运动的宣传工作也面向国外，这种宣传品大部分是用拉丁文撰写的，包括阐明胡斯学说原则的宣言在内。此外还通过个人的宣传来发挥作用，特别是利用

---

① 著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阿埃尼埃塞·西尔维亚·皮科洛米尼，即后来的罗马教皇庇护二世，也不得不承认，胡斯运动中的妇女甚至比一些意大利牧师更为熟悉《圣经》。

各种书信往来或胡斯军远征国外的时机。胡斯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国外引起了反响。一些德国城市出现了革命活动。在莱茵河畔、波兰、塞德米赫拉特斯科①，特别是在斯洛伐克，发生了农民暴动。

斯洛伐克虽然未发生象捷克那样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但一四二八至一四三三年胡斯军在斯洛伐克的直接行动也传播了进步思想，激起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驻守斯洛伐克城市的胡斯军帮助摧毁了德国贵族在斯洛伐克城市的统治，并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由于胡斯运动的功劳，社会行政机关开始使用斯洛伐克民族语言了。

一四四〇至一四六二年，杨·依斯克拉领导的胡斯军完全控制了斯洛伐克中部和东部。在利潘尼战役中失败后，一部分胡斯军在斯洛伐克组织"兄弟军"，与当地贫苦民众一起创建了反封建斗争的据点。

胡斯起义者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意识同反对剥削者和民族敌人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并不因为外国人的语言不同而对他们一概加以仇视。胡斯有句名言，精当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要比一个坏兄弟可亲"，德国贫民从胡斯军中寻求支持，一些日耳曼人参加了胡斯军的行列。

由于所有这些进步因素，胡斯运动成为我国民族新时

---

① 今罗马尼亚西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

代一切革命传统的源泉与推动力。在任何时候，只要人民起来反对压迫、不自由、社会的与民族的不平，总是想起英勇的胡斯运动的先驱们。兄弟军继承了胡斯起义者要改变封建社会制度的斗争。白山战役之前，当反对改革的压力加剧，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加剧时，在胡斯革命传统的影响下，民间自发产生的歌曲在非天主教牧师的传道中重新得到传布。

白山战役之后，统治者竭力想从捷克人民中消除对胡斯、日什卡、普罗科普·维利基和胡斯军的一切怀念，企图永远毁掉竖立在捷克人民心中的胡斯丰碑。耶稣会的教徒们舞文弄墨，极力丑化、污蔑胡斯起义军，攻击他们毁坏文物古迹，对他们加以诽谤和嘲笑；人民却忠于胡斯精神，胡斯的传统存在于人民之中，十七和十八世纪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就足以证明。

民族复兴时期，我们的作家向人民描述了胡斯军的爱国主义和坚毅勇敢的精神。十九世纪的进步作家和艺术家，不论是音乐家斯美塔纳、美术家阿列什和马内斯还是文学家狄尔、捷赫、伏尔赫利茨基以及伊拉塞克，都把胡斯革命时期作为捷克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来描述。在这方面，帕拉茨基领导下的进步历史科学，包括他的《捷克民族史》一书，也给过他们不少帮助。

在伊拉塞克的著作中，胡斯革命时期在文艺上的反映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伊拉塞克的卷帙浩繁的小说、剧作如《在激流中》、《抗击众敌》、《杨·胡斯》、《杨·日什卡》、《杨·

罗哈奇》、《胡斯派国王》、《兄弟军》和《为他人效劳》，对胡斯运动从它刚刚发轫、经过最光辉的胜利时期一直到它衰落，都作了全面的描述与反映。

4 从利潘尼战役到十五世纪中叶

(胡斯运动沉寂时期)

贵族与富裕市民的胜利使封建制度得以重新确立。他们竭力将自己在革命时期被剥夺的一切（首先是教会的土地）掌握在手中，只要能让他们拥有其财产利益，他们就心甘情愿拥戴齐格蒙德为国王。直到伊希·波杰布拉茨基(1458—1471在位)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才对贵族的侵吞扩张行为有所遏制，使国家免遭内乱之灾。但为了巩固王权，伊希不止一次对教会作出让步。

胡斯战争之后，劳动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但胡斯运动的思想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人民对重新加在他们身上的奴役并没有屈服，而是对封建主进行反抗，当然只能采用最适合中世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方法，即组织各式各样的"异教"派别。在这些教派里，如同胡斯运动初期那样，产生了关于人人平等、结束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出现救世的农民国王等所谓千年太平说的思想。

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彼得·赫尔齐茨基对文化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

彼得·赫尔齐茨基(1390—1460)出身于沃德尼奥附近

的赫尔齐孩一个穷贵族家庭。对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他勤奋自学，贪婪地阅读威克里夫、什季特尼、胡斯和马杰伊的作品，他通过与同时代文人和牧师的经常交谈，开阔了眼界，加深了文化素养。

赫尔齐茨基不仅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对他目睹的周围社会状况作出反应，而且清理了其他作家作品中的思想。赫尔齐茨基是胡斯运动胜利的见证人，但他不理解大多数胡斯运动者对于既得成就所表现的高度热情。他对胡斯起义军进行的战争持反对态度，拒绝一切战争，包括自卫战争；但在必须改变当时社会制度这一点上，却同胡斯起义军的观点相吻合。

赫尔齐茨基对中世纪的社会制度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原则上拒绝天主教教会的学说，但又不接受威克里夫、胡斯的观点和某些激进分子的学说。他在我国第一个坚决指责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牧师、骑士与服劳役者），他引用《圣经》关于人人本来平等的词句，指出阶级壁垒必须消除。赫尔齐茨基还摈弃奴役、国家权力、法律与教育。

赫尔齐茨基对教会和社会的观点，在他的《布道录》与《真诚信仰之网》这两部最重要的作品中得到详尽的阐述。《布道录》包括人民最易懂的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教义宣讲词。对于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赫尔齐茨基比胡斯看得更为尖锐。

他指责封建主饱食终日，逍遥自在，玩牌对弈，纸醉金迷，沉溺于享乐，用奴役、狩猎和各种任意强加的重负使穷

人处于无权地位。

《真诚信仰之网》是赫尔齐茨基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刻的一部最成熟的作品。作者将真正的基督教学说——福音比作一张网，如同用网捞鱼一样，能把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异教徒和罪人则是那些撕破信仰之网的人。

赫尔齐茨基在作品的第一部分就教会为何趋于崩溃和世俗化作了解释。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教会积聚财富和谋取世俗权利，从世俗与宗教权力的结合中“产生了各个极其狡猾的社会阶层”，正是它们在撕裂着信仰之网。描述这些阶层的特征并对它们进行批判，是作品第二部分的内容。赫尔齐茨基在其中批判了统治阶层、市民阶层、僧侣、大学教师和牧师。

他完全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受奴役的人民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度日，赫尔齐茨基认为他们劳动最艰苦，却受着贫困的煎熬，倍受压迫。

赫尔齐茨基认为，这一切社会不平与弊端都是由贪求财富而产生的阶级差别造成的。根据他的观点，国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祸害。赫尔齐茨基认为，随着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国家也必将消亡。赫尔齐茨基的理想是回到原先的基督徒社会。他根据自己的想象，无疑把这个社会美化为人人充分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了。

赫尔齐茨基的思想既包括进步因素，也含有反动因素。他思想反动的一面，表现在他认为人生目的在于死后的生活，表现在他宣扬悲观厌世、与世无争、勿以恶报恶的原则，

表现在他拒绝一切法制和教育。他的倒退到原始生活的想法也荒诞不经，因为它违背历史发展规律。

然而作为封建社会难能可贵的批评者，他的某些观点使人感到还是符合现代要求的。我们特别赞赏他关于必须消灭社会阶级这一观点。

赫尔齐茨基作品的表达形式与语言运用也促进了他的作品的广泛传播。他虽不能跻身于什季特尼和胡斯那样文笔高超的作家之列，但是他的语言非常精炼、雄辩、富于形象性。他经常使用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形象、比喻以及农村生活日常用语，例如："挑选一头蠢猪作国王，对这头蠢猪来说有什么价值？因为在它看来，发臭的饲料比一顶王冠更有价值。"

从伊希·波杰布拉茨基时期起，出现了最早的游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瓦·夏谢克骑士所著的《列夫先生游记》①。作者曾起草一件公文，旨在争取法国国王站到波杰布拉茨基反教会斗争这方面来。我们所保存的他的游记已不是捷克文原本，而是后来的拉丁文译本。

夏谢克的游记是中世纪古捷克文学中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题材生动有趣，叙述朴实感人，时至今日仍吸引着读者。夏谢克描述他的随行人员在旅途中遇到的惊险故事，栩栩如生。他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自豪感，描绘捷克随行

① 伊拉塞克在为青年撰写的《从捷克到天涯海角》一书中，借用了夏谢克游记的素材。

人员在各个城市的比赛与竞技中所赢得的成绩。他还注意到国外的经济状况、居民的习俗，以及他们沿途所见的一切不同于我国的事物；如意大利北部的土地一年三熟、用骡拉磨等等。

原先胡斯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实际上并不领会这个运动的革命实质。他们与天主教徒的区别仅在于用酒杯领取圣体这一形式上。因此人民对他们日益不满，纷纷脱离圣杯派。他们看不惯圣杯派教会的妥协退让行为，他们对日益加强的封建压迫进行反抗。

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如宗教幻想、拒绝参与一切宗教仪式、逃离现实社会、不参加社会活动，以及希望出现一位"农民国王"来解放被奴役者和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等，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十五世纪中叶，在日阿贝克附近的孔瓦德村，出现一个愿遵循赫尔齐茨基原则的社团。这是受赫尔齐茨基著作影响的那些宗教幻想家团体之一，它实际上继承了塔博尔派的传统。新社团成员互称兄弟姊妹，以《圣经》作为唯一的生活基准。他们强调有道德的生活和体力劳动的意义，保持简朴的礼拜仪式，采集民歌。他们拒绝在国家机关任职、在军中服役，反对宣誓效忠与发财致富。该兄弟会最初仅有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后来，一些骑士和市民也加入了。

尽管圣杯派和天主教徒对他们横加迫害，兄弟会仍然得到了发展。他们也发生过内部纷争，特别在是否应坚持

赫尔齐茨基原则、脱离生活、拒绝教育的问题上展开争论。最后该团体的大多数人表现出较健康的观点，使他们的学说与生活相适应。社团开始关心其成员的文化教养，特别是通过创办学校和文学创作对青年进行教育，这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团体的进步成员的观点所发生的变化，也是十五世纪下半叶传入我国的人文主义新思想产生的结果。

四　封建制度中兴时期的文学

（十五世纪中叶到白山战役〔1620〕）

十五世纪下半叶和整个十六世纪，贵族与市民间的斗争连绵不绝。各社会阶层之间矛盾深化，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从1526年起）的统治同非天主教贵族以及大多数市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除经济竞争外，宗教争端加剧，特别是从十六世纪初开始，路德教派在我国广泛传播，很快在圣杯派教徒中赢得众多的信徒。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一个新的文化与文学潮流，即所谓人文主义开始传入我国。这一思潮作为市民阶层的人生观起源于意大利。新的世界观的信奉者强调人生应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人文主义者尤其反对限制思想自由和阻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教会权威。

人文主义作家，特别是意大利作家，研究罗马与希腊文学，模仿其形式，汲取其题材。他们大都用拉丁文写作。因此人文主义也就是在科学与文学上的复古，因为与中世纪相比，恰恰是古代强调了人间生活的意义。

但通过古代文化的复兴，造型艺术，主要是绘画、雕塑与建筑也得到复兴。艺术家发现了人体与大自然的美，

人间生活的欢乐。他们的作品接近现实。因此我们讲文艺复兴，同时也是指造型艺术回复到古代的模式。

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十四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丁**（1265—1321）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叙事诗《神曲》虽有许多中世纪宗教思想残余，但与之并存的却是丰富的现代因素，即对教皇统治的批判，对思想自由的向往，对认识世界的渴望和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思想。

弗朗杰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其描写爱情的《十四行诗》著称。影响所及，对后来科拉尔的《斯拉娃之女》也起了作用。

乔·薄伽丘（1313—1375）以他描绘意大利市民生活的百篇故事集《十日谈》而成为意大利散文奠基人。他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强调生活的美好的一面。

在我国，人文主义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国际性的，以拉丁语作为文学语言，在选材和表现形式上模仿古代作者；一是本民族的，采用本国题材来加以提炼，但在风格上明显地以拉丁文作品为样板。

本民族的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法学著作家**维克托林·科内尔**（1460—1520），他出身于赫鲁吉姆一个富裕市民家庭，大学结业后在大学任教，后来升迁为高级官员。

维·科内尔是一位坚信不移的人文主义者。他最初用拉丁文写诗，但他首先感到应该做一个优秀的捷克人。这在

他所译的教会作家约翰·兹拉托乌斯特[1]的《论挽救堕落者》的前言中表现最明显。他在前言里说明翻译该书的缘由，主要是为了丰富祖国语言。他认为这一语言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单调贫乏，那样不圆润流畅。凡是希腊语、拉丁语所能表达的，捷克语也能胜任。由此可见捷克语的丰富多彩。"科内尔将那些用拉丁文写作的作家比作往大海里添水、多此一举的荒唐人。而他本人"则将古代真正善良的人们的书籍和著作译成捷克文"，宁可雪中送炭，让穷者变富，"而不愿锦上添花，给富人送礼，向他们献媚，以致使自己成为一个受鄙视、蒙羞辱的人。"

科内尔的《九论捷克的权利、法庭与法律》(约 1500 年)一书，表明他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知识为捷克文学及民族的需要服务的。他把捷克法置于罗马法之上，惊叹古代捷克人怎么能创造出这样完善的法律。

他的《九论》一书激起了贵族的强烈反对，因为科内尔毫不犹豫地抨击贵族企图攫取一切权力。但在贵族的压力下，科内尔不得不另出一个版本，将一些激烈反对封建主的提法改得比较缓和。但未加删改的原版本仍在民间辗转传抄，远比修订本流传得广泛。

除了专供贵族和富裕市民阅读的文学作品之外，十五世纪下半叶还出现一些批判社会状况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人民对现状的看法，继承了十四世纪市民文学进步

---

① 约翰·兹拉托乌斯特(347—407)，拜占庭作家。

作品的传统。中等市民阶层成员创造了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所谓“人民读物”。这当然不是为了今天所指的人民，主要是为市民阶层，但当时这个阶层与人民关系比较近。

因此本来不属于民间的题材也被人加工，以适应新读者的观点。这类作品屡次表达反封建的思想，捍卫人民利益。国王伊希的王宫小丑帕莱切克成为具有人民性的主人公与人民代言人。《杨·帕莱切克兄弟轶事》中的十二篇故事，就是围绕此人展开的（大约产生于15世纪下半叶）。

《杨·帕莱切克兄弟轶事》以其崇高的思想、对穷人与被压迫者的同情而显得出类拔萃。它既注意到官员的徇私枉法、教会的虚伪欺骗与巧取豪夺，又肯定了体力劳动的意义，连王室的臣仆帕莱切克也不规避这种劳动。

帕莱切克这个人物确已深入到广大读者之中，捷克近代文学（如聂鲁达、伊拉塞克）对他的注意，证明帕莱切克是人们所喜爱的人物。

从人人都应受教育这一进步观点在捷克兄弟会员中占上风时起，该团体即成为我国的文化传播者。其成员杨·布拉霍斯拉夫成了文学方面一位伟大人物。

杨·布拉霍斯拉夫（1523—1571）出身于摩拉维亚的普舍罗夫一个市民家庭，在德国大学就读过，对人文主义文化造诣很深。曾在兄弟会学校任教，后成为兄弟会主教。

兄弟会会员对高等文化教育的不信任，直到布拉霍斯拉夫时期还未完全消除。所以布拉霍斯拉夫要从事自己的工作，必须经常克服兄弟会成员对文化教育的抵制情绪。为

了对付这些论敌，他撰写了《驳兄弟会中的缪斯反对派》。他以令人折服的证据使人确信，文化教育能帮助人生活，无知则是人类进步的障碍。

布拉霍斯拉夫从事捷克文研究，二十年如一日，其奋斗成果是写出了《捷克语法》这一著作。作者在书中阐明了书面语言的特点、语言的形象性、外来语的使用和方言等。布拉霍斯拉夫所著《捷克语法》还收集了捷克成语，这表明作者对民间创作也十分关注。

布拉霍斯拉夫翻译《新约》，是他关心普及文化教育的最好例证。他成功地将《新约》从希腊文译成捷克文，这说明他是一位有批判能力的专家和杰出的语言学者。

布拉霍斯拉夫的作品注重文化财富的民族化，因而名声卓著。尽管布拉霍斯拉夫及其他人文主义者的本意是通过创作为市民阶层服务，但他们的作品也能为广大读者阶层所接受。

布拉霍斯拉夫去世不久，兄弟会的神学家便将《圣经旧约》翻译出来。译者之中甚至不乏希伯莱语专家。翻译时还参阅过《圣经》的古老译本。兄弟会员并未重译书中的《新约》，而是将布拉霍斯拉夫的译本略加改动，另册刊印。一五七九至一五九三年，摩拉维亚的克拉利采兄弟会秘密印刷所出版了六卷本的《克拉利采圣经》。

《克拉利采圣经》是捷克文学经典作品之一。洗练而优美的语言成为书面捷克语的典范。《克拉利采圣经》的语言为直到多布罗夫斯基时期才得以完成的书面捷克语规范化

打下了基础。

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白山之难以前，是科学教育著作异常繁荣的时期。当时已出现各式各样的科学专业书，尤其是自然科学（植物标本学、植物志），还有地理著作、游记、各种法学、医学、语言学著作（辞典编纂）、历史，甚至农业与技术著作。整个科学著作都表现出一种普及文化教育的热望，并同宗教迷信进行斗争。

但是，在如此浩繁的文献中，我们很少发现真正出自作家手笔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大多数是从外国语译出或根据外国作品自由改编的。

这一时期，诗歌领域颇为崇尚以富裕阶层放荡不羁的生活为对象的讽刺诗，还有祝贺生日与其它隆重节日的应景之作。宗教抒情诗，特别是捷克兄弟会作家的作品，则为数甚多。

与诗歌一样，戏剧创作也收效不太大。胡斯运动使十四世纪戏剧的发展一度中断。人文主义者虽然关心戏剧，但他们在捷克未曾创作出任何一部出色的戏剧作品。从十六世纪起，根据《圣经》故事用捷克文与拉丁文编写剧本之风又起，但甚至未达到以往时代零星的戏剧片段的水平，更没有象《油膏商人》那样成功地刻画出时代面貌。

以天主教徒和圣杯派教徒为一方，以路德派教徒为另一方，双方进行着无休止的宗教纷争。两个营垒都试图以自己的观点描绘捷克历史。天主教显贵们物色到瓦茨拉夫·哈耶克教士（1553 年卒）来撰写编年史。他的《捷克编年史》叙

述从始祖捷赫的到来至十六世纪初的捷克历史。瓦·哈耶克在其著作中经常引证他本人毫无所知的所谓资料，杜撰若干从来不曾有过的人名，而且事件的年代顺序也常不准确。

哈耶克编年史完全是本着反胡斯运动和反人民的思想写成的。作者在前言中承认，他的著作是为了捍卫上层贵族利益。然而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哈耶克编年史一直是捷克的主要历史教材，因为这本著作是白山战役之后未被耶稣会教徒焚毁的少数书籍之一。今天我们对这部编年史给予肯定评价，主要因为它记录了古老的民间传说，使其免于泯灭，它是我们了解捷克"黑暗时代"① 历史的唯一原始材料，尽管这段历史遭到了歪曲。

胡斯战争之后我国与外国政治文化交往的恢复，促使我们的先辈去了解遥远的国家。但这并非仅仅出于宗教原因，象过去捷克朝圣者去巴勒斯坦那样，据《圣经》记载，巴勒斯坦是基督生活与逝世的地方。十六世纪的旅行者所关注的是更为实际的问题：有许多年轻人在外国，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大学求学；此外，一些西欧国家的经济空前繁荣也吸引着捷克旅游者；还有些政治原因，如土耳其入侵的危险一直威胁着中欧国家，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富裕的布拉格市民奥特希赫·普莱菲特（1523—

---

① 一六二〇年白山战役之后，捷克失去了独立，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几个省份，这在捷克历史上称为"黑暗时代"。

1565)的游记，证明捷克旅游者如何善于敏锐观察并如实描写外国情况。该游记名为《威尼斯和巴勒斯坦游记》(1563)。

普莱菲特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对大自然兴趣甚浓，喜爱描绘城市建筑和各种技术设施，但同时也注意各种植物栽培，估计土地面积的大小，测量港湾，处处都表现出他观察敏锐，充满现实主义精神。

瓦茨拉夫·伏拉吉斯拉夫(1576—1635)以一个年仅十五岁的青年人，参加鲁道夫皇帝派赴君士坦丁堡觐见素丹的使者行列，一年之后使者们被囚禁，备受折磨。过了几年，伏拉吉斯拉夫从土耳其人手中逃脱出来，在祖国将他的经历写成《伏拉吉斯拉夫历险记》。他生前未能出版，直到民族复兴时期仍是一份手稿。

伏拉吉斯拉夫叙事朴实无华，真诚感人，坦率自省，不怕承认自身的过失，如因不谙希腊葡萄酒的威力而酩酊大醉，并为此受到惩罚，等等。他爱讲诙谐故事，也叙述阴森可怕的黑塔监狱里令人毛骨悚然的遭遇。他描绘风景、城市位置、土耳其习俗、疗养地，但书中最激动人心的，还是伏拉吉斯拉夫倾注全部热诚所描述的那一部分章节。

他讲故事的方式具有特殊价值。伏拉吉斯拉夫不用冗长的复合句，也不象他的同时代人那样从拉丁文作品中寻章摘句，以装饰自己的作品，他写得明白如话，好比在对人诉说自己的命运。

富裕的布拉格市民丹尼尔·阿达姆(1546—1599)，是

白山战役之前的一个非凡人物。他作为文学生活的组织者和出版者，其意义远远超出他作为作家的创作活动。他的印刷厂出版过许多标志捷克古代印刷术高峰的书籍。他是一位积极的翻译家、编辑和出版家，自己创作很少，只有《历史日历》的某些部分是他的原作，日历标明一年中每个有意义的日子和捷克与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伏拉吉斯拉夫出版的书籍，其价值主要在于它教育了广大读者。

五　封建制度巩固与专制统治时期的文学

（从捷克丧失独立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1　流亡人员中的捷克文学

白山战役的失败给全民族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后果。哈布斯堡王朝作为胜利者，以死刑来惩罚参与反抗的主要人物，没收贵族与市民的财产，将被捕的反抗者放逐出国。

白山战役之后的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度衰落的时期。但是古捷克文学的进步传统并未随之消失，它继续保持在国外流亡者的作品中。在缺乏物质手段的最不利的条件下，在去国离乡的绝望心境中却产生了一批作品，其中充满崇高思想和对被凌辱的祖国与不幸的民族的深沉眷恋之情。

白山战役之后，流亡者中间出现了一位高于当时捷克文学水平的最伟大的作家，即兄弟会的最后一个主教考门斯基。

考门斯基（1592—1670）有时被称作夸美纽斯，后者是他的拉丁化姓氏。他大约出生于摩拉维亚东南部尼夫尼采

一个捷克兄弟会成员家庭。考门斯基这个姓氏是从他家附近的村子考门纳而来，他的父亲是当地人。考门斯基在国内外学习之后，在普舍罗夫和弗尔涅克兄弟会学校任教。白山战役后，他到处躲藏，但主要是躲在奥尔利采河畔的布朗迪斯。一六二七年对非天主教徒颁布严厉的法令之后，他被迫离开祖国，前往波兰的莱什诺——捷克流亡者、主要是兄弟会成员的避难地。后因英国议会邀请他去英国创办一个用统一语言向全世界推广教育的国际科学院，他才没有在莱什诺继续住下去。

其后数年，考门斯基侨居瑞典，在东普鲁士① 居住的时间更长。他一直希望他们这些流亡者能重返朝夕怀念的祖国。然而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1648)使他的希望破灭了。和平谈判时谁也不愿接受白山战役后的流亡者，不允许他们返回祖国。

考门斯基第二次侨居莱什诺时遭到一场极大的灾祸：瑞典与波兰战争期间，该城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考门斯基丧失了全部财产，其中大部分是手稿。最使他痛心的是丢失了他那无法补偿的字典《捷克语言宝库》，以及他企图用来综述当时所有科学专业的几部著作。考门斯基离开了莱什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友人处受到殷勤接待，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一六七〇年逝世为止。

考门斯基的主要意义在于他的教育著作与文化普及工

① 今苏联与波兰交界处的一个地区。

作。其它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世界迷宫与心灵的天国》，该书于一六二三年写成，一六三一年首次出版。

白山战役之后，考门斯基经历了艰难的时刻。大部分兄弟会成员被迫离开祖国，白山战役的胜利者在捷克恣意横行；此外，考门斯基本人也遭到了不幸。瘟疫流行，夺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生命。这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批判观察，促使他于一六二三年写成《世界迷宫与心灵的天国》一书（初版时名为《世界迷宫与心灵的夏宫》），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讽喻诗集，表现诗人在人世间的历程，他象征性地将这个世界当作一座城市来描述。

一个游人（考门斯基通过他来表现自己）外出见见世面，以便挑选一个合适的职业。途中由一位先知领路。先知劝他对所见到的一切都表示满意，不要非议和批评任何事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与先知同行的还有一位引路者马麦尼：他给游人戴上一副模糊不清的、使一切都变形的眼镜。但游人未受蒙蔽，他将眼镜戴得恰到好处，使它不致妨碍他正确地观察世界。他进入的一座城市象是真正的迷宫，人们熙来攘往，为自己的职业奔波；但事实表明，每种职业几乎都是一场欺诈和骗局。人们戴着假面具，并且不时更换，干着各种劳而无功的事情。贪图金钱、暴利、社会地位和悠闲生活的欲望支配着他们。游人观察手工业者、学者、炼金术士、医生、法官、士兵和社会其它阶层与职业的人们的生活，处处发现尔虞我诈、虚伪欺骗。出于对人类社会这种可怜状况的绝望，他力图弃世而

去，在上帝的召唤下，隐居于自己的心灵之中，进入孤独状态。作品的结尾笼罩着神秘莫测、茫然不知所从的气氛。考门斯基清楚地看到社会的不平，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提出尖锐的控诉，他意识到各阶级之间尖锐的社会差别，但他所指明的脱离"世界迷宫"的出路是虚假的、唯心的、片面的。在亟需解决这一切紧压在心头的问题时，他总是求助于上帝，逃往神秘王国，陷入消极无为的宗教深渊。这就是《迷宫》的弱点，也是兄弟会整个宗教思想的特点。

《迷宫》是一部在文化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作品。它完全如实地刻画了时代、人们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考门斯基本人也意识到自己作品的现实性，他在前言中写道："读者，你将要读到的不是凭空臆造的诗歌，尽管它具有诗的形式，但你将了解到的大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自己将会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在这部篇幅较大的作品里，把我自己在短短几年中所遇到或看到的事情……描绘出来了。"

作品的语言方面，除了存在考门斯基某些同时代人都热中的日耳曼化之外，仍然清新生动并富有表现力，人文主义的风格和句子结构在《迷宫》一书中主要表现在特殊的字、句顺序上。

在考门斯基曾经教过中学的波兰的莱什诺，他完成了两部重要的启蒙教育作品。

其中之一为《语言入门》，最初的版本是拉丁文，后来用捷克文出版，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国际用语——拉丁语教科

书。该书内容充实，结构完善，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被迅速译成所有重要语言。

第二部著作为《幼儿教育手册》。这是一本父母指南，论述如何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教育。我们今天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就是根据考门斯基著作的原则创办起来的。

考门斯基在莱什诺还完成了他在祖国即已着手撰写的最重要的著作《大教学论，又名教学艺术》（1657 年用拉丁文出版）。考门斯基在这部著作中阐明了教学与教育的普遍原则。该书是为捷克教师、保育员和捷克青年而写的，因为考门斯基希望他们这些流亡者能重返祖国。他谈到写这本著作的缘由时说道：

“我们看到，我们祖国的教会与学校濒临毁灭，对于这场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我为什么要沉默呢？仁慈的上帝总有一天会赐予我们一种希望，促使我们尽力避免未来的毁灭。我们别无其它考虑的余地，当务之急是给爱国青年以帮助，尽快办起新学校，提供优质书籍，采用顺乎自然的简易方法，使青年对文学艺术、懿行美德和虔诚信仰的热爱之情象花朵似地重放异彩。”

考门斯基认为，捷克人应该走在世界进步的前列，不应坐等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超过自己。

考门斯基还着手编写过一本名为《古代捷克人的智慧》的捷克成语集，作为对《大教学论》的补充，这本书吸收了无穷无尽的民间智慧宝藏，但一直作为手稿保存着，直至现代才得以出版。

考门斯基实际上是以另一本著作《画中世界》对《大教学论》作了补充，此书在世界上以各种文字出版过无数次。《画中世界》内容极为完善，是当时依靠图画进行外语(拉丁文)形象教学的一本极富于独创性的参考书。

这一教育著作使考门斯基生前就已蜚声于世。他提出的教学程序法被广泛采纳。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竭尽全力，要在学校里废除中世纪那种死板的咬文嚼字的教授法以及对词句强记硬背的机械学习方法。他提出学生必须根据实物掌握概念，通过感官观察事物的原则；主张教学应该形象化，并要运用实例。考门斯基认为，讲授必须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符合教育目的。除了培养理智，还应陶冶和激发人的感情，锻炼人的意志；教学程序必须从已知到未知，从简单到复杂；学校教学要面向真正的实际的生活需要。他主张废除当时学校普遍采用的粗暴的惩罚，通过对学生的和善态度、优秀范例和说服教育来加强纪律。

关于外语教学的那一章很引人入胜，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大胆创举。考门斯基按年龄划分教材。教学程序为：首先是听，然后读、反复地读，抄写课文，模仿读到的东西，口头复述，最后是对话。

考门斯基根据学生年龄(从六岁起)，将学校分成四级。第一级为家庭幼儿教育(学龄前教育)，第二级是小学，第三级为拉丁学校(中学)，第四级为学院、大学。每个有孩子的家庭都该是一所幼儿学校，每个村庄和城镇均设小学，较大的城市有中学，每个国家都建立高等学校。

教育应敞开大门，学校应不分种族、社会出身、性别与年龄，对人人开放。每人都应免费受到教育。

考门斯基还十分强调体育训练与劳作技能，在儿童时期就必须培养强健的体魄。

《大教学论》最后一章，包括有如何在捷克实施新教育体系的细则说明。考门斯基一直坚信他能在解放了的祖国实现他的教育改革。这位伟大的教师断言：师资不会短缺，十五年之后，一所好学校就能培养出数百名教师。课本将由考门斯基及其同事编写。剩下的就是着手对学校进行改革了。

他呼吁，谁都不要这样议论：

"'我们为什么要率先干这类超出常规的事？让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去开头吧！且看他们收效如何再说。'但愿我辈切勿这般怠惰，甘落人后，自叹不如，缓缓爬行，而应让别人在某时某事上也看到我们遥遥领先……啊，亲爱的捷克人啊，在这类事情上我们应比其它民族更深谋远虑，因为在过去，同其它民族相比，我们学校办得差，我们被摒弃于其它民族之外，处于黑暗之中，受尽外族的蔑视与嘲笑。……寻根究底，原因是，一有需要，我们就求助于外国人，吸引他们来到我国，付以重金，这对全民族来讲是耻辱，也是损失。或者让外族移居我国，他们自己可以受教育，我们则无此机会，只好任他们扼杀和压制我们和我们的语言。目前我们有多少比外族更为能干的才高识广之士，陷入虚荣、冷漠、狂热、懒散和各种丑行之中，回想起我国的统治

者、我们的骑士、我们的城乡人民如何度过时光，我们就毛骨悚然……外国人向我们卖弄才智，压制我们，分化我们，蹂躏我们，……这一切原因何在？就因为我们缺乏训练有素的青年……”①

考门斯基在教育与教学上的奋斗，起因于捷克宗教改革和捷克人文主义最优秀的传统。考门斯基的教育著作为科学施教奠定了基础。各国都根据他的方案筹办学校。他编写的教科书被译成世界所有文字出版。

除了教育著作，即考门斯基最伟大的贡献之外，这位“各民族的教师”还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力图将所有知识成果概括于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他毕生忠于这一志愿，为大众写过一系列普及科学知识的著作。

考门斯基还以其高尚的人道主义原则，为争取各民族相互谅解与世界和平而斗争。他尽力揭示民族之间的战争根源，探求如何永远防止战争的手段。他在《迷宫》一书中即指出，出现社会不平的根源，一方面在于财富集中，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的贫困。财富集中、各民族财富不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引起各民族之间持续的血腥战争。考门斯基尖锐地谴责战争：

“要将战争作为一种兽行予以摒弃，因为只有人性才适合于人类，纠纷则可以通过正式法庭的裁决加以排解。”

考门斯基为所有民族要求和平，因为只有和平能为各

---

① 引自《大教学论》一书。

民族带来幸福。他认为只有通过发展普通教育和世界和平组织才能取得和平，考门斯基根据当时的时代精神所设想的和平组织，当然是难以实现的。

考门斯基为此目的所写的著作《光明之路》，为和平解决各民族间的一切矛盾而热情呼吁，他认为全人类象兄弟般友好相处的原则，只有通过高度的教育、道德水平和民族博爱才能实现。

考门斯基的著作具有世界意义。他有关教学与教育的观点为教育开辟了新的道路。启蒙学家们继承和实现了他渊博的思想。他为各民族间的宽容谅解，为人性与永久和平所作的崇高努力，以及他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数百年来一直在对我们发挥作用。考门斯基是继胡斯之后深刻影响欧洲文化教育发展的最伟大的人物。

2 国内文学

在白山战役之后逃往国外的流亡者当中出现了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但由耶稣会会员控制的国内文学，却几乎完全处于为反动政权效劳的境地。当捷克文学在国外因考门斯基的作品而盛极一时之际，国内文学却在苟延残喘，奄奄一息。

耶稣会教徒加强对学校的监视，控制书刊审查与印刷，对一切文学创作实行监督。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力压制对胡斯运动时期的一切报道，企图让人们彻底忘却白山战役之

前捷克人的存在。耶稣会信徒们通过宗教狂热，宣传豪华铺张的祈祷仪式与教会盛典，销毁古书(如«柯尼阿什»)，同时也通过他们本身的创作，使整个民族投入天主教会的怀抱。在他们的作品中，宣传性小册子、圣徒传记、充满神奇色彩和描绘罪人在地狱受惩罚之类的宗教狂想占了优势。耶稣会派的诗歌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圣徒传奇材料或宗教抒情诗。尽管使用的是人民易懂的语言，但这并不是人民文学，因为它具有反人民的目的：企图将读者争取到教会一边，教育他们对统治者百依百顺。

学术性著作受到轻视，即使稍有一些(如历史)，也是用拉丁文写成，并且大多具有鲜明的天主教倾向。

然而在注重捷克历史研究的作家中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到国家当前令人失望的政治状况、日益严重的日耳曼化和民族意识衰退之虞的威胁。

耶稣会会员**博胡斯拉夫·巴尔宾**(1621—1688)就是其中一位主要代表。他由于自己的文学活动和爱国主义思想，被怀疑反对政府，受到上司的追究。根据那些痛切感到民族堕落的爱国朋友的建议，他写出一部拉丁文著作，捍卫本民族运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尖锐批评背离本民族的贵族阶层。巴尔宾谴责维也纳宫廷从学校、机关和教堂排斥捷克语的那种民族政策。他指出：“首先应享有文化珍品的是本国人民……日益趋向专横的政府……给民族语言制造混乱，常常把一些外族因素强加在被奴役者头上……”

巴尔宾的诗后来成为民族复兴时期爱护捷克语的榜

样。巴尔宾还出版过一本关于捷克历史的大型著作，这对我国早期民族复兴工作者研究历史起了推动作用。

白山战役后民族文化的衰退最明显地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语言水平上。这种缺乏古代书面语规范的语言，这种没有杰出人物加以研究和普及的语言，迅速衰落退化。耶稣会成员为了使书面语接近口语，将非书面语的成分(方言、俚语、德语词汇等)硬塞进书面语言。捷克爱国者痛心疾首地注意着祖国语言的这种衰退。然而因为他们自己已失去牢固的语言感，除了已经捷克化的外来词外，他们生造了若干不正确的、不伦不类的新词。这就使捷克语的衰退更为加剧。我们把语言纯洁化这一行动称为国语纯化主义。

3 民间文学

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是捷克民族古老传统的唯一支柱与保存者。民间誊抄者抄录捷克古书，把它们收藏起来免受耶稣会员的查抄，他们还记录社会事件、战争消息、农民暴动及一些私人事件。

在这些悲伤的年代里，文学创作没有反映出民族的感情与思想，但人民中主要的健康力量在自己的口头文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民间文学创作没有被记载下来，而是口头吟诵，代代相传。

捷克和摩拉维亚大部分民歌产生于白山战役之后的时期。民歌证明我国人民拥有丰富的艺术创作。被奴役的人

民用民歌来减轻本身的劳役。他们用巧妙的讥讽去对付主人及其爪牙，也用民歌表达欢庆节日的心情、对生活与大自然的热爱。

人们也用民歌嘲笑主人，用复仇的呼声威胁剥削者。“霍特茨小庭院啊，谁也不会赞赏你！你如同人间地狱，只是还没有人烧毁你。没有人烧毁你，等到衣冠楚楚的主人一命归阴，一定有人将你烧成灰烬！”

集市小曲是民间创作的一个特殊部分，歌里吟唱着偶然的遭遇或不幸事件；更确切地说，集市歌曲是市民阶层的作品，不象民歌那样直截了当，也没有民歌那样的艺术纯洁性。

民间文学中也出现了传说与童话，淳朴的人们通过它们表达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世界的向往，正义在那个世界将主宰一切，真理将战胜丑恶。民间谚语则表现出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智慧。

《农民祈祷文》这一诗歌作品最有说服力地唱出了被奴役的农民的苦难。无名的民间作者在该诗中以热情的语言，要求皇帝约瑟夫二世帮助农奴摆脱贫困与绝望。

然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人民中主要的健康力量也没有消沉下来。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农民起义和暴动此起彼伏（如瓦拉什起义运动、捷克农民起义、霍特人的反抗、斯洛伐克的蹊径英雄）。我们可从口头民间文学中找到这些反抗运动的回声。杨·斯拉特基·科奇纳或斯洛伐克与东部摩拉维亚的绿林好汉、打抱不平的人民复仇者杨诺西克和

他的"王岭好汉",都是农民自觉进行反农奴主斗争的英雄。

十七和十八世纪，民间文学中也产生了民间戏剧。作者们以人所共知的《圣经》或耶稣会的感化剧中的题材，来说明当时的环境，或表达他们对当前事件的看法。还出现了圣诞节剧、复活节剧，并长期保留在捷克农村民间习俗之中。

民间文学在压迫最严重的时期增强了人民的斗志，发展与丰富了捷克语言，保持了它的生命力和诗歌般的清新生动。只要捷克语言保存于人民之间，只要人民顶着残酷的压迫不让自己的核心力量遭到摧毁，就无须对人民的未来感到绝望。一旦新时期的曙光出现，人民挣脱了农奴制的枷锁，就会成为新的民族力量的源泉，就会从中涌现出数以千计的启蒙学家，他们以卑微而又勤奋的工作，使我们民族赢得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成就。

从胡斯运动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捷克文学小结

胡斯运动强烈地震撼了我国的封建制度。胡斯在其作品中批判了世俗的与教会的封建主，他还关心被奴役人民的地位和那个时代的社会不平。他为了使人民接受当时的文化财富（译成本国语的《圣经》、民歌）而作的努力，他对于他所认识的真理表现出来的勇敢与忠诚，为整个胡斯运动树立了榜样。

胡斯运动时期的文学完全站在革命一边，自觉地为胡斯起义军奋力以求的理想而斗争（如《布丁辛纳手稿》）。胡斯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革命的运动，在最困难的年代，它的传统总是给我们民族增添力量。

胡斯革命运动失败后，封建制度重新趋于稳固。文学则表现了对社会状况、对国家与教会的无情批判（如赫尔齐茨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民族的人文主义作为市民阶层的思想在我国传播开来。人文主义文学放弃了胡斯运动的革命要求，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更多地面向生活（如维·科内尔）。由于人民各阶层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十五世纪出现了兄弟会。他们的作家，特别是杨·布拉霍斯拉夫的作品，表现了为广大人民阶层普及文化教育的努力。

在各派的反封建文学中产生的所谓民间读物，经常具有批判社会的倾向（如《杨·帕莱切克兄弟轶事》）。十六世纪文学主要以使人增长见识（游记）、受到教益和普及知识为己任（如瓦·哈耶克的编年史）。

白山大难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一个最艰苦的时期。非天主教知识分子被迫远离祖国，国内对被奴役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压迫，文化全面衰退。国外却出版了考门斯基的大部分著作，古代捷克文化最进步的传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高度发扬。他的教育著作至今仍具有世界意义。《迷宫》是对十七世纪社会状况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捷克文学在我国遭到摧残与毁灭，巴尔宾则是捍卫捷克语权利的唯一的光辉形象。人民成为祖国语言的使用者和捍卫者。在这

悲惨的年代里，他们仍然创造出口头文学，向敌对文化和外来统治者的文化作斗争。

六　民族复兴时期

1　从民族复兴初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大约从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称为民族复兴时期。民族复兴是一次伟大的社会运动，其表现首先是：民族解放斗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新时期的捷克民族的形成，以及争取经济与文化独立的斗争。

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我国发生的重大变化，给这一伟大的民族运动提供了可能条件。在此以前，经济上特别先进的西欧早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对陈旧的手工业生产来说是一种无可争辩的进步。

随着经济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思潮。西欧各国，主要是法国，出现了哲学上称为唯理主义的启蒙思想运动，启蒙学家要求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遵循理智、仁慈宽容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自然平等基础上的关系。这与新兴社会阶级、主要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反对贵族特权的斗争密切相关。

启蒙学家以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发现的基础上的新世界

观为依据。其目的在于传播启蒙思想、文化知识和自由思考，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与盲从现象。

法国革命前其著作影响最大的法国启蒙学家之一是伏尔泰(1694—1778)。他是一位机智敏锐、举世闻名的作家，反对任何不自由现象的、勇敢与不调和的战士。他要求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但伏尔泰既非民主主义者，也不是一位革命家。他虽然抨击教会，但未从根本上反对宗教。他认为，为了使人民唯命是从，宗教还是需要的；他批判社会制度，却将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有教养的开明统治者身上。卢梭(1712—1778)的作品比伏尔泰的思想影响更大，他宣称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卢梭的主要思想是向往大自然一般的淳朴生活，谴责对人的天性起腐蚀作用的文明。他强调人的生活的感情方面，因而对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思想和所有欧洲各国的文学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法国启蒙学家也曾力图制订合理的法律，消除中世纪的经济依附状态，使全体公民享有更大的平等权利，并使国家行政得到更好的安排。在经济上，法国市民阶层在十八世纪已成为成熟的社会阶层，那里进行了彻底的反封建斗争，终于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3)。

法国启蒙学家的思想在一些欧洲君主如奥皇约瑟夫二世，或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那里引起了反响，他们由于害怕人民的不满情绪，开始根据启蒙学家的原则在本国实行若干改革。

这首先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发展中的工业生产要求日益众多的工人，所以必须废除对被奴役人民的最繁重的压迫——农奴制。一七八一年奥地利废除农奴制并宣布信教自由①，使农奴获得了解放。从此他们能够自由迁居，送孩子上学②。这对我国的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捷克知识分子正是从这些不久前还是农奴的孩子中间成长起来的。农村居民涌进日耳曼化的城市，后来主要是涌进布拉格，使得城市增加了捷克因素。主要从工匠、商人、手艺人中产生出来的捷克资产阶级成为民族运动的支柱。但他们在经济上仍然很脆弱，必须与富裕的德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此，捷克资产阶级是民族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

约瑟夫的某些改革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在机关和学校，德语被定为唯一的通用语言。更可怕的危险是，白山战役失败后，捷克语尚未定型，而捷克民族中的多数又是农村居民和软弱的市民阶层，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还在成长之中。

复兴时期的科学，特别是在评价古捷克史方面，力图摆

---

① 宣布宗教自由并不意味着信仰完全自由。宗教自由特许权只承认新教徒（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基督教的一派，以创始人加尔文命名），而不承认捷克兄弟会。罗马天主教教会仍占有特权地位。

② 中学教育掌握在耶稣会等宗教团体手里，耶稣教会被废除，教会影响受到限制之后，开始出现五年制中学，学生毕业后再学为期两年的哲学，作为上大学的准备。

脱宗教偏见。所以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力求批判地与公正地研究民族的历史，以清除白山战役后的一切臆造与偏见。他们注意的中心最初是捷克远古史，不久便转向胡斯运动这个被认为是捷克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其后又出现一种观点，认为白山战役之后的时期是民族衰落时期，民族复兴派则努力清除白山战役之后的黑暗时期遗留下来的后果。

民族复兴早期的科学家多数为僧侣人员，他们研究修道院藏书室的旧书刊与手稿，收集档案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并着手出版。最老一代的复兴派在著作时一般使用德语或拉丁语，但他们比较注重民族生活的需要，甚至也直接注重捷克语言的需要。

在老一代民族复兴的科学家中，弗朗季谢克·马尔丁·佩尔茨(1734—1801)首先决定用捷克文写作，他是布拉格大学第一位捷克语言文学教授。在一部篇幅很大的编年史里，他记述了从开天辟地到查理四世时期的捷克历史。佩尔茨又为缺乏优秀书籍的读者出版了捷克古籍。

复兴时期的戏剧

人们讲的话往往比书本上的语言影响更为强烈，也更富于魅力。复兴派对此十分清楚。因而使捷克语戏剧能定期上演，为普通观众创作合适的剧本，就成为这一代民族复兴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批经常公演的布拉格剧场，即斯塔沃夫剧院(现为狄尔剧院)和木棚剧院，后者当时

也称为爱国剧院。由于年轻而热情的戏剧家普罗科普·谢吉维和坦姆兄弟的功劳，木棚剧院成了捷克近代演剧的基地。每天晚上和下午演出，观众兴趣很大。

作家、演员瓦茨拉夫·坦姆(1765—1816)是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戏剧工作者。为了戏剧，他甚至放弃了功名利禄。他的爱国戏剧常取材于捷克历史，甚受观众欢迎。

木棚剧院主要上演改编的外国剧，但也不乏捷克文原本戏剧，这些戏主要取材于历史，并负有宣传爱国的、启蒙的使命。

木棚剧院必须对付财政拮据的困难，同设备优良的德意志剧院竞争。十八世纪末，木棚剧院停止演出。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新的戏剧高潮。这个时期，甚至一些村镇也破天荒上演了一批戏剧。中学教师瓦茨拉夫·克利门特·克利茨佩拉(1792—1859)为根据民族精神去发展戏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努力为捷克剧场创作反映当代生活的娱乐性喜剧，这些喜剧试图以其对自私、吝啬和人的其它缺点的批判，推动民族社会的改造。克利茨佩拉的多数剧作取材于当时的城市与农村生活，通过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与民间人物形象来对观众发挥作用(如《神奇的礼帽》、《齐为祖国作贡献》)。克利茨佩拉还创作过历史剧和短篇历史小说。

捷克新诗的开端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民族生活渐趋活跃，促使人们对要

求更高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对诗歌创作进行初步尝试。复兴时期的作家意识到，仅仅出版古捷克文学书籍已远远不够，必须为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创作更为优雅的文学，如诗歌。

瓦·坦姆汇编的《诗集》(1785)是捷克近代文学中第一部严肃认真的诗作。诗集主要包括较老的作者的诗，目的在于显示过去捷克诗歌的成熟程度，还收录有希腊、罗马诗人或当代外国作家的译作，以证明捷克文也能承担翻译外国质量较高的文艺作品的任务。但同时代的捷克作者的诗作在集子中为数甚少。

坦姆这本诗集出版后十年，出现了以安东宁·雅罗斯拉夫·普赫曼耶尔为首的新的诗歌团体，这个诗社的《诗歌选集》中大部分为情诗、警句和知识性的诗歌。其中多数题材同当时外国流行的诗歌，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诗歌相近。有歌咏大自然宁静生活的颂诗，也有历史题材的诗。普赫曼耶尔诗社的另一本诗集和第一集完全相同。

天主教徒和第一个捷克近代诗歌流派的领导人**安东宁·雅罗斯拉夫·普赫曼耶尔**(1769—1820)写过著名的《杨·日什卡颂》，歌颂胡斯运动的英雄。作者认为，日什卡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普赫曼耶尔在他的创作中从更发达的外国文学，主要是法国及波兰文学中汲取养料。他最喜爱寓言，由于它的教育意义，这种形式在启蒙时期很受重视。

普赫曼耶尔诗社为捷克新诗奠定了基础。诗社的成员

把捷克古代文学及其它民族的诗歌奉为优秀榜样。普赫曼耶尔诗社的诗人放弃了格律诗的陈旧尝试，坚决贯彻按重音规律作诗的原则，从而消除了旧诗的不稳定性。他们最优秀的作品摆脱了外国模式中词藻华丽的弊病，并表达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

为人民创作知识性散文

复兴时期的作家不仅为读者群众出版以前的作家的作品（«达利米尔编年史»、哈耶克的著作、伏拉吉斯拉夫回忆录），还为群众写书，传播进步的启蒙思想，反对迷信与宗教偏见，向读者介绍约瑟夫的改革，教育人民更好地经营管理，增强民族自豪感。这些往往并非杰作，但艺术平庸的书籍却完成了重要的教育任务，为提高人民的民族与社会觉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启蒙作家还通过游记、历史与科学著作向人民传播文化知识，大力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一切取决于平民”，这就是致力于这种群众教育工作的主要代表瓦·马·克拉麦利乌斯的名言。

瓦茨拉夫·马撒伊·克拉麦利乌斯（1753—1808）懂得，为人民出版的报纸与书籍是多么有效的群众文化教育工具。最初他发行森费尔德[①]的«布拉格报»，后来又出版自办的«布拉格邮报»（从1789年起）。除刊登国内外的政治新闻外，并向读者报道工业情况，指导农民更有效地经营管

---

① 森费尔德是一个报馆老板，报纸的发行人与印刷者。

理。报上还刊载有关戏剧公演与新书出版的消息。克拉麦利乌斯又大力向农村作者约稿，因此他的报纸很快就传到农村，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他的报纸还刊登斯洛伐克作者的稿件，从而加强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团结。

克拉麦利乌斯的出版活动不断发展，一七九一年他创办了名为"捷克刊行社"的出版与发行企业，主要出版捷克古代文学作品。

"捷克刊行社"成为布拉格爱国主义者、农村读者以及初学者的文学与社交活动中心。他们在此购买书籍，或讨论文学与社会事件。

克拉麦利乌斯是群众文化工作者的榜样，他通过自己从事的新闻、文学创作与组织工作，懂得人民最需要什么。他忘我地为本民族工作，堪称同代人的榜样。

为捷克现代语言的规范化而斗争

语言，作为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的标志，受到民族复兴科学家与作家的殷切关注。白山战役之后，文化严重衰退，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书面语言，赋予它以固定的语言规范与法则，使之从口语提高到文学艺术语言的水平，丰富它的词汇，并根据变化中的经济关系、新的社会需要、科学及工业发展的要求创造专业术语。

在同外来的官方德语进行的艰难斗争中，首先要捍卫本民族语言。捷克作家通过强调捷克语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其词汇的丰富以及它与其它斯拉夫语的亲缘关系，证明

捷克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性，从而进一步指出捷克语在现代生活中具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为数众多的所谓“保卫捷克语”组织的活动内容，其榜样是白山战役后出现的巴尔宾保卫捷克语的组织。

我国民族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完成了捷克现代书面语言规范化的任务。

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1753—1829）曾任牧师、贵族家庭教师，后来单独从事科学研究。一七九二年到瑞典和俄国考察，从档案中查找捷克古代文学资料。

多布罗夫斯基对捷克古代史、捷克和斯洛伐克语言学、文学史及辞典编纂学作过研究。

在多布罗夫斯基的大型著作中，重要的有用德文撰写的《捷克语言文学史》。该书阐述了捷克语的发展，特别是胡斯运动时期和白山战役后的发展。多布罗夫斯基在这部著作中除介绍捷克语的发展之外，还叙述了捷克文学的历史。著作的主要意义在于指出了捷克文学的历史发展，正面评价了胡斯、胡斯运动与考门斯基的意义。

多布罗夫斯基在其《捷克语法详解》一书中，对语法原则作过最好的概括。该书对复兴时期的书面捷克语规范化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多布罗夫斯基在这部著作中阐明了语言的整个系统及其规律性，例如：根据原形词干首次将捷克语词分为六大类。

但是多布罗夫斯基的兴趣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历史，他经常意识到为了新文学的需要，必须创造出书面语言并使

其规范化。多布罗夫斯基正确的捷克语韵律学原则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针对从前诗人们运用重音与长短音交替韵律时的不稳定性，多布罗夫斯基确认捷克语具有自然的重音。

多布罗夫斯基访问俄国之后，更加经常地、系统地致力于斯拉夫问题的研究。他是探讨斯拉夫民族、语言、文学与历史科学的所谓“斯拉夫学”的创始人。多布罗夫斯基最伟大的斯拉夫学著作为《古斯拉夫语基础》。该书主要研究古斯拉夫语的文法体系、语音学、词法、句法和古斯拉夫文学史。这部著作意义重大，是研究古斯拉夫语的案头必备书。

多布罗夫斯基是我国民族复兴的重要人物。他关于捷克与斯拉夫语言学或捷克文学的著作具有先驱的意义。多布罗夫斯基的批判精神、科学的严格性和对他所认识的真理的忠诚，为人们树立了榜样。

政治反动时期的民族复兴运动

拿破仑战争时期与一八一三年拿破仑失败以后，奥地利出现了对当时欧洲来说已很明显的政治反动时期。统治者们出于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的忧虑，建立了所谓神圣同盟——最反动的欧洲统治者（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的联盟，其任务是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

奥地利加强了警察制度，重新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政府机关开始迫害捷克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出现了因奥

地利政界最反动的一个大臣而得名的漫长的梅特涅反动时期。捷克民族运动陷于困境，但并未瘫痪。农村新生力量之进入城市和捷克知识分子的成长，使得民族运动在不利条件下仍然有所加强。明显的事实是，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民族复兴的牢固基础，复兴运动已不再是寥寥可数的几位热情的启蒙学家的事了。

民族复兴初期的文学创作侧重语言方面。二十年代，荣格曼那一代人即已从捷克语中创造出文学语言，并开始组织民族性活动，最初主要是科学方面的活动（出版科学杂志，建立博物馆和“捷克马季采学社”）。二十年代进入社会生活的这一代人，竭力向本民族介绍应该成为民族感情的支柱的光荣历史的图景。所以复兴时期的作家都面向胡斯运动时期，把它看作捷克历史最光辉的一段。他们主要强调胡斯运动具有民族性与人民性。对他们来说，胡斯是坚韧不拔和对真理忠贞不渝的象征，是反对中世纪最大的权威——教会的不屈不挠的战士的榜样。他们称赞日什卡和胡斯起义军是为争取人民利益、反对封建主而斗争的民族英雄。帕拉茨基的《捷克民族史》为捷克民族的过去绘出了一幅最光辉的图画。

意识到数量微弱、政治上不自由的捷克民族是伟大斯拉夫家庭一个成员，这种斯拉夫思想对捷克民族复兴也具有伟大意义，而对于斯拉夫主义的科学兴趣，对斯拉夫语言、文学以及斯拉夫人历史的研究，更加强了这种斯拉夫人亲密相连的思想；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经过捷克国土的俄国

军队的直接接触，更加深了这一思想。认识到所有斯拉夫民族之间有着血缘关系，当然主要是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有着血缘关系，这种思想对民族运动是一个强大的支柱。这种思想在科拉尔的《斯拉娃之女》和切拉科夫斯基的《俄罗斯歌曲回声》两书中，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巴维尔·约瑟夫·沙法希克的《斯拉夫古代文物》，则从科学上使这一思想更为完整。

两部手稿的发现也有着加强民族意识的作用。从二十年代起，民族复兴作家们的注意力日益转向农村，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农村人民是民族的核心。他们通过采集民间创作和根据民间诗歌创作出来的作品（即所谓回声诗歌），表现了他们对人民及其文化的兴趣。这种回声诗歌旨在振兴诗歌创作，用活生生的、民族与人民的精神来替代它的书面模式。在这一方面，切拉科夫斯基不仅以他的采风活动，而且主要以他的《捷克歌曲回声》而独占鳌头，居于首位。

这一时期文学界的中心人物则是约瑟夫·荣格曼。他为创作艺术文学语言所作的努力，为丰富捷克书面语言并使其规范化以及为科学民族化所作的斗争，代表了整个他这一代人的纲领。

约·荣格曼(1773—1847)曾先后在利托姆涅希采和布拉格的中学任教，很快就使布拉格的爱国团体聚集在自己周围。

荣格曼对民族复兴第二代人的意义，正如多布罗夫斯基对民族复兴初期的意义一样。荣格曼不同于有时对捷克

语的前途持怀疑态度并严格按理智办事的多布罗夫斯基，他是一位热情的不倦的工作者，对捷克民族的未来有着坚强的信心。他以诗人、翻译家、科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史家及文化生活的组织者而名噪一时。

荣格曼译过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关于两个印第安人在绝妙的北美大自然中相爱的短篇小说①、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笔下的巨型宗教史诗《失乐园》，以及德国诗人的作品（歌德的叙事诗），这些译本比他本人的诗歌创作意义更大。他译出这些作品是为了证实捷克诗歌语言的成熟性。

一八一六年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奥地利的中学讲授捷克文，但缺乏课本，荣格曼便着手编写一部既是捷克文学理论又是语文读本的书，于是《语文选编》一书问世了。该书分为两部分：理论性绪言和文学作品举例。在选录的作品中，荣格曼也列入了从胡斯到考门斯基时期以及古代捷克作者的著作，但大部分选自他同时代的捷克与外国作家的作品。《语文选编》成为捷克语中第一部这一类的读本，许多文学理论概念在书中第一次用捷克文表达出来。

荣格曼的第二部著作《捷克文学史》的意义，比前者远为重大，这是继多布罗夫斯基的《语言文学史》一书之后全面概述捷克文学史的又一尝试，也是用捷克文撰写这类著作的创举。

荣格曼将捷克文学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与多布罗夫斯

---

① 指《阿达拉》。

基的分期法相吻合，每一时期先对政治文化关系、语言文学状况作一简单叙述，紧接着是作品索引。

荣格曼的《捷克文学史》比多布罗夫斯基的著作内容更为详尽丰富。特别从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来看，确实是一部具有创辟意义的作品。

除《文学史》外，荣格曼还编纂了他最伟大的著作——五卷本的《捷德词典》，作者为它工作达四十年之久。荣格曼的词典在当时确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其它民族需要整整一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在我国却基本上由他一个人来实现，而且是在肩负着其它繁重工作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实现的。荣格曼所收集的词汇数量空前，连日常用语中少见的古词和被遗忘的词也未漏掉，他甚至将其它斯拉夫语中的词吸收到捷克语词汇里，以丰富捷克语言（如俄语“空气”、“自然”、“旋律”；波兰语“英勇”、“忧伤”、“感动”等）。他还将自造的新词编入词典，其中有许多今天已变为约定俗成的常用词（如“回声”、“好感”、“短篇小说”等）。

荣格曼晚年出版过一部并非为公众撰写的《札记》，其中包括对他自己的生活事件的记载，这些记载证明他的真实观点是他当时无法公开表达的。这些观点表明他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景仰者和贵族与教会的反对者。

荣格曼对捷克文学贡献很大。他在多布罗夫斯基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了民族语言科学。尽管他未能象多布罗夫斯基那样始终保持批判态度，但他却以其为本民族忘我工作的热情，更富有创造性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荣格曼不

仅对复兴时期的科学有着伟大的意义，对文学也是如此。他要求民间口头文学成为真正的艺术，而不只是一种娱乐。

团结在荣格曼周围的人形成了整整一个诗歌与科学学派。荣格曼不只是这一学派成员的亲密朋友，而且是他们的顾问与老师。在这些科学家中有杨·斯瓦托普卢克·普列斯尔（1791—1849）和他的弟弟卡·博希沃伊（1794—1852）。他们两人都努力创造捷克科学术语，特别是自然科学术语。杨·艾旺格利斯达·普尔基涅（1787—1869）曾在伏拉迪斯拉夫和布拉格任生理学教授，他在其本行专业里至今仍被公认为世界权威。

描绘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展示的力量与伟大画面（诗意的图画乃至科学的叙述），可以成为该民族在争取民族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艰难斗争中的一种动力。捷克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弗朗季谢克·帕拉茨基在其著作中，就绘出了这种捷克历史画面。

弗·帕拉茨基（1798—1876）出生于瓦拉什斯克—麦齐希奇附近的霍茨拉维采一位农村知识分子、教员和福音派信徒之家。年轻的帕拉茨基曾在布拉迪斯拉发（当时叫普列斯普尔克）求学，后来到布拉格，迅速成为著名的复兴工作者之一。他首先以文化组织者著称。他与布拉格一位富裕市民的女儿结了婚，生活得到保证，因此与我国其他作家不同，他无须去同生活困境搏斗，可以全力以赴地从事民族与科学事业的开创工作。

帕拉茨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历史著作。年轻时他已

意识到，一个民族为了复兴，应对其历史有透彻的了解，应该有一部基本的历史著作。他在完成了繁重的准备与撰写工作之后，开始出版《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的捷克民族史》(1848—1876)。该书一直叙述到一五二六年哈布斯堡君主登上捷克王位为止。

帕拉茨基在他这部历史著作中给予胡斯运动时期以最高的评价。他通过对这个时期的叙述，清除了白山战役后人们所散布的各种诬蔑和谰言。帕拉茨基将胡斯运动视为捷克历史的顶峰，他肯定胡斯运动中的民主因素及其为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关系而作的努力。帕拉茨基认为，斯拉夫主义与日耳曼主义的接触与较量，捷克主义与日耳曼主义以及罗马主义的接触与较量，是捷克历史的主要意义所在；然而帕拉茨基不仅在这两股对立力量的搏斗中，而且在其相互影响中看到了历史的这种意义。帕拉茨基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导致人道主义原则的实现。

帕拉茨基通过其著作，指出了捷克历史的新的进步的内涵。所以他的《捷克民族史》是十九世纪最富于战斗性的著作之一。他这部著作对捷克文学，特别是对历史散文，从一开始就具有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一八四八年，帕拉茨基开始以政治家的身分公开发表政见，反对捷克人出席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会议。当时他作为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出席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帕拉茨基及其友人是所谓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的拥护者，这种主义是一种政治观点，它认为：对于人数

较少的捷克民族的前途来说，保存奥地利帝国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个帝国才能在好战的泛日耳曼主义面前保存弱小的捷克民族。一八四八年之后对立宪活动的压制，尤其是奥地利帝国分裂成奥匈帝国，动摇了帕拉茨基对维也纳政府的信心。帕拉茨基当时宣布："我们曾经存在于奥地利帝国之前，也将存在于它覆灭之后。"从而表达了他对捷克民族将获得自由与独立的信念。

帕拉茨基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化组织者，他的贡献是有创造性的，应予肯定的。他那善于协调政治生活中互相对立的潮流并使之结合起来的稳健个性，也起到了作用。他的著作教导我们要真诚热爱我们民族的历史及其伟大性，教导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民族将随着全人类的进步而进步。

白山战役之后，斯洛伐克进步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坚强有力得多，在福音派教徒中尤其如此，他们并未象捷克地区的福音派教徒那样被驱逐出境。在斯洛伐克，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也不象在捷克那样被破坏到这种程度。所以复兴时期的大都用捷克文写作的斯洛伐克作家将广泛的世界见闻带进了捷克文学，并对民间文艺提出了更高要求。

帕拉茨基的同事和朋友**巴维尔·约瑟夫·沙法希克**(1795—1861)是斯洛伐克人。尽管他生活相当贫困，但仍然拒绝了莫斯科大学的教授职位。他知道祖国更需要他工作。他为着与切拉科夫斯基配合，放弃了伏拉迪斯拉夫的

教授职位。谢绝这些职位之后，他以无比的热情在各个科学领域工作（他是文学史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八四八年他参加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发表了值得纪念的演说，为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斯拉夫民族争取自由。

沙法希克最著名的著作是《斯拉夫古代文物》。该书探讨的范围，上起斯拉夫各民族历史的远古时期，下迄各斯拉夫部落的共同历史分解成各个斯拉夫民族的历史。沙法希克在其著作中驳斥了外国学者的错误论点，指出斯拉夫人与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一样，也是欧洲文化的共同创造者，《斯拉夫古代文物》一书作为斯拉夫人最古老的历史的基本著作，在国外也享有盛名。

《王室手稿》与《绿山手稿》

在尊重民族的过去这种思潮盛行之际，文学创作也热中于从最古老的历史时期汲取题材。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我们这个没有古老文物的国土上，人们竟不惜大胆伪造，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古老诗歌作品的存在，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

捷克民族复兴工作者遗憾地意识到：捷克古代文学中没有英雄史诗，不象俄罗斯人有英雄叙事诗，德国人有古代英雄诗集。于是他们便力图伪造这类英雄史诗。认为伪造的赝品能增强民族自尊心的想法对此也起了作用。人们认为，捷克民族应该拥有这种文学作品，它们既显示我们民族在古代的伟大，又可以毫无愧色地同外国中世纪的英雄史

诗相媲美，从而证明捷克文化的成熟程度。

因此一八一七年和一八一八年就出现了两部捷克文赝品——《王室手稿》和《绿山手稿》，这是根据虚构的发现地点而命名的。

《王室手稿》包括叙事诗、抒情叙事诗以及富有民间特色的抒情诗歌。叙事诗大都描述捷克历史上最古老的时期（如写扎博伊和斯拉沃伊、捷斯特米尔、奥尔德希赫和博莱斯拉夫、雅罗斯拉夫、鲁迪谢和鲁波、贝奈什·赫尔曼诺夫①），抒情诗歌则全属爱情题材，抒情叙事诗《鹿》与民间故事诗相似，《兹比霍尼》近似浪漫曲。

《王室手稿》受到当时爱国团体的热烈欢迎，并迅速扬名国外，主要是斯拉夫国家。当时，人们最欣赏手稿中以理想化手法描绘的捷克上古与中古时代的情景、对祖国的敌人的激烈反抗、叙事诗的生动情节以及对优美的大自然的描写。连多布罗夫斯基也对该手稿深信不疑。

《绿山手稿》则包括捷克古代元老与首领会议片段，莉布谢对霍鲁多什与史恰赫拉夫兄弟的遗产争端的裁决的长诗片段。

《绿山手稿》对捷克古老历史（9—10世纪）的描述过于理想化，立即引起多布罗夫斯基对它的怀疑。但是后来著名的民族复兴派帕拉茨基和沙法希克都挺身而出，捍卫两部手稿的真实性，从而打消了人们对手稿的悠久历史的

① 括弧内的名字均为捷克历史上的民间传说人物。

怀疑。

到八十年代，几位捷克大学教授（格鲍艾尔①、马萨利克②、哥尔③、霍斯丁斯基④等）从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史等方面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对确定手稿为赝品提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科学证据。证据指出，《王室手稿》里的抒情诗歌是从俄罗斯民歌派生出来的，两部《手稿》的许多观点与中世纪的观点格格不入（例如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手稿》对大自然的抒情描写，在古代捷克文学中也是前所未闻的。语言方面的论据最有分量，《手稿》的语言与古代作品中的捷克语相距甚远，却与复兴时期的一代人所形成的对捷语发展的观点相符合，这一代人显然并不熟悉所有捷克古代文学著作。

两部手稿是这个崇拜古老文物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它增强了民族意识，对文学（如对马哈、泽耶尔等的影响）、美术（马内斯为《手稿》所创作的插图、米斯尔贝克以《手稿》的英雄人物为题材创作的雕塑）甚至音乐（斯美塔纳的歌剧《莉布谢》）都是一种极大的启示，但对科学，特别是对历史与语言学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虚假的历史图画。

---

① 格鲍艾尔（1838—1907），语言学家，主要从事古捷克文研究。

② 马萨利克（1850—1937），哲学家与社会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首任总统。

③ 哥尔（1846—1929），历史学家。

④ 霍斯丁斯基（1847—1910），美学家与音乐史教授。

瓦茨拉夫·汉卡与约瑟夫·林达，被认为是两部赝品《手稿》的作者。

瓦茨拉夫·汉卡(1791—1861)是捷克博物馆图书与档案管理员，一个平庸无奇的诗人(他在题材与形式上模仿民间诗歌，著有《歌曲集》一册)，斯拉夫民族歌曲与古代捷克文物的出版者。作为一个热情鼓吹斯拉夫民族相亲相爱的代表人物，他与斯拉夫的、主要是俄罗斯的作家和科学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他爱虚荣，不坚定，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在《王室手稿》里写了若干短小的抒情诗歌。

约瑟夫·林达(1789—1834)是一位新闻记者和有才能的作家，终生贫困潦倒，他的若干作品从古代捷克历史中汲取题材，在两部《手稿》中他写过一些叙事诗。

> 认为弱小的捷克民族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并不孤立，它是伟大斯拉夫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斯拉夫民族应互相支持的思想，对我国复兴工作者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而杨·科拉尔则是这一思想在诗歌方面的代表。

2 杨·科拉尔

同沙法希克一样，科拉尔也是斯洛伐克人，一七九三年生于斯洛伐克东部马尔丁以南的莫肖夫采。他勉强念完中学后，由于父亲反对，只能自食其力地维持学习，为了在哲

学与神学方面深造，前往德国耶拿[1]求学。后来在佩斯任福音教派牧师，晚年在维也纳一所大学任斯拉夫考古学教授，一八五二年在当地去世。

科拉尔早在学生时代就对斯拉夫语言和文学产生了兴趣。当时斯洛伐克人对斯拉夫民族的兴趣甚浓，科拉尔在少年时期曾亲眼见过苏沃罗夫军队和著名的俄国哥萨克部队，这更激发了他的这种兴趣。

科拉尔的斯拉夫意识直到他在国外，在耶拿的德国人环境中才得到充分发展，他对团结在所谓“布尔什团体”[2]周围的青年大学生的自由生活感到惊讶，该社团的大学生高唱新颖的、前所未闻的学生歌曲与民族歌曲，热爱自由，反对民族奴役者。拿破仑在莱比锡大败之后，耶拿成为要求全德统一的德国青年的中心地。

科拉尔在耶拿攻读福音教派神学，还勤奋地从事斯拉夫民族语言学与历史的研究，并反复进行比较。他一方面了解到斯拉夫各部族的光荣历史，同时又看到这个令人沮丧的现实：除了俄罗斯人以外，所有其它斯拉夫民族都未享有自由。德国青年高呼全德统一，奋起反对民族的敌人；在捷克，一提及斯拉夫民族性，立即被奥地利政府视为犯有叛国罪。耶拿的德国教授支持青年运动，在大学表达自由思想，批评当时的政局；维也纳政府却对捷克的每项进步行动加以迫害，不止一次地将比较大胆的教授解聘。

---

① 现属民主德国。

② “布尔什”为德文“青年”、“大学生”的音译。

然而科拉尔在耶拿也注意到全德运动的阴暗面：崇尚武力，傲慢自负，蔑视其它民族，特别是斯拉夫民族。古代斯拉夫民族在德国领土上的遭遇，对斯拉夫人来说就是一次警钟。科拉尔走过带有斯拉夫名称的萨克森村庄时，感到仿佛是在路过古斯拉夫居民的坟地。

科拉尔与一位福音教派传教士的女儿米娜的结识，对他的生活与诗歌创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同米娜一道走访耶拿郊区，游历荒山峡谷与城堡废墟。母亲反对女儿同科拉尔结婚，反对同他一起去遥远的匈牙利，因此直到十六年之后，诗人科拉尔才将她作为妻子带到佩斯。

科拉尔对米娜的爱恋之情，成了他简称为《诗歌》(1821)的第一本集子的内容。其中的十四行诗将米娜作为美的象征来歌颂，或者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创作当时捷克文学中非常罕见的十四行诗，是为了证实用捷克语也能创造出这种难度较大的诗体艺术作品。集子并未包括科拉尔这个时期所写的全部诗歌。最富有战斗性和最革命的诗歌被审查机关禁止收入诗集，《爱国者》一诗就是一例。被审查机关禁止的诗歌通过转抄，在爱国者中间广为流传，加强了民族自豪感。

科拉尔以《诗歌》为起点，收集了一首又一首的十四行诗，《斯拉娃之女》这本大型诗集因而产生，一八三二年问世。该诗集包括序诗和五个诗章，第一章为《萨拉河》，第二章为《拉贝河、莱茵河、伏尔塔瓦河》，第三章《多瑙河》，第四章《厉司河》①，第五章《阿赫罗》②。这一版本收录有六百余

首爱国的、爱情的与说理的十四行诗，在情节结构上彼此联系不甚明显。科拉尔在世时，《斯拉娃之女》已两次重版。

对同时代人和后代人影响最大的是用二行格律诗形式写的序诗。序诗气势雄伟，浑厚有力，是对于记载着真理与正义如何被暴力所压倒的斯拉夫历史的诗意深沉、感人肺腑的悲歌。过去斯拉夫民族遭受的屈辱，是人类历史的污点。诗人愤怒地质问：是谁侮辱一个民族因而也侮辱了全人类？科拉尔尽管意识到斯拉夫人的敌人使他们受了多少苦难，但他对其它民族从未怀有仇恨，他只憎恨奴役者。他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人道主义者，他首先关心的是人及其自由。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配享受自由；给奴隶戴上镣铐的人，自己就是奴隶。科拉尔认为，剥夺一个民族的权利，使其丧失民族特性，是违反人性的最大罪过。

但序诗不只是对斯拉夫历史的一首悲伤的哀歌。科拉尔在这首诗里对斯拉夫民族的美好未来也具有信心，因为他坚信真理与正义必胜。为加强对未来的信念，诗人写道："莫道悲伤属未来。乌云散，思想之光照窗台。岁月流逝风云变，真理迎得胜利来，古往今来皆如此，时代涤荡旧尘埃。"序诗的结尾，号召人们为斯拉夫民族的未来而积极工作。

斯拉夫民族的代表、女神斯拉娃在诸神大会上诉说，

① 希腊神话中的阴界河流，亡魂饮河水后，生前一切即遗忘净尽，因此又译忘川。

② 地狱里的一条河，在科拉尔的诗中代表斯拉夫地狱。

斯拉夫人过去备受欺凌。诸神决定责成女神拉达之子米莱克创造出斯拉娃的女儿（象征着斯拉夫未来的理想形象），让她为斯拉夫人解除苦难，使他们置身于世界最先进的民族行列。科拉尔根据他的情人米娜的形象塑造出一位斯拉夫姑娘的理想形象，后来作为女神的化身，伴随他周游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

一百多年之后，科拉尔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对我们起着作用。粗看起来也许会觉得，这是一种过时的爱国主义，今天已无多少现实性。这种看法不切合实际。恰恰 相 反，《斯拉娃之女》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科拉尔号召："让每人都按民族所赋予的角色的本分来勤奋地工作"，他还指出，工作的方法可以各不相同，重要的在于共同的意志。科拉尔锐敏地理解到，表现真正的爱国主义的既不是无谓的狂热，也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日常的工作，这种爱国主义行为的保证在下层人民，他们是民族的基础，"对祖国来说，贫苦牧人的小木舍往往比日什卡的战地营房意义更为重大。"

科拉尔对祖国与民族的理解可谓独具一格，与强调所谓区域性爱国主义的老一辈复兴工作者不同，科拉尔将民族置于首位。诗人认为祖国"只装在我们的心坎上"，旁人破坏不了她，也不能把她偷走。科拉尔认为，作为民族主要标志的共同语言、共同传统与共同的民族目标，构成共同的民族大家庭。

科拉尔对民族缺陷并非不加批评。他把众所周知的斯

拉夫民族间的隔阂纠纷看作最大的缺陷，但也谴责那种崇洋媚外、不加批判地赞扬外国的一切的现象。他一贯强调民族自豪感，并以民族的光荣历史来唤起这种自豪感。

科拉尔献给斯拉夫民族的十四行诗对读者的影响最为强烈，他呼吁斯拉夫各民族携手合作，因为彼此间的不和在历史上招致了频繁的灾难。

科拉尔着力论述，为什么斯拉夫人在人类历史上有其伟大的前途，斯拉夫民族是欧洲文明树干上初发的新枝，因而最茁壮有力。诗人愿他自己百年之后能从坟墓中重返人间，因为他预料会看到斯拉夫民族的锦绣前程。

除了爱国主义的和描述斯拉夫民族亲密关系的十四行诗外，《斯拉娃之女》还包括描写爱情的十四行诗，诗人对米娜的爱是作品的基本题材之一，因为整个《斯拉娃之女》就是从几首爱情十四行诗中孕育出来的。

对科拉尔的诗来说，一个饶有兴味的特点是将对恋人的爱慕和对祖国的热爱融汇在一起。开始时诗人的心是一半为米娜，一半为祖国，后来这两种感情便融为一体了。

> 爱情是一切伟大行为的萌芽，
> 没有爱过的人
> 不会懂得什么是祖国与民族。

科拉尔对诗集中的各首十四行诗远比对整个集子的编排结构更重视。序诗以二行对句形式写成，十四行诗则强调有规则的重音，十四行诗的内部结构（对比、修辞），显示

了科拉尔的古典文化素养，科拉尔师法古代诗人，诗歌语言典雅古奥。有的十四行诗，特别是最后两首，运用了许多非常晦涩难懂的隐喻，这表现出诗人的某种学究癖好，因而使今天的读者难以读懂。但在当时，这部作品无论就思想内容或形式而言，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科拉尔早在其《论斯拉夫各部族和方言之间的文学联系》一书中，就已表述了《斯拉娃之女》的主要思想。科拉尔把文学上的联系理解为斯拉夫民族互相亲近的文化纲领，而以争取纯粹的人性为最高宗旨的真正斯拉夫文化，则是这种联系的目标。科拉尔曾建议在斯拉夫人的各个主要城市开办斯拉夫书店、公共图书馆，组织大学进行斯拉夫学的研究，出版斯拉夫语法与词典以及共同的文学杂志。科拉尔这些有创见的思想直到我们今天才得以实现。

在《青年生活回忆录》一书中，科拉尔对当时的状况和他自己的青年时代的描述是令人感兴趣的。

科拉尔不只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而且是整个斯拉夫民族的伟大诗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各民族的自由与平等的热爱以及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他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爱国主义，都对民族解放斗争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他是增强民族力量的斯拉夫思想在艺术上和理论上的宣传者。

用民间诗歌做典范，面向实际生活，以使捷克诗歌人民化这一重大任务，由弗·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担当起来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两部《回声》，展示了

捷克和俄罗斯的民族气质，也证明切拉科夫斯基经过多年研究，对捷克和斯拉夫民间文学是如何多闻博识。

3　弗朗季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

切拉科夫斯基一七九九年生于斯特拉科尼采，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在布杰约维策和皮塞克念中学，在布拉格和布杰约维策攻读哲学。他在那些地方经历的事件告诉我们，当时奥地利的教育是一种什么状况。这个年轻学生曾因秘密借阅胡斯的《布道录》而被开除。后来他当过家庭教师，其后担任《布拉格报》及其游艺性增刊《捷克蜜蜂》的编辑。由于报上登过一篇指责沙皇是波兰民族的压迫者的不合时宜的文章，他被解职，此后数年生活十分困苦，直到四十年代才成为伏拉迪斯拉夫的斯拉夫学教授。数年之后，即一八五二年，他在布拉格溘然长逝，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切拉科夫斯基在求学期间就勤奋地从事斯拉夫语言和斯拉夫民间文学的研究。他搜集并用原文或捷克译文出版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民间诗歌（如三卷《斯拉夫民歌集》），采集斯拉夫民族的谚语方言（如《斯拉夫民族谚语中的箴言》）。

切拉科夫斯基在研究捷克与斯拉夫民间诗歌时认识到，民间创作中蕴藏着丰富的、能孕育出诗歌的思想与艺术珍宝。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让自己的诗歌创作易

为广大读者阶层所了解。经过对捷克与斯拉夫民间创作的多年研究，切拉科夫斯基便着手创作他的«回声»，这些诗并非为了表达诗人个人的体验与情绪，而是作为一位来自人民的诗人，为人民讲话。

切拉科夫斯基热切盼望创作出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民间诗歌的回声，就象他出版所有斯拉夫人的民间创作集那样。然而时代环境使得他只能首先集中注意于俄罗斯民歌，其次是捷克民歌。切拉科夫斯基对俄罗斯民间创作的兴趣来自他对俄罗斯的热烈感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热爱着俄罗斯，把它看作是对毫无自由的本国民族的一种支援，从俄罗斯人民在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1812)中取得胜利的时候起，更是如此。

寄希望于俄罗斯，将它视为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支柱这种思想，在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俄军对土耳其的战争获胜以后，更为增强了。切拉科夫斯基也正是在这种寄热望于俄罗斯人民的气氛中创作，并于一八二九年出版«俄罗斯歌曲回声»的。

«俄罗斯歌曲回声»表达了切拉科夫斯基的斯拉夫思想，说明他理解本民族的迫切政治需要。«俄罗斯歌曲回声»雄壮豪放的特点，正是俄罗斯人抗击土耳其人、帮助解放巴尔干斯拉夫人这一时代的形势所产生的。切拉科夫斯基通过俄罗斯古代史上的勇士形象，介绍了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行为。其中有些是他从远古俄罗斯民间诗歌中了解到，另一些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并按照俄罗斯民间创作的精神创

造出来的。这些英雄大多来自人民，很少是富翁或沙皇。他们以抗击敌人来为祖国效劳。这对捷克读者来说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号召。

切拉科夫斯基特别善于体会人民的想象、思想和感情，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对俄罗斯民间叙事诗的勤奋学习与研究，他深入了解到俄罗斯民间创作的艺术特点以及描绘人民生活的方法。

《俄罗斯歌曲回声》中的叙事诗描写了与鞑靼人、土耳其人英勇搏斗的时期，直至近代的历史事件。《回声》诗集的开头与结尾都是歌颂古代勇士性格的诗篇（如开头的《穆罗姆勇士》，结尾的《伏尔加人伊利亚》）。有些诗歌取材于古代俄罗斯编年史（如《囚犯》、《审讯》），反映出人民对沙皇的抗争，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沙皇持有孩子对父亲一般的肯定态度。这与切拉科夫斯基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好感有关，他长期把这个皇帝视为具有自由思想的统治者。与这些叙事诗相近的还有动物叙事诗①《鸟市》，在这首诗中，切拉科夫斯基显示了他的幽默感以及善于抓住对象的特征的才能。

但切拉科夫斯基在写《俄罗斯歌曲回声》时不只是一个古代俄罗斯英雄史诗的模仿者，而是始终表现出一种将有些素材进行改造，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描绘的创造精神。

---

① 叙事诗的一种，诗中描写拟人化的动物。

有时候，这位捷克诗人使用一些古代俄罗斯英雄史诗中出现过的典型的俄罗斯英雄的名字，然而诗人改变了他们的性格，或为他们添加了一些别的业绩。例如古代俄罗斯英雄史诗所表现的里拉·普伦科维奇，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财主和寻花问柳之徒，切拉科夫斯基却把他刻画成一位勇士，他使俄罗斯摆脱了为害甚烈的妖怪——猛禽维利康·维利康诺维奇。而这只猛禽在俄罗斯民间诗歌中却从未出现过。

伏尔加人伊利亚这个名字，是切拉科夫斯基自己根据伏尔加河的名称造出来的，他由此创造了在俄罗斯遭受鞑靼人强盗般袭击时的一位典型的俄罗斯勇士的独特形象。

在叙事诗中，切拉科夫斯基赋予这些俄罗斯英雄史诗里的英雄以人性，使他们与读者更亲近。例如在《穆罗姆勇士》一诗中，这位古代俄罗斯英雄史诗里最受欢迎的人物，不象民间传说的那样独自击溃过成千上万的敌人，而是只打败了三个鞑靼人，这就使他更加合乎人情了。

切拉科夫斯基给《回声》中有些诗作赋予了现实的政治内容，例如反映拿破仑远征俄国时期的莫斯科近郊之役的《伟大的悼念》一诗，以及纪念阵亡战士的《亚历山大之死》和《多瑙河上的俄罗斯人》① 等。

这些诗还采用了当时俄罗斯诗歌所特有的艺术手法，例如在《亚历山大之死》这首悲歌里，大自然为沙皇之死而

---

① 出第一版时，此诗被审查署抽掉。

悲伤，这种描述手法在俄罗斯民间诗歌中颇为常见（如“夜空的星星暗淡了，皎洁的月光也郁郁寡欢”）。

《回声》的抒情诗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幸福与悲痛时刻的生活，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爱情，小伙子与姑娘之间的关系，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感情丰富而又淳朴的人们的生活。切拉科夫斯基善于以高超的手笔表现年轻人细腻的爱情：姑娘在情窦初开时的爱恋之情（如《两个词儿》），姑娘对于正在军队服役的恋人的热烈思念与看到他归来时的欢乐心情（如《离去与归来》、《姑娘的喜悦》），一对恋人口角后的和解（如《调解》），父母反对姑娘爱上穷小伙子（如《爱情更可贵》）。切拉科夫斯基也善于描绘家庭爱情的幸福与和谐（如《儿童之歌》），或儿子对于父母的深情（如《夜话》），根据俄罗斯人民的感情特点，大自然也同所有的人融为一体。许多具有俄罗斯民间创作特色的诗歌，开头往往是呼唤某种自然物，或描述大自然景色以衬托情节或情绪，例如描写俄罗斯军队来到多瑙河的诗句：

辽阔的天空没有风暴，
密布的阴云听不到雷鸣，
俄罗斯军队朝着多瑙河挺进。

为了在形式上尽可能完善地表现出俄罗斯生活的特色，切拉科夫斯基不仅运用俄罗斯民间诗歌、呼格、比喻、对比等特有的手法，而且也采用了俄语的词汇。

《俄罗斯歌曲回声》成就巨大。书一出版，作者的同代

人便认为该诗集论意义可与科拉尔的《拉斯娃之女》并列。

《俄罗斯歌曲回声》问世十年之后，切拉科夫斯基又出版了他的《捷克歌曲回声》(1839)。《俄罗斯歌曲回声》是作者在生活上很幸福、艺术上很稳定的环境中用很短的时间创作出来的，而《捷克歌曲回声》却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产生。切拉科夫斯基在这一诗集里力图表现捷克人民生活的特点，表现三十年代末捷克农村的图景。诗人自己将诗集分成叙事诗、悲歌、儿歌、诙谐与幽默诗以及歌词等类。切拉科夫斯基在序言里，通过俄罗斯与捷克地区特点的比较，阐明了俄罗斯诗歌与捷克诗歌的区别。他将俄罗斯民间诗歌比作俄罗斯土地上广阔的森林、浩瀚的河流和湖泊，而把捷克民间诗歌比作小片森林、小河与溪流。

两部《回声》的区别在于捷克民间诗歌没有豪迈的英雄歌曲，最常见的是讽刺与嘲笑之类的歌曲和小调，由于人民往往通过它们表达自己对统治者的反抗，所以切拉科夫斯基也赋予大量诗歌以讽刺的特色。《回声》中的讽刺与诙谐诗歌主要针对着上层与小市民，按照民歌的精神嘲笑那些生活优裕、大腹便便的名门望族的财主，在《快乐的行车》一诗中，一位农村青年对“车里拉的是谁”的问题回答说：

鬼知道，我的车上拉的是什么，
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大肚皮，
我们刚一装车，
皮囊里呼噜声起。

作者根据村民们对豪绅的态度，在《柯兹洛夫的长官》一诗中同样以嘲笑方式刻画一个贵族官员人老好色，竟对“一位贞洁的德国少女海杜拉”产生了恋情。作者在嘲笑他时还以考证的口气指出：贵族官员体重“四百磅而新娘只有五磅”。该诗反映了农村劳动人民的艰难处境，同时又发出农民对绅士的嘲笑声。在《布拉格人》一诗中，作者嘲笑了模仿贵族老爷的布拉格市侩。

有些诗介乎叙事诗与抒情诗之间，切拉科夫斯基用它们来塑造民间人物，特别是捷克农民的典型（如《捷克庄稼汉》）。诗人同情人民中的英雄，尽管他们并无英雄行为，但是他们的理智与机敏却胜过贵族老爷。庄稼汉的狡猾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然而这里恰恰包含着对社会的批评。社会的不公正、老爷对农民的压迫，使油滑狡黠成为农民唯一的武器。

切拉科夫斯基的讽喻诗有相当多的社会与政治内容。《过客》一诗包含着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批评。《吉卜赛人的小笛》寓有解放斗争的思想，但表现得隐晦，所以审查官未曾察觉。诗人所写的孤独的小吉卜赛人指的是捷克民族，吉卜赛老人用以驱赶来自外国的讨厌的蚊蚋的小魔笛，象征着能够抵御敌人的古代捷克人的民族觉悟与自豪感。切拉科夫斯基不主张民族仇恨，但反对外国人利用其物质优势来欺压捷克人。

他的《托曼与森林女神》这首民间故事诗是《回声》中的叙事诗之一，通过技巧高超的结构，切拉科夫斯基成功地

表现了炽热的爱情力量以及大自然神秘的魅力。诗人在艺术结构上无疑受到如下事实的启示：诗人为一个农村小伙子挑选一位猎人的女儿作新娘，以此来说明贵族化了的姑娘对普通求爱者的鄙视态度；同时也描绘出农村小伙子托曼走向森林的道路，而托曼就在这途中悲惨地死去了。诗人以极其简练的语言，刻画了托曼的精神状态与内心的紧张（"突然急速地、后来又缓慢地向橡树林走去"），同样也十分准确地描画了自然图景，尽管用字简练（"已是半夜，月儿西沉，骑马人未必能找到归途"）；民间用语和谚语使诗的语言显得更加清新、明白易懂（"他们片刻不停，怀着良好的意愿，象离弦之箭一般飞驰"）。

《回声》中的抒情诗主要是情诗，有许多诗是写从男女恋情到家庭之爱的各种类型的爱情的。这些诗表达了细腻的感情和感受的真实性，但也反映出捷克人的悠闲与诙谐的特点。

切拉科夫斯基在《捷克歌曲回声》中充分而真实地描述了普通捷克人民日常生活的忧虑、悲伤与欢乐，成功地把握住了捷克民歌的特点，并以其轻松性、思想与形式的多样性、音乐性和倾向性来加强诗歌的特点与讽刺的锋芒。

讽刺短诗的形式同切拉科夫斯基的理智特性、明朗的气质、批判的精神以及对讽刺的感受力是相符合的。切拉科夫斯基也是这种言简意赅的诗歌形式的首创者之一。他一生都写讽刺短诗，然而有些在他逝世之后才出版问世。这些短诗抨击我国社会生活的缺点，或批评当时的文学

状况。

下面摘录切拉科夫斯基的一首触及当时社会状况的讽刺短诗，诗中描写几个太太淑女一面品尝咖啡，一面闲聊：

她们之中有个女人，我不知道她尊姓大名，
她说，若将捷克语同别的语言相比，
你就得承认，它实在贫乏得很。

对此我要回敬：
据我所知，有小小的差别倒也是真——
捷克语既丰富又甜美，
既灵活，又圆润。
恕我冒昧，美丽的夫人，
您为何断言，捷克语贫乏万分？

除科拉尔外，切拉科夫斯基是我们近代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不是单纯地对民歌的机械、生硬的模仿，而是一种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创作。他使过去只供少数读者欣赏的诗歌易为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他成了一个诗歌流派的创始人。这一派诗人继承了他关于写诗要接近民间创作、接近实际生活的纲领。他作为一位捷克与斯拉夫民间创作的采集者所进行的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在他的诗作，特别是两部《回声》里，有些作品至今仍然富有现实的艺术价值。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捷克文学小结

我们称之为民族复兴的民族运动的前提，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后来又在十八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比较有利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条件。由于经济变革的影响，封建主义开始瓦解，逐步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

在复兴初期，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著作是用德文或拉丁文撰写的，但它们服务于民族利益，力求以较正确的观点来看待捷克古老的过去，特别是胡斯时代。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致力于语言的研究，力求改善它的状况，或把它从白山战役后的衰退中挽救过来，使之实现规范化，赋予它以精确的结构(多布罗夫斯基)。这是产生要求更严的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在复兴运动中，人民群众的潮流表现在为创办捷克剧院而进行的斗争(木棚剧院、坦姆兄弟、克利茨佩拉)与教育群众的书籍和读物的出版上(克拉麦利乌斯)。逐渐产生了捷克近代诗歌，即为文化修养较高的阶层所欢迎的、要求更严的一种文学形式(普赫玛耶尔)。

荣格曼一代人在困难的政治条件下，为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医学)的民族化和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而努力工作。这种文学旨在适应当时的需要，首先是加强民族团结的民族运动的需要。他们以描述本民族的光荣历史(如帕

拉茨基的著作)来支持和激励民族斗争,并以斯拉夫思想作为民族意识的支柱,一方面是把这种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如沙法希克),同时又把它作为捷克诗歌的基础:或描写斯拉夫人的过去历史与现实的艺术图景(如科拉尔的诗歌),或描绘俄罗斯人民生活画面(如切拉科夫斯基的《俄罗斯歌曲回声》)。两份《手稿》赝品的发现也起过加强民族意识的作用。

切拉科夫斯基的诗作体现了对民歌的正确态度,例如他在《捷克歌曲回声》中就力求描绘十九世纪头三十年里捷克农民的情况。

七　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民族复兴文学

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是捷克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同欧洲和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期，一些欧洲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在这些革命运动中，年轻的市民阶层在取得经济权利的同时，试图夺取政治权利。一八三〇年，巴黎爆发所谓七月革命，同年十一月底，华沙的波兰爱国者开始了反对沙皇压迫的暴动。特别是波兰起义，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它促使我国提高政治觉悟，并提出尚未十分明确的民族自由的要求。

文学中日益加强的政治倾向，也是新的生活态度——浪漫主义这一新的思想与艺术潮流的一种反映。

浪漫主义对整个欧洲文学都产生了影响。我国在二十年代就有过它的最初表现（热中于描写古老的过去——如《手稿》；赞美民间诗歌——如切拉科夫斯基），而在三十年代，特别是在卡雷尔·希内克·马哈的作品里得到了充分表现。浪漫主义在各个国家有它各自的特点。但我们可以确定这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方法的一些共同特点：

1．与古诗体中严谨的艺术规则相反，浪漫主义强调艺术创作的自由。浪漫主义者把艺术创作当作一种能量最大的创作，它能够深入探索他们认为同理智和科学完全对立的人生疑案和奥秘。浪漫主义作家拒绝受理智支配的规范与艺术法则，他们只愿受感情支配，拒绝模仿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如史诗、田园诗、颂歌），创造了一些能使他们更富于感染力地表达思想感情的新的文学形式，例如：浪漫主义诗人们乐意按英国诗人拜伦的榜样创造一种特殊形式，即抒情-叙事诗，还有所谓拜伦式的短篇小说。他们常常赋予散文以抒情诗的色彩，使之在感情上具有更大的魅力（如马哈的《玛林卡》）。

2．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学模式相反，浪漫主义将民间创作当作一种创举和民族天才的自然表现而置于首位。浪漫主义者们搜集民间创造的作品，出版它，赞美它，并把它视为艺术创作的榜样。民间创作也常被人们模仿（如切拉科夫斯基的《回声》）。

浪漫主义对过去，特别是对中世纪极为称颂。这一方面是由于浪漫主义作家对于可以通过自己的幻想来推测到的很多往事的理解；另一方面因为过去对他们来说是对艰苦现实的一种逃避。历史成了浪漫主义作家的一面镜子和对自身思想与感受的反应（例如马哈的《克希沃克拉特》中的刽子手表达了马哈本人的思想），他们常常从过去历史中选择英雄，或者选择反抗社会、为争取个人自由或民族自由而斗争的叛逆人物，或是被社会遗弃（茨冈人）以及为社会

蔑视的人(犹太人)。浪漫主义作品中的这些主人公的行为往往是超人的,提坦式①的,因而我们将浪漫主义中的一个流派称为提坦派。

偏爱过去不一定会逃避现实,特别是当诗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革命思想时,这种对过去的偏爱往往是对革命思想的一种声援和激励。

3. 作为特殊的文学与艺术形式的浪漫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是,艺术家不是从一切方面来描绘现实,而只是从现实中选择他打算强调的那些现象,因而浪漫主义艺术表现了艺术家个人(主观的)同现实的关系。

浪漫主义者的作品里常常出现一些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浪漫主义者也热中于描写人民生活中的奥秘、疑案与幻想之类的现象,或者是命运、梦幻、感情与仇恨的不可超越的力量,通过恐怖(周围环境中的巧合——马哈长诗《五月》中的威莱姆在杀死那个诱奸他的姑娘的人时,没想到他杀死的竟是自己的父亲),使这类现象更能震撼人心。除了热中于这些特殊的、非同寻常的生活现象之外,浪漫主义者对于荒野的大自然或具有与我国迥然不同的特色的远方也很感兴趣(即异国情调)。

除抒情-叙事诗外,浪漫主义者也喜欢采用那些有助于在读者心里造成动人印象的文学形式,如民间故事诗。古

---

① 提坦巨神是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所生的子女,共十二个,六男六女。

典叙事诗由于它的平铺直叙的风格，对浪漫主义者不大适用，田园诗同样也不适合。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里，作家常常采用大段的议论或直接向读者呼吁，从而使故事情节中断。作者的注意力不在外部环境，而集中在作品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如马哈《五月》中的监狱一幕)。作者常常通过主人公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还经常把对大自然非常绚丽多彩的抒情性描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诗人描述大自然时寄托了自己的感情(大自然与主人公同悲戚)，或者将大自然与主人公内心世界加以对比(在长诗《五月》中，威莱姆的悲剧是在百花盛开的自然界的背景上产生的)。

浪漫主义也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语言里。浪漫主义作家使用形象化的、绚丽多彩的、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语言，经常有召唤、比较、对照、夸张、修辞的润色和大胆的比喻，以创造感人的艺术画面。浪漫主义者特别强调语言的音响方面，所以有些浪漫主义诗歌的句子给人以强烈的音乐感(如《五月》)。

在文学史上，我们将浪漫主义分为两个主要的流派：革命的(进步的)浪漫主义和反动、倒退、保守的浪漫主义。

在社会革命时期，反动的浪漫主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而逃向过去，把过去理想化，给它涂上最美好的色彩，以粉饰、掩盖社会矛盾，把社会描述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它阻碍革命运动，成了为统治阶级效劳的支柱；有时它又避开紧迫的社会问题而倾向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和神秘主义。

进步作家的革命浪漫主义是战斗的、积极的。尽管浪漫主义作家并不是在他们创作的各个部分都反映现实，但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对美好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的革命性想象同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进步的浪漫主义作家欢迎革命运动，有的还手持武器参加了争取美好世界的斗争（拜伦牺牲于希腊解放斗争中）。他们在作品中常常描绘革命的英雄形象。浪漫主义作品的主人公渴望斗争，向往英雄业绩与高度紧张的创造活动。

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他虽然出身于富裕的贵族家庭，却通过自身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同当时的社会决裂了。他在帮助希腊战士反对土耳其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因染上瘟疫而猝然早逝。

他的浪漫主义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写出了他旅游欧洲与近东的感受。诗中描述了被奴役民族的自由的过去和与之对照的现在。在诗篇的第二章，诗人回顾了被奴役的希腊的光荣历史，预示它将有美好的未来。

拜伦的作品主人公通常是一些不满现状和内心苦闷、反抗社会制度、渴望自由的人。他们的不满与叛逆一直发展到超人的程度，发展到反抗上帝。他们为之而斗争的理想与悲惨艰苦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拜伦作品主人公充满厌世思想与悲观主义感情。拜伦的作品对所有欧洲文学（如我国马哈的作品）有巨大影响。

在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屹立着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1799—1837）的作品，普希金出于

他的革命思想以及他与俄国最早一批革命团体成员，即所谓十二月党人的友谊，而遭到沙皇迫害、流放。他取材于俄国历史的戏剧《鲍利斯·戈都诺夫》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反映人民与通过罪恶行径登上宝座的沙皇之间的关系。在剧中，连诗人的先辈也站到了与沙皇为敌的一方。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杰出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奥涅金是出身于贵族的知识分子典型，文化教养保障了他的社会地位，但并未为他的工作准备好条件，也未能使他更深入地理解生活的意义。他对所处的环境不满意，他憎恨周围的社会，希望从事文学工作，但又缺乏足够的力量与坚韧性。他经常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甚至无能回报温存娴雅的达吉雅娜姑娘的爱情。他轻率地激起他的朋友连斯基的嫉妒，在决斗中将连斯基杀死，他自己也被这一悲剧所震惊而远走国外。几年后他回国时，发现达吉雅娜已经结婚，他狂热地爱着她，但被达吉雅娜拒绝了。奥涅金失去了探求自己生活目标的最后希望。

奥涅金是那个时代的俄国贵族的典型。他对社会感到不满，但又不能割断与本阶级的联系，他看清了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同情被压迫者，却又无力加入他们的行列。

达吉雅娜是奥涅金的对立面，是一个在俄国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与人民有联系的人。她不象奥涅金那样受过外来教育的熏陶，她有着纯真炽烈的感情，热爱生活。达吉雅娜体现着俄国妇女最优美的特性。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全面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生活。一

位伟大的俄国批评家①将这部作品称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理所当然的。

普希金的作品对俄国文学的决定性意义，在于把后者从外国影响中解放了出来，在选择本国题材以及使自己的创作充满民族精神这方面，树立了榜样。

波兰最伟大的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是波兰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因参加青年革命运动而被沙皇政府强行送往俄国居住，在那里接触了年轻一代的进步运动并与普希金结为知己，一八三〇年波兰起义失败后，他自愿流亡巴黎。

在他的题材广泛的诗作中，以带有传记成分的哲理诗剧《先人祭》最为出色。《先人祭》分为几个部分，最有意义的部分创作于起义之后，其中描述了沙皇政府对波兰学生的迫害、这些学生的监狱生活以及流放时的苦难。在诗中最精彩的部分，即所谓“即兴”里，主人公古斯塔夫（即诗人自己）奋起反抗上帝，把自己的命运与不幸的祖国的命运等同起来。

密茨凯维支最伟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塔杜施先生》，作品描述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俄国之前，立陶宛（密茨凯维支的出生地）的生活和下层贵族社会。主题是索普利察与霍列谢克这两个贵族家庭的纠纷。索普利察弄死了霍列谢克家族最后一名男性后代，然后又通过为民族牺牲来赎

---

① 指别林斯基。

罪，他的儿子塔杜施娶了美丽的佐霞·霍列什柯娃[1]为妻，从而结束了两大家族之间的世仇。

密茨凯维支的作品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特别是对马哈一代与什图尔一代有过强烈影响，多次被译成捷克文（译者有伏尔赫利茨基、斯拉德克、克拉斯诺霍斯卡、哈拉斯等）。

当三十年代的一代作家进入社会时，民族运动已经不象多布罗夫斯基时期那样软弱无力，也不只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而是包括城乡各阶层的人民。所以年轻一代已经不必去为诸如使书面语言定型化、科学民族化等民族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斗争。当三十年代作家登上文坛时，这一任务大部分已由荣格曼一代完成。

因此，三十与四十年代作家已经可以提出更严肃和更高的目标。他们希望创造这样一种文学：它完全符合民族与时代的要求，能统一和扩大至今还是分散的民族运动，活跃捷克社会生活，并为加强民族运动而提出一个坚定的纲领。三十与四十年代作家认为市民阶级是民族的主要代表，因为数量微小、觉悟不高的工人阶级当时还难以承担领导本民族的重任，但是日臻富裕的市民阶级已开始倾向更成熟的日耳曼文化，因此需要有人来创造一种成熟的捷克文化，主要是能够满足有文化修养的读者要求的文学创作。

对待波兰革命的态度，使至今统一在民族斗争中的捷

---

① 波兰男子如姓霍列谢克，他家的女性（母、妻、女）则姓霍列什柯娃，这是从"霍列谢克"变来的。

克社会人士分裂了。老一代(荣格曼、科拉尔、汉卡)对波兰起义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主张斯拉夫人要相互亲近的想法的破灭，他们不懂得，起义并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而是针对沙皇暴政。年轻一代则认识到，在斯拉夫人的相互关系中，只强调斯拉夫各民族在文学上亲近这一点，对解放斗争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进行斗争并依靠各民族自身的力量。四十年代关于斯拉夫思想的新概念在哈夫利切克身上表现得极其鲜明。当他强调对斯拉夫各民族进行直接了解的意义时，在对待俄国的态度上，他对俄国农奴深表同情，但又将农奴与他认为是代表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沙皇政府区别开来。

四十年代的作家开始更多地面向至今被忽视的普通人民的生活，对工人阶级也开始发生兴趣。三十年代在大学生与工人参加的秘密小组里，这种对于年轻的社会阶层的兴趣渗透到了文学当中。

文学以发挥教育作用、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民族团结为己任。这一倾向在狄尔的作品里得到最好的表现。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倾向作为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的一项表现，作为个人对不自由的环境的一种抗议以及对于更完善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模模糊糊的渴望，也开始加强了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兴趣，这在马哈的生活与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四十与五十年代是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作家也更加注重农村题材，他们已不只是致力于描绘人民的精神文化

状态，而是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如狄尔、聂姆佐娃的作品），对城市贫民产生兴趣（如狄尔、马哈、聂姆佐娃的作品），出现了作为抵抗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反动势力的有效武器的幽默作品和讽刺短诗（如哈夫利切克的作品），同时剧院也起到了帮助进行有效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文学已经不象复兴初期的那样，仅仅希望推行民族教育，培养对捷克语言的热爱，而且也力图争取社会进步。出现了以革命语言写作对白的戏剧（狄尔的《库特纳山的矿工》与《杨·胡斯》）。作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奏的、四十年代的文学政治化，最明显地表现在报刊与新闻事业的发展上（哈夫利切克、狄尔）。

杂志对民族、政治、社会觉悟的提高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从三十年代起，除了一些较老的科学杂志以外，也开始印行娱乐性与文学性刊物（《捷克蜜蜂》、《花朵》）。杂志在读者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通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新作，发表本国原作，协助组织社会生活。一八四六至一八五〇年间，杂志业与新闻事业空前繁荣，这与最伟大的政治记者哈夫利切克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不只存在增强民族团体之间的团结的杂志，由狄尔和他的朋友组织的所谓"捷克座谈会"也曾多次举行。这种座谈会是舞会的补充，或是有觉悟的爱国团体独立的社交性会晤。座谈会上还伴以诗歌朗诵、讲笑话或唱歌等活动。四十年代的歌曲同样有助于民族生活的发展，演唱创作歌曲，也唱民歌。这些年代产生过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

族化歌曲(如《金色的太阳啊,请把我照亮》[①]、《特金山下贝隆卡上空》、《我播下了小米》、《你问我为何是斯拉夫人》)。这些年代里还产生了我们的国歌《我的故乡》与《塔特拉山上雷鸣电闪》[②]。

在斯洛伐克,吕德维特·什图尔与约瑟夫·米洛斯拉夫·乌尔班于四十年代创造了独立的书面语言。这种从生动的人民语言提炼出来的新语言对斯洛伐克人至关重要,因为它促进了民族复兴运动和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团结。

一八四八年书刊审查和警察统治的暂时放松给捷克文学带来的革命思想,已经不象在三十年代那样隐晦,而是直接、公开表达出来的,狄尔在《杨·胡斯》一剧中提出大胆的民主要求,在《库特纳山的矿工》一剧中写了被剥削者反抗剥削者的叛逆的主题。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年代,复兴运动达到顶峰,捷克民族第一次作为欧洲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政治因素,迈进了近代历史,然而同时,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又出现了民族团体的分裂,资产阶级在此以前一直和人民在一起,因为它需要人民作为同盟军跟它一起与更强大的德意志资产阶级进行

---

① 这首歌曾被认为是捷克兄弟会的人跟考门斯基一道被迫离开祖国时唱过的。歌的第一段为:

请把我照亮!金色的太阳,
在我迈出离开祖国的最后一步时
请温暖一下我胸中的神圣情感,
再把我的泪水晒干,太阳啊!太阳!

② 这两支歌合在一起,构成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搏斗；如今它背叛了人民，害怕革命，想跟维也纳政府取得谅解。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进步力量在布拉格降灵节起义中失败而告终，民族政治纲领实际上丝毫没有实现，唯一的贡献是废除了农奴制。力争奥地利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更大合作的斯拉夫代表大会被强行解散。反动派得胜了，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胜利。一个民族既然在政治上已经觉醒，其民族意识已经复苏，它就不可能让本身的天然权利永远受到压制。恰恰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到来的新的警察镇压时期，哈夫利切克创作了他的讽刺作品，空前激烈地向着政府的专制独裁进攻，并思索着民主主义的革命理想。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民主主义理想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思想，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进步文学的前提条件。

切拉科夫斯基的主要意义，在于他以对民间诗歌的倾心热爱，把捷克诗歌从书本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他的学生和继承者却滥用他的方法，让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从属于民歌，后来甚至发展到机械地模仿民歌。针对这种作法，年轻的浪漫主义的一代，首先是捷克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马哈，强调诗人有权表达自身的体验。马哈决定走上反对传统的审美观与看法的道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抗当时的社会。

1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

马哈于一八一〇年诞生在布拉格的小城区。父亲开面粉铺，在奥地利帝国经济崩溃后也遭到破产，因此马哈的童年郁郁寡欢，全家始终生活在困苦之中。

作为新城区中学，其后是哲学法律学院的一名学生，他阅读过德国浪漫主义者的书和古代捷克编年史。现实也象浪漫主义事件和捷克古代史的学习一样，对马哈起了强烈的影响。他满腔热情地注视着波兰起义的进程。同他那一代所有的人一样，马哈将波兰爱国主义者为反抗沙皇专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视为争取整个欧洲解放的斗争。这不只停留在同情上，波兰战士经过我们的国土时，捷克居民还对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给予过支援；有几位热情的青年甚至前往波兰参加斗争。在马哈的朋友组成的小组里唱革命歌曲，热情朗读波兰浪漫主义者、主要是密茨凯维支的诗歌。马哈同他的朋友们也在布拉格的小酒店、咖啡馆里组织座谈会，不仅讨论文学，而且讨论政治局势等问题。青年作家在那里会见工人，从工人身上看到了社会上毫无权利的人们。他们将戏剧看作提高人民觉悟的有效手段。

马哈爱看斯塔沃夫剧院的捷文剧演出，这一爱好使他成为狄尔领导的小城区卡耶坦剧院的业余演员，在业余演剧的排练中，他结识了原名艾莱诺拉·肖姆柯娃的罗丽。罗丽是一位美丽淳朴然而并不出众的姑娘，她不理解马哈

的艺术意图和他那不平静的、经常苦恼和容易激动的心情。马哈以自己性格的全部热情深深爱上了罗丽。后来他发现他所爱的人不能实现他对妇女的理想，因而感到失望。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经常发生误解，他常常外出旅行和逃向大自然，借以避开他与罗丽的尴尬关系。

马哈酷爱旅游。他对大自然的观察细致入微。他跟朋友们一块儿或是独自一人去游览废墟孤堡，发思古之幽情。他最远到过意大利北部，并游览了威尼斯。旅途印象和他勤奋的博览群书，给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启示。

马哈在法律系结业后，来到利托姆涅希采当律师，生活清苦，还要为即将分娩的罗丽操心。儿子一出世，马哈立即准备补行婚礼，但重病缠身，一八三六年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过早地去世。原葬于利托姆涅希采，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将骨灰隆重地迁至布拉格维舍堡公墓。

马哈的早期诗作是用德文写的，只不过是那迷恋亡魂与墓园场景、迷恋恐怖吓人现象的老派德国浪漫传奇的回声而已。然而马哈很快就转到捷克诗歌上来了，开头写的诗歌还显出了取材于捷克过去历史的古代民间叙事诗的影响，是民歌或带有伤感情调的爱国诗歌的回声。

马哈在其大部分抒情诗里思考着生活的意义。他感到自己很孤独，因为人们不理解他。从这种意识中产生了他的悲观主义。他奋起反抗艰难的时世，反对整个社会。他这种反抗常常通过一些遁世的旅人或过着孤独生活的隐居者与僧侣、或者通过以暴力冲击社会及其制度的强盗与囚犯

来表现。

马哈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的梦想与现实的对立。他在想象中看到了生活在自由社会的自由人们，然而现实却常常使他清醒过来。马哈虽然反抗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但由于他在斗争中感到孤独无援，因而陷入了悲观主义。《我进入人世间》这首诗明显地反映出马哈的这种情感。它令人信服地反映了在马哈进入人世间时的想象与他所遇到的痛苦的失望之间的基本矛盾。他寻求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可是见到的却只是带着假面具的不诚恳、不勇敢的人。剩下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祖国。然而，就是对祖国的关系也未能使他得救。他时而象热爱亲娘一般热爱祖国，时而又感到她象一个对孩子漠不关心的继母。当他感到民族的光荣历史一去不复返时，顿时疑惑起来；但在另外的时刻，他又决心手持武器直接为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他在《民间故事诗》中号召青年投入斗争：“竖琴啊，——你这诗人的象征，愿它换来战士的宝剑。”

但即使是这种战斗决心在马哈身上也未能持久，动摇的时刻仍然经常出现。他重新去寻找捷克的光荣过去，甚至到城堡废墟与国王陵墓里去寻找，并为人生的短暂易逝和不能在大地上自由飞翔而感到烦恼，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对马哈来说如同坐牢一样，《黑沉沉的夜啊！明亮的夜啊！》一诗中的著名召唤，就是这种“超脱大地”、“飞向高空的群星”的愿望的最高表现（见《玛林卡》——诗中的间奏曲），也是马哈向往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的明证。

一八三六年四月出版了抒情叙事诗《五月》——马哈艺术创作的顶峰。

故事发生在马哈游览贝兹杰斯城堡时为之神往的一个地方多克斯，其周围有着宽阔的湖面，能了望青山和城堡废墟。《五月》当然只是以大自然作为背景，作品的真正意义在于三个悲剧：雅尔米拉和威莱姆的、一般人的以及马哈本人的悲剧。

故事情节本身在诗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只是模糊地勾画出一个轮廓，用来作为深刻的哲理性思考的出发点。

雅尔米拉和威莱姆这对情人因别人的罪过而丧生。威莱姆认识雅尔米拉之前，她已被威莱姆的父亲诱奸。威莱姆杀死了诱奸她的人，但他根本没想到被杀者是他的生身父亲。由于这一行动，他被关进监狱。在那里他思索着人生的真谛。第二天他该处死，绝望的雅尔米拉则葬身于白浪滔滔的湖中。

威莱姆在监狱里思考着这一使三人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奇怪锁链（情敌——我的父亲！凶手——他的儿子，他是我所爱的姑娘的奸污者！我不认得他！我可怕的举动导致了双重的报复）。《五月》至今还被认为是三人悲剧：以自杀了结一生的被诱奸的雅尔米拉，杀死自己父亲的被骗的情人威莱姆，和最初赶走儿子，后又诱奸他的情人的被杀者。但这种个人的戏剧突然变成了人类社会的戏剧。威莱姆因他父亲的罪过沦为强盗，为雅尔米拉报了仇，因而被处死。

他杀死了不相识的父亲，就似乎摆脱了命运的控制。然而人类社会只知道机械地行使权力，不推究一切动机，不追问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为什么遭他驱逐之后，我在森林中惊恐万分，是谁的罪过使我遭到诅咒，身负罪名？这决不是我的罪过！在这梦幻般的人生之中，我也许受到了引诱，惩罚了他的罪行？假如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本心，为什么要遭此祸殃，过早地永远丧命？”

威莱姆的内心备受煎熬，而且被判刑，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三个人的悲剧一下子成了普遍的人类悲剧。马哈通过威莱姆所提出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从个人悲剧发展成为与大自然很不协调的那种社会的悲剧。

威莱姆在监狱里不仅思考着自己的生命和死刑，还恐惧地想到死后是否还会存在什么。他也为死后即将到来的空虚而担惊受怕，为陌生的空间而惶恐忧伤。然而由于马哈在认识上能根据唯物主义去理解这种虚无，《五月》第三章中出现了对大地的充满激情的呼唤和死者的临终祝愿。因为只有大地、只有这物质的大地才是人类唯一的保障和真正的祖国。

这些诗句不仅显示出马哈对大地的热爱，而且也是他的世界观的表现，是他关于人最终同其发源地与归宿处——物质（大地）合而为一这种信念的表现。这在当时来讲，已是马哈明确的革命世界观。传教士总是训导说：善恶都来自上帝，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过受苦，以换取死后重生。这种

宗教性解释不能使他满足。马哈一直力求对世界采取唯物主义的看法，并且在《五月》诗集里作了充分的表达。从这方面看，马哈是个现代人，他不能够为自己的怀疑而到宗教信仰中寻求支助。只需指出这一层就够了：马哈的主人公反抗、绝望，但决不用宗教所要求的恭顺态度去忏悔或了此一生。在不相信来世这一点上，马哈与他的主人公是完全一致的，威莱姆在监狱一场中说道："未来——明天！ 往后将是什么？不过是幻梦一场！"

根据马哈的观点，物质是永恒的，因为人是这物质的一部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也是不朽的，如同马哈所指出，人死后会变成另一种形态，即另一种"形象"。

诗集的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指出，诗人与主人公融为一体了。在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多年之后，诗人自己来到刑场，看见威莱姆的头颅，便忧郁地缅怀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年时代，感到已无人慰藉诗人的心灵。

因此马哈本人成了这篇戏剧的第三个主要参加者。开始是客观地讲述雅尔米拉与威莱姆的遭遇，但他在接踵而来的某些暗示中已经表明，他自己已站在主人公威莱姆一边。最后，第三号人物替代了第一号人物，与威莱姆、与所有这三个主人公的悲剧融为一体了。所以在作品的结尾，诗人除了对雅尔米拉和威莱姆以外，也对自己表示怜惜；在最后的呼喊中，三个人的名字已连在一起："希内克！威莱姆！！雅尔米拉！！！"并把自己的名字摆在第一位。

《五月》的意义当然不只在于它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

也在于作品的艺术技巧。这部作品开辟了捷克诗歌发展的新时代。在马哈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象他这样令人折服地描绘过一年四季大自然的美。马哈对于大自然的描写绝不是枯燥的平铺直叙，而是活泼生动、扣人心弦的（如："远处的院墙，闪着灰暗的阴影，影子总是越靠越近，近得彼此相互拥抱，越来越低地依恋在薄暮里"）。

马哈对自然的描写富于感情的魅力，同时形象鲜明，色彩斑斓。这不仅是单调的色彩和简单的明暗对比。马哈喜欢运用两色参半或绿白相间的颜色（绿色的湖面上，一群洁白的鸟儿在飞翔……绿色的波纹熠熠闪光），或蓝白相间的颜色（如"雪白的鸽子在乌云下面掠过，水仙花儿盛开……在蔚蓝的湖面上……微风将白帆摇晃。轻巧的桨在湖水中划荡）。有些诗句色彩绚丽（如"晦暗的林中飘出淡蓝色的雾霭，徐徐升上玫瑰色的天空，那色彩柔和的湖面上，蔚蓝的雾啊，在轻轻荡漾"）。

《五月》的结构给人一种戏剧或歌剧的印象（三幕、两个间奏曲和尾声）。故事情节有其戏剧性的上升、高潮和低潮。使情节进展变慢或平息读者的激情的间奏曲，也是为戏剧过程服务的。

马哈在《五月》里为发挥诗的语言之美，在整个艺术上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仅要通过韵律，而且想以组合在均匀的声音整体中的诗句，来使读者入迷。马哈在《五月》诗集中使用的韵脚往往并不多样化，却以单音节声韵的重复来加强诗句的音乐感。《五月》的韵律大多是逐步升调的，抑扬

格[1]的，很少为扬抑格[2]的（见诗的开头两段）。

《五月》不仅通过韵律、诗句的音响（例如个别音的有韵律的规律性的重复）、音序即诗句中元音与辅音的一定排列顺序，而且也通过词汇的语音来起作用。内容上的与句子上的对立（生—死）和省略语（情敌—我的父亲）也起着作用。在选择同义词变换词的含意方面，恢复了古老的词序，重叠使用形容词，以减弱名词的核心意思。他还使用一些非常有活力的动词，以便更有力地强调故事的戏剧性。马哈喜欢使用新颖的不常见的定语（玫瑰花般的日子，五月的山谷），使用拟人化的比拟对照手法：在《五月》诗集中将云影与大鸟的翅膀相比拟，又将惨白的月亮同正在寻找恋人的姑娘相对照。他经常使用的对比手法也颇具魅力："五月的傍晚好象偎倚在荒芜悬崖的怀抱里，脸上显露出淡淡的微笑，心头却满是深沉的忧郁。"或者将两个对立的概念连在一起："逝去的恋人的感情，如同破旧竖琴的声音，疲惫的琴弦之声，"等等。

在捷克文学中，马哈是第一个不顾社会舆论，敢于表达自己的信念、怀疑、希望和感情的人。社会对《五月》大多持否定态度，诗人的同时代人对《五月》的不利的评论证明了这一点。马哈反对小市民平静的牧歌式的生活，并动摇了

---

① 或称短长格，就是一个短音节（非重音）后面跟一长音节（重音），是表示轻快的一种韵律。

② 或称长短格，即一个长音节后面跟一个短音节，表现低沉的情绪。

社会制度所依靠的教会信条。很明显，当时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并非马哈的艺术才华，而是诗的思想内容。

他们指责马哈的男主人公、堕落的姑娘与可怕的森林之王。这个社会不愿让那敢于谴责社会制度、怀疑永恒真理的强盗来打破它的宁静。

例如荣格曼与沙法希克就不理解马哈，科拉尔仅仅把他看成浪漫主义的精神失常者。帕拉茨基虽然承认马哈的诗歌才能，但也觉得他有失常态。连切拉科夫斯基也未评价过马哈的艺术技巧。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杨·斯·托米切克和狄尔尖锐地指责《五月》，如托米切克在《捷克蜜蜂》杂志上写道："我们怀疑有谁能从破竖琴的回声里听到什么声音，我们在这首诗里看到和听到了什么呢？在死人的漂亮服装里永远是一无所有……我们反对诸如此类的黑格尔主义，它认为，除了永恒再无任何目的，一切都不例外；这些将自己置于永恒之外的哲学家未曾粗略地思索一下，连他们本人及其所创造的东西也存在于永恒之中……马哈的诗是从死火山喷出来又溅落在花丛中的残渣。假如马哈先生想在他下一卷作品中再给我们叙述他的幻梦和睡眠，那可以担保，我们将使他猛醒；我们已经沉睡了两百年，再不能允许他用那破旧竖琴的嗄哑声来安慰我们……"

马哈的散文对于理解他的艺术意义也很重要。他同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对各个动词用得很活，所以他的散文也有许多抒情的与戏剧的特征。他以诗句充实散文或使散文抒情化。他兴致勃勃地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短篇小说、戏

剧甚至长篇小说片段)。他也考虑写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书名本定为《刽子手》(1834),全书分四卷,每卷都以故事发生的城堡为题名(《克希沃克拉特》、《瓦尔德克》、《维舍堡》和《查理堡》)。然而马哈只完成计划的第一卷——《克希沃克拉特》。其中描述了国王瓦茨拉夫四世被捷克叛军首领们俘虏后关在克希沃克拉特,以及他获释后回到布拉格城堡的情景。马哈主要不是写一部时间、人物都十分准确的历史小说,而是想刻画书中主人公——瓦茨拉夫国王和他的同貌人跟刽子手朋友的内心冲突。如同在《五月》中一样,《克希沃克拉特》的主人公也是表达诗人本身思想的代言人。

同样,马哈在长篇小说《吉卜赛人》中又一次重复了他的基调:梦想与现实的矛盾,社会上被放逐的人们的情景,主人公(一个虚构的吉卜赛人,他杀死了诱奸他的情侣的人)的命运。

在短篇小说《玛林卡》中,梦幻与现实的矛盾也十分明显。小说刻画了纳弗朗季什库无产者居住区简陋的条件,还描写了病姑娘玛林卡这个特殊的人物,她在马哈看来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个幽灵,是一般环境中一种美的概念。马哈在《玛林卡》里显然是要利用艺术与日常的、乃至严酷的现实进行对比。对纳弗朗季什库贫民区和对卡纳尔花园的五月之夜的描写极富立体感,因而在《玛林卡》中有时可以发现马哈的现实主义的萌芽。

马哈属于最伟大、最受人喜爱的捷克诗人之列,他那些

由于早夭而中断的作品虽未被他同一代批评家所理解，却为年轻一代热情接受，并且开创了十九世纪进步文学的光辉传统。年轻一代诗人如杨·聂鲁达和维·哈列克，以及后来几乎所有的诗歌流派，乃至我们现在的诗人，都把马哈和他的《五月》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一代又一代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读着他的《五月》，每一代都从他的诗里发现新的艺术价值。马哈成了真正的民族诗人。伟大的捷克文艺批评家弗朗季谢克·沙尔达称马哈为捷克诗歌的施洗者和培育了整个现代诗歌的精神之父。

马哈的朋友中有**卡雷尔·萨宾纳**(1817—1877)，他是诗人，新闻记者，历史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作者以及歌剧脚本作者。他为斯美塔纳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与《捷克的布兰尼博尔勇士们》写了歌词。他由于观点进步和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而长期被监禁，他的长篇小说《复活的坟墓》是他监狱经历的现实主义写照。作者通过对各个民族的囚犯(其中也有捷克人)的描述，指出了对人民的专制压迫者的革命斗争方法。

萨宾纳因生活贫困，被迫接受了秘密警察的职务，后被揭穿并开除出民族运动团体。我们把萨宾纳算在我国第一批关心工人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之列。

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1829—1890)与卡·萨宾纳，同属于一八四八年为民族自由而参加街垒战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作为我国最革命的作家之一，他常被囚禁并长期流放。他写过短篇小说、戏剧和诗歌。同哈夫利切克一

样，他属于第一批政治诗人，他的《回忆录》很有意义，是了解一八四八年前后的社会与政治状况的参考资料。

马哈的作品是孤独的个人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抗与抗议的表现，而约·卡·狄尔却按照较老一些的复兴传统的精神，致力于用革命精神教育民族运动团体，组织社会生活，他的作品中最进步的部分，尤其是戏剧（《库特纳山的矿工》、《斯特拉科尼采风笛手》和《杨·胡斯》），都是针对当时迫切的政治与社会需要而写的。

2　约瑟夫·卡耶坦·狄尔

约瑟夫·卡耶坦·狄尔以一八〇八年生于库特纳山。父亲为军乐队员，后操裁缝职业。狄尔最初在布拉格念中学，当时荣格曼在那里任教。后来到赫拉德茨卡拉洛维念书，老师是杰出的捷克戏剧家瓦·克·克利茨佩拉。狄尔回到布拉格之后，在哲学院求学，但对戏剧的爱好很快就压倒了他谋求公职的打算。他放弃学业，随着流动剧团离开布拉格。两年之后失望而归，到军事机关服役，但仍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戏剧与写作活动。

在动荡的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间，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作家，站在为民族政治自由及人民社会权利而斗争的先锋战士的行列，所以革命与立宪运动失败之后，布拉格根本没有他立足之地。狄尔只好再次参加流动剧团，开

始了他一生当中最忧郁的时期。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政治与社会启蒙家之一狄尔，在物质贫困中，在遭受奥地利当局迫害以及身体很坏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一八五六年在比尔森逝世。他受到奥地利政府的迫害，而他一生忠诚地为之服务的人民却热爱他。

除了哈夫利切克以外，狄尔也在捷克复兴时期的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主办过《五月》杂志，它象十九世纪头十年的某些杂志那样，是专为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创办的，但它尽量与广大读者的生活、利益和需要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狄尔力求让尽量多的文章出自捷克作者的手笔。于是《五月》杂志成了培训捷克青年作家马哈、爱尔本、萨宾纳等人的学校。读者通过杂志了解了欧洲进步的浪漫主义者（密茨凯维支、普希金）。狄尔强调人民的政治教育，注意捷克的教育事业和劳动青年的培养，反对当时的不良风气（酗酒、借债等）。狄尔教育他的读者要有民族与民主的自豪感，反对封建主义与教会的黑暗势力，与维也纳政府的反动目的作斗争。

约瑟夫·狄尔的创作活动，是从取材于捷克历史的短篇小说开始的。他想通过历史素材来向同时代人指出，当时的民族斗争应该如何进行。狄尔的历史短篇小说充满着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的范例以及对自由和民族的热爱。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库特纳山法令》，描述了有纪念意义的一四〇九年事件。这一年，瓦茨拉夫四世以他的所谓“三票”决定使布拉格大学捷克化。

狄尔也尝试创作有关现代生活的短、中、长篇小说，为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关心小市民、手工业者和农村人民的生活。他的最大功劳是在文学中写出了最底层的被剥削者：学徒、女仆、雇农和工业无产者（例如《穷人》描述了工人与厂主之间的矛盾）。他并不相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而相信通过说服教育有可能把资产阶级争取到全民族利益这一边来，激发他们对人民的责任感，要他们理解人民。

他的不太成功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名捷克人》，描写一个忘本变节的儿子与父亲之间的矛盾。父亲由于自己的爱国感情被认为是最后一个捷克人。这部小说引起哈夫利切克的尖锐批评。他指责狄尔过分动感情的提法，不同意他为了民族事业企图争取贵族的想法。狄尔承认这一批评的部分合理性，所以开始更多地注意城乡贫民以及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箍桶匠的状况。正是狄尔的这些短篇小说达到了最大的效果与艺术真实性。

反映艺术生涯的短篇与中篇小说在狄尔的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艺术上和思想上最有价值的当推《捷克艺术家的历程》这一组短篇小说。三位青年艺术家根据协议五年聚会一次，以便向本民族捐献一笔稿酬。作者把捷克艺术家带到国外，与发达民族的伟大艺术世界进行比较。狄尔想通过这本书把捷克艺术与世界艺术的命运连在一起，从小市民审美观与"三月以前"① 的标准的桎梏中开辟一条道路。

狄尔艺术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的戏剧。他是捷

克戏剧大师，忠于人民戏剧事业的榜样。在狄尔时代，除了几个以谋生为宗旨的巡回剧团和德意志人经营的斯塔沃夫剧院上演的几出毫无生气的捷克戏，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有效地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与政治觉悟的戏剧，直到狄尔创办业余的卡耶坦剧院并担任斯塔沃夫剧院剧目评选委员和导演之后，才给我们的戏剧提出了新的目标：摆脱维也纳的时髦戏剧，使戏剧服从一个总的目标，即对人民进行政治与道德教育。狄尔的戏剧创作非常丰富，包括滑稽剧、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戏剧、历史剧和神话剧。在狄尔的滑稽剧中，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费德罗娃契卡》（副标题是《又名：没有愤怒，没有争吵》），该剧描绘布拉格手工业阶层人民的生活。在当时日耳曼化的布拉格，这个阶层是捷克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代表是自豪的爱国主义皮鞋匠克罗乌基尔和他的儿子磨坊帮工耶尼克。站在对立面的是狄尔刻画的贵族化的市侩阶层，这些人因为自己属捷克籍而感到羞耻，竭力往富裕的德意志资产阶级里钻。在《费德罗娃契卡》一剧中，这一阶层的体现者是富裕的油脂作坊老板娘玛斯基尔柯娃，她阻挠侄女莉杜卡对耶尼克——“一个粗野捷克人的儿子”的爱情。故事以布拉格鞋匠们在鲁赛尔山谷参加民间盛会而达到高潮。在这些普通捷克人民中间，玛斯基尔柯娃认识到自己的愚蠢。这个戏里最使人感动的是《我的故乡》这首歌词，由弗朗季谢克·什克罗乌普谱曲，盲

① 指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前的时期。

人音乐家马列什演唱。它最初原是一支民族歌曲，后来成为国歌。

狄尔取材于他的当代生活的戏剧具有重大意义，他大胆地触及了捷克社会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他让新的社会阶级、小市民暴发户、大都对民族利益和被他们剥削的职工漠不关心的企业主和工厂主，登上了舞台。与他们相对立的是贫苦人民，他们忍受着生活中难以忍受的折磨与痛苦。狄尔所有的戏剧都洋溢着健康的乐观主义；他歌颂普通人，指出他们在道义上对贵族世界占有优势。大部分戏剧的结尾表明了狄尔要改造“残酷的”资本家，把他们争取到人民事业方面来的理想。大部分戏剧情节都由此而来。

狄尔的历史剧，特别是《杨·胡斯》和《库特纳山的矿工》与过去取材于捷克历史的戏剧、与克利茨佩尔的戏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有着非常现实的政治内容。狄尔不是为了提供可信的历史图景，而是为了表述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现实问题。对于狄尔的这一倾向，不仅剧院的观众（该剧院在一八四八年演出时，饰胡斯一角的演员曾登台对他们作过讲演）心中有数，就是曾经阻挠这两部戏剧上演的审查机关也一清二楚。

《库特纳山的矿工》与《杨·胡斯》这两部戏剧是一八四八年事件的直接回声。狄尔从历史主题中获得了阐述现实社会问题的启示。描写十五世纪末库特纳山矿工暴动的戏剧不只为了反映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产生这一戏剧的动因是一八四四年斯米霍夫矿工和一八四八年前纺织

工人的罢工运动。《库特纳山的矿工》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戏剧。狄尔指出了工人阶级利益与它的压迫者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就连工人领袖奥帕特的女儿安内什卡对铸钱师傅的儿子辛克的爱情，也无法象狄尔先前一些剧本里的爱情那样获得圆满的结局。政治上的调和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力争调和的奥帕特死于刑场。劳动人民权利的坚决捍卫者，战斗的维特则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库特纳山的矿工》是在一八四八年事件之前不久写成的，它是作为一种号召，要人们投入战斗并为即将来临的争取自由的民族搏斗作出牺牲。“到处充斥着兄弟们的血啊，但愿快乐的种子在血泊中开出鲜艳的花朵”，这就是剧本在思想上的结束语。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在争取民族与民主权利的政治搏斗中首次上演了狄尔的剧本《杨·胡斯》。

在这里，狄尔不仅是为了描述胡斯个人的命运，不仅是为了颂扬本民族的过去，而且是为了借胡斯之口来表达革命的一八四八年的纲领，表达本民族在当时的斗争目标与要求。胡斯是为真理、为良心的自由、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而斗争的战士……

……或者作为一个人，
却不允许象人那样
感觉、说话、行动，
不允许享有人的权利，

这如同人虽活着，
却总被人诅咒……

狄尔通过胡斯之口，面对着将人民控制在愚昧与被奴役地位的天主教教会说道："教会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可以思考，但它没有思考。神甫们仅仅热中于巩固贵族的统治，把人的理性化为灰烬。"胡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力量来源于对人民的爱，他的名字"和人民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

狄尔也未曾忘记在他那个时代如此迫切的斯拉夫人相互关系的问题。胡斯的学生与朋友耶罗宁将胡斯的信件传遍了斯拉夫世界。

杨·日什卡也是剧中一个重要角色，他在剧中与胡斯在康斯坦茨相见，虽然这与史实不符。对于狄尔来说，日什卡代表正在战斗的民族的理想领袖，他认为人民"长期听任权贵们摆布，但一旦奋起，王位和宝座就被震撼得摇摇欲坠"，这些名言，是对维也纳政府的明确警告，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狄尔也未忽略令人信服地刻画胡斯的敌人：在狱中被胡斯宽恕过的、奸诈的告密者巴列奇传教士，残酷而骄横的红衣主教彼得·安格里，贪求世界霸权的人们的代表康斯坦茨主教团，所有这些同时也是捷克民族的敌人。

狄尔力图通过《杨·胡斯》一剧再现本民族的伟大过去，使同代人在暴风雨般的一八四八年事件中提高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热情。

狄尔的神话剧至今仍是他的著作中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分。特别是《斯特拉科尼采风笛手》、《伊希的梦幻》以及《森林女仙》。狄尔以他高超的艺术技巧，将自己对普通人及其纯真的感情与道德的信心，将他对他们最终能战胜私欲杂念的信心融汇在民间神话之中，使之具有迷人的魅力。

《斯特拉科尼采风笛手》这"三幕民族童话剧"是对捷克人最纯洁的品质的颂歌，但同时也是对捷克民族性格中的缺点的告诫。狄尔试图指出，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的对财富的贪求，对于人的纯真的道德是何等危险。潘塔列奥·瓦齐克，一个"跑江湖"的捷克人和流浪汉，正是这种没有骨气的守财奴的典型，这种人为了钱可以替任何人效劳，最后甚至出卖自己的民族。

剧中的主人公什万达，是捷克人民的巨大才能、进取精神、勇敢和富于感情等特点的体现者。然而他却有一个缺点：对家乡感到不满，想发财致富，并到国外去寻找荣华富贵，等他进入外国宫廷，才认识到以实用态度看人的上层人物生活空虚，为人下流自私。

是一位普通捷克人的爱情与忠诚挽救了什万达。狄尔在《斯特拉科尼采风笛手》一剧中歌颂了捷克妇女的优秀典型，即什万达所热爱的忠诚恋人、淳朴的多罗特卡。为了挽救什万达，她即使上绞刑架也在所不惜。她勇于牺牲，不图实利。捷克乐师卡拉弗纳体现着人民的智慧并忠于家乡，他同样是个勇于自我牺牲的人。

童话人物在剧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们给予剧本以富于

诗意的魅力,并表达了一种古老的民间信念:大自然与人构成一个统一体,人只有与大自然和故乡谐调一致,才能正确地生活。因为女仙罗莎瓦是什万达的母亲,她的母爱帮助什万达摆脱了外国的引诱与他本人的傲气。

《斯特拉科尼采风笛手》对加强民族自豪感和人民的自尊心有着重大意义,它对捷克资产阶级所奉行的崇洋媚外那一套提出了警告,并力图指出:每个人首先应该为祖国工作。

狄尔站在捷克政治与艺术生活的进步方面,认为艺术就是为民族服务,为争取人民的权利而斗争。他面向人民大众,正确地认为民众是民族的核心。他终生为反对封建反动派而斗争。一八四八年,他捍卫了革命的民主目标,唤起了民族觉悟以及民族复兴的领导阶级——市民阶层的自尊心。只有在资产阶级维护全民族的利益时,他才站在他们一边;当资产阶级离开了全民族的目标时,狄尔便转而反对他们。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年代里,狄尔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批评者,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剥削人民和道德虚伪。

狄尔的作品是民族复兴的文化生活中重要的里程碑。他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入我国文学,反映了普通人民的苦难及其高尚道德。他在作品中运用现实主义艺术的因素,是我国戏剧与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奠基人。

从四十年代中叶起,作家们的政治积极性有了提

高。马哈的个人抗议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发展到四十年代变成了作家对封建社会的抨击。特别是新闻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作家政治积极性的提高。讽刺文学与诗歌逐渐成为反对倒退的最适当的形式。

卡·哈夫利切克就是我国政治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捷克讽刺作家。由于他那充满英勇事迹的生活、他在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妥协性与坚韧不拔精神，他成了下一代人的榜样。

3　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

哈夫利切克于一八二一年诞生在普希皮斯拉夫附近的博罗瓦。父亲经商。哈夫利切克先在聂麦茨基·博罗特(今哈夫利切科维·博罗特)，后来在布拉格上中学并进神学院学习。他希望当牧师，因为他从这门职业中看到了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最大可能性。然而束缚着他的自由思想的兵营式的神学院生活以及神学院长的排捷态度，激起了哈夫利切克对教会的反感。教授们很快发现了这一点，终于因他的爱国表现将他开除。这一时期，哈夫利切克勤奋学习斯拉夫历史，并准备走上作家的道路。根据沙法希克的推荐，他到俄国去当教师。这样，哈夫利切克彻底了解了当时俄国的状况：一面是被奴役的人民，一面是残暴的沙皇政府。

当他与雇主之间发生误会时，便又返回祖国。他有过许多大胆的计划，但暂时连工作也没有。帕拉茨基慨然相助，将他介绍到《布拉格报》及其小说增刊《捷克蜜蜂》去任编辑。由于他的干练与新闻才能，这两种报纸成为捷克公认的很有活力的报纸。梅特涅垮台与一八四八年维也纳革命之后，出版方面的松动使得哈夫利切克能够创办第一份大型政治日报《民族报》，然而降灵节暴动的失败标志着短暂自由的结束。当奥地利政府强行解散帝国议会，并宣布强奸民意的宪法时，哈夫利切克在他的报纸上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哈夫利切克多次抨击政府，因此这位英勇无畏的记者被军事法庭判刑入狱，《民族报》停刊。但哈夫利切克并未屈服。出狱后他迁居库特纳山，开始出版《斯拉夫人》杂志，但在库特纳山他也受到警察的追踪，当局没收了若干期《斯拉夫人》杂志。后来他停办刊物，迁居聂麦茨基·博罗特。政府虽然指控他犯有煽动罪，但法庭却将他释放了。维也纳政府看到威胁利诱对哈夫利切克都无济于事，便决定强制这位英勇的记者保持缄默。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哈夫利切克由警察押解，流放到蒂罗尔。即使在这里，哈夫利切克也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他写出了三首最著名的诗：《圣弗拉季米尔的洗礼》、《蒂罗尔悲歌》、《拉弗拉国王》。四年之后他获准离开布里克森①，但回到祖国时已是病体支离，形销骨立，一八五六年即因痨病逝世。这位英勇

① 他的流放地，见137页。

战士的葬礼成了捷克人民一次民族示威游行。鲍日娜·聂姆佐娃在他的棺木上放了一顶荆冠，以表示对民族殉难者的敬意和对维也纳政府暴行的无声抗议。

哈夫利切克是十九世纪捷克最伟大的政治作家。在他活动的时期，民族复兴运动已经不限于加强捷克语言和文学，而且转向政治目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向反动的维也纳政府进行了初步的政治斗争。

哈夫利切克旅居俄国一事对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去俄国时他已是教会与反动势力的敌人，有觉悟的爱国主义者；他还热烈主张增进斯拉夫人的相互关系。他在俄国已从当时的泛斯拉夫思想中寻求加强民族斗争的力量，但却大失所望。他认识到，沙皇专制制度对人民和民族的自由持敌视态度，这同奥地利专制制度并无二致。他所写的关于俄国的一组文章《俄国剪影》就包含了对沙皇专制的批判，但哈夫利切克同时相信俄国人民伟大的未来。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斯拉夫人的政治》与《俄罗斯人》等文章中强调指出，俄罗斯民族将摆脱沙皇统治，斯拉夫人在政治上的相互联系仍将是捷克政策的基石。

作为政治家，哈夫利切克是自由党① 的成员。这个政治团体由富裕的捷克资产阶级与部分贵族构成，它要求奥地利颁布宪法，让奥地利帝国成为各民族团体的自治联盟，让维也纳政府实现捷克人与日耳曼人在语言上的完全平等。

---

① 自由党，实际上是保守党，它的主要代表是帕拉茨基。

哈夫利切克同帕拉茨基都相信维也纳政府会接受这些要求。他和帕拉茨基一样不愿打碎奥地利帝国，因为他错误地将它当作斯拉夫弱小民族的保护者。所以到了决定性时刻，我国资产阶级便站出来反对领导布拉格六月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克罗姆涅希什国会①解散之后，哈夫利切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正当资产阶级背叛民族，满足于物质利益之时，哈夫利切克却单枪匹马投身于斗争，以抗击气焰正高的反动势力。在这场斗争中，他作为记者、讽刺作家与诗人赢得了全体人民的支持，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政治上勇敢与坚定的榜样。他个人的英勇范例，对七十与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

在我国，哈夫利切克首先理解到报纸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报纸不仅要给读者以消息或消遣，而首先应该在政治上、在公民责任感上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对他们进行教育。报刊必须为进步理想而斗争，就这个意义来说，哈夫利切克成了本民族真正的政治思想导师，他竭力使民族的政治目标渗透到最广泛的阶层，渗透到农民与工人中去。

哈夫利切克的新闻活动同三种捷克政治报刊，即《布拉格报》、《民族报》与《斯拉夫人》联系在一起。

《民族报》成了人民的真正良心。当革命运动遭到失败时，哈夫利切克与他的报纸就是民族的唯一代言人（哈夫

---

① 奥地利政府因害怕革命影响在首都日益扩大，所以将国会从维也纳迁到克罗姆涅希什（现捷克一小城市）。

利切克将《民族报》基本的纲领性文章收集在《民族报的灵魂》集子里)。

《斯拉夫人》杂志与人民的关系最为密切。在这个杂志上,哈夫利切克摈弃了捷克资产阶级的政策,面向唯一忠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最广大的人民阶层。

由《斯拉夫人》杂志发表的关于教会与宗教问题的文章汇编而成的《库特纳山书简》,在读者中间引起了特别的反响。该书成为捷克人民的一本教科书。人们秘密阅读、抄写,广为流传。在这本书里,哈夫利切克揭露了教会过去与现在的反民族政策,指出只关心自己物质利益的教会如何与封建国家相勾结,共同剥削人民。

哈夫利切克在他的杂志上不仅关心政治事件,也注意艺术与文学问题。他的《论批评》一文对捷克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是从此建立了我国科学的文学评论。他强调指出,文学的使命是忠实地描述人民的生活,通过灌输进步思想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为所谓"倾向性"艺术、为具有明确政治教育目标的、思想丰富的艺术而斗争。

了解伟大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作品①,对哈夫利切克将文学看作一种争取进步的社会斗争手段有着重大意义。

一八四五年,哈夫利切克为狄尔的篇幅较大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名捷克人》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其中表现了一种信念:文学必须忠实地、现实主义地描绘民族生活。所以他

---

① 哈夫利切克曾将果戈理的《死魂灵》译成捷克文。

对狄尔那个短篇小说中感伤的爱国主义持否定态度。他写道："是把我们的爱国主义从言谈变为行动，加以身体力行的时候了。让我们更多地从爱民族的感情出发去采取行动，而不是让这种感情停留在口头上吧！"

哈夫利切克是一位天生的评论家与讽刺家。他的全部作品都浸透着对现实的批评。这在他的讽刺短诗里表现得最充分。哈夫利切克大部分讽刺短诗写于青年时代，在神学院求学以及在俄国居住的时期。哈夫利切克在他的讽刺短诗里，以我国前所未有的锐利、猛烈和幽默文笔去攻击一切阻碍进步、麻痹与愚弄人民的事物。在一八四五年的讽刺短诗手抄本上明确地写着："博罗夫斯基·哈维尔向愚蠢与仇恨开战，他不用马刀，却锻冶和磨快了细针、尖头、撬杆与棍棒"，并将这题词讥讽地献给"教会、国王、祖国、缪斯[①]们和世界"。这是他所关注的主要题材范围。在针对教会而写的讽刺短诗中，哈夫利切克是以彻底的无神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讥笑整个天主教教会。所以当他在世时，这一部分讽刺短诗只有一小部分得以出版，在题为献给"祖国、缪斯们"的讽刺短诗中，他公开揭露空洞无物的爱国主义，抨击捷克科学研究单位的反动代表人物及作家们（如《博物馆》、《汉卡》）与政治家们。

除了讽刺短诗以外，哈夫利切克还写过许多政治歌曲，作为民族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哈夫利切克为人们熟悉的

---

① 司文化艺术的女神。

民族曲调配词，使其尽快流传于人民之中。

哈夫利切克在布里克森流放时期写下的三部伟大诗作，是他艺术技巧的顶峰，这就是《蒂罗尔悲歌》、《拉弗拉国王》与《圣弗拉季米尔的洗礼》。

《蒂罗尔悲歌》讽刺性地描述了哈夫利切克被押送到蒂罗尔南部小城布里克森去的情景。他因为反抗奥地利维也纳政府的英勇斗争而被流放该地。

哈夫利切克到达流放地的第二天就决定写这首诗，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力量。在这首诗里，他异常猛烈地，同时又尖刻、俏皮地抨击了当时政治上的一切倒行逆施。他勇敢地克服了个人的悲伤与苦恼。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并未绝望，相反地，他希望通过个人悲剧来提高民族的勇气。哈夫利切克在《蒂罗尔悲歌》里最清楚地显示出，他是一位自觉将个人生命献给民族与进步事业的勇敢的爱国主义者。他非常精辟地阐明自己的人生使命说："历尽人生万般苦，高举火炬向前行，让那快乐的火焰，为年轻一代照前程。"

哈夫利切克极其大胆地鞭挞了奥地利国家机构的反动性和警察的专横跋扈，这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蒂罗尔悲歌》里，除讽刺、讥笑、嘲弄与诙谐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很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如描述哈夫利切克与家庭、故乡告别的段落。《蒂罗尔悲歌》成为捷克人民最喜爱的诗歌之一。哈夫利切克与家人告别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几乎悬挂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家里。

哈夫利切克毕生都在学习民歌的艺术技巧，在《蒂罗尔悲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民歌中汲取各节的结构法、韵律系统及节奏的，看上去似乎平常的诗句结构，却是诗人艰辛劳动、雕琢加工的成果。哈夫利切克的目的不是写"回声式"的诗歌，《蒂罗尔悲歌》是以民歌的形式、政治性很强的内容来对维也纳专制主义进行战斗的、无情的批判。

哈夫利切克本人将《拉弗拉国王》称作"快乐的民间故事诗"。该诗写一个由于长着驴一般的长耳朵而感到羞耻的国王的故事，是根据爱尔兰民间传说改编的自由体长诗，具有政治含义。诗里对时代形势、主要是对帝王专制的局限性与顽固性作了明显的暗示。诗的价值在于它富有民间的幽默感，对诗中主要人物（国王、古古林、捷克乐师们）的描绘也很形象而具体。

哈夫利切克的诗歌创作高峰为长诗《圣弗拉季米尔的洗礼》。哈夫利切克在侨居俄国期间就已把这首诗的素材收集好了。诗人根据古代俄国编年史史料，来抨击人民的主要敌人，即同教权相勾结的帝王专制。这两股反动势力有着同一目的：使被奴役者处于不觉悟与盲从的地位，使他们更加顺从地受人剥削。沙皇弗拉季米尔将贝鲁神[①]看作他的奴仆，因为在专制国家里，教会也得帮助统治者来压迫人民。如果贝鲁拒绝服从沙皇，同样会被判处死刑。但

① 斯拉夫人认为主司雷电的神。

如同所有专制国家的帝王一样，沙皇离开了神也无法生存。人民会拒绝服从，王权将趋于崩溃。因此必须寻求另一位天神：各种教会的代表象商人一样涌入俄国，自我推荐。

全诗是一幅罕见的规模宏大的现实画卷。它不仅表现俄国，而是主要表现奥地利以及所有专制国家最迫切的时代性问题。所以《圣弗拉季米尔的洗礼》受到读者的特别喜爱。当它问世时，因为不能付印，就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爱国读者之中。《圣弗拉季米尔的洗礼》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哈夫利切克最进步的思想。

哈夫利切克的最高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使他的作品为人民所阅读与理解，他的作品使用的语言也服从这一目的。所以哈夫利切克一扫他那个时代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矫揉造作、咬文嚼字与夸大其词之风，将生动的人民语言不加修饰与加工地带进了文学。他勤奋学习人民语言，掌握典型的民间成语、形象与词汇，又将这些民间语言因素巧妙地、适当地吸收到诗作之中，使其尽可能取得生动、形象与实际的效果。某些粗俗的词汇，只要哈夫利切克认为它们能使意思更鲜明，使诗句更有力，他也决不回避使用。

哈夫利切克为争取民族权利进行英勇斗争，在捷克的作家与记者当中，很少有人象他那样为人民所热爱。哈夫利切克对一切反动黑暗势力与背叛行为的斗争，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的真挚、热情、诚实与不妥协的品德，是他留给民族的不朽的瑰宝。哈夫利切克作为一个讽刺作家

与诗人，为以后各代捷克作家与诗人树立了榜样。他使捷克文学更加接近现实主义与生活。他通过他的旨在为民族需要服务的、倾向性鲜明的文学创作，给捷克文学提出明确的目标：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

马哈的同辈人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继承了切拉科夫斯基搜集与创作诗歌的活动。正如切拉科夫斯基在《捷克歌曲回声》中提供了十九世纪初捷克农村人民的图画一样，爱尔本也决定在他的诗集《花束集》与民间创作集中展示一幅幅图画，以反映古代人民的观念、生活以及他们的世界观。

4　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

卡·雅·爱尔本以一八一一年生于捷克东北部的米列金。家庭境况不佳（父亲是个鞋匠，后为园丁）。爱尔本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与贫困搏斗中度过的。他在赫拉德茨·卡拉罗维上中学，杰出的捷克戏剧家克利茨佩拉在该校任教。爱尔本在那里成了一个有觉悟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布拉格念完法律专业，任司法机关职员，后在布拉格城市档案馆当管理员，因而有可能全力投入采集工作。他因肺痨病于一八七〇年逝世。

爱尔本是在三十年代关于如何理解捷克文学的激烈斗争中，在切拉科夫斯基的“回声”诗歌与马哈的新诗之间的

争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尔本在许多方面都是切拉科夫斯基的继承者。他把整个一生献给了民间创作文物的采集工作。但他已不只是象切拉科夫斯基那样(如在《俄罗斯歌曲回声》里)为了现实的需要才模仿、利用和改造民间创作，而是想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来说明古代斯拉夫人在其神话、童话与歌曲里所表现的生活与思想。他希望刻画出斯拉夫民族在最古老的部落与文化统一体时期的生活。

爱尔本的意义在于他的民歌采集、出版和诗歌创作活动本身。

爱尔本为采集出版捷克民族歌曲花费了他一生中几十年的工夫。通过查阅档案材料，爱尔本热心地将流传在民间的所有歌曲一一记录下来，出版了三卷《捷克地区的民歌》集，并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把它们改写成《捷克大众歌曲与歌谣》。然而他把最大的力量放在斯拉夫古代童话与传说上。他从这里看到了反映斯拉夫人最古老的生活与思想的一幅完整无缺的图画，他还出版了《原始方言中的斯拉夫民间童话与传说一百例》。

捷克童话在这个集子里具有特别的意义。爱尔本以完善的艺术手法对原来的民间创作进行了加工。最著名的有：《高个子、大胖子和千里眼》，《神鸟与红狐狸》，《金发女郎》，《万能神爷爷的三根金发》。爱尔本的《捷克童话》收入了所有经他加工整理过的童话，这个专集在他逝世后很久才出版。爱尔本还将《斯拉夫其它少数民族神话与传说选》译成捷克文。爱尔本对童话的看法与聂姆佐娃截然不同。他不

象聂姆佐娃那样，想用童话与传说进行教育，为社会进步而斗争；对于爱尔本来说，童话、神话与传说是过去人民生活图景的反映。他最大限度地强调斯拉夫方言之间原来的亲缘关系，强调所有斯拉夫部落的风俗、习惯以及对大自然和生活的态度本来是一致的；然而爱尔本的作品从来不只是具有这一学术意义，它们还加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斯拉夫亲缘关系的思想。

爱尔本的翻译工作也服务于密切斯拉夫关系的思想。他将“两首古俄罗斯诗歌”《伊戈尔远征记》与《顿河彼岸之战》改写成捷文诗。爱尔本对这两首古代俄罗斯大型英雄史诗的翻译，显示了他高超的翻译技巧与诗歌才华。

爱尔本自己创作的唯一诗集是《花束集》，它是捷克文学中最著名与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是作者将近二十年诗歌创作的成果。其中有的诗篇最初发表在杂志上(1838 年第一次发表《宝库》一诗)。一八五五年的第一版除序诗外，还收录了十一首民间故事诗(《宝库》、《新郎衫》、《午间女妖》、《金纺车》、《圣诞节》、《小鸽子》、《扎霍什的刑床》、《水妖》、《柳树》、《女儿的诅咒》、《女预言家》)。

《花束集》问世，正值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之后的新专制时期，大部分捷克作家保持沉默，正如杨·聂鲁达所说的处于“活埋的时刻”。在这革命希望幻灭与政治压迫的时期，《花束集》以其对人民的信任，起到了补药的作用。作为结束语的《女预言家》一诗，增强了人们的政治信念。

《花束集》的基础是捷克神话。爱尔本作为采集家，对

神话很熟悉；他作为艺术家，又成功地用完善的诗歌形式将神话加以改写。爱尔本认为神话所表达的是人们对世界与生活的本来观点。

爱尔本认为，命定性与必然性是神话思维最基本的特点。人类在大自然毁灭性的力量面前束手无策，心中充满着无法解释的疑虑，于是力图将一些自然法则带进这个世界。他们从自然界的生命循环与一些重大自然现象的周而复始中得出结论：一切都由不可改变的法则（必然性、命定性）支配着。后来我们的先辈又将这种法则带进道德领域。这种无所不在的法则就是大自然本身。爱尔本在《花束集》中对这一法则绝无任何异议，认为只要越出了超自然力量给人们规定的界限，就会受到惩罚，导致人类毁灭。破坏人们之间的自然关系（如忘了关照孩子、谋杀、不孝顺父母），向超自然的力量呼吁或渴望干预命运等行为，都会使人立即受到惩罚。然而爱尔本还承认爱与宽恕的法则高于这必然世界，高于这罪与罚的世界。对生活法则的大胆跨越，必须用忏悔来抵偿。

爱尔本不仅描述了我们先辈的生活态度，而且象他的伟大的同代人马哈一样，也为同样的生活问题所苦恼：生活的动荡不安，对生活与世界的意义的怀疑，对社会状况的不满。然而爱尔本找到了与《五月》诗人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否定马哈的革命斗争和对命运、对社会与道德法规的反抗，而承认自己在斯拉夫神话里看到的超人的秩序。不仅违反世界秩序要受罚，任何人对别人犯了罪也要

受罚。

所以《宝库》中的母亲也受到惩罚，因为她为追求钱财忘掉了自己的孩子，只有忏悔才使她重新获得母亲的幸福。在《新郎衫》中，一位姑娘由于埋怨命运而受到惩罚，结果被夺去了未婚夫。在这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神话的两条线索：多神教式的（死者复生）与从诗中作出的基督教式的（乞求圣母怜悯）结论。生活与世界法规终将战胜黑暗与死亡。在《午间女妖》一诗中，将超自然的力量引入人世间的行为受到残酷的、难以弥补的惩罚。

《扎霍什的刑床》在《花束集》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马哈的《五月》给爱尔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首民间故事诗在《花束集》中的出现，便是清算《五月》的强大影响的一次有意识的尝试。爱尔本不赞成马哈的虚无、厌世与绝望的诗作。扎霍什在严峻的忏悔之后获得赦免，朝圣者在罪恶王国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善与爱得胜了。

在《圣诞节》里，爱尔本成功地描述了古老的民间风俗、习惯与迷信。旧的多神教世界与较新的基督教世界在这里合成一个整体。但该诗还有一条道德结论：人的认识受到严格的限制。任何不必要的好奇心、窥测别人的眼睛所不该看到的领域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水妖》一诗表现了人与引诱人和吓唬人的自然力的关系。这首故事诗按照民间古老的表达方式对这自然力提出警告。两个世界不可调和，每种解决办法都是悲剧性的：不是女儿鄙视母爱，就是母亲隐瞒自身的母爱。尽管自然力对她们残酷地进行报复，最

后还是人的世界取胜。

《花束集》的内容当然不仅是神话世界，不仅是充满罪恶、惩罚与调和的世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过去社会与家庭生活的生动图景，看到捷克原野的柔和景色。爱尔本是一位具有伟大而永恒的社会价值的诗人。《花束集》是母性的颂歌，诗中绝大多数主人公是妇女。妇女和母亲是家庭的体现者，是民族及其力量的哺育者。

民间故事诗的形式最适合《花束集》这种诗的内容。爱尔本巧妙地运用了民间故事诗的一切艺术手法。切拉科夫斯基的民间故事诗《托马与森林女仙》是爱尔本的创作范本。爱尔本的民间故事诗以情节的急剧发展与戏剧性的表现手法抓住人心。作者的语言表达手段与情节的戏剧性相适应。他爱用无动词的句子，诗中常常既无连接词也无结尾。例如在《新郎衫》中：

你听！墙根旁的脚步声，
小窗上，笃笃，笃笃，笃笃！

情节的戏剧性发展常常用叠韵来加强(如《新郎衫》的结尾)。故事情节紧凑也与故事诗的特点相适应，所以在一般描述与突出特征方面，《花束集》的文笔非常精炼；然而戏剧性的对白却占有特殊地位。在民间故事诗中，情节简练、艺术高超的作品要算《午间女妖》了。故事实际上就发生在教堂鸣钟的那一瞬间。爱尔本是善于描述和捕捉特征的大师，他只用寥寥数语就能展示出环境的画面，表现出角色的

生动特征。

在《金纺车》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尔尼奇卡富于特色的形象：

姑娘出来有如鲜花开放，
世上未见过这般娇美芬芳。

而她的母亲则是：

出来一位老太婆，全身只见皮包骨……

爱尔本的诗句优美，其奥秘在于他对人民语言的完整透彻的了解，以及能对读者所有感官发生作用的高超技巧；他的诗句能引起人们在行动、视觉与听觉上的联想。

爱尔本的作品不是革命的，他本人在政治上可以说是站在保守的一边。他对任何抗拒命运与必然性的言行都有反感，这也许是来源于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的绝望情绪。《花束集》的确带有这种政治上不自由的沉闷气氛，然而就是在这个艰难时世，爱尔本仍然表现了他对民族的爱和对它未来的坚强信心。《花束集》的序诗与诗集结尾的《女预言家》一诗，使诗集具有了政治意义。序诗中死去的母亲代表祖国；她的孩子们忘不了她，并永远忠实于她。《女预言家》带着对民族美好生活的信念召唤着：命运注定，民族将继续生存下去。"…… 一条溪流被填起来了，另一条又会出现在世上……"爱尔本从民族的过去看到了它的光明未来。

《花束集》成了晚辈艺术家永恒的创作泉源。聂鲁达、伏尔赫利茨基、贝兹鲁支、沃尔克和其他诗人都学习他的民间故事诗的技巧。《花束集》同样也吸引着我们一些最伟大的造型艺术家(马内斯、阿列什),使我们的音乐大师们(安东宁·德沃夏克、兹登涅克·裴比赫、维杰斯拉夫·诺瓦克等)爱不释手。

爱尔本作为民族志学家与诗人，创造出了斯拉夫人特别是捷克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的壮丽画面。他的《花束集》与童话是我国后辈艺术家们经常重温的不朽之作。爱尔本的全部作品是对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伟大信心的表现。它唤起了民族自信心,并指出:人民才真正是民族的核心与今后生活的保证。

爱尔本的作品指出了人民过去的生活、他们对世界的想象与观点。与他不同的是鲍日娜·聂姆佐娃,她描绘了捷克人民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情况。这个时期,农村旧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已进入末期(《外祖母》),资本主义关系开始破坏农村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庄园内外》及其他短篇小说)。

5 鲍日娜·聂姆佐娃

鲍日娜·聂姆佐娃以一八二〇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一个贵族家的马夫,日耳曼人杨·潘凯尔,母亲为捷克女佣

人特蕾齐亚。小小的芭蓉卡[①]（本名芭尔博拉）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捷斯卡·斯卡利采度过的。潘凯尔一家在她出生后不久就搬到这里来了。夏天，潘凯尔爹爹在公爵夫人扎汉斯卡的拉季博日采庄园当马夫，只有冬天才同她一道到维也纳去。在小芭蓉卡所有的童年回忆中，她的外祖母玛格达伦娜·诺沃特娜给她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外祖母是一八二五年搬到拉季博日采她女儿那里去的。

芭蓉卡小时候在捷斯卡·斯卡利采上学，后来到赫瓦尔科维采的庄园管理人身边受教育，在那里她首次接触德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文学读物使这位年轻的姑娘怀着崇高美好的理想，憧憬着更有意义的生活。

芭尔博拉·潘凯洛娃[②]十七岁时与海关税务官约瑟夫·聂麦茨结婚。聂麦茨比他年轻的新娘年长一倍。他是一位有觉悟的爱国者，由于他的民族意识，他得不到上司的赏识，所以工作地点常常调换。

聂麦茨夫妇在新婚后的几年里多次迁居。一八四二到一八四五年在布拉格居住期间，聂姆佐娃熟识了布拉格的爱国团体，直接结交了先进的捷克作家。在布拉格时，她已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民族事业。她与诗人瓦·博·奈贝斯基[③]的友谊对她影响很大。奈贝斯基建议她投身于

① 聂姆佐娃的小名。

② 聂姆佐娃婚前的名和姓。

③ 瓦·博·奈贝斯基（1818—1882），浪漫主义诗人，受马哈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

文学创作。聂姆佐娃在布拉格创作并出版了她早期的诗歌与童话。

在霍茨科，特别是在多玛日利采的居住对聂姆佐娃有着重大意义，她在那里熟悉了捷、德城乡人民的生活。她深入多玛日利采农村了解人民的生活，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汲取营养，也为人民从事启发民族意识的工作。聂姆佐娃在多玛日利采继续创作童话，为布拉格的杂志撰写民俗学方面的文章和有关城市社会生活以及农村社会状况的报道。在那里，她也试图创作她早期的短篇小说。

聂姆佐娃在霍茨科经历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她在农民中作宣传，对他们进行宪法教育。当她听到布拉格暴动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布拉格。在此期间，聂姆佐娃的丈夫也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甚至参加过议员竞选。聂姆佐娃曾对新的自由的诺言抱有热诚的希望，然而布拉格人民的斗争却以投降告终了。

聂麦茨夫妇因积极参加革命而遭受奥地利当局的迫害，他们的行动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聂麦茨被传讯，一次又一次被迫迁居，最后到了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终于被解职。五十年代时，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其它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接踵而来。聂姆佐娃恹恹成疾，易怒的丈夫常常不理解他那必须以微薄的稿酬来贴补家用的妻子。爱子辛内克的夭折，使他们的家庭遭到更大的不幸。但就在这个时期，在聂姆佐娃不得不向朋友、熟人借债度日的困苦与不幸的日子里，产生了她最伟大的作品——不朽的《外

祖母》。

在霍茨科的居留，特别是对各个阶层的社会差距的了解，使聂姆佐娃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她的观点与人民阶层的要求逐渐趋于一致，她能用被资产阶级所欺骗与叛卖的人民的观点来评价布拉格革命。在革命年代，当巴赫专制制度加强之时，聂姆佐娃识别了真诚磊落的人民爱国主义与市侩怯懦的爱国主义，亲自体验到布拉格的所谓爱国团体是怎样回避她，害怕她的观点，无视并指责她的观点。所有这些都促使聂姆佐娃必须与市侩团体决裂，并与因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有着进步思想的年轻人如萨宾纳和弗里奇，最年轻的作家聂鲁达、哈列克靠近了。聂姆佐娃也是我国最早接触空想社会主义的人之一．捷克摩拉维亚兄弟会成员弗・马・克拉采尔在我国宣传这种思想，该兄弟会曾唯心地希望将人类社会建立在彼此兄弟般团结友爱的 原 则上。克拉采尔在论文集《与友人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起源的通讯》(1849)中，为聂姆佐娃写下了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导性的文章。

一八五一到一八五三年，聂姆佐娃曾三次离开布拉格去游历斯洛伐克，还有一次是到那里作考察性的访问。她从当时所有捷克作家的作品中获得了对斯洛伐克的透彻了解，几乎结识了所有著名的斯洛伐克作家，与他们保持通信联系。她有关斯洛伐克的文章与研究，对两个兄弟民族的亲近起过不少促进作用。

从五十年代中叶起，聂姆佐娃就受到慢性病的折磨，长

期的贫困与不幸的家庭关系使她的病情日益恶化。一八六一年她来到利托米什尔，与出版商阿乌古斯塔洽谈她的作品的出版事宜，但在圣诞节时病势加剧，由她丈夫接回布拉格。一八六二年元月，她由于精力衰竭和长期困苦而溘然早逝。

聂姆佐娃是在四十年代中叶以她的情诗、爱国诗歌和童话进入捷克文坛的。是爱尔本和她的友人切伊卡大夫激发了她对童话创作的兴趣。

聂姆佐娃的《民间故事与传说》(1845—1847)包括各种民间创作，但主要是她自己创作的童话，此外还有若干地方性传说与传奇故事。

聂姆佐娃的目的不是如实地记录民间流传的童话，她这本集子并非供民俗学家使用的。作者从各种童话题材中进行选择，把她从讲述者那里听来的故事内容加以压缩或扩展，但又不是随意改动，而是如同童话里描绘的那样，力图表现出典型环境和捷克人民中的典型形象及其性格特点。在聂姆佐娃后期的一些童话(主要从《民间故事》第3集起)里面，作者更多地保留了民间讲述的形式，这不只是在题材和表达方法上，在语言上也是如此。人人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实现公正的吏治，道德价值战胜罪恶势力等等，都是聂姆佐娃童话的主要思想。这些道德价值大多由人民中的英雄来体现，他们战胜了门第高贵者的傲慢、豪富与邪恶。

聂姆佐娃最优秀的童话描绘了捷克农村环境中一些人

物及其命运，他们并不使人感到不自然、不现实。例如关于玛丽什卡的童话写的就是一位贫苦村民的家务事。在《夜岗》里出现了很有特色的农村人物：穷教员与吝啬的磨坊主。

《民间故事与传说》问世时，正是捷克文学需要从艺术上刻画捷克农村人民的民族特性的时期，聂姆佐娃后来在《外祖母》里最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与此相反，聂姆佐娃的《斯洛伐克童话与传说》(1857—1858)则是从民俗学与采集家的兴趣中产生的。聂姆佐娃希望通过这些童话，向捷克读者展示斯洛伐克民间艺术的丰富多彩，所以她尽可能按照她从讲述者口中听来的和从已出版的集子中看到的民间艺术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加以介绍。聂姆佐娃对霍茨科的了解与她在斯洛伐克的第四次逗留，给她的游记与民俗学描述提供了许多素材，这实际上是聂姆佐娃的新闻创作。《多玛日利采近郊即景》是在《花朵》与《捷克蜜蜂》杂志上连载的，它记述了霍茨科人民民族觉醒的形势与状况，但她也注意到民间服装、习惯与人民的整个物质文化。后来又开始记述公益事业(教育问题、妇女地位、人民的社会需要等问题)和民间传说（关于杨·科齐诺维)。

《关于斯洛伐克的文集》产生于五十年代，是一些关于民族学及语言学的学术性短文，以及斯洛伐克人与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其它民族的生活情景。这都是聂姆佐娃关心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条件的明证。

聂姆佐娃在一八四八年写成的著名文章《农民政策》也属于她的新闻作品。她在该文中指出：宪法的颁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需要与愿望。伏契克在评价聂姆佐娃这篇文章的意义时说："在当时乃至以后很长时期内，捷克作家中没有人象聂姆佐娃这样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工人阶级对贵族老爷的所谓自由的看法。这在我国是真正划时代的见解：来自彼岸的见解。"

聂姆佐娃的童话与新闻创作是她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准备。聂姆佐娃描绘捷克民族社会，特别是描绘农村社会生活的意图，将她的童话创作与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联系起来了。这种作品中的来自民间的主人公是代表整个民族运动的英雄人物。

聂姆佐娃的农村短篇小说明显地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体现着作者的两种意图。其一是努力指出体现着一定历史发展的农村人民的优点方面，其二是指出农村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旧的家族关系遭到破坏、没落的封建主义与上升的资本主义之间进行激烈搏斗的情景。

聂姆佐娃早期的短篇小说，是她住在多玛日利采期间孕育和创作的。这些作品的情节，仅仅是刻画环境的一种手段。聂姆佐娃在后来大多是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里，则把注意力放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 她常常批评社会的弊端，如《山村》(1856)、《庄园内外》和《穷人》（均1857)、《好人》(1858)，唯一以斯洛伐克为题材背景的《山脚下的小木舍》(1858)以及《老师》(1860)。

聂姆佐娃短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些“好人”（她有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以《好人》为题的），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来自民间，常常直接出身于贫民。主人公的基本特点是善良与高尚，有益于社会，不自私，并竭力使自己对周围环境有所作为。善良的人常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总是努力使善得以占优势。

聂姆佐娃力图在短篇小说里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她在贫富对立中观察到的。她的短篇小说《庄园内外》是对当时社会上阶级对立的最尖锐的批评性观察，是贵族老爷的豪华奢侈与不可想象的贫困最尖锐的对比图。斯科奇多波莱太太为了跻于上层人士之列而买得贵族头衔，她的小狗约利睡的是褥子，吃的是用瓷盘装着的精美食物；而穷人的孩子却在活活地饿死。身患霍乱的寡妇卡拉斯科娃的婴儿陷于绝境，她的儿子伏伊杰赫无处安身。穷人对富人来说只是一种累赘。只有穷人懂得爱别人。后来斯科奇多波莱太太虽然也帮助穷人，但那不过是一种慈善行为，并不能消除社会贫困。

《山村》是作者一部介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的作品。聂姆佐娃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是提出有无可能消除贫富之间、主人老爷与人民之间的隔阂问题。但这不是作品的唯一思想。从这一考虑中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例如教育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宗教、信仰与迷信，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以及捷克与斯洛伐克人民的关系等问题。

这种调和人民与权贵之间的社会矛盾的思想，在《山村》里是通过霍茨科的农村生活以及那里老爷们生活的描绘对比表现出来的。上层人物的代表，贵族哈卢什，他的母亲和未婚妻叶伦卡以及奴仆们，生活在理想的和谐之中，财主们将自己的财产只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这种理想化的观念使作者创造出来的往往不是真实可信的人物，而只是她理想中的绅士。

与此相反，她对农村人物却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的。《山村》一书虽然由于把贵族理想化而使艺术价值有所降低，但仍不失为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聂姆佐娃文学创作的顶峰是她的《外祖母》(1855)。《外祖母》成书于作者失去她的爱子辛内克、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最艰苦的时期。它是一部对"童年的天堂"的回忆录，是"为了安慰自己悲伤的灵魂"而创作出来的。每当她回忆时，就好象奔到了她亲爱的外祖母身边。聂姆佐娃的童年回忆，成了她的作品素材的主要来源。但聂姆佐娃还以她对人民(比如说多玛日利采人民)生活的了解，充实丰富了这些回忆。关于地方与人物的描写主要根据她自己的回忆，情节线索也是从回忆中引伸出来的。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全都象她在作品里所描绘的那样。在这里，诗与真实糅合在一起了。《外祖母》不是一本传记作品。聂姆佐娃在使用回忆所提供的素材时非常灵活。作者的主要意图在于表现普通人的和谐生活。这些普通人的活动是围绕着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心人物而展开的。在外祖母身上正好体现出一个

经历过艰苦生活与搏斗，善于从中汲取教益，变得稳健、明智的捷克人的特点。

聂姆佐娃的小说将十九世纪上半期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安排在拉季博日采山谷里。外祖母周围聚集着一批人，他们创造了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农村环境，这个环境与庄园里矫揉造作的不自然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聂姆佐娃还以她的想象与当母亲的亲身经历，对她童年记忆中的真实人物外祖母作了补充。玛格达伦娜·诺沃特娜的实际生活，在基本特点上与外婆本人所叙述的并无二致。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最大变动是，外婆并非死于老漂白场，而是死在维也纳。

对芭蓉卡父母的性格，聂姆佐娃几乎是根据真实情况来描写的。聂姆佐娃的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点贵族化，对农村生活不甚了解。父亲卜罗西柯（杨·潘凯尔）是一个单纯直率、诚恳而健谈的人。虽然是日耳曼人，但同大家相处融洽。

聂姆佐娃描述了一些孩子的典型。年纪最大的芭蓉卡（作者本人）体现着儿童好奇与敏锐的特点，杨与魏林身上体现出儿童的无忧无虑与贪玩爱动，阿黛尔卡则完全是个幼稚儿童。

磨坊大叔与克瑞斯特拉以及她的未婚夫雅古普·米拉或者古特拉一家，是鲜明的劳动人民的典型。

贵族老爷的世界由公爵夫人和养女荷尔坦思叶小姐构成。聂姆佐娃是以扎汉尼公爵夫人、纳霍茨科庄园主卡特

日娜·贝德日什卡·扎汉斯卡为模特儿来塑造这两个人物的。

乍一看来,《外祖母》由于它具有朴素与自然的特色,可能使人感到该书的创作未经过深入的艺术构思。但是每一部伟大作品都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写成的。聂姆佐娃的《外祖母》也有它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故事情节以及各部分的艺术安排。

《外祖母》的基本结构由两条情节线索组成。一条展示着老漂白场外在的生活。从外婆的到来开始,继而描述她平常的一天,紧接着除了卜罗西柯一家人以外,还出现了其他的人:磨坊主,瑞森堡猎人,财主的看山人莫依日什,卖草药的老大娘,疯子魏克杜尔卡,克尔科诺谢山的猎人贝尔大爷,公爵夫人和她的养女,以及一系列的小人物。然后,生活描写的范围越来越宽,根据书中各个地方的需要,情节的起伏时而较为温和徐缓,时而急促紧张。

小说的另一条脉络是内在的,从第八章开始逐渐展开,属于自然情节发展的范围。这实际上是对一年来的老漂白场的描写,对一年四季的生活的描写。用以表示自然生活中最丰饶的季节——夏天到来的是鲜花盛开的草地、隆重的圣体节、圣约翰之夜和斯瓦托尼奥维采庙会等,用以表示秋天的是夏末秋初的晴朗天气和苹果片或干梨片;用以说明冬天的是在温暖的壁炉旁边所讲的童话、圣诞节的习俗、姑娘们纺纱之夜。然后春天来到,大自然从沉睡中苏醒,孩子们淹死稻草人玛任娜① ……以下情节的叙述已不再按照

准确的时间顺序：魏克杜尔卡和她的死，克瑞斯特拉和米拉的遭遇乃至荷尔坦恩叶的爱情秘密，但这些都以大自然的情调作为陪衬，例如：用夏天的暴风雨衬托魏克杜尔卡之死，而克瑞斯特拉与米拉婚事的解决又与愉快的丰收节相联系。

《外祖母》的结构是以引言开始，以结束语告终。引言——对外婆的回忆，用的是直接称呼，外婆的呼格②。结束语则是对外婆暮年和临终时情景的描写。

在每一章里，聂姆佐娃总是将定期重复出现的事情与单独出现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来讲述（比如：在描述外婆普通的一天时插入了狗咬死十只小鸭的故事）。

《外祖母》对人物和情节的描写具有单纯朴质的特色，同时也深刻表现了人民生活的画面。在千变万化之中，作品里始终贯穿着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美好而合理，并与社会协调一致。聂姆佐娃在《外祖母》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聂姆佐娃在三十四岁写《外祖母》的时候已经积累下许多生活经验，懂得她经常遇到的社会不平和民族之间的冷漠，也有了坚定而明确的观点与目标。聂姆佐娃在《外祖母》中融汇了自己的许多生活经验，而这主要是通过外婆之口表达出来的。外婆是人生阅历极深的典型。她为别人的

---

① 用稻草扎成的人形，春天来临时，孩子们把它扔入水中，表示送走严冬之意。

② 捷克语的名词有七个格，在直接称呼某人某物时，用第五格，即呼格。

幸福、为整体的利益生活了一辈子。

是什么把人引向丰富而和谐的生活？每个人的信条应该是让劳动使生活达到更高境界，更有意义。对外婆来说，蜜蜂就是勤劳的榜样，外婆对任何东西也不象对屋里的蜂房那样喜欢，因为“人们一看到这些整天忙忙碌碌从蜂房里飞出飞进、勤勤恳恳工作的小蜜蜂，就感到高兴。”（见第12章）

公爵夫人曾经问外婆是否希望无忧无虑地度过老年，外婆回答说：“只要我还活着，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就得做事。懒人再高贵也不顶用哪。”（见第 7 章）

外婆对公爵夫人说，她有一条坚定的原则：富人的施舍对穷人无济于事，穷人要依靠经常的劳动（见第 7 章），才能成为一个勤奋的工人和主人的忠实助手。

生活得好的另一个条件，则是注意健康。“健康可真是宝贵呵，人一失去了它，才知道它的可贵。”（见第16章）

外婆同动物和大自然的关系极为融洽。她善于简明扼要而又富于感情地对孩子们讲解那些最微小的动物的生活（见第 8 章①）。

外婆还有一种美德，那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她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的热爱。当公爵夫人惊异地问外婆和她的孩子们

---

① 在第八章里，给孩子们讲解蚂蚁的生活情况的其实是荷尔坦思叶小姐，而不是外婆。

为什么不留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克拉茨科时，外婆回答说：“那他们可能会学外国话、外国习惯，最后，他们就会完全忘掉自己的血统。这样，叫我怎么好向上帝作交待呢？不，不行啊，谁出生时是捷克血统，就让他总说捷克话吧！”（见第7章）。她在另一个地方又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热爱捷克土地，就象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超过一切，象好孩子一样为她工作……”（见第11章）

聂姆佐娃就这样在《外祖母》一书中向后代，主要是向青年表达了她的爱国主义遗愿。

与《外祖母》内在的思想价值紧密相连的是它出色的语言艺术。作者善于运用细腻而又恰如其分的语汇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情绪与思想；善于使用适当的手法来描绘每个人物和每种现象。她的语言来自人民，流畅清晰，明快易懂。

伏契克非常出色地刻画了聂姆佐娃这个人物的侧影：“鲍·聂姆佐娃不只具有一个可爱的有魅力的灵魂，她不只是一位美丽的优秀女性，有着一颗无限渴望美好事物的心，却遭到难以理解的残酷命运的打击，她也不只是一位需要过时的与无用的怜惜的殉道者 而且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新型的女性，她具有一颗叛逆者美好的和最人道的心，她的命运是一个战士的命运。”

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捷克文学小结

三十和四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努力，其目的在于统一与扩大分散的民族运动，活跃捷克的社会生活（舞会、座谈会、社会歌曲、早期社团、娱乐杂志），并赋予民族运动以坚定不移的纲领。

传统的斯拉夫民族互相支持的思想为民族自由的要求所代替，而这与三十和四十年代文学强烈的政治与革命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出现了统一的民族生活，为完成民族任务而争取富裕市民阶层的努力，一方面力图组织民族生活，通过文学在社会底层人民中起教育作用。狄尔以自己的生活与作品最好地代表了这种倾向。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尚未解决的社会矛盾的表现，作为孤独个人对周围环境与不自由生活的反抗和渴求更好的社会组织的模糊愿望，也开始得到加强。马哈在他的生活与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感情。

四十和五十年代标志着文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农村题材，作家们开始关心城市贫民（如狄尔、聂姆佐娃），出现了讽刺与悲歌的形式，作为反对倒退、追求进步的斗争手段（如哈夫利切克）。四十年代文学的政治化，最明显地表现在新闻事业的发展上（如哈夫利切克、狄尔）。

一八四八年运动是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潮，但同时又是

到那时为止统一的民族运动团体分裂的表现。一八四八年以后，尽管政治上有反动派的压力，而最优秀的作家仍然继承着过去的进步理想。爱尔本的作品继承了切拉科夫斯基的传统，致力于表现民间文化与人民的观念。

聂姆佐娃的作品，一方面刻画了捷克农村人民在家长制生活方式仍然存在时的图景（如《外祖母》），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资本主义关系开始破坏捷克农民与小市民生活的情景（如聂姆佐娃的短篇小说）。

八　六十和七十年代

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奥地利各个地区建立起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之坏，比过去梅特涅专制政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策划人为奥地利大臣亚历山大·巴赫，所以这个体制也称为巴赫体制。这个时期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一切政治活动都已停息，没有议会可以让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去捍卫他们的权利，一八四八年一度大大发展的捷克政治新闻事业几乎衰落，社团的公共活动全然消失。任何微弱的自由思想的表现都遭到压制，奥地利政府用暴力扼杀了民族运动。当时布拉格警察总监宣称，几年之后捷克民族将不复存在。一八四八年涌现的许多政治与民族活动家被监禁或流放，如哈夫利切克、萨宾纳、弗里奇和狄尔，就是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出布拉格的；其他的人则隐居起来，销声匿迹，从事科学研究，如帕拉茨基、沙法希克；有些老作家又正好在这至关重要的五十年代离开了人世，如科拉尔、切拉科夫斯基、哈夫利切克、狄尔。

文学事业在书刊审查制度的压力下几乎难以为继。那几年文化上仅有的大事，是出版了爱尔本的诗集《花束集》

(1853)和聂姆佐娃的《外祖母》(1855)，发行了《五月》文艺丛刊(1858)。

巴赫的统治将奥地利经济引到了崩溃的边缘，外交上也遭到失败，特别是一八五九年奥地利对撒丁作战败北，更加速了专制独裁的崩溃。巴赫因此被迫下台。经济上的压力迫切要求变革。事实表明，在奥地利进一步实行工业化的时期，以旧的半封建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奥地利所属各国再度建立议会政体，一八六〇年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皇帝颁发了所谓十月诏书，许下诺言要承认捷克民族的政治权利。在这种政局缓和的形势下，接踵而来的六十年代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各自出版刊物的政党(老捷党、少捷党)逐渐崛起，同德意志人进行激烈的竞选较量与民族斗争。德意志大资产阶级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霸权，我国各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如希普或波特克尔科诺谢等，举行了热烈的群众集会。捷克农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民族中的地位。在政治斗争中，过去反奥地利和反教会的传统，特别是胡斯运动的传统，又得到恢复。

这种政治热情的高涨，是由捷克资产阶级经济上的繁荣决定的，然而捷克资产阶级同时又必须与得到维也纳政府支持的、经济更加发达的德意志资产阶级进行艰苦的竞争。在捷克资产阶级中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力量是老捷党，大地主在该党中有过巨大影响。老捷党人日益关心本身的经济利益，他们比较倾向于与维也纳达成协议，因而越来越明显地背离了帕拉茨基在一八四八年参加政治斗争时所表

现的思想。结果是捷克政治团体开始分裂，少捷党的影响与作用增长了。比较确切地说，这个党代表工业家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少捷党的机关报《民族报》证明，该党在六十年代初远比老捷党进步，参加它的编辑部工作的是某些过去的激进派人士，杨·聂鲁达也在其中。可是到后来，少捷党人也由于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日益明显地放弃了他们原来的纲领。

到一八四八年，除了资产阶级内部的这些矛盾之外，民族统一斗争中的阶级矛盾也越来越强烈地在民族团体里表现出来。工人问题产生了。工人阶级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起初是无组织的，更确切地说是出自对社会制度的反抗，后来便发展到建立工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1878)。捷克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这种努力感到不快，从一开始就认为工人的这些要求对自己是一种危险，于是以表面上的服从民族利益来掩饰它的反对态度。老捷党的政客们宣称，这样分散民族力量是对民族的背叛，老捷党人(后来少捷党人也是如此)企图以各种改良主义措施去消磨工人阶级的斗志。但是工人阶级愈来愈觉悟到，唯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追随资产阶级政党，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工人阶级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并付出极大的代价去维持它，同时又组织互助团体。工人中的诗人们以其热情洋溢的诗句与歌曲来加强这些组织，用世界工人运动的杰出榜样——巴黎公社(1871)来振奋它们的革命精神。

在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高涨时期，奥地利所属各国都没

有规定工作时间、最低工资限额等社会立法。工厂里，工人为了获得微薄的工资待遇，每天要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厂主可以随心所欲地雇用和开除工人。工人只能任其摆布，一旦发生争端，既得不到保护，也无法律作后盾。

当一八六七年所谓二元帝国[①]建立时，捷克资产阶级与维也纳之间的政治搏斗以失败而告终。奥地利专制王国当时分为两部分：所谓里塔河[②]前部分，即奥地利与捷克，和里塔河后部分，即匈牙利。通过当时的选举制度，在奥地利部分由德意志人控制政府，匈牙利部分则由匈牙利人控制。但维也纳和佩斯都不关心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人的政治权利。捷克和摩拉维亚出现了新的日耳曼化的压力，斯洛伐克则肆无忌惮地推行匈牙利化。当时帕拉茨基有一句名言：我们曾经存在于奥地利帝国之前，也将存在于它覆灭之后。但是六十年代如此高涨的政治与民族热情，至七十年代却每况愈下，逐渐消失，一直到捷克政治生活重又陷于明显的危机之中。

随着政治高潮的到来将出现文化高潮。一八六二年临时剧院揭幕，"雄鹰体育协会"和作为捷克文学、美术、音乐家组织中心的"艺术座谈会"相继成立，布拉格歌咏小组"钟鸣"产生，继而在农村也仿效"钟鸣"产生了许多歌咏小组，

---

① 一八六七年根据奥匈统治阶级间的协议，奥地利帝国改为二元体制的奥匈帝国，奥皇为帝国元首兼匈牙利国王。奥、匈有各自的议会和政府，但外交、财政和部分军队仍由双方共同掌管。

② 多瑙河右边一支流，形成奥匈帝国两个部分的天然分界线。

以推广爱国歌曲和音乐。到一八六八年，布拉格民族剧院终于奠基动工。

尽管政治形势不利，坚持一八四八革命年代进步思想的年轻诗人们，在巴赫专制时期又开始要求言论自由了。巴赫专制崩溃之后，他们又站在民族与社会斗争的前列。他们信奉的理想使得他们在观点上开始与捷克资产阶级疏远，直至最后与之决裂。诗人聂鲁达与哈列克以及音乐家斯美塔纳，是为在捷克生活中实现进步的、真正民主的社会原则而斗争的先锋战士，所以常常与捷克政治代表人物，尤其是与弗·拉·莱格尔，即老捷党的领袖，帕拉茨基的继承人发生冲突。

一八五八年，一批青年诗人在一个共同的艺术原则上联合起来，团结在《五月》丛刊的周围。其中主要有杨·聂鲁达、哈列克、斯维亚特拉。有些老一代的作家如萨宾纳、聂姆佐娃、爱尔本和弗里奇也和他们在一起。《五月》丛刊成了捷克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老作家的共同行动，证明年轻一代并不是要抛弃我们本国文学的传统。他们继承了那些使他们感到亲切的老一代作家的事业。进步的社会理想把青年作家与革命民主主义者萨宾纳、弗里奇联系在一起；爱尔本作品的民族特点、聂姆佐娃的现实主义，使青年作家倍感亲切。他们给自己的丛刊取名《五月》，是为了纪念马哈并继承他的社会叛逆精神。《五月》发刊时登有马哈的照片，萨宾纳还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马哈生平和思想简介。“五月”这一诗歌流派通过其理论文章和文学创作所

宣扬的原则，可归纳如下：他们的艺术创作源泉应是真正的现代生活，要直截了当地摆脱五十至六十年代在小说中占优势的历史主义；文学，无论小说与诗歌，都必须表现实际生活中的一切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由于社会阶级分化而开始紧迫地表现出来。这批青年作家也要求更广泛地了解欧洲文化。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题材方面，他们都不只满足于本国的传统，但并不象保守的反对派所责备的那样缺乏民族感情。保守派指责这种臆造的缺点，是因为他们对青年诗人力图反映现实和社会实况感到愤怒。这些年轻的叛逆者希望将捷克文学也提到更高的世界水平，所以他们在外国文学中寻求并找到了与之相近的精神，如法国文学中的雨果，德国文学中的海涅，匈牙利文学中的裴多菲。但是同时，“五月”派诗人又特别强调其创作的民族特点。

“五月”派作家对社会问题采取这种态度的结果之一，是工人、工业无产者这一新的主人公进入了捷克文学。这特别表现在**古斯特·弗莱格尔·廖拉夫斯基**(1833—1875)的小说，主要是《小天地里的故事》中。作者在其中描绘了布拉格印染厂工人悲惨贫困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厂主，主要是与德意志人的斗争(当时捷克明显的社会问题是：工人是捷克人，厂主是德意志人；社会压迫常常伴随着民族压迫。继弗莱格尔之后，雅库普·阿尔贝斯、斯瓦托普鲁克·捷赫、安塔尔·斯塔谢克以及卡雷尔·瓦茨拉夫·莱依斯也注意到这两个方面)。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四十年

代，以一八四四年伟大的工人暴动为最高潮。这一年采用了印刷机，大批工人失业，他们在绝望中捣毁了机器甚至整个工厂。弗莱格尔小说的有些题材虽然还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如工人领袖普罗哈斯卡未曾公开的贵族出身），但总的来说是第一次努力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的表现。这部作品是对剥削和奴役人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有意义的是，小说出版于一八六三年，正是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捷克文学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农村的时期。

过早逝世的诗人**鲁多夫·马耶尔**（1837—1865）也以现代工厂工人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他在《中午》一诗中叙述被贫困的非人生活所压榨与折磨的工厂司炉工怎样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如果他们把锅炉烧炸，就会叫正在享用佳肴美酒的主人气绝身亡。但他们后来又认识到，假如只死掉一名暴君，那也无济于事。为了改革，必须消灭这所有的一切。

马耶尔除了写作马哈式悲伤忧郁的诗歌之外，还写过几首关于波斯卡·舒玛瓦地区[1]民族示威运动的政治诗歌，如《向拉包河畔的营地进军》。

雅库普·阿尔贝斯（1840—1914）也是“五月”派的同代人，与他们有某种共同之处，例如关心社会问题。作为政治报刊的新闻工作者，他也遭受过政治迫害。他对工人问题很热心，从事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撰写过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这种对工人运动的兴趣还表现在他的许多小说里，

---

① 位于今捷德边境。

如《生存的候选人》或未完成的作品《史特莱伊赫鬈毛狗》。后者与弗莱格尔的《小天地里的故事》有着同样的主题。阿尔贝斯的世界观是自觉的唯物主义的，所以他作为一位中篇小说家，试图对那看上去是浪漫主义的生活现象进行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解释。阿尔贝斯是所谓"传奇短篇小说"的创始人。这是一种短小的形式。作者借助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通过逻辑推理，对貌似神秘的现象作出合乎自然的解释，如：《牛顿的大脑》（关于一种比光速还要运转得快的机器）、《圣艾克萨维利约斯》（关于圣米古拉什小城教堂的圣艾克萨维利约斯画像的虚构之谜）等。

六十和七十年代，作家和诗人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关心一八四八年废除了繁重的奴役的捷克农村。一方面把农村人民歌颂为民族的健康核心，争取他们参加民族斗争；但同时又指出正在出现的乡村社会分化。在描写捷克农村方面，以哈列克的成就最为卓著。他在短篇小说中树立了一个能适应自然生活的理想人物，后者与大自然规律协调一致，是农村人们相互关系中实际存在的。在哈列克的诗歌，特别是在《我们村子的童话》里，哈列克也表现了农村生活中的某些悲剧现象。

瓦茨拉夫·肖尔茨（1838—1871）以诗篇歌颂了捷克农村。肖尔茨出生于索波特卡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代对农奴制和劳役已有所感受，毕生过着困苦的杂乱无章的生活，过早地在故乡去世。他唯一的诗集为《报春花》。肖尔茨写过情诗和爱国的抒情诗，成功地运用了某些艺术形式，如十

四行诗或东方的嘎扎勒诗①。古老的农村传统，对农奴制与劳役的回忆，还有当时捷克农村活跃的民族运动，都对他有过很强烈的影响。他的诗《我们的农舍》和《歌唱长茧子的手》充满了这种精神，前者是对培育我们的启蒙者的平凡小农舍的歌颂，《歌唱长茧子的手》则是人类劳动的赞歌。肖尔茨将劳动当作一切生活的基础与条件来歌颂，离开了劳动，不仅不会有幸福，也不会有高度的文化，他认为劳动人民是民族的基础。

农村题材也是**卡罗林娜·斯维亚特拉**(1830—1899)的作品、特别是她描写耶什捷德地方的小说的组成部分。她对农村的社会状况并不太关心，而是更多地强调道德问题。她的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放弃个人幸福，服从更高的理想，因此这些特殊人物起到了改造民族运动团体的示范作用，例如描写没有爱情的、失败的婚姻的作品《农村小说》，歌颂妇女道德力量的《溪旁十字架》。妇女解放问题也是斯维亚特拉的作品的内容，这指的是将妇女从当时社会对她们的看法和陈旧的偏见（聂姆佐娃以自己的一生与著作同这种偏见作过斗争）中解放出来。长篇小说《小黑彼得》的主人公也是妇女，她从社会偏见中解脱出来，放弃她在富人社会中的地位，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一方面作者从已被社会抛弃的进步观点出发批评了社会；另一方面，斯维亚特拉又有勇气在书中安排了一种符合正当的自然愿望

① 流行于波斯、阿拉伯等地的一种抒情诗体。

的生活，这体现了她和其他“五月”派成员的一个共同的重要观点。

刻画两个倔强的情人的短篇小说《吻》，也属于描写耶什捷德地区的小说之列。该作品后来由艾丽什卡·克拉斯诺霍尔斯卡改编为斯美塔纳歌剧的脚本。

卡·斯维亚特拉的长、短篇小说的基本思想，是叙述主人公如何努力争取自主权，以创造自己的、摆脱了因循守旧的社会偏见的生活。她的作品标志着我国散文①，特别是采用较完善的小说结构的散文在思想和艺术上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斯维亚特拉的作品与其他大都通过小型形式、主要是短篇小说形式来分析个别现象或社会问题的“五月”派成员的作品，颇有区别。

聂鲁达的忠实朋友**阿多尔夫·海杜克**（1835—1923），以其诗歌创作来争取我们民族、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互相了解与亲近。他是“五月”派中唯一看到他们的理想部分地实现，看到我国民族一九一八年的政治独立和斯洛伐克的解放的人。通过在斯洛伐克的几次逗留，他了解并衷心爱上了这个地方。斯洛伐克的人民、歌谣、古代传说和习惯，为他创作诗集《洋琴与小提琴》提供了灵感。这本诗集表明，在促使捷克与斯洛伐克民族更加亲近的事业上，海杜克是聂姆佐娃的继承者，而且当时斯洛伐克已出现残酷的匈牙利化，斯洛伐克人几乎被剥夺了所有民族、政治与文化

① 在本文学史中，“散文”是指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非韵文体的文学作品而言。

权利和成果。海杜克的诗不断激励人民，提醒人民注意这种压迫。海杜克还写过许多抒情诗(描写大自然、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抒情-叙事诗、诗体短篇小说和史诗。他一方面注意现实题材，另一方面又从历史中汲取素材。但是海杜克作为一位采用朴实形式的抒情诗人，施展得最为得心应手，最为成功。他的作品常常具有富于民歌传统特点的歌谣色彩。

捷克爱国者，特别是狄尔，早在一八四八年之前就想建立他们独立的剧院，这个愿望终于在六十年代实现了。一八四八年他们便着手尝试，但巴赫专制统治强行压制了这种努力，直到巴赫垮台后，他们才得以重整旗鼓，然而捷克政界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大阵营。以莱格尔为首的保守派代表只满足于设立临时剧院，并宣称本民族还没有足够的观众、演员、歌唱家和剧本。年轻的进步艺术家，特别是聂鲁达、哈列克和斯美塔纳却与他针锋相对。莱格尔的想法尽管遭到年轻一代的反对，但仍然得到了实现。一八六二年所谓临时剧院(院址在今天民族剧院的所在地)揭幕，首次演出的是哈列克的塞尔维亚历史悲剧《伏卡辛国王》，但后来的保留剧目则大多是水平一般、迎合资产阶级口味的社会剧和德、法等国的喜剧。我国前一时期最大的戏剧家狄尔的作品很少上演，“五月”派成员在戏剧方面无所建树。临时剧院的最大文化事件，是在一八六四年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之际演出了整套莎士比亚戏剧。

与此同时，修建民族剧院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人们

在"献给自己的民族"的口号下募捐（该口号用金字镌刻在民族剧院舞台上方），并于一八六八年为剧院破土奠基。那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示威，它不仅是在文化上，而且是在政治上对不久前实现的"二元帝国"政策的抗议，是我们民族力量与政治决心的坚强表现。民族剧院是根据建筑师约·齐特克的设计，按照新文艺复兴风格建立的，并且为征求它的内外装饰举办了设计竞赛。当时我国著名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都参加了竞赛，如米·阿列什、弗·热尼谢克、瓦茨拉夫·布罗齐克、沃依捷赫·希纳依斯（幕布由他设计绘制）、约·杜尔卡，特别是约瑟夫·瓦茨拉夫·米斯尔贝克、安东宁·瓦格内尔、博胡斯拉夫·史尼尔赫。民族剧院对捷克造型艺术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就把为民族剧院设计装饰的艺术家们直接称为"民族剧院一代"。

一八八一年春，民族剧院落成。但同年八月十二日即毁于大火。当时捷克人民显示出了伟大的牺牲精神：当剧院还在熊熊烈火中焚烧时，就已经开始为重建剧院而再次募捐。捐款的数额极大，因此毁掉的民族剧院的重建工作两年内便完成了。一八八三年剧院最终建成，并举行了第二次揭幕式。

那时，我们的民族剧院与其他民族的类似剧院根本不同，他们的剧院大多是宫廷的贵族剧院（例如现在的狄尔剧院，就是以前的所谓斯塔沃夫剧院）。我们的民族剧院则是全民族依靠自身的努力、自己筹款建造的。它不仅没有获得政府的资助，甚至还遭到它反对。此外，从造型艺术的角

度来看，它证明捷克的艺术、建筑、绘画和雕塑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标志我国民族从复兴时期开始的短短十年间文化发达的一座丰碑。因此每个捷克人对民族剧院怀有其它民族所无法比拟的炽热真诚的感情。每个捷克人都盼望观看民族剧院的演出，每个捷克演员都想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捷克剧院的最终建成推动了当时作家和作曲家的戏剧创作。这一时期，主要是**贝德希赫·斯美塔纳**(1824—1884)的歌剧音乐达到了世界水平。斯美塔纳曾在临时剧院担任乐队指挥，他的歌剧在那里上演过，但直到民族剧院落成以后，他的歌剧才得到了应有的关怀与道具设备。斯美塔纳创作的歌剧有：《捷克的布拉尼博什》、《被出卖的新嫁娘》（以上两剧的脚本均由萨宾纳所作）、《达利博尔》、《莉布谢》(这出名剧是民族剧院开张时的首演节目)、《两寡妇》、《吻》、《魔鬼墙的秘密》（最后三部歌剧由克拉斯诺霍尔斯卡作词)。与斯美塔纳齐名的安·德沃夏克(1841—1901)，主要以歌剧《雅各宾》、《魔鬼与卡佳》和《水仙女》而闻名于世。

著名的三位作曲家中的第三名成员为兹·费比赫(1850—1900)，他是《沙尔卡》、《麦辛的新娘》、《暴风雨》等歌剧的作者。

"五月"派成员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是杨·聂鲁达。几十年中他一直站在捷克文化生活的前列，自他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直到去世，毕生都为进步、民主、民族与政治自由而战斗，作为诗人、散文家和新闻工作者

而战斗。

1　杨·聂鲁达

(1834—1891)

杨·聂鲁达是布拉格人，生于一八三四年。父亲是退伍军人，曾在骑兵兵营酒吧间服务。聂鲁达的父母后来搬到布拉格小城区马刺街，经营一家杂货铺。父亲去世后，母亲摆香烟摊维持一家生活。这样，小城区就成为聂鲁达度过童年的场所。当时布拉格城四周都有城堡围护着，只有郊区在不断扩展。在这古老的布拉格城里，小城区又可以算作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城市。人们在那里过着田园诗般的小市民生活，每条街自成一体。多少年之后，它的街道和贵族宫殿前寂静的广场依然如故，毫无变化。人们都彼此了解，关心着琐碎的社会事件，诸如某某人亡故，某处举行婚礼，某某人在某处开了新店铺，等等。幼小的聂鲁达就是在布拉格城区这种气氛中长大的。当他偶尔和他的朋友"涉水"来到布拉格老城或新城时，这对他就算是一次小小的郊游了。但那时候，聂鲁达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已经尝到(特别是在学校里——那当然是德意志人办的学校）被富家子弟欺凌与嘲笑的滋味。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其后在新成德意志中学担任短期代课教师(后来的作家雅库普·阿尔贝斯就是他的学生)。聂鲁达在大学念书时已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他写诗，后来主办过一些小说

杂志，最后长期固定在《民族报》，为它写出了著名的杂文与戏剧评论。他喜欢旅行，周游过巴尔干、埃及、小亚细亚、意大利、法国、德国。他晚年身受重病的折磨，一八九一年八月逝世，安葬于维舍堡公墓。

聂鲁达是人与生活的敏锐观察家，优秀的心理学家，善于以切中要害的讽刺与幽默表现他所获得的认识。在他关于我国当时社会生活情况与问题的观察和创作中，在他的新闻活动中，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单是为《民族报》一家就撰写过两千多篇小品文（其中有些后来以各种书名汇编出版）。他的作品使这种现代文学形式在我国达到了完善的境地。聂鲁达的小品文描述了捷克与布拉格的社会与个人的许多重大事件，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整个捷克社会生活。聂鲁达几乎对一切都感到兴趣：如一年四季的时装，秋天涌到布拉格来的大学生，投奔布拉格接受社交教育的农村姑娘，消夏别墅里的来往游客，舞蹈训练班和化装舞会（他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舞迷）。在布拉格漫步时，他还注意大街小巷、广场、集市、商店、机关，也注意贫民窟、养老院、疯人院、监狱等。特别是当他接触到民族或社会问题时，他善于用诙谐的口吻，将社会上严重而令人不快的真相公之于世。他严肃地思考我们的生活和捷克民族的特性、长处与缺点，在民族教育方面做过无法估量的工作。聂鲁达是最早认识到斯美塔纳音乐的民主主义和捷克特点的人物之一，并成为这种音乐的热烈拥护者和为它的普及而斗争的战士。他对捷克戏剧尤为关心，从一开始就

对临时剧院的演出给予极大的关注。作为一位评论家，他涉及了戏剧方面的一切问题：上演节目（他要求上演表现当代生活的戏剧）、导演、表演艺术；并为培养青少年演员而斗争。与捷克戏剧有关的任何问题对他都不陌生。这样，他不仅充实了自己的小品文，而且使他的专门戏剧论著与批评的内容更为丰富。经过长期不懈的新闻与文艺论著工作，他终于盼到了民族剧院揭幕，这该是多么幸福啊。

聂鲁达的内容最严肃也最著名的杂文，是那些涉及当时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杂文。聂鲁达毕生站在进步一方，他常常带着嘲弄与讽刺，同封建主义的倒退、旧习以及教权主义作坚决斗争。他抨击老捷党及其领导人莱格尔的拖拉与保守政策，满怀同情地注视着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的各种事件，正确地看到他的理想与我国革命历史的理想的联系，并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赞同这种理想。当布拉格工人阶级第一次示威游行庆祝自己的节日时，聂鲁达写了他著名的杂文《一八九〇年五一节》。他是在世界的社会形势终于发生急剧变化时写出这篇文章的。他自己宣布参加工人的行列（“……贫苦的工人错把我们算作‘老爷’，真正的老爷却把我们视为‘工人’”）。

对于聂鲁达来说，杂文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聂鲁达是有勇气只靠写作维持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从客观上讲，杂文也是最适合他的新闻活动的一个形式。这是一种剖析迫切的现实问题的文体，因为聂鲁达一直在接触这些问题，这对他那抱定类似目标的整个诗歌创作与其它散文创作具有深

远的影响。聂鲁达通过小品文解剖了整个捷克生活，从而使小品文执行了当时在其它更发达的民族文学中由长篇小说来承担的任务。聂鲁达（还有其他“五月”派成员，包括斯维亚特拉）感到，在我国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尚未成熟，于是集中精力写些小型散文和短篇小说，这就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时期散文的繁荣铺平了道路。聂鲁达在世时，多半被他同代人视为一个敏锐的新闻工作者和小品文作家，理解他的诗作的真正意义的人，可谓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比聂鲁达幸运的友人哈列克的影响使他被埋没了，另一方面是作为诗人，他创作缓慢、费力，而主要是因为他赋予诗歌以跟散文同样的任务：不回避过去不能入诗的生活中的任何问题。聂鲁达创作过六部诗集，这些诗集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基本支柱。它们是《墓地之花》、《诗卷》、《宇宙之歌》、《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平凡的主题》以及《礼拜五之歌》。

第一本诗集《墓地之花》，在巴赫专制的最后几年就已创作与发表。这一时期也就是聂鲁达自己所谓的“被活埋的时期”。诗集表现了年轻人的悲观失望、苦恼烦闷与狐疑不决的情绪。这种情绪一方面来自不平衡的生活状况、颠沛流离的生涯、对安娜·霍林诺娃的折磨人的爱情，以及知心朋友之死；更主要的是由于全体人民的、整个民族与社会的景况，由于诗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所以聂鲁达这部诗集充满着幽默、讽刺，并呼吁改善穷人的生活。老一代人（如弗里奇）要求诗歌不是粉饰现实，就是表现浪漫主义激情，他

们对聂鲁达这部诗集持反对态度。直到后来出现了跟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年轻人,才对他的诗集有较好的理解。

十年之后，聂鲁达出版第二部诗集《诗卷》(1868)。在这部诗集中,他表现出比较明朗的生活情怀,《墓地之花》的伤感和悲观主义消失了。这本诗集包括抒情诗、叙事诗和纪念性的诗，思想内容较前丰富。特别是在社会与民族题材方面,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具有更加精确的洞彻力。诗集也使我们能深入窥视一下聂鲁达的感情生活、他与父母、与安娜·霍林诺娃的关系。聂鲁达的这些关系同时具有普遍意义(如母子关系)。聂鲁达从一开始就努力克服主观主义。他关于社会问题的短诗使他成为社会性短篇故事诗的创始人(如《在慈善家的城堡前》)。在《尝尽千辛我甘愿》一诗中,聂鲁达回首他的一生,其中充满着欺凌、斗争、胜利与悲伤失望。但聂鲁达是满意的,因为纵然尝尽千辛万苦,他也心甘情愿，不管将来命运如何安排，他都甘愿使自己的生活服从更高的任务。

又过了十年,到一八七八年，聂鲁达第三本诗集《宇宙之歌》出版。诗集标志着聂鲁达向乐观主义的彻底转变,是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同时也是时代的一种反映。那是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有过伟大发现的时代，它为人类精神展现了意想不到的前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可能解决一切疑惑。聂鲁达深入思考宇宙世界,观察宇宙,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悲伤苦恼,反而使他精神振奋：总有一天，人类的灵魂将深入探索这宇宙的奥秘，大地对人来说将显得渺

小。然而聂鲁达并不因为宇宙现象而忘了自己的民族，他从大大小小的星斗联想起捷克民族的命运与安排。这个民族只有力求进步才能在未来经受住考验，如“昂首挺胸吧，我的民族！”这一诗句，表达了对民族未来的坚强信念。在星斗中聂鲁达也发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宇宙之歌》不仅是聂鲁达的、而且是整个捷克的诗歌中最富于独创性的诗集。《宇宙之歌》的表达形式也甚有特色：除了具有民间传统的朴实无华的民歌曲调之外，还有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赞歌，描写天体时采用了拟人化手法。

同《宇宙之歌》迥然相异的《平凡的主题》，则是诗人个人的诗体日记。在形式上按一年的季节（春、夏、秋、冬）分为四个部分，诗的思想感情与季节的自然情趣协调吻合。春天，百花盛开的大自然，在诗人心里激起欢快的感情；丰饶的夏天又使他饱享了充足的舒适的阳光，诗人和大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秋天，自然界一片凄凉，百花凋零，唤起了他对青年时代和朋友们的忧伤的回忆与怀念；最后一部分则直接抒发出似曾虚度年华的悲叹和对死亡的渴望。这样，诗人个人内心深处的情绪，最后就成了一种对人生厌倦的伤感之音。

假如说聂鲁达用秋天和冬天的题材表达了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心理，那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感觉上的怀疑情绪而已，因为在他去世之后，他的《礼拜五之歌》向全民族证明：诗人虽然经历了个人的孤独，但决没有虚度年华。《礼拜五之歌》是聂鲁达给全民族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尽管有的

诗在八十年代就已写成和发表，但在他逝世以后才汇集出版(1896)。这是一部豪放、刚健、感情浓郁的诗集，而不是过分敏感柔弱的民族爱国抒情诗。集子的名称表达了某些诗篇的基本思想：历史上的捷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为他人作了牺牲，我们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大礼拜五[1]。诗人通过这本诗集，表示了在大礼拜五之后复活必然到来的坚强信念，羸弱多病的诗人认为，对祖国和民族的爱是自己生活的唯一意义，他在感情奔放的诗歌中预言了本民族的美好未来。聂鲁达根据哈夫利切克"我的红色与白色"的口号，来为一首诗定名，但他在诗中以非凡的诗歌创作才能变换了两种颜色的象征，以"让捷克大地重现白昼，鲜艳的玫瑰遍地芳香"的祝愿作为这首诗的结束。《在酒杯国土上》一诗写道，捷克是苦难的土地，在那里，"希望每天都与死亡结交"，过去是苦涩的，现在也是苦涩的。《再向前！》一诗提醒人们，我们民族假如想自立于其它民族之林，任何时候也不能贪图安逸，必须永远向前，这样才能盼到民族理想的实现。在《爱》一诗中，聂鲁达表达了他在生活中遭到的损失：为母亲的死而哭泣；爱，就他而言已是人老体弱，但对民族说来，却是永葆青春。整个诗集充满了庄严的激昂情绪，虽然只收录了十首诗，但以它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感情而论，却是我国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

《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1883)在聂鲁达的诗作中占有

---

① 耶稣受难日。

特殊地位。这本集子表现了聂鲁达在人性与艺术性方面的一切特点，那正是我们在他全部作品中十分珍惜的人民性、民主性、对社会与革命问题的关切、幽默与完美的艺术形式。聂鲁达善于运用自己特殊的手法，将具有古老传统的故事诗与浪漫曲（聂鲁达抹掉了二者的区别）加以改造，善于用现实生活中的题材去充实它们，甚至在题材上予以扩大。聂鲁达的《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或是带有故事内容的抒情叙事诗，或只是带有巧妙结尾的政论诗。题材有国内的、国外的、民间的和新编的、民族的和社会的；基调有严肃的、幽默的，有时是讽刺的。在题材的选择上，同故事诗的陈旧概念不同，聂鲁达抛弃了那些超自然力的，乃至令人恐怖的传统题材。爱尔本的著名诗集在这种故事诗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的作品里，故事的矛盾通常是建立在人与命运的关系的基础上。聂鲁达意识到，爱尔本式的故事诗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探索新的路子，即直接从生活中汲取故事诗的题材。这在《诗卷》中已有所表现（如《在慈善家的城堡前》、《爷爷的饭碗》），到写《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时则完全走上了这条道路：如果说聂鲁达曾经触及一些超自然力的题材，那么他也善于使之接近现代人的感觉与理解。采用《圣经》题材的诗也是如此：例如加入一些幽默成分或当代社会问题，或借助异国（巴勒斯坦）的气氛来描写捷克农村，聂鲁达还赋予传统的宗教人物以普通人的意义，等等。

在《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中，我们很容易从思想上把那些诗作分为几个类型：首先，聂鲁达善于以非凡的艺术手

法，对人民甚至纯朴天真的儿童从思想感情上予以薰陶。《耶稣受难的悲歌》一诗描写撒旦要求给耶稣判刑，并且要耶稣从十字架上看到他的母亲在十字架下如何肝肠欲断，而这种刑罚却使人类得到了解救。在《山村》一诗中，聂鲁达叙述了一个小孩的天真的信念，这个孩子相信，草药将治愈耶稣圣体的创伤。这种天真的信念产生了奇迹，耶稣的伤口果然痊愈了。在《孩子的故事》一诗中，死神来到一个缠绵病榻的小孩面前，但它并不是那种瘦骨嶙嶙的可怕模样，而是与一般儿童无异，它邀请行将死去的儿童一同做游戏。

在其它故事诗里，聂鲁达运用《圣经》与宗教主题，但他妙笔惊人，能赋予它以幽默的或现代社会的意义。在《主显节的故事》一诗中，三位国王到伯利恒向耶稣致敬，可是耶稣对他们说，有一天他们会给他戴上荆冠，在他去各各他时他们谁也不会陪同他的。幽默的《圣诞节之夜》一诗中的捷克场景，使人联想起阿列什画的伯利恒，乡亲们带着礼品来庆祝耶稣诞辰，典型的捷克农村乐队也来了，十二位漂亮的姑娘带来最美丽的第十三位姑娘安杜莉奇卡让耶稣亲吻。在《五月》这首叙事诗中，一位农村姑娘请求她的守护神、女圣者赐给她一名未婚夫，随便什么样的都行，只是不要火红色头发的。圣者回答她说，村子里只剩一个可以当女婿的人，可他却恰恰长着火红色头发，这时姑娘也就只好认可了。《天堂的悲曲》也是聂鲁达对宗教观念持嘲讽态度的一种表现。贞女的保护神圣伊丽莎白在天上呆了很长时间，已经感到厌倦，据说是因为无人需要她关心。在《卡纳婚礼》

一诗中，聂鲁达描绘了捷克农村古老的婚礼习俗，基督和他母亲在那里设宴，将水变成葡萄酒，使人得到欢乐。

其它几首故事诗则牵涉到捷克民族生活。《捷克民间故事诗》里的巴列切克骑士请求春神让他在每年春季复活几天，这样至少可以使捷克土地能因欢笑和愉快而得到短暂的复活。在《查理四世传奇诗》中，聂鲁达使这位统治者在人性方面更接近读者，描述他如何与朋友维哈季采的布什克同饮葡萄酒。作者往这个幽默的画面注入了爱国主义的结论，以表达对捷克人民的爱，并试图表现捷克民族的性格。在《一八四八年之春狂想曲》中，聂鲁达回忆在光荣的革命年代，人们如何开始感到自己成了真正的人，当时的春天又如何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卡·博罗夫斯基的英灵》是以摩拉维亚民间传奇故事的形式描写三个灵魂，其中两个善的，一个恶的，恶的灵魂却力争上天堂，那就是哈夫利切克的灵魂。经他向圣杨·奈波莫茨基① 祈祷，他才获准升天，而这与哈夫利切克祈求我们的语言(民族)永世长存的著名讽刺短诗毫无二致。同民族题材密切相连的，是《意大利故事诗》里显然具有革命性的社会题材：意大利爱国的共和党修道士乌戈·巴希在谋求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中被捕，并判处死刑。临刑前，他表示希望能遇见基督，基督将根据他头上飘扬的红旗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间英雄认出他来。

聂鲁达在有些故事诗中使用了古代民间故事诗的典型

---

① 天主教会为抹掉杨·胡斯的形象，制造了圣徒奈波莫茨基的神话。

题材，但却使它带有令人吃惊、意想不到的结尾。例如《赫尔戈兰湾的故事》的内容是：由于贪得无厌的约翰的罪过，船舶在暗礁上撞得粉碎，但约翰竟在死者当中认出了他未来的女婿。在《古老的故事》中，一位失节的姑娘决定同她的孩子一起自杀。《冬天的故事》一诗尤其奇特：巫师救活了三个被判绞刑的歹徒，命令他们为他安排晚餐和下榻之处。第一个拿来褥子，是从一个穷寡妇的病孩子床上偷来的；第二个拿来做弥撒用的葡萄酒，第三个拿来祭祀用的面包，是从为垂死者祈祷的牧师那儿偷来的。这时忽然雷声大作，狂风突起，天旋地转。当黎明来临，路旁竖起绞刑架，绞死了这四个人。聂鲁达的创新之处是：对违反人性的罪行予以惩罚，而不象爱尔本那样惩罚反抗命运者。

《黑湖的故事》一诗表现了强烈的主观色彩。聂鲁达描写他欣赏湖景时所获得的印象：他觉得湖面下隐藏着什么东西，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吸引和诱惑他沉沦下去。在《波尔卡舞曲》一诗中，聂鲁达幽默而别具一格地描绘了波尔卡舞从农村传入城市，使富人穷人、老的少的、国王和乞丐，人人为之倾倒。诗篇以高超的技巧，直接描述了舞蹈的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聂鲁达这本诗集所表现的总的乐观主义、独创性、严肃、幽默加嘲讽，它的朴实无华，以及思想性、人民性……所有这一切使《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堪与马哈的《五月》、聂姆佐娃的《外祖母》、爱尔本的《花束集》媲美，一同成为捷克文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读物。诗集对这一荣誉完全当之

无愧。在聂鲁达的其它作品中，唯有普及程度不亚于它的著名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能与之相比。

我们知道，小城，即聂鲁达度过童年的地方，在他的童年给他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这些印象一直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多年之后形成一系列篇幅不等的短篇小说，总名《小城故事》(1878)，这是聂鲁达散文创作的高峰。它表明了他的讲述技巧、捕捉特征的本领和描写事物的艺术才华。这三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具有不可企及的魅力的、感人的散文作品。总的来说，它表现了聂鲁达对小人物的爱和对他们的烦恼与痛苦的同情，但也是对捷克小资产阶级和各种特殊类型的人的批判。这里再次显示出聂鲁达从健康的人民核心中摄取来的民主主义，他的幽默与诙谐；另一方面又以叙事诗式的、想象的手法表述了不寻常的题材，这些都一再吸引着我们。

在《小城故事》的结构上，聂鲁达运用各种方式以激发和保持读者的兴趣与紧张情绪，例如：直接叙述、札记、书信、日记等等。但主要的是作者对现实的揭露；人们产生出某种错觉，后来确认其不对，进而发现了真正的价值（如利巴什先生，在圣瓦茨拉夫弥撒中的年轻的聂鲁达）；有些人物（如鲁斯卡太太）或环境（在《害人郎中》里）则是从幻觉下揭露实际情况，把虚假的幻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一种手段（如《静宅中的一星期》里参事先生的家庭）。这些散文的社会意义正是由这一艺术手法体现出来的。在所有短篇小说中，聂鲁达本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直接出面了，或者

通过简短的诠释亲自出场讲述，或者直接用第一人称讲话。短篇小说《三朵百合花》、《圣瓦茨拉夫的弥撒》、《这是怎么回事》等，就是如此。在其它的几篇短篇小说中，聂鲁达则借助于某个人物来表述自己，如《静宅中的一星期》里年轻的巴沃尔或《黄昏叙谈》里的大学生霍沃尔。这种手法说明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感受，说明聂鲁达的个人经历与青年时代居住过的小城是如何密切相关，而他又是怀着多么大的个人兴致写出了这些短篇小说；同时也证明聂鲁达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切。聂鲁达通过他们的遭遇，表示了自己对社会的批判立场。所以《小城故事》才受到读者这样的欢迎，它是捷克散文作品中最为人们爱不释手的书籍之一。

聂鲁达的短篇创作，以《外国风光》最为出色。这是他游历德国、巴黎、巴尔干、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的成果。在这些游记里，聂鲁达以他擅长的敏锐的观察方法摄取了他所访问的国家和地区给他的印象，并以丰富扎实的知识将这些印象串在一起，他既注意国事，也注意到人和习俗，既留心现在，也注意到过去，因而在寓教益于娱乐的散文这种类型中写下了形式上、内容上都很出色的短篇佳作，成为后来许多游记的先驱。

短篇创作《衣衫褴褛的人》在聂鲁达的散文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一篇关于铁路工程中的劳苦工人的故事，聂鲁达通过这个短篇，表现了他对这些迁徙不定、难以为生的工人的环境乃至生活与劳动方式的详尽了解。聂鲁达一方面是根据自身的观察（如《衣衫褴褛的人》写于捷克多条铁

路线的修筑时期)，另一方面又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根据熟悉情况的人的介绍”来记述的。他叙述生动，有时幽默，有时严肃；整个作品又一次证明，聂鲁达怀着多么浓厚的兴趣来理解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全部现象，他的观察力多么敏锐。《衣衫褴褛的人》的形式接近现代体裁，即所谓报告文学，也就是用报道的形式披露一些事实情况。聂鲁达这种观察和表现方法是他长期的新闻活动所养成的，因为新闻工作总是要求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区分轻重主次、反应迅速、文笔灵活，当然还有对人的深切关心。

聂鲁达的《布拉格即景》就是产生在这个基础上面。这是许多布拉格贫民生活的片段，正是聂鲁达通过自己的新闻活动才了解到的。在这些作品中，聂鲁达将我们带到贫民和乞丐的小舍、当铺、警察哨所，带到主管贫民事务的各种地方和国家机关，同时向我们展示出由当时社会制度产生的贫困、失业和苦难。这些图景也是聂鲁达对社会的抗议和他深信这种状况必须向好的方面转变的表现。

聂鲁达的各种作品始终保持着生命力。一直到今天，不仅他的《小城故事》是如此，《外国风光》和他所有的诗集乃至小品文（尽管小品文大多牵涉到聂鲁达那个时代的现实题材）也是如此。作品中的幽默感和严肃性都是不朽的。我们至今依然赞赏聂鲁达锋利的文笔、他的讽刺，有时则是他的挖苦嘲笑。他对于被当时社会制度压抑的一切所表现的兴趣，至今仍对我们起着作用。他为权利、正义和我们民族以及整个世界的进步与幸福所作的不懈斗争，至今仍可

作为我们的楷模。

聂鲁达的作品实际上在他逝世以后才得到真正的公认，与他不同的是他的朋友维杰斯拉夫·哈列克，后者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已为人们所完全承认。当时他已被看成最伟大的捷克诗人、捷克文化的代表、艺术问题上的代言人和最高权威。多年来，直到他过早地逝世为止，他始终站在捷克文化活动的前列。他同聂鲁达一样，也是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对本民族说话的。他和聂鲁达有许多相同之处，当然也有区别。二者都有进步的、自由的思想观点。哈列克同聂鲁达一道，以自己的笔和组织才能反对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反对本民族遭受的冷遇，反对阻碍我们民族文化与政治发展的一切。但与聂鲁达不同的是，他具有和谐、稳健的精神，他的诗歌不象聂鲁达那样只是客观地反映，而是来源于新鲜的感受，他的富于音乐性的诗句不同于聂鲁达豪放苦涩的特点，因而更适合当时读者的口味，这就使哈列克成为青年人特别喜爱的诗人。

2 维杰斯拉夫·哈列克

(1835—1874)

与聂鲁达不同，哈列克出身农村，一八三五年生于多林涅克（姆涅尔尼克以南），先在布拉格念中学，后来就读于哲

学院。父母送他求学时希望他成为教士，但未能如愿。他当学生时已开始写诗，这决定了他的终生职业，他成了一位作家。为了谋生，他在《民族报》任编辑。他同聂鲁达一样访问过外国，特别是巴尔干。正当他在艺术创作上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的时候，经过短时期的患病，竟于一八七四年十月过早地逝世，葬在维舍堡墓地。他在捷克社会生活中享有盛誉，深受爱戴，并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死被认为是民族的不幸。

使哈列克一举成名的诗集是《黄昏曲》(1858)。这是他的第一本抒情诗集，但它与聂鲁达的第一本抒情诗集《墓地之花》多么不同啊！在聂鲁达的诗集中，忧伤情绪占统治地位，这一点连诗人自己也不讳言，它与时代的状况是一致的。而在哈列克的集子里，则是用轻松而富有音乐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欢欣、乐观、热情和愉快。爱，而且是幸福的爱，没有折磨人的思虑和怀疑、没有为任何忧伤的阴影所笼罩的爱，是哈列克诗集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主题。对于哈列克来说，妇女是最大幸福与愉快的赐与者，她们使他成为艺术家，没有爱就没有艺术，也不会有生活，爱使人更加充实，更加善良。哈列克对艺术问题也有同样高超的见解：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应该是自己人民的代言人、预言家。上帝加于一个民族的最大惩罚，就是拒不赐给它以诗歌和音乐，因此民族必须尊重诗人——预言家，他们在社会上必须有牢固的地位。在类似的热情洋溢的诗句里，哈列克不断激发人们去热爱祖国和民族。

哈列克的一本直接题名为《大自然中》的诗集，写他如何乐观愉快地欣赏大自然的美。诗人在大自然中看到了人类社会所没有的和谐协调的体系。所以对诗人来说，大自然是一个慰藉者，能给他以宁静和休息，激励他投入工作和斗争；而人类社会则充满矛盾，因为它偏离了大自然的和谐体系。但是，诗人由于出身农村而对大自然的主题感到分外亲切，这并不意味着他回避社会问题；恰恰相反，这倒更有助于他去批评社会弊端。回到大自然，恢复它的法则，恢复人类的自然关系，恢复仁爱，这就是哈列克为社会补偏救弊的手段。《黄昏曲》和《大自然中》这两本诗集形式朴实，大多由几段四行诗组成。哈列克常常从具体鲜明的自然景象出发，采用把自然现象拟人化等等手法，因而他的作品比较通俗易懂，为人喜爱。在两本集子中，有些诗歌由于音乐性强，被斯美塔纳或克·本德尔谱成了歌曲。

《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特别是哈列克死后出版的《我们村里的童话》中的某些诗篇，是他的诗作的顶峰。他年轻时就已结识许多典型的农村人物，经历过各种事件，后来便从对这一切的回忆中产生出关于农村生活的抒情叙事短诗，例如：幽默的《上等兵卡林纳》描绘一个爱吹牛的退伍军人的出色典型；严肃的《拍卖》写一个穷寡妇把全家赖以糊口的唯一的母牛卖掉了。在其它诗篇里，哈列克描写了掘墓人、狂热的乡村怪人、采石匠、从城里逃回的壮丁、浪迹农村的茨冈人等等。诗集通过其题材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为上世纪中叶捷克中部农村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富有诗意

的画面，既表现了它的光明，也表现了它的阴影。这种标志社会不平的阴影引起日益剧烈的阶级分化。农民开始明显地分为穷、富两类。

由这一分化而产生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解决，就成为哈列克重要的农村短篇小说的主题，这些短篇小说不仅在哈列克的作品中，而且在有关捷克农村的散文中都具有明显的意义。

哈列克这个出身农村的孩子对那些阴暗面了如指掌，他深知一些当家人常常多么恶劣地对待需要赡养的老人，当爱情与农民家庭的经济利益不一致时，当一对情人中间一方富裕、另一方贫穷的时候，父母怎样阻挠孩子们相爱。哈列克（甚至从自己家里）了解到农村里有些人如何顽固执拗、冷酷无情和贪财好利。

哈列克通过他的农村短篇小说贯彻了“五月”社的纲领精神，即刻画真实的现代生活及其所有的问题，这些小说中以《养老的人》最为出色，它描写一位需要赡养的老人受到他当家的儿子摧残、压迫，终于发疯。又如《荒山下》写一个富裕农家的儿子，违背父亲的意志娶了个穷人家的姑娘为妻，他们在伏尔塔瓦河畔一座荒山下的小木舍里幸福地生活着。

表现哈列克对农村社会关系的理解的最有特色的短篇小说，是《在庄园和小木舍里》。作品的基调是我们从他的《黄昏曲》或《大自然中》所熟悉的：在那以财产论人的不公正的社会里，一个人得不到心理与感情上的平衡，只有从和

谐的大自然里才能获得它。对大自然的法则不能靠理智，而要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与自然的、正确的人的关系相协调时，他才能获得生活幸福。作者在这些农村短篇小说里也显得是一位彻底的乐观主义者，这一点表现在他解决所探讨的问题时，除了少数悲剧之外，结局大多和平圆满，就连那最强硬的个性也有所软化，善到最后总是取胜。

哈列克作品所引起的反响是明显的，他的抒情诗对青年的影响尤其显著，因为它充满了使读者感到亲切的自然而丰富的人情味，他的优美的抒情叙事诗以现实主义与生动活泼见长。哈列克用他的农村短篇小说为其他作家，特别是为更加彻底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卡·瓦·莱伊斯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九　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文学

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捷克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比以往更加急剧的分化。老捷党头目的政策日益背离人民的利益。早在六十年代，它的保守性就已引起所谓少捷党的抵制和反对。如今老捷党为了维护本身的经济、财政利益，越来越公开地与维也纳和解，常常满足于不体面的妥协与让步，越来越表现出它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老捷党的首领们呼吁民族和睦，高喊爱国口号，热中于谈论统一的民族，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转移视线，掩盖民族复兴时期曾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统一起来的各民族团体的日益明显的分裂。从不关心工人问题的、原来的资产阶级纲领陷于严重危机的境地。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全民族实际上已经十分明显地分化成两个阶级：以老捷党（从90年代初期起，继老捷党在政治上的失败之后则为少捷党）为代言人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终于找到自己的党——社会民主党来实现本身的政治要求。该党建立于一八七八年，它受到国家政权和其它政党的迫害，有很长一段时期，不管在普通自治会或是在捷克国会和维也纳议会里，奥地利选举制都不容许它占有代表席位。该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模糊纲领，

成了人们用来反对它的一件甚为得心应手的武器，因为它过分片面地强调国际主义，而将民族问题的解决搁置一边。反对派指责它不热爱祖国，背叛民族。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纲领里谈到我们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解放。这也是官方的捷克政策与进步的捷克文学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后者不仅坚持、还进而发展了所有的进步理想。

我们在聂鲁达和哈列克身上看到，为了本民族在政治上的发展，他们是怎样全力参与斗争的。上世纪最后十年出现了又一批作家，他们是约·瓦·斯拉德克、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阿洛伊斯·伊拉塞克、卡·瓦·莱伊斯、特·诺瓦科娃、安·斯塔谢克和其他许多人。他们用诗歌和散文为我国人民的政治权利与民族权利而斗争。他们意识到，在完成了复兴过程的今天，还有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等待着他们去解决，民族和社会斗争远远没有完结。捷克音乐、造型艺术，特别是雕塑（米斯尔贝克），在较为有利的物质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各种文学形式获得广泛发展：约·瓦·斯拉德克和伏尔赫利茨基在这个时期出版了著名的抒情诗集；从思想与艺术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抒情诗进一步丰富了捷克文学。伏尔赫利茨基的某些作品，特别是捷赫的史诗，使叙事诗达到了顶峰。历史散文已从旧的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伊拉塞克的作品更是登峰造极。与历史散文发展的同时，来自现实生活，主要是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短篇小说也繁荣起来，如特·诺瓦科娃、安·斯塔谢克或约·霍列切克的作

品。政治与社会题材更加频繁地出现于文学之中，民主主义文学更接近工人诗人的创作。

这个时期的著名诗社有“鲁赫”与“卢米尔”，前者得名于文艺作品选集《鲁赫》。这个丛刊由一个年轻的诗人社团发行，他们为一八六八年民族剧院奠基的盛举而挥笔赋诗。“鲁赫”社成员的艺术纲领在许多方面与老一辈“五月”社成员相同，但他们更强调胡斯运动的社会传统与革命传统。“鲁赫”社的主要诗人为斯瓦托普卢克·捷赫。

属于“卢米尔”社的主要有斯拉德克、伏尔赫利茨基和尤·泽耶尔。“卢米尔”诗社得名于散文杂志《卢米尔》，斯拉德克主办该刊几乎达二十五年之久。与主要继承本国传统的“鲁赫”派不同的是，“卢米尔”派并不回避外国思想流派。他们的纲领是要将捷克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提高到世界水平，使之能与世界其它民族、主要是拉丁族及日耳曼族的文学水平相匹敌。“卢米尔”派想让捷克文学脱离德意志的精神领域，显示出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卢米尔”的文化纲领中还包含着一个政治目的，即表明：假如我们民族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那么也就有权要求独立的政治。“卢米尔”派想一方面以自身的创作（这里也常常利用外来的题材），另一方面通过杰出的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达到文化上的这一目标。斯拉德克与伏尔赫利茨基主要是抒情诗人（关于他们，后面另有叙述），尤·泽耶尔（1841—1901）则主要是叙事诗人，他的热爱捷克的思想，倾注于有关捷克古代的一组叙事诗《维舍堡》中；此外，他还写过大量长短篇小

说，其中最出色的是长篇小说《杨·玛丽亚·普洛伊哈尔》。泽耶尔在其中解决了自己同祖国的关系问题。

工人运动的独立的文学创作，是与工人阶级政治生活的开端，特别是与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的产生(1878)紧密联系着的，它当然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因为工人运动受到奥地利国家政权的残酷压制。工人杂志被没收，编辑被判刑入狱。根据当时的出版法，许多文章不准付印，因而不得不通过手抄本来流传。工人阶级的诗人，战斗的革命诗歌的作者，大多是普通人。他们出身贫寒，缺乏高度的文化修养，是一些手工业者或工厂工人。尽管他们屡遭迫害，但仍然全心全意忠于工人阶级，怀着革命理想，不为频繁的迫害所屈服。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著名的政治斗争事件，如巴黎公社、共产国际的建立、将五月一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来庆祝的决定，乃至终于在我国第一次真正庆祝这个节日(1890)的情景，所有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工人阶级诗人们的决心。新的社会与革命题材从思想上丰富了捷克诗歌（如巴黎公社在他们的诗句中得到反映，等等），他们从我国思想进步的杰出诗人如哈夫利切克、聂鲁达、捷赫、斯拉德克等人那里汲取富有表现力的手法；反过来说，原有的艺术文学也不止一次从工人阶级诗人那里接受革命的主题或素材，所以两种诗歌能相辅相成。这种结合也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老诗人们力图克服个人主义，使文学接近生活，从而与工人阶级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创作的歌曲成为工人

演出的保留节目的组成部分。

工人诗人的诗作是党和阶级的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文学典型，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诗作里，传统的诗歌形式充满着新的思想，这对于从事创作的诗人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典范，是开拓新的可能性的一种动力与榜样。

拉吉斯拉夫·萨波托茨基(1852—1916)是这一时期工人文学的著名代表。他是一个裁缝的儿子，本人也学会了缝纫，通过自学掌握了文化。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已接触到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捍卫者和传播者，给工人刊物撰写过大量文章、诗歌和短篇小说，宣传社会主义。这使他不断地与奥地利国家政权发生冲突，多次被捕入狱，但这反而将他推到了由他帮助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地位。他还翻译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终生的工作，便是致力于在工人阶级中最大限度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原则这一活动。今天捷克读者已从他儿子安·萨波托茨基所写长篇小说《新战士站起来》和《动荡的一九〇五年》中，了解到他的生活与工作。拉·萨波托茨基在那两部小说中是以拉吉斯拉夫·布德契斯基这个响亮的名字出现的。

另一位工人诗人为**诺贝特·祖拉**(1854—1886)，他是个珠宝匠，也是从年轻时候起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新闻工作者与组织者、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最著名的一首诗叫《狱中人》，是八十年代初在监狱里写的。诗中“新

战士站起来"这句话，因为成了安东宁·萨波托茨基的小说标题而著名。后来祖拉因忍受不了奥地利官方的迫害，先到瑞士，后去美国。当他风华正茂之时，却在那里与世长辞。奥地利的监狱生活毁坏了他的健康。

第三位著名的工人诗人约瑟夫·博列斯拉夫·佩茨卡(1849—1897)，是布拉格一名穷苦织布工的儿子。他学的是铸工手艺，却在斯米霍夫印花布厂当工人。他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工人的艰苦劳动和工资状况，将毕生的劳动献给了工人的解放事业。他通过勤奋学习，掌握了几门外语，热情研究社会主义科学，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他和萨波托茨基以及祖拉一起，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作为工人新闻记者，他热情工作，写文章、诗歌、短篇小说，以其充满革命精神与生动场面的文学作品，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一切物质上精神上的暴行与压迫的反抗。他在布拉格、维也纳、普罗斯捷约瓦作新闻记者工作，八十年代中叶流亡美国。在那里他出版过一本《捷克工人歌曲集》，其中收集了我国工人运动初期最重要的革命歌曲。他在狱中亲自创作了许多诗歌，如《劳动之歌》。

这些工人诗人的诗歌常常是有意识地根据著名歌曲、小调、主要是民歌改编的，因而得以广泛传播，也便于记忆。此外，在工人集会上演唱这些曲调，也便于对警察、宪兵和国家的其它政权机构掩盖它们的革命内容。工人歌曲就这样保持或重新恢复了战斗的社会歌曲的古老传统，团结了

集体，因为这些歌曲体现着工人集体的战斗纲领，如同胡斯革命运动或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那样。

八十年代，所谓批判现实主义进入捷克文学领域，其特点是有意识地强调艺术真实，不加粉饰，不用理想化的笔调去刻画现实生活——主要是社会生活。因为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来自农村，对社会生活问题、农村的分化非常熟悉，所以这种现实主义在农村小说，即批判现实主义散文的创作中多半占有主要地位。此外，取材于历史的散文也得到发展，其目的是在人民力量高涨时期，让人们回顾一下曾是我国历史动力的那种思想。这些现实主义作家通过描绘实际状况，来对它提出直接或间接的批评（“批判现实主义”即由此得名），并促使它发生变革。当然，他们自己有时也并不清楚怎样才能发生这种变革，因为他们常常不理解他们所刻画的社会过程的真正原因，即经济原因。尽管有这样的缺点，他们的作品仍然是那个时代生活的重要记录，仍然是文学中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促进了社会问题的解决。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现实主义描写的作用，主要取决于表现方法上的典型化艺术，即是在描述一定的现象、人物或情节时，使读者不仅仅把它当作个别的、唯一的，同时还能看到它的普遍意义，它对一定的阶层、地区和社会来说成了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从文学的这一任务出发，长篇小说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小说既然要对社会进行分析，情节的紧凑性与集中性就有所减弱，往往没有一个主要的

中心人物，变为结构松散、范围广阔的纪事小说。作家们在赞成现实主义概念的同时，也采用了新的表现手法：运用口语、方言、古语（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里）等等。

在我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上，由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始的国外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小说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曾经起过强烈的影响。

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他写过一系列反映上世纪前半期巴黎和农村的法国资产阶级生活的小说（《人间喜剧》），揭露了他们的凶残、贪婪和权力欲。

巴尔扎克通过这些小说，描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阴暗现象，主要是贪财逐利和由此引起的权力欲。他出色地刻画了妇女与沉醉于某种欲望的人们的心理。如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是个绝妙的典型人物——吝啬鬼，他反对女儿的婚事，破坏了她的幸福，因为他想到的只是陪嫁必然要减少他的财富。小说《高老头》讲一位富商的悲惨命运，他把两个女儿嫁给贵族，她们却反过来，为了有他这个父亲而感到羞耻，使得他在孤单和寂寞之中死去。在小说《贝姨》里，巴尔扎克成功地描述了一个日渐衰老的处女的心理；《邦斯舅舅》揭示出所谓上层社会的一个诈骗财物（在小说中是指所收藏的珍贵名画）的阴谋。

巴尔扎克的艺术方法是现实主义，尽管他有时并不回避浪漫主义的主题和情节结构。巴尔扎克用本能、也用环

境来解释人的行为与性格，所以他对环境也十分注意，详尽地描述了城市、街道、房屋、室内陈设等。

巴尔扎克小说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本着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为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一幅幅真实图景，谴责了这个社会的厚颜无耻、假仁假义、道德败坏和萎靡颓废，因此巴尔扎克对其它国家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发生过影响，赢得了世界声誉，成为后来许多作家的导师。

俄国一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共同特征，是坚信必须实行社会改革，对俄国人民优秀品质充满坚强的信心，并从俄国人民中预感到美好未来的萌芽。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契诃夫是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人高尔基。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出身于富裕的贵族家庭，可是他母亲对农奴的无情态度，促使他起来坚决反对这种中世纪的余毒。

屠格涅夫最著名的作品是《猎人笔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认为，该书在不小程度上促进了农奴制的废除。这是一本由优美的风格和出色的写景构成的农村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在这里发挥了他的基本思想：农奴制是俄罗斯国家制度的一个污点，是对俄国人民的侮辱。在屠格涅夫的其它作品中，还有著名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屠格涅夫在这部作品里描绘了俄国地主阶级和一群有识之士的思想分歧，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身上。这一代的代言人是

巴扎罗夫，他不承认对祖国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也不承认艺术等等。他自称为虚无主义派（屠格涅夫采用了这一称呼，人们也这么称呼他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间的真正革命者在以后十年里起过重要的作用）。巴扎罗夫在这里代表这样一代人，他们为国内的气氛感到烦恼，意识到现状不能持久，但因为他们脱离人民，不依靠人民，从而对进步、发展、正义、生活和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因此他们不是陷于无所作为的悠思遐想，便是采取单枪匹马的暴力行动。

屠格涅夫在他对人物的细腻准确的心理描写方面，对我国文学有过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哈列克，在七十年代初认识屠格涅夫之后，简直为之倾倒了。从哈列克后期的短篇小说（如《大学生克沃赫》）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如何向屠格涅夫学习以详尽的心理细节来刻画他的人物性格的。当然，屠格涅夫后来对我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有所影响。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最著名的俄国作家，也是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一直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是《战争与和平》（1865—1869）。这是反映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生活的一幅宽广而深刻的画卷，其中包括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帝王、贵族、将军一直到普通士兵和农民。除了俄国社会的丰富画面以外，小说还描述了那个时代的主要军政事件，如摩拉瓦河上斯拉

夫柯夫附近的“三皇”之战，拿破仑远征俄国，莫斯科大火，拿破仑溃退，严寒与游击战给他的大军带来的覆灭。托尔斯泰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仔细研究了那个时代所有较重要的原始材料，作为他下笔的依据。小说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托尔斯泰全力证实：世界历史不是由所谓杰出人物创造的，他们只不过是群众意志的体现者而已。这在拿破仑和他的对手(一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是库图佐夫元帅)身上可以得到证实。托尔斯泰指出，这些人作出各项决定，采取各种行动，都是在他们自己无从施加影响的外部环境和因素的压力下被迫行事的，实际上是他们为事件所左右与支配，而不是他们自己主宰这些事件。与这一观点相一致，托尔斯泰特别注意人民和俄罗斯民族，对他们不可战胜的力量深信不疑，所以他的小说非常详尽地描绘了最终把拿破仑军队消灭的游击战。他叙述这些游击战的产生，描写这场斗争中的很多典型事例；虽然他也列举了许多立下战功的个人，但给人的最终印象仍是：战争中的胜利，是经过自觉起来反对侵略者的全体俄国人民的努力而取得的。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别列·别竺豪夫探求人生的意义，他与一个明智的普通农民的相遇对他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别竺豪夫对生活、对它的正面现象，以及对于为他人从事无私劳动有了深刻信心，他终于结束了他的彷徨状态。

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过巨大的反响。托尔斯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伟大的俄

国作家，他所创作的一切在全世界唤起了很大的注意。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典范《战争与和平》，更是对我国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文学有过强烈的影响。

这一现实主义也渗透到捷克戏剧之中，从八十年代中叶起开始在著名的捷克剧场——民族剧院表现出来。该院最初只是上演外国戏剧，特别是俄国戏剧，随后才渐渐出现捷克的现实主义戏剧家。

特列扎·诺瓦科娃(1853—1912)是杰出的现实主义女作家之一。她长期生活在利托米什尔。她在周围发现了丰富的民族史料，撰写过一系列民俗学论文，这是她为文学创作做准备的一种方法。她在接连写出几部关于城镇或农村环境的长短篇小说之后，创作了许多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她十分注意东部捷克人民的生活，如长篇小说《杨·伊列克》。主人公是十八世纪中叶宗教团体捷克兄弟会的虔诚信徒，一个真实人物（特列扎·诺瓦科娃使用了伊列克本人的笔记），他被封建暴政和宗教迫害逼得逃亡国外，到了信奉福音派新教的普鲁士。诺瓦科娃在小说中描叙了农奴的艰苦生活，同时也描叙了旧日的捷克宗教改革和潜在的革命传统的影响。

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伊希·什马特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作品。普通织布工人伊希·什马特兰探索着"真正的上帝之真理"，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合理安排。最初他在天主教里寻找，随后在福音派新教里寻找，可是通向这个社会的真正道路却在社会主义中，他在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里找到了它，成为该党的信徒。诺瓦科娃在小说中指出，社会主义怎样在农村中克服艰难险阻，必须与哪些观点作斗争，要费多大的劲和多少时间才能取得一些成就。下述情况也多多少少表明了这一点：在小说结尾处，正当社会民主党首次在我国参加竞选时（1897年），什马特兰溘然逝世了。

小说里的工人们为实现政治理想、变革社会制度、改善劳动人民生活而作的努力，是由一位有觉悟的织布工人哈麦尔尼克来体现的。他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热烈信徒，但周围的人不理解他，甚至对他反感、嘲笑。尽管如此，他却获得愈来愈多的信徒，而这都是通过在农村贫民中坚持不懈的工作才取得的。诺瓦科娃这部长篇小说忠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农村的社会分化。

在小说《在里布罗庄园》里，诺瓦科娃描写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如何对东部捷克农民起了作用。农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劳役，因为这劳役已深深波及农村人民的个人生活——例如里布罗的生活。在这里，诺瓦科娃还注意到，当时农村已开始从阶级上区分为富农、贫农和无地农民。诺瓦科娃最后一部大型小说是《德拉夏尔》（副标题为《牧师—启蒙者的故事》），这实际上是一本传记小说，因为作者在其中描述了三月事件① 以前爱国牧师约·约·米·德拉夏尔的生活遭遇。德拉夏尔也曾寄希望于一八四八年

① 见125页注①。

革命，他希望能作为一个毫不虚伪的牧师生活下去，但是他的希望落了空。他不仅受到天主教、而且受到福音派新教会中的反动派的迫害，结果日渐消沉，身心交瘁，濒临死亡。因为他完全相信仁爱，从而脱离了曾经成为他心中的支柱的社会斗争，在捷克—摩拉维亚高原一个荒村里了结了自己的一生。诺瓦科娃接触的那些问题，正是二十世纪初文学所要解决的，当时，个人主义和克服个人主义的问题已提上重要日程。

诺瓦科娃上述主要长篇小说不仅表明了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而且由于运用了彻底的现实主义方法，因此也从艺术上反映了东部捷克人民过去和近代的生活。这些作品论价值是属于我国近代文学的基本作品，它们使诺瓦科娃成为卡·斯维亚特拉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在文坛享有盛誉。

另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安塔尔·斯塔谢克**（1843—1931），他在塞米里当律师，在那里他了解到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德意志资本主义对下克尔科诺谢的乡村和城镇的野蛮的渗透方式。他把这些见闻尽量表现于作品之中。他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关注着工人运动。在有些作品中，他意识到用革命手段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因而也理解他所看到的十月革命的意义。斯塔谢克作为一位作家，对下克尔科诺谢人民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深感兴趣，其短篇小说集《我们山区的梦想家》就是这种兴趣的表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下克尔科诺谢有许多人热中于招魂术，当然，主要是那些无产阶级化了的穷人。他们想通过这种法术来

实现他们关于社会的设想。斯塔谢克在他这本小说集里讲到一个招魂术团体中各个成员的遭遇。斯塔谢克的其它小说以社会冲突为主题，如长篇小说《朦胧的信仰》。作者在小说中真实地描绘了资本家、主要是德意志人如何控制捷克人及其财产，农村居民怎样变成工业无产阶级，厂主怎样肆无忌惮地压制工人对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等一切要求；小说还描述了一八七〇年著名的斯瓦罗夫罢工，罢工中厂主列比克竟然下令对工人开枪。斯塔谢克的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马托乌什鞋匠和他的朋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克尔科诺谢纺织厂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劳动状况，和以这种状况为背景的马托乌什·什杰邦涅克的生活境遇。马托乌什先当鞋匠，后来成为产业工人，他是下克尔科诺谢最先读到《共产党宣言》，并向当地人民传播其内容的人之一。当时正值巴赫统治时代，因此，马托乌什不断被迫害、审讯和判刑，最后不得不迁走了事。小说除了具有笔锋犀利的特征之外，还以对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巴赫反动时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清新生动的描写而冠绝一时。

斯塔谢克与大多数批判现实主义者不同之处，正在他不只局限于描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矛盾与冲突，而且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它们的原因并指明了出路，即变革社会制度。尽管在有些小说中运用了浪漫主义的主题，但他仍然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约瑟夫·霍列切克（1853—1929）也属于现实主义作家

之列。作为一个南部捷克人，他试图在小说体的纪事《咱们的》中，为他故乡一带（沃德尼奥斯科、彼塞茨科）和上世纪中叶该地区的人民绘出一幅完整的画面。霍列切克不只描述农村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其它陈旧的家长制农民生活的外表特征，而且描述他们的观点、思想，对社会生活中其它问题的关系等。霍列切克态度保守，迷恋过去；不受城市或现代文明影响的乡村，就是他的理想之所在，所以他把作品中的人物也加以理想化。他不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描绘人物。

拉吉斯拉夫·斯特劳佩日尼茨基和莫尔什季克兄弟对于使现实主义渗入戏剧起过很大作用。

拉吉斯拉夫·斯特劳佩日尼茨基（1850—1892）是民族剧院第一位剧作家。现实主义戏剧得以登上舞台，要归功于他。他本人的戏剧创作最初还遵循着半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例如他的独幕名剧《兹维科夫小妖》和《铸钱师傅的太太》（两剧的主角都是库特拉山的打油诗人，贵族出身的闹事者米古拉什·达齐茨基）。然而他最成功的作品《我们的傲慢的人》则已经是现实主义的了。这是取材于彼塞采克典型的捷克农村生活的一出娱乐喜剧。剧中关于谁该当更夫的争辩使居民分为两派。冲突本身并不深刻，没有明确的社会根源，但作者揭示了富裕农民身上的显著特点。尽管这实际上只是现实主义戏剧的一种尝试，但对当时的观众和批评界而言，已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件，以至作者本人不得不在报上发表专文，为他这个剧本辩护。这在当时

是对保留剧目的一大突破，因为那时候上演的不是对席勒或莎士比亚作品的粗制滥造的现代模仿品，就是所谓沙龙戏剧。

斯特劳佩日尼茨基为以后的现实主义戏剧家铺平了道路，这些人的作品得到观众完全和充分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尔什季克兄弟——阿洛伊斯**(1861—1925)**和威列姆**(1863—1912)的剧作，以及莫尔什季克兄弟各自创作和共同创作的长短篇小说。威列姆写过关于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布拉格生活感到幻灭的长篇小说《魔鬼卢齐扬》，和一部以布尔诺附近奥斯特洛瓦森林为背景的言情小说《五月的童话》。莫尔什季克兄弟合写了一部关于斯洛伐茨科与汉纳交界处的摩拉维亚村庄的小说体纪事《村中一年》，指出那里农村的特点在逐渐消失，由于残酷的城市商人与工业的罪过，该村在道德和经济上已濒于崩溃。

两兄弟合写的第二部作品是反映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剧本《玛丽莎》，它属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在民族剧院建立现实主义戏剧的牢固传统的剧本之一，一八九四年才首次上演。剧中主角是个农家女，她爱上雇工弗朗采克，而他却不得不去服兵役。玛丽莎的父母在这期间把她嫁给一个鳏夫——磨坊主瓦沃拉。买卖婚姻是不幸的，特别是因为她父亲里扎尔并没有按照诺言给瓦沃拉送去嫁妆时，这就更增加了玛丽莎的不幸。弗朗采克从军队归来后去找玛丽莎，提出一同逃奔布尔诺，但玛丽莎谨守农村道德准则，决定忍受痛苦，拒绝了他的请求。有一次弗朗采克在等待玛丽莎。瓦

沃拉竟对他开了一枪，但没有击中。第二天玛丽莎就给丈夫下毒(把毒茶兑在咖啡里)。瓦沃拉在最后一刹那希望与妻子和解，但终于死去了。两位作者通过《玛丽莎》指出，金钱关系、见财眼开等等经济原因，在农村如何起着决定作用，其结果则是夫妻反目，酿成悲剧。玛丽莎的悲剧是必不可免的，因为她无法摆脱个人与环境习俗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至今还有。

莫尔什季克兄弟这两部名作遵循着捷克散文和戏剧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路线，是在资本主义影响下捷克(或摩拉维亚)农村道德危机的真实写照。

斯·捷赫是用诗歌传播民族与社会理想的主要人物，他的某些作品受欢迎的程度，是很少有人能企及的。斯·捷赫在其大量诗歌与散文创作中，再现了胡斯运动的理想，或者以白山战役后的题材，向人们提出警告。作为一位诗人，他注意捷克农村的社会问题，也关心工人运动的激进要求；作为人道主义者和讽刺家，他同市侩及其在民族与政治问题上的奴颜媚骨进行斗争，并预示了社会制度变革的最初迹象。

1　斯瓦托普卢克·捷赫

斯瓦托普卢克·捷赫一八四六年生于贝内肖夫附近的奥斯特热德克。父亲是一位有觉悟的爱国者，给财主当管

家。曾几度迁居，所以小斯瓦托普卢克的童年是在好几个地方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遵照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尽管他对此并无特别爱好，还是干了几年法律工作，后来才专门致力于文学。他常年主办文学刊物《花》，有时住布拉格，有时住乡下，曾屡次出国旅行（到俄罗斯、克里米亚和黑海、意大利），一九〇八年在布拉格去世，葬于维舍堡公墓。

捷赫从在家乡时开始，就已在父亲的教育下，为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科拉尔式的斯拉夫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捷赫的思想是在政治上激动人心的六十年代趋于成熟的。一八六八年参加诗歌丛刊《鲁赫》一事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该丛刊是为纪念民族剧院奠基而出版发行的，它团结了当时有自由思想的进步青年。捷赫是它的编辑之一（斯拉德克也参与编辑）。捷赫在丛刊上发表了《波罗的海的胡斯革命者》——一首情绪激昂、鼓舞人心的诗。他在诗中将古代胡斯革命者的英勇精神与现代进行对比，以激发捷克民族的力量与勇气，这个民族不久前刚刚觉醒，重新投入政治生活。从此胡斯革命的主题在捷赫的作品中不断出现，例如《亚当分子》就是一首关于日什卡消灭所谓亚当分子的塔博尔教派的历史叙事诗（亚当分子是“绝对自由”的代表，许多人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日什卡》一诗中，捷赫歌颂了伟大的胡斯军统帅，以极大的艺术说服力描绘出一个场面，即杨·罗基昌如何打消了激怒中的日什卡要毁灭布拉格的念头。捷赫在诗剧（未完成）《罗哈奇在锡昂》中表达了自己对激进的塔博尔派的同情。他本着胡斯革命传统精神，创作

了白山时期的历史叙事诗《米哈罗维采的瓦茨拉夫》。诗的主人公是在老城广场被处死的一位贵族的儿子。他唤起布拉格人民反对白山战役的胜利者，反抗耶稣教派和蹂躏捷克民族的外国侵略者，并表现了胡斯革命前辈的英勇精神。他们只有镰刀，但他们刚毅勇敢，坚韧不拔。年轻主人公的热情号召在艺术上有着明显的倾向性，是为八十年代的同代人而创作的，因为当初的民族热情这时已明显地减弱了。

捷赫的斯拉夫思想见于他的寓意诗《斯拉维耶》，斯拉维耶是航行在黑海的一艘船舶。船上的乘客都是各个斯拉夫民族的代表，船员举行暴动，乘客们团结在最大民族的代表——俄罗斯人周围，战胜了这场叛乱，平安地将船驶入港口。诗的寓意很明显，这就是捷赫的信念：斯拉夫人如果保持相互团结，并承认俄罗斯民族具有领导作用，就会有幸福的未来。捷赫在《斯拉维耶》一诗中所表达的这种信念，由于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而更为增强了。在《草原》与《到广阔的天地中去》两首诗里，捷赫向俄国革命表示敬意，把它看成是俄罗斯民族消灭压迫者的第一步，捷赫的来源于科拉尔的斯拉夫思想因而更具有现实意义。

从捷赫的诗体短篇小说三部曲《在菩提树荫下》、《列舍金的铁匠》及《收割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关于捷克农村及其发展的观点。《在菩提树荫下》有七个叙事诗组，严肃与愉快的故事相互交替，这是在农村酒馆门前的菩提树下，由参加礼拜日座谈会的人讲述的。在序言中捷赫回忆了在农村环境中度过的青年时代，接着由一位农民讲述，随后是

裁缝、农村教员、退伍军人、赶车人、饭店老板娘和流浪乐师。座谈会结束时，一个磨坊主发表了一篇词藻华丽、热情洋溢、为祖国和民族祈福的祝酒辞。诗的整个特点主要是那田园诗风味，不写农村生活中的社会冲突，一些故事只是个人性的。《列舍金的铁匠》一诗则截然不同，其题材属于民族社会性质：离列舍金不远的地方，一个充满田园诗意的村庄兴办工厂，出现了德意志厂主。他要把农民变成工业无产者，并使整个地区日耳曼化，农民开始屈服于外国资本的权势，只有铁匠奋起反抗。反工厂主的暴动发生了，厂主派军队前来镇压，铁匠被打死。但厂主不得不将工厂卖掉，这样，列舍金日耳曼化的代表人物也就消失。捷赫在这里运用了当时的现实题材，即深入到捷克地区的资本家、工业主大多是德意志人，因而招来两种祸害：社会压迫与民族压迫。但捷赫在他的诗歌中只是解决第二个问题。诗的格式也很有趣。除了含义丰富、修辞讲究的诗句之外，作者在抒情诗部分还使用了民歌。捷赫在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方面最为成功的要算《收割人》一诗。他在诗中注意到终生为地主干活的农业工人的生活，诗歌的结尾表示他坚信这些劳苦奴隶解放之日终将到来，到那时他们就能为自己劳动了。

可见捷赫明确地认识到，农村社会不是一个统一体，那里也在发生阶级分化，除了早已为文学所注意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外，还存在着农村无产阶级。作者的功绩在于他提醒人们注意农村的贫困生活，并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

捷赫的诗体和散文体讽刺作品也很出色。他通过这些

作品既同人类社会、也同捷克社会的弊端作斗争，特别是反对对本民族的冷漠态度、无原则性和无节操的表现。在讽刺诗《哈鲁曼》里，捷赫嘲笑那种机械刻板地摹仿外国模式或设施，而根本不看是否适合本国情况的现象。讽刺诗的主人公是一个开化的猿猴，它在原始森林中建立猿猴国，并根据人类社会的样板来组织这个国家。当然只是模仿人类社会的形式，而不是其精神和内容。

散文体讽刺作品中成就最大的有两部作品，它们的主人公是富裕的布拉格市民布罗乌切克（意为“小甲虫”），书名分别为《布罗乌切克先生月球旅行记》和《布罗乌切克先生新的旅行记》①。

第一部是艺术讽刺小说，主要讽刺当时诗歌、绘画和音乐界的某些怪诞现象，特别是脱离真实生活的倾向。滑稽的场面是这么形成的：布拉格的小掌柜布罗乌切克先生，是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小人物，他梦中突然到达月球，月球上古怪的居民与布罗乌切克先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活于艺术之中，一切为了艺术，生活充满着花的芳香，只有露水才配作他们的饮料。第二部讽刺小说《布罗乌切克先生新的旅行记》则严肃得多，因为它涉及了祖国与民族问题。布罗乌切克先生梦中又生活在胡斯时代被齐格蒙德军队围困的布拉格，在这里显示了他真正的性格：在温文尔雅的布拉格人中间他自称是布拉格人，而在塔博尔派中间又声称是塔博

① 全称为《布罗乌切克先生在十五世纪的新的划时代旅行记》。

尔派，在假想的十字军和德意志人中间，他甚至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和德意志人。在维特科夫战役[1]中他畏缩逃跑，当日什卡亲自判处他死刑时，他辩解说他根本不是十五世纪的人，而是属于十九世纪的。日什卡更为激怒，他的讲话使讽刺的思想达到高潮："但愿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后代！"捷赫宣扬受人欢迎的胡斯运动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要显示出胡斯革命者（不只是男人，而且有妇女）的英勇、坚定和热情；另一方面则为了揭露十九世纪末捷克资产阶级的怯懦、无原则性和对本民族的冷漠，他们的理想只是自己的权益和物质福利，这是捷克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个完全堕落了的、以爱国主义口号掩饰其空虚的老捷党的真实写照。捷赫所描绘的布罗乌切克先生简直成了一种典型，当然是令人厌恶的反面典型。

捷赫写得最出色的往往是长篇叙事诗，而抒情诗，特别是表现个人私生活的抒情诗，则颇为少见。他的抒情诗集《晨歌》和《新歌》收录了激励坚韧、和睦、劳动、热情和自力更生精神的爱国主义政治诗。捷赫在若干诗集里表达了民主主义思想和必须进行社会改革的信念。他的观点直接成了口号，如"劳动光荣"或"未来的英雄"。捷赫笔下的这种英雄既不是过去制度的代表——贵族，也不是居统治地位的现存制度的代表——资产阶级，而是工人，至今仍然受压和无权的人，但他们是新生活和幸福的创造者。在《地下

---

[1] 一四二〇年，由日什卡统率的胡斯革命军在布拉格附近维特科夫与罗马教皇的十字军交战，获得大胜。

之声》一诗中，捷赫预示了社会剧变的到来。这场变革将冲破靠强权来维持的现存制度而出现。

但捷赫的思想在著名诗集《奴隶之歌》(1894)中表现得最强烈、最突出。该诗集产生于捷克人民加强反奥地利的斗争、奥地利政府以暴力进行镇压的时期。

《奴隶之歌》寓意深长，诗的背景是东方（诗中提到棕榈、原始森林等)，故事发生地点是一个种植园。那里有一批奴隶在奴隶主的皮鞭驱使下从事劳动。这是有意识安排的，这种安排同捷赫的整个艺术手法密切相连，即通过一般性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当然，由于当时的形势，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读者立刻能领悟到，这是指的国内情况。奴隶就是我们，奴隶主就是那些统治我们的人。诗集中所有诗歌都表示了对社会压迫的强烈憎恨，对于人沦为他人奴隶的现象的强烈憎恨，那是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抗议。在有的诗里，捷赫还强调以下事实：除了社会压迫之外，还存在着民族压迫；榨取奴隶血汗的财主豪绅，同时也蛮横地剥夺他们仅有的财物——语言。诗人通过奴隶之口，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并威胁说：总有一天，挣断的锁链会响亮地痛击财主们的颅骨。在结尾一首诗中，捷赫表达了自己的希望：虽然他自己将看不到，但一个没有统治者也没有奴隶的时代，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即将到来。

《奴隶之歌》的普遍意义和反民族压迫的主题，使得资产阶级只愿根据本身的利益片面地理解这部诗集。他们把捷赫的态度解释为仅仅反对民族压迫，但实际上，反社会压

迫的主题才是主要的。工人阶级正确地理解这一点，因此，诗集中的许多诗成为工人教育座谈会和研究院活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捷赫的激进思想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顶峰。由于这部诗集，他成为极受欢迎的人物。捷赫的《奴隶之歌》所取得的成功，是任何其它应时当令的诗集所无法比拟的。

捷赫的全部作品证明，他深有感受地经历与体验了他那个时代，灵敏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所有迫切的政治、民族与社会问题。捷赫根据民主、爱国与进步的精神完成了他的艺术使命，因此他的作品始终具有生命力，成为捷克读者爱不释手的读物。

如同捷赫的作品一样，约·瓦·斯拉德克的作品也充满着他那个时代的捷克民族生活所特有的全部思想。他也属于对自己时代的问题作出反应，并表达了人民的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愿望的诗人之列。斯拉德克的抒情诗，是气势豪迈、刚健雄壮和感情真挚的抒情诗范例，而绝不是多愁善感的。在思想方面，他坚信民族传统的创造者和体现者、当代民族斗争中的英雄主要是农民。他们是不依附他人意志与专断的独立主人。

2　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德克
(1845—1912)

约·瓦·斯拉德克一八四五年生于兹皮罗斯一个不大富裕的家庭。父亲是泥瓦匠，但他家的祖上和亲属与土地有密切关系。斯拉德克求学期间主要靠自己谋生；中学毕业后，在布拉格大学攻读自然科学。他同捷赫一样，在动荡的三十年代热情参加政治与文化活动，并和捷赫一起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学业结束后，他旅居北美两年，为民族博物馆搜集自然标本，在一家公司当过工人，担任过捷克报纸的驻美编辑、教员和铁路建筑工人，熟悉美国的大部和墨西哥的一部分地区，获得了丰富的语言知识，主要是透彻地了解了美国的状况。斯拉德克来自半封建和警察官僚制的奥地利，他欣赏当时美国的民主，同时也看到它的阴暗面，他看到，实际上是对利润的追求在支配着这种民主。美元就是民主的主人。为了美元，文明的白人会对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施加最残酷的凌辱和暴行。斯拉德克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一员，对这种事实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并把自己的认识通过众多的诗篇表达出来。回国之后，他曾短期担任《民族报》编辑，其后在捷克斯洛伐克贸易学院任英语教授。他的编辑工作甚为出色：七十年代中期他接管《卢米尔》杂志，担任编辑一直到上世纪末。他把遵循同一艺术原则的作家（“卢米尔”派）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些作家力图将

捷克文学提高到世界水平，使之作为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列，同时又能保持它的民族特点。

斯拉德克晚年患有严重的脊髓神经病，一九一二年在故乡逝世，葬于维舍堡斯拉维纳公墓。

斯拉德克离开捷克旅居美国时已经是个诗人。海上旅行，侨居美国，对异国风光与人民的了解，在广阔的大陆上的漂泊，还有对祖国的眷念，都是他创作最初两本诗集《诗歌》与《海上火花》的泉源。在这些诗集中可以发现充满着非常真挚的爱国主义与对被奴役人民的同情的诗篇，但也有些作品强烈抗议美国虐待处于无权地位的印第安人（如《在印第安人的坟地上》）。同时，年轻的斯拉德克生活中一桩震撼人心的事件，即他的第一位夫人艾密丽之死，也如同一片阴影似的显现在所有这些题材之中。斯拉德克后来几部诗集则表现了他个人的镇静与刚毅（如《光辉的足迹》、《在天堂门口》、《来自生活》、《阳光与阴影》等）。在这些诗集里，斯拉德克成了爱国主义的宣传者，这种爱国主义不是伤感的历史挽歌，而是勇敢豪迈的、具有坚定的社会觉悟和对未来充满乐观主义的展望，未来将合理地实现整个捷克民族与社会的愿望与需求。斯拉德克的许多诗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同情，后来则表示坚信工人阶级将自己创造未来。这主要是在一八九〇年五一节之后，这个五一节对聂鲁达也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沙皇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时，斯拉德克以自己的诗句，向无休止的屠杀和残酷折磨俄国革命者的现象提出了抗议。

同捷赫一样，斯拉德克晚年也成为工人劳动的自觉崇敬者和工人美好前途的宣传者。于是斯拉德克也就自觉地理解了捷克农民的劳动与意义，他觉得我们民族的这一组成部分现在和未来都是民族力量最牢固的支柱。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民族的这一组成部分是以故乡的土地为依据的。斯拉德克主要在《农夫曲》与《捷克十四行诗》里表达了这种思想。斯拉德克在诗中歌颂农民的勤劳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表达了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对贵族与大地主、资本主义在农村的代表的反抗与嘲笑，其中也含有一定的保守主义。农村世界对他来说显得比工人的生活与劳动更富于诗意：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世界，它有着牢固的传统、习惯、一整套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进行劳动的世界。

斯拉德克与农民阶级、特别是与他的故乡波特布尔特地区的亲密关系，也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了。斯拉德克以他的某些诗集，加入了由切拉科夫斯基的《捷克歌曲回声》所开始的行列。斯拉德克的诗歌生动地展现了住有农夫、农妇、农家女、小伙子、农村牧师、铁匠、村长和磨坊主这些典型人物的故乡情景。与其他“卢米尔”派不同的是，斯拉德克创作这些诗篇时不过分雕饰，不玩弄辞藻，并运用了民间文学手法，文笔朴素，因而也更富于感染力。

当斯拉德克本人深深地沉浸在故乡的宁静与幸福之中，并对此加以宣扬时，他希望孩子们也能享受这种幸福，因此他创作了几本描写儿童并献给儿童的诗集。这些诗与

儿歌受到普遍欢迎，迅速挤掉了一直充斥于幼儿读物中的各种空洞无物的、毫不吸引人的顺口溜和打油诗之类。斯拉德克指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为孩子们创作有艺术水平和有价值的诗歌，创作来自朴素的儿童想象和快乐的儿童世界的诗歌，这些诗歌不是通过令人讨厌的方式，将道德说教强加给小读者、小听众。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就熟悉了关于从小门洞里爬出来的髒小狗、撕破了上衣的骄傲的公猫的诗歌，还有关于被掉进烟囱的苍蝇吓一大跳的娜娜，关于猪崽的荣耀或是关于农民伊尔的诗歌，这个农民犹豫不决，不肯修补屋顶的窟窿，终于让暴风雨把屋檐掀掉；还有其它等等诗歌，都收集在《金色的五月》、《云雀之歌》、《大钟和小铃铛》里。即使在儿童诗里，斯拉德克也未忘记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所以这些儿童书籍也成了我们民族斗争的武器。

斯拉德克的诗歌作品不只是抒情的，在他的诗集中还处处可以见到叙事诗、民间故事诗、民间传奇诗、宗教故事诗、诗体短篇小说、生活剪影片段等等，从而使斯拉德克堪与我们前辈中许多最优秀的叙事诗人如爱尔本、聂鲁达、哈列克相媲美。他的叙事诗与抒情诗形成一个表现了捷克精神的英勇刚毅的特点的整体，它摆脱了过分伤感的情绪，并深知美好的未来要靠勤奋的劳动、稳定性、耐心和在捍卫自身权利时的不妥协精神才能达到。在这一方面，斯拉德克的作品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生动的榜样，尽管他的愿望已成为现实。

但斯拉德克的意义并不限于他自己的创作。“卢米尔”社的理想是把捷克文学提高到世界水平，斯拉德克作为该社的成员绝不只是挂名而已。“卢米尔”派的努力不仅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上，而且体现在作品的翻译上。斯拉德克有意识地集中译介了古代英国文化。他的著名译品，美国诗人朗费罗关于印第安人的长篇史诗《海华沙之歌》①，就是他旅居美国两年的成果。其后他又继续由英文、瑞典文、俄文、波兰文和西班牙文进行翻译。斯拉德克规模最大的译品为《莎士比亚戏剧三十二种》的诗体译本。我国一直很盛行莎士比亚崇拜，复兴时期捷克剧院（“木棚”剧院）刚刚建立便上演了莎士比亚戏剧，尽管只是为了向普通观众介绍这位艺术大师的经过改编的译作。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已出版莎士比亚主要戏剧的译本，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但上世纪末已经很明显地感到，这些译文不符合新的、有了进步的诗歌语言。捷克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建立后，即以重新翻译为己任，这个任务由当时我国最优秀的翻译家斯拉德克、伏尔赫利茨基和克拉斯纳霍尔斯卡承担下来，但最后却落到斯拉德克一人肩上。这样，从一八九四年起，斯拉德克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开始出版，到一九一二年几乎全部（32种）出齐。斯拉德克这一翻译巨制同他创作的诗歌一样，是他所建立的一项恒久的功勋，尽管我们知道，斯拉德克自己也意识到，原作意义如此重大，在几代人之后势必要

---

① 《海华沙之歌》是朗费罗（1807—1882）根据印第安人各部落的古代传说、故事和神话而写成的一部史诗，海华沙是印第安人的领袖。

重译，因为诗的语言在不断变化、发展和完善，况且，每种译本总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适应现实，使作者的精神复活，将它解释得与当前的生活与文学的需要相吻合。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伏尔赫利茨基以他的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及翻译等大量作品，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充实了捷克文学，也使得捷克诗歌语言与诗歌形式大为丰富，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了捷克人民的民主进步思想及理想。他的作品闪烁着生活上的乐观主义和欢快情绪，民族团结和全人类的团结精神，对民族与祖国、对艺术和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人类不断进步与完善的信念的光辉。

他的作品，可谓卷帙浩繁（仅诗集一项，伏尔赫利茨基就写了80余本）。人们谈到他时正确地指出，他一个人完成了在其它国家的文学界需要由一代人来完成的任务。伏尔赫利茨基的努力目标，是充分了解并向我们民族介绍世界文化的全部财富。因此我们才能解释他的某些弱点：如在思想方面常常缺乏独创性，对许多外国题材未能深思熟虑，有时过于偏重形式而忽略了内容与思想。尽管如此，伏尔赫利茨基的意义毕竟是伟大的。这也由于他创造了精彩丰富的诗歌语言，清新优美、抑扬顿挫的诗句，它们具有从朴素的歌谣直到慷慨雄壮的歌曲的丰富音律。

3 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

(1853—1912)

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原名艾米尔·弗里达，一八五三年生于罗乌尼。父亲是一个不大富裕的商人，为人口众多的家庭操劳一生。伏尔赫利茨基的童年是在他的舅舅、科林附近奥夫恰林地方的牧师家度过的。他曾在布拉格和卡拉托维上中学，后来进神学院，随后转到哲学院。结业后在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当家庭教师一年。回国后短期担任教师、捷克技术处秘书，后来又在布拉格大学任比较文学史教授，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是捷克科学艺术院的成员，也是国外一些类似学院的成员。一九一二年在多玛日利采逝世，安葬于维舍堡公墓。

伏尔赫利茨基写过许多抒情诗和叙事诗、戏剧，大量的文学评论，并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占有最主要的地位。

伏尔赫利茨基比其他任何诗人都更为注意抒情诗中的生活的节奏。他的诗，因时而异，也因诗人的遭遇和生活而有所不同。它们分别反映了他青年时代的悲观心情、安逸舒适的生活、悲剧、颓唐以及再度出现的高涨情绪。这首先是一大批有关他个人的生活的抒情诗，伏尔赫利茨基在其中以丰富而优美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妻子、家庭和孩子的爱，又以咏怀抒情诗表达了他关于人类善良的观点、对人的热

爱与信任等等，此外，他的爱国诗则歌颂了祖国的美丽、她的过去及美好的未来。九十年代初夫妻关系的破裂曾使得伏尔赫利茨基一度精神颓唐，但生活的沉重打击也未能动摇他这种坚强信念。后来新的创作力量、新的乐观主义和愉快的生活经历等使他克服了颓唐情绪。他的诗集很多，从第一本翻到最后一本，就可以看出他个人感情发展的梗概。

伏尔赫利茨基在其咏怀诗中对国内生活，特别是对文化与政治生活里的重大事件作了敏锐的反应。他以大型诗篇《伟人祠》歌颂民族剧院的建立，并同聂鲁达、斯拉德克一样，将五一节作为工人阶级从资本桎梏中争取解放的象征与希望来欢迎。他清楚地看到当时资产阶级的没落、对利润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无耻崇拜。他为资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沉沦得如此之深，早已将其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抛之脑后而感到惊讶。他预见到，即使付出流血革命的代价，也必须摧毁这个制度。他歌颂工人和他们的劳动，思索穷人的遭遇，强调他们有权享受美好的生活。他采用爱国主义主题的诗主要收录在《我的祖国》诗集中。在这本诗集里，伏尔赫利茨基描绘了捷克国土、布拉格及其它许多捷克地区的美丽风光，联想她光荣的过去，表达她最终将获得解放的信念（如热情的颂歌《捷克》或《三访希帕山》等诗）。

伏尔赫利茨基的咏怀抒情诗中就已常常出现反映历史题材的诗作，民族问题与紧迫的社会问题通常以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伏尔赫利茨基这种咏怀抒情诗是与他的叙事

诗相衔接的一个环节。

所谓《人类史诗片段》在伏尔赫利茨基的叙事诗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一系列以史实为题材的诗集，伏尔赫利茨基运用这些题材，通过诗的表现手段，描绘出人类从远古直至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发展。他看到世界历史中善与恶的不停斗争，看到为这一场场搏斗所付出的无数牺牲。但他深信，尽管英雄们在斗争中倒下了，但牺牲不会是徒劳的（如罗马的斯巴达克等）。伏尔赫利茨基相信，人类愈来愈趋于完善。在各个历史时代中，他对古希腊时期及其艺术倍感亲切，因为他强调自然神话和感情生活、世俗生活以及生活乐趣；其次是文艺复兴，它把人从中世纪教会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发挥了人的自由思想的才干。伏尔赫利茨基将他那个时代看作由残酷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短暂衰退的时期，但是他相信，人类将再度振作起来，掌握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宣扬的理想。

从爱国主义的信念与人类发展的思想中，产生了伏尔赫利茨基最重要的诗集之一《农家故事诗》。于是伏尔赫利茨基就把我们民族载入了世界历史，而且主要是通过对胡斯革命的描绘达到了这个目的（伏尔赫利茨基写过大量歌颂胡斯、耶罗尼姆、杨·热利夫斯基、日什卡的诗篇）。他通过《农家故事诗》，刻画了我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时期，即白山战役后农村人民受压迫最深的时期中最具特色的这一部分。伏尔赫利茨基认为，在那灾难时期，人民是民族的真正捍卫者、历史上胡斯革命思想的坚持者。他以富有表现力

的诗句，描绘并歌颂了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在这本诗集的一些诗篇中，栩栩如生地浮现着不知名的或历史上实有的农村起义者的形象，如马·乌利茨基、杨·科齐纳、彼得·杜利克村长和其他人；同时也一针见血地表现了封建权贵们，如科乌什的罗列茨基、布来达的罗米卡尔伯爵和被受难的乌利茨基亲眼见过的其他许多人的冷酷与残忍。整个诗集充满对残酷暴行的反抗和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因而对今天仍然具有引起警惕的现实作用。诗集的悲怆情调到结尾时转变为乐观主义的希望：布·拉尼克率领的圣瓦茨拉夫军队的武器有朝一日会成为劳动工具，和平劳动将成为我国人民的目标。

作者将《农家故事诗》献给友人托马耶尔和伊拉塞克，不是没有意义的，伏尔赫利茨基与伊拉塞克常常采用同一个题材(如《柯日纳》)。《农家故事诗》形式完美，不乏简洁扼要、感人肺腑的佳篇。

除了诗歌以外，伏尔赫利茨基还创作过大量戏剧，有严肃剧和喜剧，有历史和现代题材、捷克和国外世界的题材。

他最成功的剧作，有采用古希腊关于罪与罚的题材的三部曲《珀罗普斯求婚》、《坦塔罗斯的和解》和《希波达弥亚之死》（由兹·菲比赫为歌剧作曲），以及出自捷克历史的、令人捧腹的喜剧《查理城堡之夜》，查理四世皇帝不是作为一个威严的统治者，而更多地作为一位钟情的和被疼爱的丈夫在剧中出现。

伏尔赫利茨基在一些诗集中特别注意那种难于驾驭的

诗歌形式，这种形式在外国文学中是为了艺术上的完美而培育起来的。伏尔赫利茨基使捷克的十四行诗臻于完善(如《隐居者的十四行诗》)，将许多外来的、特别是罗马与东方的形式引进捷克诗歌，他的诗歌形象丰富，比喻繁多，充满不同一般的新颖的诗歌语言成分，从而为文化进步与捷克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为翻译家，伏尔赫利茨基在"卢米尔"派这一范围里，实现了用自己的翻译(主要是从拉丁语)来扩大捷克文化视野的纲领。他从意大利文翻译了但丁的《神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以及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从德文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从法国文学中系统地翻译了雨果的诗；从西班牙文翻译了卡尔德隆的戏剧选集，还翻译过英国和其它各国文学作品。

伏尔赫利茨基的诗作涉及范围很广，意义重大，这不仅指它的数量，而且指它的精神、思想内容，即他的进步性、他对人和人类的热爱，特别是他那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

历 史 小 说

捷克的历史小说从民族复兴时期起就有着丰富的传统。由狄尔的历史散文引进这一领域里的思想，就与外国同类的小说文学截然不同，这种思想是捷克历史小说文学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民族的历史小说文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并非多民族的法国人或英国人那里，不象我国人民这样遭受过外族压迫。他们的历史小说文学的目的主要是艺术

方面的和娱乐性的，其长篇或短篇历史小说不必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我们只需提一下瓦·司各特或亚历山大·仲马[①]就行了)。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狄尔开始，历史小说文学已成为提高捷克民族意识与觉悟的有效手段，成为民族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有时起着警惕作用，有时又作为正面的榜样，从来不会让读者对所阅读的情节或所描写的人物持冷漠态度。在三月事件以前的时期，这一崇高的倾向甚至是主要的。作家们只顾强调这一面，而把历史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置于第二位了。

同整个文学发展相适应，到十九世纪下半期，历史小说文学从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发展为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影响捷克文学的强大的现实主义浪潮也波及历史小说文学，使之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我国历史小说文学中可以发现许多过渡性的现象和作家，他们的作品里除浪漫主义因素之外，已有现实主义的尝试。

例如瓦茨拉夫·贝内什·特舍比斯基，一位颇受欢迎的短篇历史小说家，他主要是以白山战役之后那个时期的悲惨故事来感动读者。现实主义随即提出了某些新的要求。首先是历史事实的准确性与真实性，这就必须以认真细致的研究为前提。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家已不能象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现实(事件与人物)，而必须尊重史实，这

① 指大仲马。

就必须了解各种类型的史料，因为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描写时代与环境，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细节上也应如此。作家对此是无法虚构的，这里要求以真情实况为依据，特别是当读者的要求与批判立场随着历史知识的不断增长（通过学校教学、历史科学及史料性著作的出版）而增长的时候。

上世纪最后十年我国文学中的这项要求同过去那种启发民族觉悟的政治性的爱国主义传统融合在一起，随即又出现了其它的因素。它们是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明显标志，也就是典型化的艺术。这种艺术能创造出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形象，他们体现着同一社会阶级或阶层或集团的众多人物的特征。这门艺术要创造一种与历史真实相符合的、对这个或那个时期来说是很本质的、并与时代精神并行不悖的情节，以致读者可以说：尽管也许没有发生过，但却叙述得跟真的一样！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及其功能。作家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对人物与情节可以进行虚构。

这种典型化的方向、典型的作用之所以更有意义，是因为作者即使未直接诉说自己的命运和批评意见，主题本身也将他的观点显示出来了。只有通过这种典型化的过程，才能把握住在历史上起作用的、不以个人为转移的规律与思想，才能在历史中探索自身进步的原动力。

所有这些特点，伊拉塞克的历史小说都兼而有之。他的历史小说是我国全部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顶峰。

4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

(1851—1930)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一八五一年出生于赫罗诺夫镇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父亲是面包师。赫罗诺夫镇的人生活在纯朴的古风之中，因为那里离商业干线很远，但他们过的并不是田园诗式的生活。伊拉塞克在青年时代就已了解被刚刚开始的工厂竞争所折磨的山区织布工人，他目睹终生劳累、只剩下一个行乞口袋的日益衰老的农业工人的景况，认识到连他父母也未能幸免的艰苦的生存竞争。但另一方面，赫罗诺夫和那整个地区又使他了解到许多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至今还活生生地留在人民记忆之中：十八世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夺取捷克王冠的侵略战争，一七七五年最后一次农民暴动，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军队的进驻，一八六六年的奥地利与普鲁士之战。在此期间，纳霍茨科直接成了几次流血战斗的场所。伊拉塞克作为年轻人所经历的这一切，后来都被作为作家的他加以采用了。

伊拉塞克最初是在布罗乌莫瓦一所德意志中学就读，上高中则在赫拉德茨—卡拉罗维的捷克学校，他在那里经历了六十年代日益觉醒的爱国主义热潮，也加强了他的斯拉夫意识，特别是通过俄语与波兰语的学习和对著名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是对果戈理的了解，果戈理的《钦差大

臣》曾对他发生强烈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来到布拉格上大学。他本来打算当一名画家，一度在绘画与文学二者之间犹豫不决，后来决定以中学历史教员作为他的公民职业。他对绘画的爱好仍不减当年，在画家中也有几位知心朋友，主要是米古拉什·阿列什[①]。伊拉塞克的绘画才能后来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见于人物刻画，而且见于风景描绘。写景对伊拉塞克来说不只是一种点缀，而是通过景色的速写来衬托和铺垫情节的特点。大学毕业后，他到利托米舍尔，任中学教员达十四年之久。当地环境富于文化传统，对伊拉塞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从利托米舍尔的历史中为自己的创作汲收了一些古代传说、事件乃至人物。他在利托米舍尔也建立了家庭，直至八十年代末才重返布拉格，回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回到艺术生活甚至整个文化生活的中心，接触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档案库和图书馆，而这一切他在利托米舍尔是指望不到的。

但他的出生地赫罗诺夫却始终是他的第一故乡和唯一故乡。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别墅，又在附近买下一小片树林，供他消夏避暑之用。退休以后，每逢春天，他就前往赫罗诺夫，一直逗留到秋天。有时，他从这儿出发（象原先从布拉格出发一样），作短暂或较长时间的旅行，以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这样，他参观了斯洛伐克，在那里发现

① 米古拉什·阿列什（1852—1913），捷克画家。其创作多以民间故事与传说为题材，富有捷克民间艺术的装饰意趣，他为民族剧院所作的表现捷克民族历史的壁画稿《祖国》，就是一例。

了过去胡斯起义军战士，布朗迪斯的杨·伊斯克拉或利杰肖维采的彼得·阿克萨米特的足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伊拉塞克写出了他最优秀的作品，取材于我国历史的长、短篇小说，使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荣誉与赞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作品在对民族进行教育时更是显示出无穷的价值。因此，那一时期伊拉塞克也成为整个民族在重大政治示威活动中（如1917年）的捷克作家代言人。伊拉塞克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在布拉格逝世，骨灰安放于赫罗诺夫墓地。全民族都参加了他在布拉格和赫罗诺夫的隆重葬礼。

伊拉塞克同他的故乡有着紧密的关系。他遵从故乡的传统，同时又很关心当前的时代。因此他的第一本书就反映了鹰山贫苦纺织工人的生活、他们的穷困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伊拉塞克将这本书取名为《山里的故事》。后来他才找到创作历史散文的真正道路。在大学学习的最后几年，他已开始写一部小说，其主题是他的作品所特有的，书名《斯卡拉克一家》，从此他再未放弃历史小说文学这块基地，创作了一系列真实描写我国历史的长、短篇小说。最初所写的历史长篇小说有《在激流中》、《抗击众敌》、《兄弟军》和《胡斯派国王》。与这些长篇小说构成一体的有历史剧三部曲：《杨·胡斯》、《杨·日什卡》、《杨·罗哈奇》。吸引伊拉塞克注意的我国历史第二个时期是白山战役之后的时期，那是我们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期，但也是陷于绝境的农民频繁暴动的时期。伊拉塞克反映这一时期的小说有《峭

壁》、《还我自由》(原名《狗头军》)、《黑暗时代》和《斯卡拉克一家》;随后便是我们的民族复兴时期,他通过大型长篇小说《弗·勒·维克》将这一时期详尽生动地反映出来了。伊拉塞克在编年体长篇小说《在我们这里》一书中,满怀热爱与忠贞,描写了上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在农村、在他的故乡赫罗诺夫民族觉醒与政治觉醒的过程。他那有吸引力的短篇小说《哲学生纪事》描绘了一八四八年、它的前夜以及布拉格革命对利托米舍尔的青年人的思想影响。编年体小说《在我们这里》结束之处,就是伊拉塞克的回忆开始之时。这些回忆录收集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伊拉塞克在这本集子里讲述了他离开利托米舍尔来到布拉格那一段生活。除长篇小说外,他还写过一些剧本,一部分是上面已提到的历史剧,还有些剧作取材于现代生活,如《父亲》或《沃依纳尔卡》,以及一些童话剧。这些戏剧具有狄尔戏剧的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是《灯笼》。他还为青少年创作了《捷克古老传说》,这部著作今天已成为经典作品。他的名为《从捷克到天涯海角》一书,收集了经他改编的列夫先生从罗日米塔尔到西方国家的游记,那是一部成书于十五世纪的古老的捷克游记。

伊拉塞克的作品可谓卷帙浩繁,但主要以其精神与思想内容而出类拔萃。

伊拉塞克作品的思想倾向不是通过任何令人生厌的说教或训诫,而首先是通过有意识的选题来表现的。伊拉塞克使本民族在人民行动起来、有力地干预并创造历史的那

个时代与时刻，栩栩如生地重现在读者面前。不论是胡斯革命时期的军事战线上的英勇行为，还是农民暴动时期背水一战的决断与反抗行为，或者甚至在许多时候是无足轻重的微小隐蔽的行动，在城乡复兴的文化与政治工作方面的有意识的民族活动，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伊拉塞克通过作品主题的挑选，向读者，也就是向全民族展示了过去的民族力量与坚韧不拔精神，从而激发和促进了民族能量的新高涨。这一点在从九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策的罪过，我们民族正经历着政治危机的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民族准备迎接国家的未来，要从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中寻求慰藉和力量，于是在伊拉塞克的长篇小说中找到了它。当时伊拉塞克的长篇历史小说出来发言了，在万马齐闇的地方发言了。

伊拉塞克作品的基本思想同帕拉茨基著作的思想如出一辙。帕拉茨基作为科学家所宣扬的，就是伊拉塞克作为文学艺术家所表现的。我国历史的精髓在于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哪里得到贯彻，我们民族就在哪里蓬勃发展；这一思想在哪里受到压抑，我们民族就在哪里堕落沉沦。但即使在衰落时期，人们也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在暂时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也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这种思想的体现者和为它而斗争的战士一直是人民，所以哪怕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们也没有向上流社会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和贵族屈服。我们的民族复兴来自人民，人民是未来的保证。十

分明显，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观点同我国所有著名作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同聂鲁达、捷赫、斯拉德克、伏尔赫利茨基及其他作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伊拉塞克的作品至今还是我国文学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伊拉塞克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就是从这一概念引伸出来的。他的作品很少象浪漫主义小说那样，只有一个主人公。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通常是由一系列人物所表现的全体人民，同时他笔下这些人物又反映和集中了更大的整体的观点，即他们为之讲话和行动的团体的观点。从伊拉塞克的人物形象中不仅可以看出他对这些观点所持的立场，还可以看出他对他们所代表的思想的评价(如在《抗击众敌》一书中，一方面是塔博尔派的人物，另一方面是齐格蒙德)，而且情节丰富，几条线索蜿蜒曲折，相互交错。为了更好地驾驭对人物众多和情节复杂的人民运动的画面，伊拉塞克终于创造了广阔的小说体编年史的独特形式，如《弗·勒·维克》或《在我们这里》。

虽然伊拉塞克的小说文学可以一直追溯到多神教时期，但他的艺术性最强、思想上最重要的作品，首先要推取材于胡斯运动时期，即捷克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的小说。

第一部是三卷本长篇小说《在激流中》(《两个庭院》、《火神之子》和《只有三票》)。在这部小说中，伊拉塞克描述了国王瓦茨拉夫四世统治时期捷克改革运动的发生与民族、社会以及宗教等所有因素。伊拉塞克在小说中描述了国王与大贵族、教会权贵，主要是与大主教杨(耶什特因人)之

间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接触到已经表现出来的所有民族复兴的思想，认识当时的著名人物杨·胡斯、杨·日什卡等，小说以库特纳山法令的颁布作为结束。

《抗击众敌》是关于胡斯运动时期的三部曲中间的一部。胡斯革命的爆发是这部小说的中心题材，包括塔博尔派的建立，布拉格人与齐格蒙德的徒劳的谈判，齐格蒙德对捷克的出征讨伐及占领布拉格的企图，日什卡从塔博尔出兵援助受到威胁的布拉格，他在维特科夫取得辉煌胜利，最后是日什卡将那些越轨的教派从塔博尔驱逐出去。这是一幅团结统一的人民的画卷，正因为他们团结，所以能抵御外来敌人的可怕袭击。人民是伊拉塞克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从表面看来，小说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赫沃兹登一个地方长官的家族成员：父亲、女儿和侄儿，但他们并不代表特殊的个人命运，而是体现着当时对农村小贵族来说具有典型性的经历。胡斯运动的所有首领都出身于小贵族。所有塔博尔的兄弟姐妹以及万众一心为击败敌人而团结一致的布拉格市民同样是小说的主人公。日什卡这个人物被着重加以刻画，他是一位善于正确估计敌人及其意图的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与个人交锋中的英勇战士。我们赞扬他的审慎、镇定和果敢精神。我们看到，他是个注重行动的壮士，而不是在无谓的争吵中废话连篇的人。作者也绘声绘影地刻画了敌人营垒中的人物：齐格蒙德国王本人或教会权贵，从前罗乌尼奥维克修道院的彼得神甫或罗仁贝尔克的贵族典型代表。贵族认为胡斯运动好，是因为他们想趁没收教会财

产之机使自己致富。我们主要通过齐格蒙德在库特纳山执意拒绝布拉格市民的和解建议的场面，认识了他的残忍和仇恨人的性格；接着我们又怀着满足的心情注意到，他不得不面临他的军队的意外失败。伊拉塞克是描绘古代场面的大师，例如关于日什卡从波希奇到萨扎夫途中的胜利的章节，然后当然是小说中的革命高潮——关于维特科夫战役的描绘。伊拉塞克精炼出色地创作了胡斯革命军的编年史，并以无法模仿的艺术手法描述了情节紧张的戏剧性场面。伊拉塞克在写景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艺术才华。

同伊拉塞克所有小说一样，这部作品的语言朴素而贴切，句子结构正适合于平静流畅的叙述。但在必要时伊拉塞克也善于通过词汇的选择，用重复、感叹词等来达到感人的效果。作品中偶然也出现个别必不可少的、有实际内容的古词(如武器名称、胡斯革命军的编排等)。

《兄弟军》是描写胡斯运动的三部曲中最后一部。胡斯军队的统领，这些农村小贵族，他们对利潘尼战役失败后的国内状况不满，宁可流亡国外。当时在国外流行一句俗话："凡是捷克人，都是小贵族"，这些小贵族中有许多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为依斯克尔贵族(布朗迪斯人)服军役。当那里的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便为捍卫民主主义的塔博尔原则而单枪匹马地战斗，结局很是悲惨。然而由于他们的缘故，民族意识以及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团结有所加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幅胡斯运动衰败的图景：他们已经不是为思想、而更多地是为小贵族统领们的物质利益作斗争，因而招

致了可悲的结局。这个时期捷克由来自波杰布拉特的伊希统治，此人即《胡斯派的国王》一书的主人公。他的权力已登峰造极，以致与罗马教廷完全断绝关系，并被革除教籍。但是捷克民族中发生的暴风雨般的胡斯革命运动，却在悄悄地转化为新的捷克精神，转化为温和的捷克兄弟会了。

与这些描写胡斯运动时期的小说相衔接，伊拉塞克还写过戏剧三部曲：《杨·胡斯》、《杨·日什卡》和《杨·罗哈奇》。在第一部戏剧中，伊拉塞克叙述胡斯与教会教阶制度的斗争，他对人民及其革命思想的忠贞不渝和他的最后被处决。第二部主要写日什卡担任军事统帅的时候，齐格蒙德在库特拉山附近的失败。日什卡这一形象同《抗击众敌》中一样刻画得很富有特点。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沉着冷静的军事领袖，圣杯派的始终如一的代表，齐格蒙德国王和贵族的反对者。对日什卡来说，首要的是使布拉格市民与激进的塔博尔派之间在教义问题上不停的争论得以平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对立面的主要人物同在《抗击众敌》中一样仍然是齐格蒙德。在这里，这个国王也表现为胡斯派不可调和的、甚至疯狂的敌人，他被捷克与匈牙利上层贵族所包围，一句话，他代表了为胡斯信徒所抗击反对的整个封建世界。最后，我们还看到日什卡的正当的愤慨；戏剧（如同捷赫的《日什卡》一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以日什卡决定毁掉布拉格，后被罗基昌有力说服劝阻的一场作为结束。这一戏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向我们介绍了胡斯部队在杜巴地区的统领罗哈奇。即使在利潘尼战役失败之后，他也未向

齐格蒙德屈服，而继续坚持其激进原则，并为之献出了生命。

伊拉塞克所注意的我国历史的下一个时期，是白山战役之后的时期。

在小说《峭壁》中，伊拉塞克描述了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恰斯拉夫斯科的农民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福音教会传教士马蒂阿什·乌利茨基（他也是伏尔赫利茨基的《农家故事诗》的主人公）。著名的《还我自由》也有类似的主题。小说描写了霍特族人起来反对拉明格尔，描写了他们与正规敌军优势兵力的绝望斗争，然后是农民领袖、主要是杨·斯拉德基—科齐纳被惩处。伊拉塞克另一部关于白山战役之后的时期的长篇小说是《黑暗时代》，书名本身就是这个悲惨时期的标记。这是一幅捷克人民遭受奇耻大辱的图画。日耳曼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捷克文化的衰退在继续着，国家只允许和承认一种宗教——罗马天主教，其它宗教的信徒则横遭迫害与惩罚。劳役与农奴制使农奴低贱得毫无人的尊严可言。同这精神与物质上的贫困尖锐对立的是巴罗克式①的布拉格的豪华，这里修建起金碧辉煌的宫殿和教堂，以显示教会对异教徒与叛乱民族的胜利。这就是所谓新圣徒杨·奈波穆茨基创造奇迹的时期。尽管如此，在捷克东部仍然有众多的福音教或捷克兄弟会的秘密教徒。他们坚定顽强，宁可逃往信奉福音教的外国，也不为威胁与暴力所吓

---

① 一种豪华、浮夸或过分雕琢和怪诞的建筑风格。

倒。在关于白山战役之后时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斯卡拉克一家》(这也是伊拉塞克第一部较大的历史著作)中，伊拉塞克描绘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这次暴动于一七七五年正好发生在他的故乡纳霍茨科，席卷了捷克三分之一的地方。

在所有这些以农民暴动为题材的小说里，伊拉塞克指出历史上的胡斯革命传统是怎样活在人民中间，这种传统在最艰苦的受压迫的岁月如何激励人民行动起来，引导人民用武器去赢得权利。人民的代表也就是革命家，如《峭壁》中的乌利茨基，《还我自由》中的科齐纳或《斯卡拉克一家》中的依尔·斯卡拉克。伊拉塞克在所有这些长篇小说中表明了他的同情，他的热情的关注是在人民及其命运这一方面。

关于我国的民族复兴时期，伊拉塞克首先在五卷本长篇小说《弗·勒·维克》中作了描述，时间包括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多布罗商人维克（原名赫克）是那些希望捷克民族与语言有其美好未来的人之一，这样的爱国主义者起初为数很少，但逐渐有所增加。约瑟夫二世统治时，他经历过一段较好的时光，约瑟夫二世逝世之后，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又痛苦地遭受到新的压迫。小说虽然以维克的（在最后一卷中也包括他儿子的）生活遭遇构成情节的主线，但许多无名的、在本民族中默默无闻的工人、小手工艺者、有觉悟的农民、学生、牧师、职员，仍然是布拉格乃至农村的真正的主人。他们在周围传播有关

民族意识的思想，指出作为捷克民族的一员是足以自豪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捷克文化生活的开端，如最早的捷克戏剧的演出，报纸、书籍的出版等等。我们还可以从中了解当时捷克作家的形象，以及他们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艰苦而愉快的工作的情形。伊拉塞克指出，国内的老传统如何起着作用，而传统又如何因法国革命的思想或其它事件而得到加强。这些事件中尤其以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军队两次从捷克过境的影响为最显著，俄军过境不仅非同寻常地加强了捷克的，而且加强了全体斯拉夫人的爱国主义意识与觉悟。当时的爱国主义者认识到，我们并不孤立，我们民族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孤立，而是在斯拉夫民族大家庭里有着自己的地位，俄国人民就是我们的朋友。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最准确地检验出，伊拉塞克的作品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并与捷克民族如此休戚相关，因为他的作品直接来源于捷克民族，来源于人民的传统。

四卷本长篇编年史式的小说《在我们这里》则是《弗·勒·维克》的思想上的继续。伊拉塞克本人也最喜欢这部作品。它的副标题为《新的编年史》，这是因为它所叙述的不是国王、公爵、骑士、纷争与战斗，而是上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生活在奥列尔山下的小城镇帕多利的普通人。帕多利正是伊拉塞克自己的故乡赫罗诺夫，而且时间正是公爵夫人扎汉斯卡主管纳霍茨科庄园的时期。说得更准确一点，当家的不是这位夫人，而是管家艾森特。这是当时一个地地道道的管家人的典型，一个对农奴冷峻无情和残酷压迫他

们的人。在纳霍茨科的公爵庄园的阴影下，帕多利的生活似乎很平静，然而却充满着许多小事风波和居民的种种遭遇。在这部小说体的编年史里，伊拉塞克塑造了一个流传后世的崇高形象，即帕多利的牧师哈沃罗维茨基(原名列格涅尔)。这是没有宗教狂热和不容异端的毛病的开明牧师典型。他来自人民，充满对人民的爱，所以他不仅为人民出主意，而且用行动去帮助人民。当他看到山村织布工人的极端贫困时，便想法使之减轻：教他们用新的方法织布。他为他们创办学校，鼓励他们经商，使他们从麻木的、听天由命的状态中觉醒过来，他还教农民提高产量，等等；但同时，他也没忘记提高人们的文化与爱国主义觉悟：出借并散发捷克文书籍，加强民族意识，关心学校和成人的文化教育。他将自己的住地当作可以耕作的"休闲地"。通过他的双手，"休闲地"变成"耕地"，变成准备播种的土地。播种的土地不仅生长麦穗，而且也生长杂草。不过一切并不象哈沃罗维茨基预计的那样顺利(例如，他曾在帕多利徒劳地寻找煤炭，这倒不是为他个人，而是为了使这个地区致富)，但他的工作并非徒劳无益。伊拉塞克借助于哈沃罗维茨基牧师这个人物指出，他是这样设想为人民工作的：不是通过豪言壮语与口号，而是通过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琐碎行动，通过榜样和对人民的忠诚。

伊拉塞克取材于我国历史的一系列小说，以编年史《在我们这里》告一结束。还有一本原来是为青少年撰写的作品，作为该书的补充。但它的意义与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青

年文学读物，这就是《捷克古老传说》。伊拉塞克在其中用朴素而又象诗一般感人的语言记述了古老的传说，这些传说或流布于民间，或由古代编年史家保存下来。伊拉塞克通过这部作品去激发人们对捷克历史、对它的震撼人心的事件——或是著名的战争，或是悲剧性的、忧伤而神秘的故事——的热爱，从而加深他们对民族与祖国的热爱。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人民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和对人民起义者怀有深厚的同情（如对库特纳山矿工们、科齐纳、杨诺西克）。

伊拉塞克是自觉的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历史的真实性高于一切；但同时他又是这样的艺术家，很善于将娴熟的叙事艺术的激情灌注在编年史所涉及的时代与历史事件之中，善于使我们对陈旧的故事情节感到亲切，使死去的人物形象具有生命力。他不只是为了撰写供人娱乐的读本，而是遵循着为民族服务的坚定意图。关于这一点，伊拉塞克自己在回答一个祝贺他六十寿辰（1911）的代表团时说："我竭尽全力来复活我国的历史，使之接近更明朗的观点，更为人所理解。我不是一个只盯着过去，不关心现时期本民族的艰苦搏斗的梦想家。正由于我全心全意参与这一斗争，所以感到有必要回溯过去，因为不了解昨日，就不会充分理解今天。"

兹·内耶德利院士在阐述伊拉塞克的作品方面有着伟大的功勋。他自己作为一个利托米舍尔人，对伊拉塞克倍感亲切。他将自己毕生工作的很大部分献给伊拉塞克，撰

写了大量专著来介绍伊拉塞克的作品，解释它，指明它在思想与艺术上的杰出价值，并广为传播。后来他又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精力用于设立在白山的赫维兹达宫的伊拉塞克博物馆。这座夏宫①是捷克民族失败的见证，宫中展出了这位对民族复兴功勋卓著的作家的作品。伊拉塞克的读者和仰慕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向他表示敬爱、景仰、尊崇与感激之情。

描写捷克农村生活的编年史家是卡·瓦·拉伊斯。他的作品描绘了因贪财而产生的人的顽固性，同时也歌颂人民的朴实。后来拉伊斯在其作品中还探讨过捷克知识分子在农村的作用。

5 卡雷尔·瓦茨拉夫·拉伊斯

（1859—1926）

拉伊斯一八五九年生于下克尔克诺谢新帕卡附近的别罗赫拉特，毕业于伊青纳的师范专科学校，后在捷克—摩拉维亚高原地区任教数年。他深切了解当地村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和不利的气候条件下所从事的繁重劳动，那种苦役使人们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使家族感情变得麻木迟钝。九十年代初（这时他已被公认为青少年读物作家），他

① 即赫维兹达宫。

来到布拉格，先后在几个地方任教，直至晋升为中学校长。他是伊拉塞克、伏尔赫利茨基、历史小说家文特等创办的联谊社的成员。在一个长时期内，每逢节假日他便回故乡下克尔克诺谢去探望一次。即使身在繁华喧闹的大城市布拉格，他也依然是故乡的儿子。拉伊斯卒于一九二六年。

拉伊斯最初写一些具有爱国主义特点的、富于感染力的、带有历史色彩的诗歌，在这些方面他是捷赫的高材生。此外，他还为青少年撰写短篇小说，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和回忆性的。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他常常利用童年时代的经历与琐事，来贯彻不露斧凿痕迹的高尚的教育与爱国主义倾向。由此他进而以农村或小城镇生活为依据，进行篇幅不多的现实主义描写和大型的长篇小说创作。拉伊斯从短篇历史小说家逐渐成为当代生活及其光明与阴暗面的描绘者，就局部而言，他写的正是他的出生地下克尔克诺谢，或者是他任教时所熟悉的捷克—摩拉维亚高原的情景。拉伊斯继承了哈列克有关农村的长短篇小说的传统，他的作品再度反映了恰恰是哈列克带进我国文学中的那些农村生活问题：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老年人常有的不幸遭遇、为改善生计所经受的苦役与劳累、乡下人在城市环境中的破产，等等。当然，他解决的办法不同于哈列克，对问题的分析也更为深刻。拉伊斯也发现了产生他所描绘的现象的其它原因，这首先是由于农村状况的发展，比哈列克的时期更为明朗化了。拉伊斯在表述这种状况时采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他在短篇小说里主要指出：金钱或贪财的欲望

如何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哥哥仇恨弟弟；父母不愿让孩子得到爱情，因为男方或女方贫穷；当家的欺压需人赡养的老人；吝啬引起兄弟姐妹的反目和不体面的纠纷。从这一观点来看，拉伊斯有些短篇小说如《父母与孩子》或《养老的人》，是具有鲜明特色的。通过作者的现实主义描写，这些故事成了对破坏与瓦解农村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直接控诉。

拉伊斯对那些无法抗拒自己命运的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表现在他最优秀的一部作品，长篇小说《日落西山》(1899)之中。故事发生在捷克—摩拉维亚高原一个小村庄里，中心人物是九十高龄的牧师卡洛乌斯。半个世纪以来，卡洛乌斯忠实地为象他一样纯朴贫苦的人民效劳，他唯一的愿望是要死在自己的教民中间，死在牧师寓所而不是退休后居住的小木屋里。

他这一愿望实现了。卡洛乌斯一生行善，不计报酬，唯一的报偿就是穷人对他的爱戴与忠诚。

拉伊斯通过这些人物表明，他们对牧师多么亲近，他是如何评价他们的生命力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何将他们视为民族的核心、民族生活与未来的可靠保证的；另一方面，拉伊斯却谴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行政当局、富裕农民和政客，他们空喊爱国口号，但对人民漠不关心，对人民的生活一无所知。同时，拉伊斯还通过卡洛乌斯牧师和波杰利切克老师，显示了农村知识分子的卓越功勋和忘我而平凡的劳动，而这种劳动在贫穷偏僻地区是必不可少的。

探讨农村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拉伊斯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偏僻山村的爱国者》(1894)的主要思想。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下克尔克诺谢。拉伊斯通过这本书，为那些如今已无人知晓的教员与牧师竖立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们在那个时代用民族语言宣传民族意识，举办爱国主义的座谈会，出借捷克文图书，他们是捷克民族在那偏僻山村的真正圣徒。在拉伊斯的小说里，这些人就是斯特赫利克牧师、教导主任奇热克和教师助手切尔马克。他们是波兹捷金纳山区这片民族土地上的热情的工作者。

不管现实是多么令人不快和危惧，拉伊斯从来都是面对现实。这样的事实有：在德意志资本影响下，日耳曼因素渗入下克尔克诺谢，当时来自利别雷茨或维也纳的德意志工厂主兴办的纺织工业正在这个地区蓬勃发展，这对该地区的我国人民意味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这种外国资本除了社会压迫之外，还带来了日耳曼化。于是拉伊斯专心致志创作了大型长篇小说《不可救药的鞋匠》。他通过这部小说的几个典型人物，指出生活在德意志环境中的某些捷克人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强调那些不为外族压迫所屈服的人的强烈的民族与社会感情。他还正确地指出，各民族间的摩擦常常是由资本家及其仆从人为地挑起的，目的是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严重得多的社会问题。两个民族的贫苦人民却能经常互相协商与谅解。

卡·瓦·拉伊斯是我国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为繁荣捷克长短篇小说所建立的功勋，并不因为他没有

看到摆脱他在作品中精心描叙的农村社会危机的真正出路而有所减色。拉伊斯的长篇小说同诺瓦科娃的小说一样，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村生活的图景。

十　二十世纪初的文学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致力于克服十九世纪末期文学所陷入的危机。这次危机的原因是社会性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局势一直是不明朗、不顺利的。老捷党与少捷党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背叛日益彰明较著，因为全民族中对维也纳政府的不满与反抗有增无已，维也纳政府拒绝公平合理地解决诸如捷克语与德语的平等权利这一类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便出现了反奥地利的、名为"青年一代"的进步运动，年轻的斯·科·诺伊曼就是它的一名成员。但运动的纲领总的来说很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它未能依靠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依靠人民。连工人运动及其政党也在经受着危机。开始时显得激进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逐渐成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领导，党的活动仅限于议会中的争吵，根本无能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

这一形势的后果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作家中间也表现出来了：有些人迷失方向，陷于混乱状态。他们意识到文学迄今所表现的进步思想与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没有发现一个能帮助他们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他们明白，这样的人不

是、也不可能是如今已完全走向反动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观点上不可能、也不甘愿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他们对布罗乌切克之流的生活格调甚为反感。但是他们还不善于完全摆脱自己出身的阶级的羁绊，不善于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与之打成一片，尽管他们也注意到工人阶级政党正在经历着危机。于是文学中出现了为自己的思想而斗争的热望，个人主义便成为这些年代文学的主要标志。人们所写的作品并非什么创新，其根源在马哈的作品中已经存在，不过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显著罢了。

基于这一原因，人们摈弃了批判现实主义方法，出现了自然主义倾向。他们的意图是仅仅描叙实际生活的某一片段。自然主义者不致力于反映生活中典型现象的艺术，从而失去了观察事物本质、洞悉事物发展的能力。自然主义者认为人的一切取决于自然规律，人本身无能为力。自然主义热中于生活中的反面现象，因而它最终必然具有悲观主义的特点。

我国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为**克·姆·恰佩克-霍特**(1860—1927)。他在反映布拉格工业界与文艺界情况的小说里，怀着极大兴趣去描写一些特殊人物或事件。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涡轮机》，叙述布拉格一个实业家族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衰落与崩溃。这个家庭的命运是与工厂紧密相连的。

注意生活的否定面，使得自然主义与没落的文学艺术流派即颓废派接近起来。作家们意识到当代社会的崩溃，

最初并不想随波逐流，只是企图从文学上加以描画，但他们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文学又沉浸于悲伤、苦闷、蔑视生活的情绪之中。诗人歌颂病态心理(如崇尚享乐)，歌颂各种欲望和丑恶现象。颓废派文学宣扬脱离生活实际，强调下述的原则：艺术与生活迥然不同，艺术的目的与意义仅在于艺术本身，而不在于表现任何倾向，艺术必须符合“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这个口号从何而来？对生活与社会表示不满与厌恶的作家转向自身，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个人主义变成了明显的主观主义。对于这种倾向，抒情诗是最合适的表现形式，所以它在九十年代的文学中占有领先地位。根据这些观点，美只存在于艺术之中，只有艺术才是稳妥可靠的、唯一的价值所在。由此引起了对诗歌形式问题的更大注意，必须不断加强对形式的关怀和对艺术的崇拜。艺术被宣称为一种独特的、贵族式的、只为寥寥无几的骄子服务的东西。

另一流派——象征主义，同样避而不谈艺术与文学的社会功能。诗人们通过一些画面(诗一般的图画)的罗列，创造出一个独立自在的世界。他们躲进这个世界，从中寻求安身之地。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特别的现象：即使是这里（例如在奥塔卡尔·布热齐纳或安东宁·索瓦的诗里），也表现了(尽管是模糊的)一种关于人的团结友爱的梦幻，当然，所用的形式很晦涩难懂，蒙上了一层象征的色彩，如握手表示集体主义的人类大家庭。象征主义也含有某种明显的社会色彩，尽管只是非常模糊的。

我国诗歌中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奥塔卡尔·布热齐纳(1868—1929)。他在五部艺术完美的诗集中叙述了他本人的思想发展——从起初的苦闷与低沉情绪，到相信每一代人都有拥抱全人类、全世界，拥抱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社会博爱精神(如《手》)。布热齐纳的诗歌形式完美，诗句有的严谨规范，有的自由舒展。充满诗意的画面、象征、寓意等表现手法比比皆是，因此常常使人很难弄懂诗的真正核心与含意。

九十年代所有这些文学流派也组成了自己的批评队伍。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从上述艺术流派出发对文学作品提出了要求，并以各个流派的名义说话。所以我们提到批评时，便有颓废主义的批评、象征主义的批评等。这些批评主要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因而背离了它的社会使命。一些外国的实例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也发生了作用，如法国文艺批评注重文学作品的形式而忽视其内容，俄国文艺批评则健康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这个时期，弗·艾·沙尔达已成长为一位富有特色的文艺批评家。他当时贯彻了“文学作品应对生活有所贡献”的原则。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具有决定意义的倾向。主要问题是：如何克服个人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应该如何与社会集体相结合。有些作家找到通向工人运动的道路，到工人中间去(如诺伊曼)，为他们编辑和印行杂志。接近工人运动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潮在工人运

动中得到传播，它导源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状态的抗议。作家竭力使文学接近生活，所以又开始重视当代的迫切问题，对那些见弃于人类社会的人表示关注。诗歌充满着行动的渴望，抒情诗中响彻着革命的口号、寓意和号召，同时产生了一种通往彻底的社会主义诗歌道路的作品，这种诗当然是在一九一七年之后才得以充分发展。这整个发展在诺伊曼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主要见于诺伊曼的作品，其次是屹立在本世纪之初的、新道路最突出的指引者贝兹鲁支的作品，还有雅·斯·马哈尔、弗·迪克、安·索瓦、卡·托曼、弗·什拉麦克、雅·哈谢克等人的著作。

1 彼得·贝兹鲁支
(1867—195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段时期从事创作的诗人中，彼得·贝兹鲁支在使诗歌面向生活的问题上完成了一项最有意义的转折。他原名伏拉吉米尔·瓦谢克，一八六七年生于奥巴瓦。父亲是中学教员，曾作为民族活动家在奥巴瓦区热情地工作过。他站在那些假文物的反对派一方，参加了所谓手稿之争①，为此遭到“爱国志士”们的迫害。贝兹鲁支十三岁时，父亲亡故，母亲不得不为抚育六个孤儿操劳。贝兹鲁支在布尔诺读完中学后进布拉格大学哲学

① 见78—81页。

院，但是半途辍学，从事邮政工作，在米斯特克与布尔诺等地当邮务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叛国嫌疑下狱。从一九二八年起在布尔诺退休，有时寓居汉纳的科斯特尔采，一九五八年在那里去世。人民民主共和国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贝兹鲁支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实际上他只有一本诗集《西里西亚之歌》和后来的一首诗《蓝色蝴蝶》。

贝兹鲁支的诗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发表于《时报》杂志增刊《座谈》，后来收入《时报丛书》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书名《西里西亚号》(1903)，三年之后，即一九〇六年才出版这本有着固定的、今天已尽人皆知的书名的集子。其后，《西里西亚之歌》又多次重版，成为传播最广的捷克诗集之一。

贝兹鲁支由于他在故乡的体验和经历给他留下的印象而成了一位诗人，这指的是俄斯特拉发地区的劳动人民、矿工、冶金工人的无穷苦难，当时矿井与工业企业里恶劣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冷酷无情，穷人在老爷面前的无权地位以及民族压迫。贝兹鲁支看到我国人民的主体部分如何被强行日耳曼化，而日耳曼化又如何与社会压迫紧密相连。教会的统治也使人民丧失民族自信心。贝斯基迪的大庄园和大片森林都归外国统治者所有，而穷人在那里拾点干柴也要受到惩罚。诗人痛切感到，尽管我们的民族在这里失去了数以千计的儿女，捷克官方政界乃至文学对此却毫无所知。

这一认识在贝兹鲁支内心蕴藏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当贝兹鲁支受到致命的病魔的威胁，不愿让这些证据同他一起泯灭时，他心中的激情突然迸发出来。震撼人心的现实本身与诗人个人的处境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具有不同寻常的迫切性、强烈的个人激情和艺术效果的诗歌。有意义的是，诗人自己这一角色退居幕后了。贝兹鲁支与成千上万的无名矿工融为一体，休戚与共，经受着社会上无权无势者所受的压迫。他沉重地感觉到社会与民族的压迫，但是又不愿逆来顺受，而要奋起反抗，他渴望复仇，因而回想起西里西亚的杨诺西克、复仇者翁德拉什（如《翁德拉什》一诗）。

贝兹鲁支这样来抑制自己的个性表现：他或者以一名矿工、以自己人民的无名歌手出现，或者以一个大喊大叫、令人不快的丑怪形象出现在只顾举办民族庆祝会，而不关心西里西亚人民命运的布拉格的捷克官方人士面前。与这种倾向相一致，贝兹鲁支小心谨慎地注意不让人知道他使用了笔名。贝兹鲁支的诗歌中不仅有苦难的场面，也有暴动的号召，关于来日报仇的描述。必须让所有造成这场苦难的人如外国资本代表拉利什、古特曼等遭到惩罚！在这里，贝兹鲁支和捷赫一样不用讽喻手法，他诗歌中的人物采用真实姓名，情节有真实地点，因此诗集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但贝兹鲁支有时也成功地运用九十年代诗歌语言中常用的象征手法，但是象征包含着具体内容，并不脱离实际，而是直接面向实际。

贝兹鲁支表现社会冲突的基本意图，使诗人不仅写抒情诗，而且写叙事诗，这样，他便成为哈列克、聂鲁达的社会性故事诗的继承者。他的社会性的故事诗的题材具体生动，带有直接的典型性。贝兹鲁支在这些诗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将西里西亚的特征及其民族与社会问题具体表现出来了。其中最感人的是《玛丽契卡·马格冬诺娃》。女主人公的遭遇由于其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成了整个西里西亚人民的命运的缩影。《教员哈尔法》这首民间故事诗也有同样的效果。

在这里，贝兹鲁支所以能使作品收到效果，不仅由于主题本身，而且也通过形式，即精炼、简明、激昂的呼唤、问话，或诗的结尾处的尖刻讽刺。于是，如同爱尔本成了超自然题材的民间故事诗大师一样，贝兹鲁支也逐渐成长为社会性故事诗大师，成为年轻一代诗人如沃尔克的宗师。贝兹鲁支在《成就》一诗中表示，对他最好的报偿是让被蹂躏的人民真正站起来；仅仅赞美他的诗集，或者关心诗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否实有其人，这就远远不够了。

贝兹鲁支还写过许多以发抒个人情怀为特色的诗，他在诗中被表现为一个孤独寂寥的、被爱情遗弃的人。但即使在这些诗中，他也将个人悲剧与整体、诗人与社会结合在一起。例如《红花》一诗，特别是后来的《蓝色蝴蝶》一诗，就证明了这一点。《蓝色蝴蝶》这首较长的独立诗篇于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出版，这是一位年迈诗人的充满伤感情绪的倾诉。他渴望蝴蝶标本册里有一只珍贵的蓝色蝴蝶的儿时梦

想已经实现，可是他用革命诗句所号召的、消除社会差别与不平的愿望却未能实现。贝兹鲁支在第一共和国[1]时期已经看到，从前的生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改进，一切景况如旧，一方面照样是资本主义的贪欲，另一方面依然是社会压迫。由此产生的诗人的失望，最初表现为忧郁伤感，随后则表现为反抗了。

贝兹鲁支诗作的手法也与主题相适应。例如，他有效地运用对比法（如《你与我》、《他们与我们》等诗），紧迫的提问或直接的呼语（如“你感觉怎样，玛丽契卡·马格冬诺娃？”），重复某些字、词组、叠句（“我在东布罗瓦挖着；我在奥尔罗瓦挖着，在波列巴挖着，还在拉察的地下挖着”），插入方言土语（如“土豆”、“客店”），或使用鲜明有力的定语（如性质形容词“流浪乐师”、“痴痴迷迷的风笛手”、“疯狂的叛乱者”、“烂醉的歌手”等）。贝兹鲁支的诗在韵律上多种多样，主要是扬抑明显，具有特别的效力。贝兹鲁支的诗常被谱成歌曲（特别是由列·杨纳切克谱成的曲子）。

贝兹鲁支的作品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民族与社会诗歌的最高峰。同其它类似的诗集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贝兹鲁支不仅仅满足于社会的人道精神，即对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同情，而是直接提出要实行清算与复仇。诗集的这一革命性主调在当时诗歌中是颇为新颖的。当然，贝兹鲁支所宣扬和用以进行威胁的还只是一种自生自

---

① 指从一九一八年建国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接受慕尼黑协定这一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发的、个人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没有提出有纲领的社会变革。但贝兹鲁支诗作的思想价值并不因此而降低。《西里西亚之歌》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为反对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有组织的斗争的一部分，它至今仍然具有这样的生命力。

约瑟夫·斯瓦托普卢克·马哈尔(1864—1942)是老捷党与少捷党的空洞口号式的捷克爱国主义的敌人和反对教权主义的战士，在他创作初期尤其是这样。长期旅居维也纳使他离开了布拉格的生活，能更好地观察维也纳对捷克的政策的内幕。作为一个诗人，他起初在其痛苦的怀疑主义的抒情诗中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如诗集《我的自白》），其后又在长篇组诗《世纪的良心》中评论了人类(同伏尔赫利茨基的《史诗片段》相似)。但是因为他不理解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只是一些大人物的事迹，因此他的观点是悲观主义的，认为人类没有迈步，没有前进，其顶峰是古希腊罗马，后来就每况愈下了。马哈尔不仅颂扬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德，如勇敢、爱国、纪律性与责任感(如《蒂突斯·曼利乌斯》一诗)，而且歌颂罗马的凯撒大帝等。根据他的历史哲学，这些人全是意志坚强的人物。对于资产阶级，马哈尔则以嘲讽怀疑的态度进行评价(如《向何处去》诗集中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墓志》一诗)：资产阶级曾给历史带来光辉(法国革命)，如今却早已失去生存意义，奄奄一息了。

第一共和国的发展，特别是它所标榜的民主的真相，使

马哈尔深感失望。他对大人物的崇拜，使他在第一共和国末期接近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观点，因此马哈尔的整个发展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作为诗人显然是进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便成了保守分子。

维克多尔·迪克（1877—1931）对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形势作出了非常敏锐的反应。作为新闻记者和诗人，他主张对奥地利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捕入狱。他抨击统治阶级的机会主义政策，他的进攻性、论战性的诗作也反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因为他感到该党的政策不符合民族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四部诗集：《轻重脚步》、《非此即彼》、《窗》、《最后一年》。《窗》诗集中的《大地之声》一诗，最出色、最热诚地表现了捷克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同时，他又担心捷克民族在关键时刻可能辜负与背叛自己的纲领。

迪克明显地表现出为摆脱个人主义、投入超乎个人之上的集体所作的努力，但与其他找到通向工人阶级集体的道路的人不同，迪克创造了一个统一的、超阶级的、虚假的民族概念，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族一度团结起来反对奥地利这个事实给他造成的错觉。一九一八年之后，为了这一团结，他不愿看到随着民族的解放，社会问题已上升到首要地位，因而他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鼓吹者。这就是这位伟大的、曾经是进步的诗人的悲剧所在。他同马哈尔一样是擅长讽刺的大师，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的抒情诗的大师。

安托宁·索瓦(1864—1928)的诗作表达了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他对捷克小市民习气的反感与抗议，表现了强烈的社会感情、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社会变革思想的同情。

索瓦的主要诗集表明，他是一位特别强调社会人道主义的印象派诗歌的代表。在这方面比较有特征意义的，是他描述捷克南部风光的一组写景小诗集《我的故乡》。

在这些格律短诗中，索瓦出色地描写了捷克南部故乡的风光与生活。他不只描绘外部景色，还注意观察和刻画例如一年之中不同季节甚至不同日子的风光变化，试图表现它的情绪、悲哀，并在景物中发现了胡斯革命的历史。他将自己的精神状态融入风景描写，使他个人的悲伤与故乡景物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版的诗集《家乡之歌》，表现了真诚而又坚定的爱国主义。

另一些诗集表明，索瓦是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嘲讽者与进攻性的批评者。他之所以不满，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成全与实现诗人对自由与崇高人性的设想。所以索瓦常常倾向于幻想拥有较美好的人类与较完善的社会制度的未来，在这个制度下，作家与诗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对索瓦影响强烈。由于它的影响，索瓦在最后几部诗集中，由过去模糊的人道主义上升到对社会压迫的抗议，这不只是通过工人的行动，而且是以工人的精神来表示抗议的。

从艺术角度看，索瓦的作品也很有意义。他创造了韵

律灵活多样的独特诗句，这种诗已不再满足于固定格式，而是非常舒展自如，以便容纳所有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所谓自由诗）。

索瓦为了表现他对人类和对人类当时的命运与未来的、有时是抽象和不确切的概念，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他是我国最突出的印象派代表之一。索瓦作为一位描写捷克风光、特别是捷克南部风光的诗人，至今还没有人能与之匹敌或超越他。他善于用几个简短诗句来表达倾心叹赏的情绪。

除了诺伊曼青年时代的作品之外，诗人卡雷尔·托曼与弗拉尼亚·什拉麦克也属于这一时期。

卡雷尔·托曼（1877—1946）本名安东宁·贝尔纳谢克，他只写过寥寥可数的几本抒情小诗集，但他的作品却属于捷克现代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的一部分。他的抒情诗晶莹清澈，准确明了，运用了捷克诗人中少见的精湛的比喻略语的艺术手法。托曼渴望漫游遥远广阔的世界，因而离开了故乡，他的叛逆性格和对狭隘的捷克环境的不满，驱使他到欧洲各大城市流浪。托曼在求学时期，已经历了十九世纪末进步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乃至政治上的全部危机。所有这一切在托曼早期诗集中都有表现。这些诗集流露出对人世浮华的恐惧、对世界与社会的不满，此外还反映了诗人以嘲讽形式所表达的爱情上的波折、坎坷。托曼对限制人的自由生活、使人不能尽情享受的社会表示最强烈的反抗。这是一些充满愤怒、仇恨和抗争，同时也充满强烈的爱的诗作。

托曼的西欧之行在他身上引起了变化：在外国大城

市的无产者中间，托曼意识到自己扎根于故国，逐渐抛弃其个人主义观点，并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虚幻性。因此他的诗中出现了新的基调：和睦、协调和对生活的赞美。他从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传播者，转变为一个用诗歌形式叙述祖国的苦痛悲哀和值得自豪的希望的诗人。这就是托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写诗集《十二个月》的内容，这一诗集代表他创作的顶峰，是根据严谨的格律写成的。这十二首以月份为题名的、形式严整统一的短诗没有慷慨激昂之情，而是以朴实刚健的风格、坚定明朗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忧虑与希望，因而效果明显。除了民族的希望（如《七月》、《九月》），托曼还表达了社会的希望（如《五月》）。托曼的其它诗集中仍然交错出现原来的基调：思念远方和歌颂故乡。对解决社会冲突的坚强信念与希望，代替了过去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无政府主义态度和反抗。伟大十月革命的范例对托曼也有强烈的影响。

解放后，托曼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弗拉尼亚·什拉麦克（1877—1952）也经历过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强大浪潮，他出生于索博特卡，一生中经常回故乡探望。早期诗集《蓝与红》、《贫困的生活啊，我依然爱你！》以无政府主义的姿态抨击社会，主要抨击奥地利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蓝色＝后备兵，红色＝无政府主义者）。什拉麦克如此尖锐地予以抨击，是因为它们禁锢了人的生活，而什拉麦克则认为生活具有极大的价值。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出于对生活的眷恋与希望而歌颂它。什拉麦克抗议

他亲身经历过的战争，他的诗里经常出现有关士兵的主题，例如后期抒情诗中的《永恒的士兵》，就是满怀热情地呼吁和平的。他后期的若干诗集，如《堰堤》，已不象最初那样富于进攻性，而是更多地表现他在生活中所体验的激情与欢乐。他的早期诗集所表现的生活是很使人痛恨的社会生活，如今则主要是感情生活。什拉麦克竭力描画支配着人与自然的那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给生活以热情，而且主要表现在青年时代。他想把握住所有最细致的感情活动，表现生活的、主要是爱情的欢乐。当然，随着青春的消逝，他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忧伤情绪。为了稍加克服，什拉麦克日益将注意力集中于家园与故乡。第一共和国末期出现法西斯危险的时候，什拉麦克创作了一些战斗的爱国诗篇，后来将它们收入诗集《伤痕与玫瑰》中。诗集包括德国占领时期所写的诗篇，表现了什拉麦克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法西斯及其暴行的反抗以及对布拉格革命与解放的欢庆歌颂。

什拉麦克的散文具有和他的诗歌相类似的意义，其代表作为《银风》，所写的是什拉麦克特别喜爱的题材：青年学生长大成人时体会到的复杂感情的故事。什拉麦克对青年时期有一个崭新的概念：在伪善的社会里，长大成人的时期并不令人愉快，而是痛苦的、艰难的，所以大家对青年时期应该持温和体谅的态度。类似的主题也见于什拉麦克的剧本《夏天》，但喜剧《河上明月》却是描述老一辈如何看到年轻一代正在以一种稍稍不同的方式，经受着他们父辈经历过的生活忧患。

什拉麦克的抒情诗朴实无华，富于音乐感，充满激情，很合青年人的心意，对战后一代人（如伊·沃尔克）有过强烈的影响。

一九五二年什拉麦克逝世时，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将他安葬在他的出生地索博特卡，离他的同乡，诗人瓦·肖尔茨的墓地不远。

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代表为**弗朗季谢克·沙尔达**(1867—1937)。他是布拉格大学的世界文学教授。他的功劳在于使批评摆脱了单纯的讲大道理和平铺直叙的陈套，结束了根据事先确定的评价尺度来议论作品的、旧的批评方法。他探索一条新的途径：向读者阐述作品时，不仅对它作出评价，而且向作家指出今后如何才能写得更好。他评价文学作品，总是要看它给生活提供了什么，它是否丰富和改进了生活。他对捷克文化及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观察数十年，并作为各种文学或艺术刊物的编辑来干预生活，最后写成和出版了他的《沙尔达札记》。沙尔达要求作家与诗人的作品表现他们深刻的亲身体验。他深受当时的个人主义的影响，但又竭力去克服这种个人主义。所以他在评价某些文学与政治现象时虽偶有失误，但他总是正直诚实、光明磊落的。整个说来他站在进步一边，其证据之一是他曾将一种杂志(《创造》)交给尤·伏契克掌握。他认为，用查封杂志来禁止捷共对时局发表意见是错误的。

他反对陈规陋习，反对走老路和陈腐思想，反对倒退和艺术上的不负责任，从而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重要的

是，他到晚年为止，一直都很理解和关心后起的年轻一代，评论他们的创作。他在文学发展上发挥了同诺伊曼非常相似的作用，通过他的崇高威望，他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影响大大促进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捷克文学的发展。

2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

（1883—1923）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作品，不仅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和幽默小品，而且就其整个特点与基本态度而言，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期的范畴，并带有这一时期的烙印。当然，使哈谢克登上他创作的顶峰的，乃是他战后创作的那一部关于好兵帅克的遭遇的著名长篇小说。

雅·哈谢克一八八三年出生在布拉格，毕业于贸易专科学校（相当于现在的经济学院），可是任何正式职业他都未能坚持到底。他当过一阵临时编辑，但当时对社会制度不满的那一代人的典型的急躁不安情绪驱使他离开了家乡。他周游了（多半步行）整个奥匈帝国和德国部分地区，其体会与印象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而他写得最成功的是幽默与讽刺作品，在那里，他嘲笑了捷克与外国小市民的倒退势力、空洞无物的爱国主义以及捷克官方的政策。他还运用讽刺武器反对教权主义与奥地利精神，嘲笑奥地利军国主义。他以自己的坎坷生涯向社会挑战，这个社会的全部制度法规都成为他讽刺的对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俄军的俘虏，加入俄国的捷克兵团，其后与领导决裂，进入红军行列。在红军中他作为新闻记者、政治委员，在几个重要岗位上忘我地工作。他是俄国能正确理解伟大十月革命意义的少数捷克俘虏之一。这一认识清除了他原有的无政府主义的最后痕迹，而这种无政府主义也是他同代的许多人所经历过的。世界大战后他回到祖国，继续他的工作，重新提笔创作幽默与讽刺短篇小说，抨击与讥笑捷克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性。关于帅克的大型长篇小说是他的未竟之作，因为一九二三年他就溘然早逝了。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哈谢克就已写出若干篇以兵士帅克为主人公的、反对麻木不仁的奥地利军国主义的讽刺幽默作品。大战后，哈谢克又回头塑造这个人物，作为《世界大战中的好兵帅克历险记》的主人公。小说是一幅奥地利专制王朝及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讽刺画。帅克以实际上只是表面的愚笨对战争进行抵制，他通过这种愚笨，揭露奥地利整个国家制度、特别是军事机构的荒诞无稽，破坏奥地利国家机器与军事机器。他常常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而恰恰暴露了这些命令的毫无意义；他制造混乱，迫使周围的人，主要是军官，在愤怒之中现出自己的真面目。其次，他又善于以天真无邪的表情和机智雄辩的口才摆脱一切困境。

作为帅克的对立面，哈谢克刻画了一系列代表奥地利政权的下级与上级军官，帅克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同他们

作斗争的。帅克可算是社会上一个游民，不属于哪一方面，只是为自己的区区小事而奋斗，尽管有时也同情其他的普通士兵。哈谢克非常明确地指出，帅克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也有许多消极的、不良的特点。他并不象外国诽谤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体现捷克人民基本性格的典型。帅克只是特定时期的一部分捷克人的一种典型。哈谢克的现实主义的实质正表现在这里。不仅帅克，哈谢克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叙述的事情也是现实主义的，尽管乍一看来常常显得言过其实，不大自然(这与讽刺的实质有关)。

与这种现实主义相关联的是形式。他的形式实质上是很自由的，没有一定的情节，所强调的主要是帅克叙述的大量生活事例。帅克正是通过这些事例来影响周围的人。哈谢克在这里运用了捷克的民间语言，还大胆地掺杂着粗俗俚语，这无疑具有表现特征的意义。

哈谢克通过他的长篇小说，讽刺了奥地利军国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地利实况，真是入木三分。虽然帅克其人正是从这种特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哈谢克的讽刺却具有极为普遍的意义(例如，帅克首次上阵射击时，他对敌人喊道："别开枪，这儿都是人啦！")。就今天来说，哈谢克这部作品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哈谢克的《帅克》已享有世界声誉。它被译成多种文字，改编为剧本和拍成电影，成了反对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十一　两次大战之间及占领时期的文学

伟大的十月革命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在这次革命中，拥有列宁这样杰出的革命理论家和有经验的工人革命政党领袖的俄国无产阶级获得了胜利。

作为对伟大十月革命的一种反响，不仅其它国家出现了革命的尝试，而且在那些用革命手段解决问题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国家，工人阶级进步组织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俄国无产阶级为保持和巩固革命成果，既要与内部敌人，也必须与资本主义列强作斗争。十月革命后的四十年中苏联人民所经历的斗争是艰苦的，然而苏维埃国家的公民以自己日常的、切实的劳动，克服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我国的发展也是在苏联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之下出现的。

早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旬，布拉格工人阶级已走上街头，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现的国家却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新国家成立后的头两年，社会民主党内右派与左派之

间发生了搏斗。党内两派的矛盾如此深化，以致在那场关于人民大厦的争夺①和一九二〇年底总罢工之后，一九二一年五月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状况的发展表现了早期的繁荣，这种繁荣在一九二九年左右达到顶峰，但很快就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替代。资本家在新的扩充军备和准备新的世界大战中寻找出路。

危机时期，欧洲政治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掌握了政府，把国家引向军事侵略。在国内政策上，法西斯制度的特征是采取最残酷的暴力手段来反对具有其它政治思想的公民。

一九三三年夺取国家政权、以希特勒为代言人的德国纳粹主义的政策，集中表现为控制其东部斯拉夫邻国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准备进犯苏联。

希特勒按照精心准备的计划向前推进。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民主力量的不统一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支持，使他得以实现这一计划。他们以为，牺牲了苏联，希特勒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要求了。

德国资产阶级中许多进步人士也表示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他们中间以小说体编年史《布登勃洛克一家》作者托

---

① "人民大厦"是捷克工人运动和进步政党在布拉格的重要活动场所。一九二〇年，社会民主党左、右两派为党的财产发生纠纷，资产阶级政府支持右派，派警察占领"人民大厦"，因而爆发了全国总罢工。

马斯·曼(1875—1955)为最突出，他在作品中通过一个商家的四代人来揭示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与衰落。曼氏在流亡中特别用他的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进行斗争。他在这部作品中抗议法西斯歪曲古代历史，通过约瑟这个人物，创造出一位为了让人道主义战胜反动势力不怕使用阴谋与暴力的英雄。

我国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它的有些派别歌颂法西斯专制，并企图在我国推行这一制度。

工人阶级以共产党为其代言人和保卫者。但是党还须为自己的团结而斗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时期，党内出现了思想上的动摇，以哥特瓦尔德为领导的一派在第五次党代会上(1929年2月)获得了胜利。哥特瓦尔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作为党的纲领的基础。

在我国出现工业甚至农业上的严重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党在思想上的巩固立即显示出了伟大的意义。资本家竭力用损害劳动人民的办法来弥补他们的利润损失，劳动人民却通过一系列罢工(例如1932年春在捷克北部的矿工罢工)来进行抵抗。在罢工中警察和宪兵甚至使用射击武器来对付罢工的工人。

因此共产党尽力将全国反资本主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以建立一个反对愈来愈危险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政府。但是党的一切努力当时未能奏效，因为我国许多公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危害甚大的威胁。

直到最危急的关头，全民族的所有进步文化势力才聚集起来，然而这些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与人民一道，逼使政府接受苏联为反对西方大国的慕尼黑协定(1938年10月)而给予的援助。

欧洲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变化，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都得到了反映。

文学最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反应。许多小说对毁灭人的生命与劳动成果的战争表示异议。其中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1874—1935)的现实主义的日记、长篇小说《火线》以其反战倾向而出类拔萃；德国文学中阿诺尔德·茨威格(1887年生)的部分反战作品，特别是《一九一四年的青年妇女》、《格里沙中士案件》、《凡尔登的教训》均属此类。伟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4—1944)的技艺高超的短篇小说《比埃尔和吕丝》，也对毁灭青年人的爱情与个人幸福的战争狂的愚蠢行为提出抗议。罗曼·罗兰除了几本有关音乐的书以外，还写过两部大型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约翰·克利斯朵夫》讲的是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故事，他(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与贝多芬有许多类似的特点。小说《母与子》刻画了三代妇女的命运，安乃德这一人物反映了罗曼·罗兰的思想转变和他对俄国革命与列宁著作所抱的希望。他的戏剧为人民的思想被大家所接受，并培养了法国人的纯正品格。在这些戏剧中，描写法国大革命的《爱与死的搏斗》在我国倍受欢迎。

法共党员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是法国生活

的杰出批评家，这尤其表现在四卷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和讽刺当时社会的《企鹅岛》一书中。法朗士的小说常常运用“创造历史”的方法，即为各种事件和纠纷、特别是为政治性的事件和纠纷的产生，有意识地创造出某种环境。

对于捷克人来说，战争的概念是与强迫捷克士兵为他们敌视的哈布斯堡王朝利益效劳和卖力的奥地利以及奥地利军国主义的概念相联系的。所以哈谢克在其优秀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中猛烈抨击奥地利军国主义。继哈谢克之后，有几位小说家竭力清算了战争屠杀的荒诞行径。弗·什拉麦克在长篇小说《身躯》里，表现了被战争夺去丈夫甚至毁坏生活的少妇们对于战争的本能反抗。卡雷尔·孔拉德(1899年生)的长篇小说《分道扬镳》，表现了年轻一代对战争屠杀的愚蠢行为的反应。作家伏拉吉斯拉夫·万丘拉的长篇小说《可耕地与战地》尤为出色。万丘拉通过呆傻的靠津贴度日的热巴指出，战争带来的一切与普通人的利益是多么格格不入。

所谓“兵团文学”就是用一种特定的方法表现战争事件。它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捷克部队的所谓兵团士兵中的作者创作的。兵团主要由被俄国人俘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士兵组成。兵团本应该同奥地利作战，但它在俄国的领导却用它来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所谓“兵团”作家的绝大部分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坚持民族主义。

雅罗斯拉夫·克拉托赫维尔(1885—1945)的作品却与兵团文学的这一倾向大相径庭。他从政治上的左派的阶级

观点出发，描绘兵团士兵的生活情景。他的史记体小说《源泉》尽管未能完成，但仍然为我们保存了那些远离祖国、能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行动采取正确立场的捷克人的生活与思想的现实主义记录。克拉托赫维尔的《革命之路》一书，也包含着兵团在俄国的生活与斗争的许多纪实。后来克拉托赫维尔的进步思想的表现，就是他一九三七年的战争期间参加了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二次民主作家代表会议。克拉托赫维尔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于特莱津集中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诗歌，表现了来源于生活的普遍的欢乐情绪，和认为所缔造的和平将持久不衰的信念。

但为时不久，这种初步显露的乐观主义便被对事物的实际状况的认识所抵销，人们认识到，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完全战胜可能重新挑起战争的反动势力。此外，人们又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新国家中的阶级矛盾在如何进一步深化，所以捷克作家很快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加入思想上截然不同的阵营，他们的不同观点也表现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

左翼作家理解伟大十月革命的意义，认识到我国的状况只有通过革命方法才能解决。他们以苏联诗人为榜样，力图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这些作家中为首的是斯·克·诺伊曼和兹登涅克·内耶德利。许多青年诗人团体以及由玛丽亚·玛耶罗娃和伊万·奥布拉赫特领导的小说作家队伍都属于他们之列。

相反，极右方面的作家，则竭力表现捷克资产阶级以及我们民族中将自己的利益与劳动人民的剥削者联系在一起

的那一类人的思想感情。

然而还有许多作家介于两个对立阵营之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划归这一方或那一方。这些人从实质上讲是民主主义作家，他们善于运用敏锐的理解力去洞察当代社会矛盾的本质，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或勇气从本身的认识中就如何对待阶级剥削的代表者的问题做出结论。卡雷尔·恰佩克就是这些进展程度各不相同的作家的突出代表。

二十年代捷克文学中的进步阵营与我国文学生活的其它部分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阵营主要聚集在具有进步的文化政治纲领的杂志周围，那就是斯·克·诺伊曼主持的《六月》、《树干》、《无产阶级文化》和兹登涅克·内耶德利的《沸腾》。

这些杂志刊登具有原则意义的文章，其中包括伊希·沃尔克在《沸腾》上发表的《无产阶级艺术》(1922)一文。沃尔克在文中强调对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指出了它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新的艺术必须是革命的，因为创造这种艺术的艺术家希望为新的、更好的现实而斗争。从而新的艺术更具有党性，或者象沃尔克所说，更具有倾向性。当然，这必须是真正的诗歌，力求用新的、不致歪曲真相的眼光，也就是从无产者的立场来观察生活。新的无产阶级艺术将不是畸形的，而是乐观主义的(它相信改善世界的可能性)、集体主义的。生活将不被理解为个人的事，而是伟大的整体即社会阶级的事。

沃尔克通过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将无产阶级诗人和无

产阶级诗歌载入文学史册的诗歌团体的纲领。新诗不应只具有社会性，不能仅仅以同情的态度，而应该以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去对待无产阶级及其贫困，应该力争对世界进行革命的变革。这些诗歌的积极的主人公应该是工人，必须用工人的观点来观察整个现实；但是这种新文学又必须创造出适合于新内容的新形式。沃尔克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这些观点，而且在实践中用自己的作品体现了这些观点。无产阶级诗人意识到，假如新艺术要发挥其作用，就必须简明易懂。这一要求导致了形式的民主化，表现在语言和结构上。为了通俗易懂和明白如话的原则，人们强调那些把世界的客观表象描写得最出色的叙事诗（沃尔克则强调民间故事诗）。诗歌中的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来自当代现实。

但无产阶级诗歌还解决了争议不休的文化遗产问题。有些诗人和理论家坚持认为先辈所创造的一切艺术都已僵死，无产阶级必须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沃尔克和内耶德利按照列宁主义，正确地要求思想和形式上崭新的艺术，同时又要求利用历史上的一切进步因素。

无产阶级诗歌竭力将诗歌与为工人阶级美好未来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二十年代初期，年轻一代的文学工作者却为它展开了一场原则性的斗争。

多数青年诗人与小说家意识到，必须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一个思想基础，它不同于老一辈（大部分是捷克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创作的文学的思想基础。因此他们研究

革命的政治理论，因此诺伊曼在《六月》杂志上发表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译文，因此这一代的著名进步作家（奥布拉赫特、玛耶罗娃）曾前往苏维埃俄国。他们不仅希望在那里了解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社会制度，而且也想从那里获得文学创作的新启示。

这些作家大多是具有坚强信念的社会主义者，或者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过了不久，他们之间出现了观点上的分化。那些团结在摩拉维亚文学团体主办的《客人》杂志周围的文学工作者，主张走渐进的、逐步改善的道路，而布拉格《山菊花》杂志周围的文学工作者却主张革命和革命艺术。

但《山菊花》内部也在形式问题、我国诗歌与欧洲当代诗歌流派的关系问题，以及对待过去文学的态度问题上出现了观点分歧。这种观点上的矛盾使沃尔克离开了《山菊花》杂志。这些矛盾的结果在后来沃尔克逝世以后，无产阶级诗歌的纲领已被放弃之时，仍有所表现。当然，主要原因不是沃尔克的逝世，而在于社会状况，在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暂时巩固。当时有些诗人以为近期内不可能发生革命，这就使文学革命失去了远景方向。对待世界的革命态度被诗歌形式领域内的革命所代替。他们认为诗人不宜揭露生活的矛盾，而应歌颂（如纯诗派所要求的）世界和事物的美，诗歌必须将人从严酷现实的压力下解放出来。这自然明显地削弱了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因为纯诗主义主张内心世界的解放，这一诗歌流派把表现在诗歌逻辑结构（根

据思想顺序）中的所谓理性枷锁加以摒弃，而强调诗歌形象性的随意运用。这种倾向在诗歌中日益加剧，终于发展到超现实主义。在纯诗主义时期，我们看到有些诗人主观主义日益严重，以致其作品晦涩难懂，从而失去了思想性。然而总的说来，纯诗主义提高了诗歌的敏感程度，加强了诗歌的表现能力、形象性和音乐性，乐观主义也是它的一个肯定的方面。二十和三十年代，该流派的主要代表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据。

二十、三十年代的形势实际上极为复杂：思想显著进步的作家探索着诗歌的方法问题，他们的诗歌在艺术上真正的现代性与在政治社会观点上的现代性即革命性不相适应。

二十年代社会主义战斗诗歌的创作者首推斯·科·诺伊曼。他通过自己的《红色诗歌》，向青年诗人指出了通向工人阶级、通向苏联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

斯·科·诺伊曼影响了整个青年一代的诗人。用故事诗的形式来表现社会主义的新的战斗激情的伊希·沃尔克，向他学习了思想的明确性。在诺伊曼和无产阶级诗歌的直接影响下，雅罗斯拉夫·赛弗特和康斯坦丁·比贝尔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弗朗季谢克·哈拉斯和威来姆·扎瓦达二人尽管艺术倾向不同，仍深深敬佩诺伊曼。

比沃尔克大约年长十岁的两位诗人，即约瑟夫·霍拉和英德希赫·霍谢伊希，也接受了无产阶级诗歌的纲领。

约瑟夫·霍拉一八九一年生于洛乌特尼采附近的多布

希尼。他在洛乌特尼采求学的年代，特别是后来在布拉格，就感到了他生活其中的社会的阶级差别。所以他在战争期间创作的、发表于诗集《鲜花盛开的树》中的诗作，已经响彻着社会之音。

他的战斗的无产阶级诗歌主要收集在三本集子中：《劳动的一天》(1920)、《心灵与世界的喧嚣》(1922)和《暴风雨的春天》(1923)。尽管这里反映了诗人动摇于典型的个人与集体成员之间、战斗责任与渴望孤独之间的态度，然而这些诗的战斗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工人阶级的圣母》(见诗集《劳动的一天》)一诗就明确表现了诗人对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心。

从三十年代起，霍拉在诗歌创作中开始了一个转折。霍拉对革命的期望落空，于是日益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创作出马哈式伤感的、纤弱的诗篇(如《风中弦》、《马哈变奏曲》)，然而霍拉从来没有陷入纯诗派那种主观主义之中。尽管不象发展初期那样显豁，但他的诗歌还是愈来愈明确地对社会事件作出了反应(如《寂静的两分钟》表现了奥塞克矿井的灾祸)。

当法西斯危险威胁着祖国的时候，霍拉同那些以诗歌来加强对民族事业胜利的信心的诗人站在一起(如他的诗集《故乡》、《小提琴手杨》、《废墟上的花园》)。

他的小说作品题材同他的无产阶级诗歌相类似：小说《荒年》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一座小城市的情景。编年史体小说《社会主义的希望》记述了一九二〇年的政治

事件。

霍拉于一九四五年逝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英德希赫·霍谢伊希(1886—1941)的诗作，反映了诗人在无产阶级处于青年期的时候的经验，反映了他(不同于文化发达的国家的诗人)在前线、在那个技术进步对他毫无吸引力的国家的生活。

霍谢伊希写过三本诗集。

《广场上的乐声》表明诗人相信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去夺取胜利。诗人这一信念的基础，是他想象中的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团结。

诗集《珊瑚项链》除了第一本集子的主题之外，还表达了诗人对一位患难与共的女性的爱情。

在最后一本集子《白昼与黑夜》里，诗人清楚地预见到那些靠别人劳动过生活的人的毁灭。

霍谢伊希从外文、特别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杰出的诗作，是他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译文也同他创作的诗歌一样，表现了他在掌握诗歌语言财富方面的熟练技巧与罕见的敏锐性。

捷克的散文小说也表现了我国生活、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这一切的反应。这些作品根据其对于记述生活时的准确性、真实性所持的态度和所用的手法，分为若干等级。

许多小说作品仍旧强调要一味表现主人公内在感情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艺术概念与倾向，常常把人的这种感情生

活描绘得完全脱离了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的一切影响，特别是脱离了他作为社会一员的特点。

有时采用以惊人的设想（例如一个划时代的发明等）来表述生活中的问题的乌托邦形式。乌托邦形式的产生，是由于希望解决一些暂时无法通过现实手段来解决的、同现实社会力量不相适应的问题。

散文小说作家中，有些人思想明确、进步，具有革命意识，之所以能达到这一步，是因为他们克服了本身的个人主义。而未能摆脱个人主义的作家，则观点模糊，表现出彷徨与动摇，这些作者经常陷入悲观主义，认为真理要么不可知，要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真理。这在卡·恰佩克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但连他也终于认识到：生活只有两个方面，一面向着进步，向着人类的未来；另一面却力图巩固与加强反对进步的诸种社会因素。当法西斯威胁人类文化的基本价值时，卡·恰佩克决定参加反对世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他为那些不十分坚定和勇敢的艺术家树立了榜样。

两次大战之间，共和国的经济生活被社会动荡所搅乱，充满着危机。这在小说中，特别是强调社会题材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对失业与贫困的震撼人心的认识，是产生某些小说作品的动力，这些作品显示了捷克小说散文的发展道路。

卡雷尔·诺维（1890年生）著有长篇小说《我们要活下去》，这是一篇关于两个无产者（徒劳地寻找工作的建筑工和裁缝）的故事，带有民间叙事诗的情调。诺维在作品中提

供了一幅关于经济危机时期无产阶级的、未加粉饰的贫困的图画，尽管他未直接指明消灭人类贫困的道路。

雅尔米拉·格拉扎罗娃(1901年生)在她的小说《降灵节》中探索这条道路。当然不可能通过个人复仇来解决。先前的女仆弗朗季什卡在完全绝望时就用过这种办法。她所以要嫁给贝斯基达一个年迈的老板作妻子，是为了在她未婚夫惨死之后，为他们俩的孩子找一个合法的父亲。可是当她的丈夫欺骗她时，弗朗季什卡便对他及其情妇进行报复了。

什么是作家作品中常常用批判态度提起注意的生活贫困的出路？只有从革命世界观出发的作家，才能答复这个曾经被我国民族文学的许多伟大代表钻研过的折磨人的问题；只有理解工人阶级作用的作家，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唯有通过革命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建立人类的幸福。

然而仅仅对现实抱着最好最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问题具有理论知识，还不能产生优秀的艺术，艺术家必须找到在艺术作品中表达思想与世界观的方法，必须为新思想与新问题找到新的艺术手法。因此，依靠苏联作家的经验，特别是依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高尔基的作品，对我国先进小说家伊万·奥布拉赫特和玛丽亚·玛耶罗娃有着巨大意义。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新社会，从而为以新的艺术方法逐步创造的新文学提供了基本前提。

高尔基(1868—1936)以其毕生的作品促进了俄国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因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已善于区

分两个互相对立的、截然不同的阶级：穷人的世界与资产阶级、商人的世界。继描写赤脚汉和流浪者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底层》)之后，他又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剧本，在这些作品里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绝境的道路。他的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已有过关于摆脱社会危机的道路即建立新制度的暗示。至于在这一斗争中需要多么深刻的信念，高尔基在长篇小说《母亲》与剧本《仇敌》中已经指出过了。高尔基的其它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描画了革命前夜的俄国生活。高尔基在这些作品中把握住俄国的形形色色事件，不仅塑造了正面典型，而且也刻画了反面典型。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为新制度而斗争的战士。他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列宁》和《好》，是在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鼓舞下，在俄国所取得的革命成果的鼓舞下创作出来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与生活紧密相连，是诗人进行宣传的一种方式。马雅可夫斯基亲自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从而表明，诗人的岗位在人民之中，艺术作品尤其必须表达无产阶级的感情与创造思想。

在其他许多以革命后的生活为创作题材的苏联作家中，我们至少应提到**肖洛霍夫**(1905年生)及其描写顿河哥萨克生活变迁的画卷《静静的顿河》与《被开垦的处女地》、**法捷耶夫**(1901—1956)及其关于苏联新一代的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爱伦堡**等。所有这些作家不仅证明了苏联人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建设新

的苏维埃国家的英雄行为，而且也教育人民以乐观主义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捷克的社会主义作家从苏联作家的作品中认识到文学创作的新方法，这一方法是苏联作家在描画新的社会现实、用社会观点与态度去看待世界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他们对十月革命及其成果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九三四年召开的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从理论上阐述了新的创作方法。这个方法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把苏联文学基本作品的一般的与最明显的特征作为它的主要标志。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作品不能是通过局部典型画面表现出来的被歪曲的生活图景，因为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作者，是从观察现实的未来发展情景的革命世界观出发的。作者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必须具有明确的概念。他必须认识劳动的价值，以便能表达劳动的诗意。他必须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人民在斗争中的助手和战斗工具。于是产生了站在进步一方，即社会主义一方的艺术作品，并以这种党性教育自己的读者。这些作品是为劳动人民群众创作的，所以它在人民群众看来必须明白易懂，当然，这必须无损于它的艺术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为苏联文学，而且为其它文学的作者指出了道路。

玛耶罗娃沿着这条道路，写出了长篇小说《最美丽的世界》、《汽笛》和《矿工之歌》。《无产者安娜》、《栅 栏 里 的 镜

子》和《侠盗尼柯拉·舒海》的作者伊万·奥布拉赫特走的也是这条道路。

捷克小说中的这两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者和经典作家，都是为工人阶级权利而斗争的自觉的战士，是工人阶级的教育者，他们表现了历史的各个发展时期的命运以及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观点。

苏联的生活与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不同，因为捷克文化赖以成长的根基与苏联文化的根基迥然相异，苏联的现实同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现实也差别甚大；所以这种文学创作方法在我国造成的效果也不一样。但这种方法并不妨碍各个作者表现他们个人的才智，所以由具有阶级觉悟的作家创造出来的捷克文学也如此丰富多彩。

伏拉吉斯拉夫·万丘拉(1891—1942)在社会主义作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位莅在拉斯拉夫市的医生是最坚决的反法西斯战士之一。万丘拉作为占领时期一名地下工作者被捕，在海德里赫专权时期①，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遇害，后来被追认为"人民艺术家"。他的文学发展道路非常复杂。其长篇小说《杨·马尔霍乌面包师》展示出一幅人类贫困的图景，这种贫困象狂潮巨浪压在人们身上。杨·马尔霍乌是一个面包师，由于他心地善良，缺乏反抗生活冲击的能力，终于沦为一贫如洗的无产者。他心肠好，对资产阶级世

① 海德里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委派的捷克总督，请参看358页。

界不能适应，因而濒临绝境。万丘拉在他其它长篇小说中也同样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基于对人类贫困的这种震撼人心的描画，更由于万丘拉在艺术语言上所作的创造性努力，这部小说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散文领域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万丘拉的散文虽然感情色彩浓厚，但是颇为难懂。万丘拉非常有效地吸收了民间语言与古代语言，特别是《圣经》用词的特色。这不只表现在万丘拉的词汇上，而且也表现在作家复杂的造句方法上，他的文字的难度因而更大，这从他反映中世纪侠盗骑士生活的长篇小说《玛尔克塔·拉萨洛娃》可以得到证明。这部小说是对自由生活的赞歌，同时又是对那种限制人的社会的反击。他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捷克历史小说《捷克民族历史图》之中，它是万丘拉在占领时期为加强捷克人的力量而创作的。但突然的暴卒使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万丘拉在这部代表他发展顶峰的作品中解决了人民性的问题：与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更显得朴实无华，通俗易懂。

除小说散文之外，戏剧也是我们生活的一切变化的敏感的指示器。民族剧院或维诺堡剧院等大剧院（其重要创始人为弗朗季谢克·朗格），无疑只是偶然上演一点革命的，或至少是进步的作品。大剧院基本上是表达资产阶级社团的观点。这种团体通过预付费用的办法，迫使剧院只能上演供市侩消遣的戏剧，而不去触动他们的宁静与安逸。

戏剧的先导、现代戏剧的前锋，都集中在小型实验剧院和舞台上，其中的维斯科夫采和维利赫解放剧院最为重要。

在导演英德希赫·洪赛尔，特别是评论家伏契克的影响下，它们从无拘无束的大学生中时兴的幽默剧过渡到政治上富有战斗性的演出(如《凯撒》、《破衣烂衫》、《反面与正面》)。布里扬的D 34 剧院也致力于表现新戏剧的特点。这个剧院只上演有艺术价值的进步剧目，演出时强调民族进步力量在其斗争中可以依靠的那些思想。

捷克有一部分文艺批评是文学与戏剧的重要助手和它们的进步倾向的观察者，它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要求来衡量艺术作品，拒绝为艺术而艺术，不愿过分强调形式、强调表现内容的词汇，要求有思想性的、有党的战斗性的、革命的艺术。提出这些要求的首先是经常为兹登涅克·内耶德利主办的《沸腾》杂志撰稿的那些批评家。

兹登涅克·内耶德利(1879年生于利托米什尔)虽在查理大学任音乐史教授，却把大量时间用于传播捷克的进步文化。因此他一直在为斯美塔纳和伊拉塞克的作品而斗争。一九四五年之后，他还撰写过一系列有关捷克文学和文化的文章，既涉及古典作家，也涉及现代作家(如聂姆佐娃、狄尔、哈列克、沃尔克等)，而且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来论述的。他的著作进一步为评介捷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内耶德利总是将他的评价同政治观点联系起来(如《共产党人——捷克民族进步传统的继承者》一文)，他的大型专题著作(如《斯美塔纳》、《列宁》、《捷克民族史》、《民族剧院歌剧史》)同样是从这些政治观点出发的。

内耶德利将他有关捷克文化发展的渊博知识，将大战

前他在加深捷苏友谊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中所表现的坚持进步的精神，用来教育战后的先进青年，教育他们在观点上始终不渝，引导他们进行深刻的自我修养和忠于马列主义学说。

假如说内耶德利偏重于评价历史上的捷克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那么较年轻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则主要是经常考虑沙尔达的启示的皮夏、伏契克和贝·瓦茨拉维克，他们评价了当代文学作品。

伏契克的著作与我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性紧密相连，但伏契克对我国古典文学的进步传统与作品也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我国古代作品中寻找各种现实问题的答案。特别是他在我国民族遭受法西斯直接进攻威胁时期所写的、关于捷克文学史上的重大现象的重要文章，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进步的文学传统。

贝德希赫·瓦茨拉维克（1896—1943）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活动集中在当代作家的评介上，后来则着重探讨当代文学作品的基本问题，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我国二十世纪中叶文学的评论史的研究和初探。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文学从各个方面描述了民族社团的活动，并以其进步作品，对准备在法西斯称霸欧洲时为民族生存而艰苦斗争的那股力量的胜利起了促进作用。

1 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伊曼

（1875—1947）

诺伊曼的作品是从九十年代起进步发展倾向的最突出的表现。诺伊曼一开始就受到资本主义崩溃所引起的思想混乱的冲击，但他一直在设法摆脱，终于在十月革命的正面影响下，创造出对我国现代诗歌直接具有奠基意义的诗作。

诺伊曼于一八七五年六月五日生于布拉格。父亲是律师和议员，但他在诺伊曼五岁时即与世长辞，因此对诺伊曼的教育主要由母亲来承担。诺伊曼早在青年学生时代就同工人接触，并出席社会民主党会议，在审理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青年组织“青年社”这一重大案件时，诺伊曼也被判入狱，在比尔森附近的博利服刑。

诺伊曼出狱以后，有一段时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是一种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对任何制度都加以否定的小市民运动，它是孤立的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反抗。无政府主义思想驱使诺伊曼前往北部捷克，特别是到莫斯特茨科和特普利茨科的矿工中去。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表现是徬徨不定和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持异议。诺伊曼给工人讲课，并为他们撰写小册子。

他决定离开布拉格，抛弃阻碍他直接认识生活的社会团体的不健康环境，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里程碑。一九〇四年，他经过维也纳到达摩拉维亚，在布尔诺附近的热奇科

维采定居，以写作为生。大自然的美，特别是布尔诺周围的大片森林，使他恢复了感受能力。诗人深切地认识了大自然，还饱享了人世的幸福，包括爱情的幸福在内。

在这深邃宁静的森林中，诺伊曼深入考虑过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给政治生活、特别是给捷克民族生活带来的一切启示。诗人在这里加深了对现实的感受，同时清除了曾一度控制他的颓废没落的诗歌的影响。

但在大自然中，诺伊曼已开始重视人用来掌握自然的工具——技术与文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诺伊曼身处前线，后来他将战时的经历写入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战争已抱有反感。在战争进程中，他的政治观点也趋于成熟。诺伊曼认识到，组织在第二国际中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虽然在纲领上拒绝战争，但在一九一四年未能制止住战争的爆发。这样，俄国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的观点，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产生的一切，对他就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诺伊曼期望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将会实现他所想象的没有被剥削者的社会。当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走上相反的方向时，诗人便成为共产党人，并将其全部作品献给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

一九一八年以后，诺伊曼特别是通过他主办的杂志《六月》、《无产阶级文化》和《共产主义评论》，强有力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生活。

这些杂志表明，诺伊曼是渴望写出无产阶级的战斗诗篇的年轻诗人的良师益友。当时翻译出版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也具有重大意义，它正是由诺伊曼主办的《六月》杂志发表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诺伊曼为社会主义诗歌乃至整个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工作。诗人坚决拒绝所有企图使他脱离社会主义诗歌的战斗使命的人，他对无产阶级和苏联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所以他才如此坚决地反对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这位作家访苏回国后向读者提供了一幅歪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画面①。诺伊曼在他的《反纪德论》一书中不仅清算了纪德的观点，而且对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苏联是诺伊曼对未来的信念与希望的泉源，它使他在法西斯直接进攻社会主义力量的时刻，也深信世界进步力量必然胜利。法西斯占领时期诗人留在祖国，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并共同欢庆一九四五年五月红军带来的解放，在他一生的最后两年，还多次呼吁保卫我们的新制度。

"人民艺术家"诺伊曼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布拉格逝世。

诺伊曼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与散文。但其主要部分是诗歌。诺伊曼在他的散文中一方面探讨诗歌与文学的发展

---

① 安德烈·纪德(1869—1951)的《从苏联归来》(1936)和《从苏联归来的修订》(1937)。

问题，一方面就艺术的各种问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他在散文中还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事件表明了立场。诺伊曼对自己、对其他捷克诗人一直强调，应该熟悉那得以在当时政治活动中保持正确方向的社会科学的成果。

诗人诺伊曼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今天收集在《青春与反抗》中的他的第一批诗作，是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诗人在各种文学思潮中徬徨、探索的表现。

这一时期，诺伊曼对社会完全持个人主义态度。这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安排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观点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或者至少是这一反抗的暗示）。这种反抗在艺术上表现为自由体诗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如诗集《魔鬼在我们中间扬名》中魔鬼的象征）。魔鬼的象征并不是从宗教上来理解的，上帝宝座上的魔鬼是被压迫群众进行反抗的形象。这证明，诗人在如何克服自身的个人主义。在这一发展时期的最后，诺伊曼的作品中更经常出现无产者生活的图景和关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的暗示。

诺伊曼早期诗歌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对本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为此他写出了诗集《捷克诗歌》(1910)。一九〇四年之后，诗人曾在维也纳作短暂逗留，在那里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捷克民族的问题，认识到民族生存如何遭受自私的政客的危害。尽管形势未可乐观，诗人对今后的发展仍然表示有信心。

民族存亡和无产阶级群众生活这两个严酷的社会现实主题，在诗人的下一步发展中汇合成为一个主题，成为诺伊

曼战后诗歌的中心主题。

但诺伊曼必须为这种诗歌寻求一条道路，通过更加紧密而深入地面向生活来寻找这条道路。

他的《森林、河流、山坡集》是这条道路上的第一站(1914)。诗人醉心于大自然、布尔诺的森林，这首先是因为诗人能在此处按照自己的心愿完全自由地生活。他在这里的居留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成果，首先是恢复和丰富了诗人的感受能力。大自然的美使他从追求诗歌的辞藻转向生活。诗集的第一首诗《进堂的祈祷词》，就是以表示诗人新的态度的诗句开始的：以生活、欢乐和美的名义。生活的欢乐与美感，是诗人在森林中、在河流和山坡上时充满他内心的两种感受，而大地就是这种喜悦的赐予者。

在布尔诺森林中小住不仅仅给了诺伊曼以感官的陶醉，恬静的诗人还思考着生活的真谛，寻求生活的规律。这一切在《森林、河流、山坡集》一书中，在他各篇诗的艺术方面也表现出来了。这些诗篇画面丰满，同时诗句又极其谨严，很重格律，因而使人联想起伏尔赫利茨基的诗作。诺伊曼将这位诗人视为捷克诗歌最伟大的宗师之一(见诺伊曼下一部诗集中《伏尔赫利茨基的丧礼》一诗)，因为这位诗人同他一样，得到了生活赐予的鼓舞和灵感。

但人的行动也已渗入大自然的寂静之中，所以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先从大自然回复到人，随后又从人转到另一点，即考虑人们怎样以自己的劳动去进行创造，考虑技术和整个文明。这样便产生了他的以歌颂普通人、歌颂文明为标

志的诗篇。

诺伊曼的文明颂诗是他下一部诗集《新歌集》(1918)的核心。这次印行的诗歌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诗人对人类文明的成果，对电话、电报、电灯、印刷机乃至全部技术的赞歌。文明表现最多的是城市。城市中喧闹的生活、广告、马戏杂技、交通——现代化城市的生活节奏，这一切，诺伊曼在其《新歌集》中都作了描绘。

然而人类技术是与生活及生活中的阶级问题相联系的。诗人对此也比以前看得准确得多。

诗人在其诗集中所颂扬的，不是早已注定要灭亡的那个世界的代表，而是新人、"普通人、工人和公民"。对这种生活和这些人物的注意，也就是诺伊曼诗歌的"文明化"，是通过诗句、诗体的变化表现出来的。诗人以自由体诗句表现生活的急剧节奏和紧张性，在这些诗句中诗人用动词，同时使用贴切的词汇来达到鲜明的戏剧性或思想表述上的简明性，使我们能够很快将诗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领会。

诺伊曼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他所谓的"国民战争"时期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以战争的两个公历年份"1914—1918"为书名的集子，书末是对捷克人民未来的乐观主义展望。

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诺伊曼已在他的《六月》杂志上发表诗作，表达了他的日益增长的忧虑：

经历过艰难的生活、冷酷的异邦，

我的心仍然怀着自豪的信念。
我们获得了胜利。热情激荡，
但对那……新的信念，我的心却将枯萎悲怆。

(《叹息》)

在诺伊曼此后五年的生活中，他对于合理制度的信念不断增强，并为这一制度的实现进行斗争。《红色诗歌》(1923)是这种信念在诗歌中产生的成果。通向这本诗集的道路，就是通向工人阶级、通向以科学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诗人意识到，世界正在为争取进步，争取更美好和更合理的制度而进行伟大的斗争。诗人所属的民族，从一九一八年取得国家自由的巨变的陶醉中清醒过来，也同样在经历这场斗争。但诗人大失所望，不禁自问他为什么出生在眼前这个对他如此疏远的民族中。因此他更加感觉到自己是另一个整体的一员，他这样自述道：

我是人类之子，无产阶级的同志，
我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子。
我相信机关枪，相信凿子，
我有一双手，粗壮无比。

(《悲歌》)

他从失望中逐步产生出对世界革命胜利的信念，这场革命也将为他带来新的生活。

但是民族并不统一，被分成两个阵营。

而进步与反动势力搏斗的战场不仅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还包括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同诗人一样，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新的革命思想问题。所以诺伊曼在克服迷惘、怀疑，取得内心斗争的胜利之后，写出了直接呼吁革命的战斗号召。

诗人对革命成功充满坚强的信心，苏联的存在是这一信念的支柱。所以他是对第一个自由的国家、实现了社会正义的国家表示敬意的诗人之一。

一九四五年以后，诗人以题名《1946—1947》的新集子补充了他的著作，在这一诗集里，他特别对我国人民将坚持一九四五年走上的进步道路，表示深信无疑。

诗人还为革命的内容找到了相应的形式。他运用了《新歌集》所取得的艺术经验，并使之更加丰富：采用自由诗句和更富有表现力的诗的手段。在这里，思想上的矛盾——对本民族状况的极大失望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新生活的深刻信念——一方面以赞美诗的形式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又以号召、呼吁和直接呼唤的形式反映出来。

《红色诗歌》今天已成为捷克社会主义诗歌的经典著作，这是诗人在争取战斗的、进攻性的、对世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事物进行无情抨击的诗歌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发展成果。诺伊曼通过这一诗集，赞颂劳动群众是新生活、新制度的创造者。

诺伊曼这本诗集已毫无彷徨与怀疑的成分，表现了对

无产阶级斗争必胜的信心。所以一九一八年以后走上捷克文坛的大批年轻的诗人，将这些诗歌当作自己诗歌创作道路上的指路牌，师法它，依傍它。

一九三〇年，诺伊曼出版了情诗集《爱情》。诗人在这本诗集里不仅集中表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他还意识到，作为个人，他始终是为新世界而奋斗的集体的一员。

《爱情》诗集是捷克文学中最优秀的情诗作品之一，其特点是更加朴实无华，但又更富于音乐性和更加深情洋溢。诗人在诗的结构上又回复到格律诗句。

同时，捷克诗歌却经历着因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而出现的深重危机。许多诗人背离了战斗诗歌的纲领，将自己努力的重心从思想转移到形式。诺伊曼根据自己关于文学与诗的使命的观点，反对脱离沃尔克的诗歌传统，反对诗歌离开战斗阵地，反对纯诗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流派。他主要以苏联诗人为表率。

为了格外强调自己属于这一诗人阵营，诺伊曼将他的一部新的诗集《心灵与乌云》(1935)献给了高尔基。献辞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我唯一的慰藉、欢乐与骄傲是：我和您诗人一起，甚于一切地热爱着解放了的俄罗斯和伟大的苏联，人类未来的解放者。"

这部诗集的创作时间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登峰造极、德国法西斯上台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解体的时期。所以诗人对这一深重危机的一切现象，都表示反对与批评。他写了《仇恨之歌》，抨击一切引起解体的原因和

一切注定要灭亡的东西。诗人反对那些来源于正在解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对人则表示热爱。然而他意识到，这决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对一定的人的爱，对这种人可以而且必须用行动来表示亲近。

这种对于人的热爱与尊敬，是从全世界所有进步人类寄托其希望、也是诗人诺伊曼寄托其希望的那片国土上滋长出来的。《向苏联致谢》一诗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对于无产阶级事业出自内心的好感和对于它必将获得世界性胜利的信心，是这全部充满坚强战斗决心的诗集的基本特点。

诺伊曼在两年之后即一九三七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诗集《地平线上的生活奏鸣曲》。全书分几个部分，是根据音乐的回旋曲——十四行诗组合而成的。诗集的主题是日常生活及其问题。地平线上的生活，指的是同并不存在的超感官的、形而上学的生活相对立的现实生活。

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唯物主义》，诗人在此表达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生活唱赞歌。与浪漫主义者马哈（“我的遥远的道路呵，徒劳的呼唤！”）不同，诺伊曼知道他自己和同志们的道路通向何方：

生活美好，路途迢迢，
任何呼唤都不会徒劳。
疲惫并非城市的耻辱，
背叛与忏悔才遗臭万代，

走倒退之路必受惩罚不可饶。

（《生活》）

诗人歌颂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一切。物质是生活的基础，精神则是物质的表现。诺伊曼根据他的世界观，确定了文学创作者在民族中的地位。他不象浪漫主义者（如哈列克）那样，把文学创作者抬到全民族的其他成员之上，而是平等地将他们列入其中。由这种排列出发，也就确定了文学创作者的公民职责与人的职责。

诗人诺伊曼也愿意以自己的才华和劳动成果，为把人们从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因此写了政治组诗《大陆》。同时他又怀念着正在进行欧洲无产阶级伟大斗争的西班牙。这一斗争也是诗人以及我们全体的斗争。

这部诗集的最后一部分由《老工人》一诗构成。这是用诗的形式同诗人哈拉斯的《老媪》一诗论战。与哈拉斯相反，诺伊曼强调指出，年老不一定也不应该标志着个人脱离集体，标志着孤独、悲伤，而应标志着继续积极参与共同的事业（因为“老工人的手仍然可以制造弹药”，老工人的脚“还乐于走进新世界”）。这首诗是对充满艰苦劳动和伟大信念的生活的赞歌，毫无颓唐悲观之意。

诺伊曼直到一九四五年才得以出版的诗集《难熬的年代》，是法西斯准备进攻我国的时期，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命运的沉重焦虑的表现。尤其是诗集第二部分，都是诗人用以激励自己人民的诗作。他号召人民尽管处在艰苦备

尝的时代，仍应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祖国和历史的理想。

日趋老迈的诗人和他的人民一起，经历了法西斯占领和人性受压的艰难岁月。他这几年所写的诗收集在《恶浊的年代》(1946)中。诗人在诗集的最后一首诗中向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一些证据，以证明他在极端黑暗与暴虐的时期所表现的坚强诚实的态度(见《自豪吧！》)。

诺伊曼的诗歌创作，是以新出版的《红色诗歌》中最后一部分诗篇而告终的。

《光荣归于红旗》一诗是作者用诗的形式写成的遗书，又是杨·聂鲁达的名诗《再向前》的变奏曲。诗人临终前还号召人民保持警惕，准备斗争。

诺伊曼经历过漫长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不仅是指诗人从青年时代的叛逆精神，中经无政府主义，一直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观点；我们从他的诗歌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法演变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青年时代的诗受过象征派和颓废派诗人的影响，到诗人写《森林、河流、山坡集》时才从中解脱出来。力求认识人生规律的热望促使他写出了这本诗集中的一些作品，其结构和音调有时使人想起伏尔赫利茨基的诗篇。在描写文明化的《新歌集》以及其它社会主义战斗诗歌集中，诗人重新运用了次数不等的停顿，运用了能够鲜明地表达现代生活的急促节奏或社会斗争的紧张气氛的种种手法。一些似乎是由无产阶级战斗口号演变而成的诗歌写得精炼紧凑，诗集的思想表现在若干短诗里，这些短诗以戏剧性的节奏

快速达到思想的高峰，成为诗集的中心。有些诗，特别是《红色诗歌》和其它集子中的诗扣人心弦，被拿到工人集会上朗诵。诺伊曼的诗是为人民而写的，所以总是通俗易懂，尽管形式多样，但始终明白如话。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说，这都是富于战斗性的诗篇。

诺伊曼除了诗以外还写散文，但后者只是他的作品中一个陪衬性的组成部分。诗人在散文中阐述他的政治与艺术观点（如《生活万岁！》），或者叙述自己对生活的印象和思考，包括谈布尔诺的自然环境（如《郊外》），谈外国大地风光（《平民之战》、《爱尔巴桑》①、《布拉戈日达》），还有两本捷克斯洛伐克旅游印象记。他的《聂鲁达回忆录》具有文献意义。长篇小说《朵朵金云》描绘他那个时代的流浪汉生活情景，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发抗议社会规章和资产阶级法令。诺伊曼还写过几部学术著作，例如《法国革命》就是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论述的初步尝试。

有些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为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取胜打下了基础，诺伊曼作为一位诗人和战士，正是站在他们的最前列。作为诗人，他在二十年代将整个一代诗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并给他们指出了通向进步的战斗诗歌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将诺伊曼的作品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之作。

---

① 爱尔巴桑是阿尔巴尼亚一地名。

2 伊希·沃尔克

(1900—1924)

在两个世纪之交诞生的一代诗人，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或战后初年登上文坛，他们的优秀代表就是伊希·沃尔克。

沃尔克以一九〇〇年诞生在汉纳地区普罗斯杰约夫，出身于银行职员家庭。他在安宁的市民环境中度过青年时代，诗人的气质主要是他母亲兹登娜培育出来的。

沃尔克在中学学习的时期就不仅显示出文学天赋，而且具有音乐和美术方面的才华。

中学毕业后，沃尔克来到布拉格学习法律，同时把很多时间花在文学上，广泛接触了年轻一代诗人，以及赞同战斗的社会主义文学纲领的老一辈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诺伊曼、内耶德利、霍拉和奥布拉赫特。这个年轻的法学系学生对他们怀着由衷的敬意与深厚的情谊。

在布拉格居住期间，沃尔克看去似乎很健康。可是一九二一年春他初次在海边小憩时，已发现肺病的征兆。到一九二三年，情况更加严重，当时他正住在老家普罗斯杰约夫。当医生诊断结核病菌已侵袭他的两叶肺尖时，沃尔克便到塔特拉山区去治疗。在那里，特别是在波里扬涅茨疗养院，病情时好时坏，从一九二三年十月中旬起，诗人的健康情况日趋恶化，进入了弥留状态。一九二四年初，沃尔克

的父母根据医生建议，决定将诗人接回他出生的城市。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沃尔克在那里停止了呼吸。

沃尔克这位大学生的多方面的才华，十六岁时已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文学方面。沃尔克在其早期试作的诗中，已注意继承捷克诗人，特别是聂鲁达、马哈尔和索瓦的作品，后来还有外国诗人，特别是象征派的作品。但他青年时代的试作，早已具有什拉麦克和诺伊曼诗歌的感人的音调与画面。这些早期诗歌尽情地表现了由于战争结束和生活陶醉而引起的普遍的欢快心情；还表现了诗人们关于世世代代永保和平的信念，但其中有些人认为，新世界可以建立在兄弟般的情谊与谦让的基础上。

这是影响沃尔克诗作的产生，影响他的处女作《宾至如归》(1921)诗集的一些基本的外在因素。然而除了这些表面的时代动因之外，他的诗歌的主要基础是诗人强烈的生活感受。

沃尔克生活在布拉格这座大城市里，在此感到孤独、寂寥，渴望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回到母亲身边。因为她那里，即家乡，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宁静、舒适和幸福的地方。与此相反，城市，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整日耗费着诗人的生命，损害着他的感受能力。

沃尔克以孩子般天真的眼光，观察着这个常常刺伤他的周围世界。他相信一切，并使之人格化。他将最普通的东西(如壁炉、邮筒)当作有生命的东西来描写。认识这些最普通的东西的道路，就是诗人寻求通向世界的道路的

表现。

然而对于人间不平事的认识，终于从这个世界渗透到诗人的生活里。在《归来》一诗中，沃尔克谈到那些不幸的人，他们“为一顿晚餐而使双目失明”，因为分文莫名，无以为生。在这类诗中，人类贫困的概念还只是以一种非进攻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沃尔克还坚信，矛盾（也包括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人们彼此间的爱来缓和。他对生与死的矛盾也持同样看法。所以总的说来，诗人生活其中的世界，目前还是一个和平、舒适、梦幻的世界。所以根据他的稚子般的想象，上帝完全是以一个有人性的慈祥的形象进入这个世界的。但当诗人一朝醒来，在生活中寻找这位上帝时，却完全是徒劳。所以他只好恭顺地请求人们道：

我们请求赐予爱，上帝的子民啊！
——打开你们的心灵之窗吧！

（《乞丐》）

恭顺——这是诗人的基本感情。恭顺还加上孩子般的羞怯。沃尔克将自己对自己的号召写进《降灵节》一诗，并非偶然：“心灵啊！鼓起勇气来，与石块相识吧！”

诗人逐渐成熟，到了作出决定、永远与自己的稚子世界诀别的艰难时刻了。

他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他将体验到痛苦与悲伤，体验到人间的贫困与烦恼，认识到人的真实形象。在那个世界上，他将由一个心地驯良、赞美生活及其恩赐的

人，变成为美好世界而斗争的战士。

沃尔克在创作第一批诗集时，还相信人是善良的，世界可以通过人的心灵与爱而得到拯救。

沃尔克在表现他想象中的诗一般的世界图景时，常常运用基督教神话中的象征，取材于少年时的感性世界。然而在这里沃尔克显得很有特色，特别是使用了非同寻常的观察方法。这尤其表现在对一些东西的称呼上。这些朴素小诗的特点有时近似民间谣曲和民间诗歌。

沃尔克的长诗《圣山》写于一九二一年春，发表在诺伊曼主办的《六月》杂志上。这是证明他的思想已发展到认识同志关系的重要性，并深信个人必须融入集体的一篇诗体自白。

这位“成熟了的小伙子、大学生和社会主义者”经常到圣山——奥洛莫乌茨附近的著名游览地——他的祖父母那里去，与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们聚会，他们已在生活的搏斗中留下伤痕。他们的王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这些青年男子讲述着“俄罗斯和勇敢的列宁”。诗人已不是形单影只一个人，而是自愿加入了新的社团，关于这个集体他写道：

我们是这英勇国土上的战士，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国王，

共同的旗帜犹如黄昏时分的苹果花，在我们上头飘扬。

我在您的圈子之内，就象您口中一块食物，自感舒畅。

我被咀嚼着，吸吸着，渗入到您的血液、静脉、心房……

他的爱情已不是使诗人脱离青年集体的那种感情；相反地，只有在这里，他才学会了认识爱情的真正意义。诗人将爱情与为集体工作联系在一起，爱情又给予工作以新的意义。

诗人对世界的态度的变化，也表现在他的艺术手法的变化上。他的表现手法仍然是朴质的，但已更加丰富，因为他是从比个人角度更为广阔的观点来观察现实的。

二十一岁的伊希·沃尔克已经达到这样的信念：必须抛弃对世界的田园诗式的概念，必须同为变革世界制度而斗争的诗人们站在一起。

诗人思想感情上的这一深刻转变，是在当时的政治事件影响下，特别是一九二〇年与诗人的朋友们的观点相接触时发生的。

那时，沃尔克和他的诗坛朋友开始写“无产阶级诗歌”。作为一个进步艺术家，他不愿站在这一伟大斗争之外袖手旁观。他希望成为这场斗争的宣传者和战友。沃尔克意识到，恭顺和拥抱一切的爱必须代之以革命行动；同时他又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善的爱必须同对恶的抵制与仇恨结合起来，对恶必须进行斗争。不能容许诗人在某个梦境中徘徊，

他必须“从不可信的天国”走到“责任重大的人间”来，所以他的诗歌的注意力现在不仅集中于描绘资产阶级世界的瓦解，而且也集中于用诗的形式表述未来的世界。

于是沃尔克成了一位具有深刻的社会倾向性与同情心的艺术家。诗人通过友谊的体验，加深了对生活的感受。这一切都表现在诗集《生辰》中。

诗人生活态度的这一深刻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手法，即他的诗的表现方法。他的诗中曾经有过的那种轻飘感，已由战斗诗歌的严肃性或强有力的重音所取代。但即使在这一发展时期，沃尔克的艺术仍然保持着近似民间诗歌的特色。他的社会故事诗尤其能证明这一点。

诗人为自己的诗歌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这首先是与劳动人民、与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他的个人命运与幸福是与大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他的爱情幸福，也未曾把他关进个人的小圈子，未曾使他忘记斗争。对于沃尔克来讲，正如他在《大海》一诗中所说的，“世界只属于那些使世界得以生存，并倚仗世界而生存的人”。这首诗的结尾肯定工人是“唯一的现实，最实在的现实”。

对于诗人来说，世界正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分为富人的世界和穷人的世界。

这两个彼此分离的世界的对立，见于《玻璃窗外一张脸》一诗。一个把脸贴在咖啡馆窗玻璃上的穷人的充满仇恨的目光，象利剑一样插入咖啡馆这个安乐舒适的世界。

无产者对其贫困的制造者的仇恨，也是沃尔克的《在爱

克斯光室》一诗的基本主题。爱克斯光透视医生诊断出造成无产者痛苦的许多原因，然而他在最深处观察到的是工人的阶级仇恨。

诗人认清这些现实后发出号召："快把个人痛苦的童话书合上吧！"诗歌的主题应该比诗人的个人生活更丰富一些，因为：

> 现实从各个角度以严酷的目光注视着你：
> 贫困、肺结核、无权、战争、贫困……。
>
> （《快把个人痛苦的童话书合上》）

然而沃尔克对这严酷的生活现实所持的态度从不消极。在《山上的传道》一诗里他直截了当地说：

> 凡是活着的人都知道，
> 世界必须合乎正义。

世界的正义——这是诗人的基本概念。这概念当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而要按照无产阶级的感受去理解它，它将重新出现在他的墓志铭上，诗人在其中自述道：这是一位"诗人，他热爱世界，并为它的正义作过斗争"。

为世界的这种正义而斗争，是沃尔克对现实的态度的又一基本特点。社会制度变革问题在沃尔克作品里多次出现，在《梦的故事》这首诗中表现得最明显。诗中的青年工人杨，梦见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新的美好世界，他决定用实现这个梦的办法来毁掉自己的梦。然而要毁掉这个梦的不

只是杨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无产者，诗人写道：

由血肉筋骨构成的人们，他们创造了世界，
并将它永远继承。
他们要用实现美梦的办法来毁掉自己的梦，
他们不只有颗善良的心，还有那拳头，
铁一般地坚硬。
他们在世上昂首阔步，进行搏斗，
创造自己的幸福。

(《梦的故事》)

沃尔克诗歌发展上的一个特点，是将战斗的主题注入诗歌的叙事形式之中，将迫切问题糅合于情节之中。他本人在一封信上写道："抒情诗所表现的是一种情态，叙事诗则意味着行动。"由于沃尔克对世界的冲突与矛盾的观察与认识，他的叙事诗中出现了争论，特别是出现了戏剧性情节。于是产生了故事诗、新的社会故事诗的形式。在这些诗中，沃尔克有意识地、明显地继承了爱尔本的古典故事诗的特色。一九二三年沃尔克谈到这位诗人时说，对他来讲，爱尔本"关于无产阶级艺术和整个现代艺术的观点，比起所有文笔晦涩、伤感备至、无足轻重的年轻的法国人的观点来，显得更为亲近"。

沃尔克在诗集《生辰》中印有三首故事诗。《未出生的孩子》一诗表现一对穷苦恋人的悲伤，贫困不允许他们为爱情的结晶而欢乐。《梦的故事》则是直接号召革命斗争。在

《炉工的眼睛》里，沃尔克指出一个人怎样献身于大家，在劳动中不惜以自己的幸福和生命作代价，为他人作出牺牲，而劳动的价值是超越一切的：因为“工人可以逝去，劳动却将永生”。故事诗的这一结论，是沃尔克对于个人与集体关系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

在诗人的故事诗遗作中有一首名诗《海员的故事》，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伦理见解，是诗人渴望团结的感情的表现：人的每一项恶劣行为都将受到惩罚。那位海员因为对妻子不忠，对他许诺永远相爱的马赛姑娘不忠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即正如他所抱怨的，他妻子对他也不忠了。

随后，他同伙伴们要从一座灯塔旁边行船而灯塔看守人已死，他就报名接替看守人的岗位，以便用繁重的劳务洗刷他自己的双重罪过。这就要求他注意航行的安全，让灯塔的光芒给海员指引通向幸福的道路，而他的幸福却因为自己的轻率而毁掉了。

沃尔克的故事诗不仅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的顶峰，同时又是捷克诗歌中故事诗发展的重要一环。沃尔克故事诗中的人是与支持敌对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相对抗的，必须依靠、也只能依靠所有受苦人的联合，依靠诗人自愿加入其行列的穷人和被放逐者的努力，才可以粉碎这支力量。

在所有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得到发扬的渴望团结、用行动来改造人、自强不息等思想，表现在沃尔克对待自身疾病的态度上。在这方面他是异常勇敢的。诗人孤独地忍受着肉体的痛苦，但他还指望恢复健康（见《初愈的病人》），甚至

在高烧的情况下还描述了自己的幻觉(见《高烧眼绿》)。《垂死者》一诗写诗人如何向生活告别，他很怕临死时的痛苦，却不怕死亡本身。《世界朝病床沉落下来……》表达了他由于不能与同志们一道参加斗争而感到的悲伤，因为(又如同他在自己的墓志铭中所说的)他不得不死在“他拔剑参加斗争之前”。

沃尔克在创作诗歌的同时还写过小说。在小说中，诗人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说出他在诗歌中所表达的一切。这方面有几个短篇小说试稿和几篇现代题材的童话(如《盗窃太阳的百万富翁》、《扫烟囱的人》)和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极光》。他的戏剧试作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他的纲领性评论文章对了解诗人的理论观点是很重要的。除了已经提到的《无产阶级艺术》之外，还有《平日的与星期日的艺术》以及一系列新书评介，在这些评介中，沃尔克总是能说出某种原则性的见解与论断。

沃尔克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成了青年和工人所热爱的诗人。但在他逝世以后，曾经出现过“别再谈论沃尔克！”的叫嚣。提出这种要求的，是那些背离沃尔克无产阶级诗歌路线，在诗歌中压低战斗之音和减弱革命倾向性的诗人。但是诺伊曼特别捍卫了沃尔克的遗作。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诺伊曼的正确：沃尔克的作品仍然稳固地保持着它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将沃尔克与诺伊曼并列，作为战斗诗歌的首创者，作为日常诗歌的传播者。所谓日常诗歌就是为满足

广大无产者群众的需要而写的，因为沃尔克力图在他们艰苦的阶级斗争中起到引导的作用。沃尔克以自己的诗作给他的朋友们提供了榜样，特别是在社会故事诗方面创造了表现现代阶级矛盾与斗争的新的文学形式。我们今天将沃尔克的作品视为具有社会主义文学根本价值的作品。

3 伊万·奥布拉赫特

(1882—1952)

伊万·奥布拉赫特是带着人类社会一个被放逐和被侮辱者的强烈感情进入文坛的，所以他青年时代的作品就已经表现了个人对集体的反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这种个人的反叛才变得与革命一致起来。

伊万·奥布拉赫特原名卡米尔·泽蒙，一八八二年诞生于赛米里，是那位以笔名安·斯塔谢克为众所周知的律师安东宁·泽蒙的儿子。他的青年时代是在赛米里度过的，那里同时进行着社会的和民族的两种斗争。他父亲在捷克工人与德意志雇主的矛盾中几次代表捷克工人，对儿子有过强烈的进步影响。奥布拉赫特在赫拉德茨·克拉罗维学习期间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布拉格一名大学生发表过一些诗作与短篇小说。

毕业以后奥布拉赫特先后在维也纳《工人报》、《人民权利报》和《红色权利报》（至1929年止）当政治记者。奥布

拉赫特是首批参加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作家之一。一九二〇年，他曾作为它的代表在俄国居留数月，回国后，他以实际行动参加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暴动和筹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工作。三十年代专门从事文学活动，解放后在新闻部和广播电台工作。

根据他一生的著作，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逝世。

奥布拉赫特的文学道路是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尝试开始的，但不久即转向小说。他的第一部作品《愤恨的孤独者》(1913)，讲的是人类社会的被放逐者、流浪汉和生活在人类社会边缘的牧民的故事，他们以仇恨来回答社会对他们的蔑视与嘲笑。

奥布拉赫特第一部尝试性的长篇小说是《最阴暗的监牢》(1916)。小说的名称是很形象的，含有多方面的意义：这里所指的监牢不只是黑暗，而且有妒嫉，但主要是自私。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女人是男人的特殊财产的观点，也被列入这些基本因素之中。

小说《最阴暗的监牢》写了这样一个人，他被关在"自我"这所监牢里面，只是有气无力地拆毁着使他与人类社会相隔绝的围墙。小说反映了普通人的彷徨状态，这种彷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的典型特点，许多过去固有的价值都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发生动摇了。

他的另一部小说叫《演员叶瑟尼亚的奇怪友谊》(1918)，它建立在更多的人物关系之上，对时代的问题干预

也更深。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剧院里，奥布拉赫特善于抓住和表现剧院生活，包括小型农村剧场以至民族剧院。

小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奥布拉赫特强调人有义务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更合正义、更富于人性的世界，以反对战争给捷克人带来的沮丧情绪；而且我们可以看出，他正在朝着努力克服个人主义孤独情绪这方面继续前进。尽管有这方面的努力，尽管刻画了时代的战争气氛（当然始终只是一种背景式的刻画），尽管有几处暗示当时的情况，但这部小说本质上仍然是两个对立的艺术典型和人的典型的心理描述，如同当时的其他许多同代小说家一样。

但是，奥布拉赫特访苏回国之后，他的文学发展就有了新的方向。

这一发展开始于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告文学集《今日俄罗斯》(1921)。这些文章是我国关于苏联的最初的直接报导，曾大大影响了捷克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俄国新制度的肯定态度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奥布拉赫特将他的报告文学作了补充，用《探索之行》的题名予以重版。

奥布拉赫特思想上的成熟表现在小说集《共和前后趣事九则》(1927)中，后来此书出版时改名《曾经发生过的事》。尽管书名上标有"趣事"的字样，但并非幽默，而是讽刺。作家在短篇小说《艾杜阿尔德·日阿卡的生涯》中指出：他从前在日什科夫的好友怎样依靠在军队里告密和反对罢工工人的残酷手段，成为奥地利警察局的成员，这个歹

徒居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①之后骗取了民族的信赖，在新的共和国巩固了自己的官位，因为他善于利用他的恩主对“布尔什维克危险”的恐惧心理。

奥布拉赫特的小说《无产者安娜》(1928)，对现实采取了更自觉的、当时已很鲜明的阶级立场。这是一个来自佩赫希莫夫斯科的农村姑娘的故事。安娜到布拉格当佣人，她在日趋崩溃的市民家庭里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真面目，逐渐认识到这个对她只有蔑视与嘲笑的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认识最初只是本能的、下意识的。但是在托尼克·克罗乌斯基带她去参加的工人集会上，安娜受了教益，认识到生活中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社会阶级，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安娜直接经历了这场斗争的一个部分——社会民主党左、右两派关于布拉格人民大厦的争斗。这时托尼克已成为她的丈夫，他作为最有觉悟的同志之一，参加了这场搏斗和总罢工。安娜亲眼看见，盘踞在鲁多夫林(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议会所在地)的警察，怎样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安娜的发展是同工人阶级的发展，同其他劳动人民的逐步觉悟以及革命左派的形成紧密相连的。

在小说《无产者安娜》中，奥布拉赫特创造了捷克社会生活中两个对立营垒的几名典型人物。这是在对本民族两个组成部分的深刻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托尼克·克罗乌斯基是小说中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

---

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之日。

代表。科尔本采区的充满同志友爱的环境和为争得一块面包而斗争的工人的经验帮助了他，使他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能很快把握住方向。托尼克了解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特别了解其右翼领导企图让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汲取了经验的左翼遭到失败。他是一位工人干部，熟悉工人群众的感情与观点。托尼克意识到，工人阶级的美好未来只能通过严酷的斗争，而不能与资产阶级一起坐在铺着绿绒布的会议桌旁边，依靠谈判来获得。同时他坚信，不斗争，资产阶级决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他用这场斗争教育自己的同志，使安娜也从中受到教益，因为他爱她，要把她培养成这样一个妇女：能始终理解他的政治工作，为了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甘愿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作家通过托尼克指出，这些置身于战士的行列，为更美好、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人的特点，是怎样在艰苦的搏斗中锻炼出来的。

阶级觉悟的提高，在小说女主人公安娜身上得到了更鲜明和更广阔的反映，她从一个贫穷的、深受阶级剥削的农村姑娘变成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年轻妇女，但又不是直线式的自然的发展。安娜的雇主鲁贝什一家利用每一个机会对她进行阻挠和破坏。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无知的被踩在脚下的安娜，才会为那点微薄的工资给他们干活。所以他们竭力使她脱离她从中出身的、按劳动地位说她应该隶属的那个阶级，言过其实地向她描绘大城市的诱惑和危险，也就是利用来到另一个劳动环境的人的狐疑不决。但是这座房子里的另一女仆马什卡在这方面帮助了安娜，教给她

观察周围情况的方法，这表现了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友爱感情的基本方式。托尼克的话语和政治信念、工人会议的发言以及这些会上出现的紧张气氛，使安娜通过自己的天生智慧，认识到真理是在哪一边。从这一认识中形成了这位年轻妇女作为人的自尊心。小说结尾时，她已不再是一个成天战战兢兢地向她所侍候的人卑躬屈节的胆怯的农村姑娘。布拉格总罢工期间，安娜已经作为一位年轻的母亲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她知道，没有她所归属的工人阶级的胜利，就不会有她的人生幸福。现在她已明白，无产阶级必须用打击来回答打击，当达德拉·乌尔邦诺娃——原来的雇主鲁贝什建筑师的女儿，如今的希夫诺邦卡经理的太太——提醒她说资产阶级将要向游行示威的工人开枪时，她面对面地回答她："我们也开枪！"所以安娜在艰难的斗争中称她的托尼克为战斗的"同志"。在这一刹那，安娜不只是预感到，而且清楚地知道，与托尼克并肩战斗是她的职责。她知道，任何时候也不能背叛托尼克，不能因为爱情而使他放弃争取无产阶级权利的斗争。

作为这些正面主人公的对立面，奥布拉赫特一方面刻画了反面人物，另一方面刻画了动摇不定的人物。

资产阶级世界在这里是由鲁贝什一家来代表的。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无诚实可言，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只顾自己。

代表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杨达克虽已认清大势所趋，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为无产阶级斗争而牺牲自己的舒适生活

与高官厚禄，因为他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谋取私利。对于该为右派还是为左派说话的问题，他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随便作出决定，不得不屈服于社会民主党里那些违背人民意志、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右派领袖的敌对性政治压力。在他的儿子耶尔达·杨达克身上，作者暗示了一种波及非资产阶级家庭的深刻的过程。耶尔达与父亲不同，他同左派一道，作为警察恐怖手段的牺牲者倒在议会门前了。

通过《无产者安娜》，奥布拉赫特创造了一部政治小说。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当时的真实材料，画出了二十年代初的工人阶级斗争图景，从而为后代保存了有关捷克工人阶级发展中的一个时代，也就是已经运用俄国无产阶级的初步经验的时代的一些鲜明例证。但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还在于让年轻一代阅读时能认识到：每一项成果，劳动人民生活的每一步改善，都是经过许多斗争，经过许多工人的流血才得来的。

《无产者安娜》与前面提到的作品的根本区别在于，奥布拉赫特试图把它写成一部政治小说。为了表述他对那些不仅牵涉到个别人物，而且牵涉到整个工人集体的问题的兴趣，他得运用新的艺术手法。所以在运用报告文学形式来描述的同时，还用了一些非常富有诗意的写法（如描写安娜的地方）。尽管奥布拉赫特常常不善于把所有因素糅合成一个牢固的艺术形体，但他的小说就其内容和战斗倾向而言，仍然属于我国小说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作品之列。

奥布拉赫特的另一本书是根据作者个人在政治斗争中的经历，主要是根据他在西里西亚的俄斯特拉发监狱的生活写成的，书名叫《栅栏里的镜子》(1930)。这一半是作者个人的自白，一半是他对罪与罚的问题、对在狱中认识的各种人的命运的思考。奥布拉赫特不是以殉道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而是力图通过敏锐的感觉，认清监狱环境的制度，指出囚犯中包括各类人物典型，从失败者、"愤恨的孤独者"到有觉悟的革命者。他们都向作者介绍俄斯特拉发的情况，而奥布拉赫特正是照实说明这个地区的特点的，实况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缺陷都在这里表现得很尖锐。这个制度毁灭着每个与之不相适应的人。奥布拉赫特针对两名俄斯特拉发矿工的命运指出，对于社会施加于人的压力的反抗是多么不一样啊！或者是个人的叛逆，单枪匹马的斗争，这种人注定要失败；或者是被奴役者的共同斗争，这场斗争将另一矿工一直引导到参加共产党人的行列。

在《栅栏里的镜子》中，奥布拉赫特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学作品，使报告文学与其它的文体(日记、叙述、议论)结合起来，因而他才可能从各个角度，带着各种不同的感情倾向，将他认识到的现实告诉读者。在这部作品中，他善于将各种不同因素糅合成一个坚实的艺术整体，这表现出奥布拉赫特的艺术造诣。

一九二九年以后，奥布拉赫特发现一个新的题材领域，那就是过去喀尔巴阡山下的俄罗斯人地区的生活。这块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那里

的人民生活艰难，因为受到捷克人的剥削。尤其是农民党[1]曾千方百计榨取这里的森林资源来入私囊。

外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的生活，给奥布拉赫特提供了创作几本书的题材。

奥布拉赫特第一本关于外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的书叫《无名地》(1932)，一九三五年再版时改名《群山与世纪》。这本书也具有报告文学的基础，实际上是为以后的书作准备的素材。奥布拉赫特在书中指出，这个偏僻角落里的人们怎样过着同几百年前一样的生活，原始的经营方法又是怎样与中世纪宗教黑暗势力有联系。他作为一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修养的人得出结论说，当地居民对于捷克人的反抗，是被剥削人民对于异族入侵者的反抗。

这种现实经过作者的艺术创作意志的深化与充实，成为他对于世界大战结束时和战后初年一位蹊径英雄的生活与行动的描述范围。该书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侠盗尼柯拉·舒海》(1933)。

尼柯拉·舒海是科罗恰瓦地方一个青年男子。他因想念家乡和艾尔日什卡，当了逃兵，回到故乡。尼柯拉实际上过着非法的生活，所以必须不断躲避警方的搜捕，被迫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的绿林好汉，常因饥饿而去抢劫。

奥布拉赫特这部小说里有两条情节线索交错着：一条是尼柯拉·舒海本身的故事，另一条是关于尼柯拉是个顽

---

① 第一共和国时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政党。

强的侠盗的传说。当尼柯拉听人讲述这些传说时，特别是当他想起巫婆预言他枪弹不入时，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在民间故事中，尼柯拉其人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大个子。人民把尼柯拉比作另一位民间英雄奥莱克萨·多夫布什。受到捷克资产阶级剥削的人民把他看作更高的正义的体现者，并相信尼柯拉将为他们争得自由。

尼柯拉生活中的某些事件，使人们更加相信那些认为他神通广大的民间传说。比方说，有一次，尼柯拉眼看就要落到一批捷克宪兵手里，但艾尔日什卡买通了其中一个宪兵，他又脱险了。

尼柯拉轻易不杀人，只是"为了自卫和正当的复仇"才动刀枪。尼柯拉这一高尚的道德观点，使他全然不同于那个只为引起恐怖而嗜杀的兄弟约拉。

宪兵们原来竭力想逮住他，但是徒劳。后来他们作了这样的安排：利用科罗恰瓦人的恐惧情绪，将尼柯拉出卖给他的迫害者。然而活的尼柯拉是没法对付的，于是科罗恰瓦地区当局对他宣判了死刑，但他的乡亲维尔霍维纳人却把他作为领导人民反对权贵的英雄来尊敬．后来只好由科罗恰瓦人来处决他和他的兄弟，其中的两个人——亚当·赫列普达和耶辛柯——用镰刀砍死了他们。实际上尼柯拉和他的兄弟约拉是因被人出卖而丧命的。

在这部小说中，奥布拉赫特成熟的艺术，表现在他用来描绘真实命运的方法上。奥布拉赫特通过两条线索——实际题材与民间传说的题材——的结合，在他的小说中创

造了一种类似民间故事的情调。由于作者以精彩的文笔描写了一幅幅夜景（如尼柯拉来到故乡的村庄一幕，德尔巴克·德尔巴契卡茅屋的火灾）和尼柯拉摆脱追逐者的办法，这种情调就显得更加浓郁了。科罗恰瓦犹太人的生活情景、这位民间英雄的战斗性格本身以及他的超人的力量，都增加了故事的悲壮情调。作者让尼柯拉的生活结束得带有点悲剧性。

奥布拉赫特的诗意的语言，也加强了他的艺术效果。遣词用字、词组搭配（"科罗恰瓦的奶香"，"笔在纸上搔抓"）、句子结构、不落俗套的诗意的画面之运用（"黑暗硬得如同一堆顽石"、"生灵的热血沸腾了"），都使人感到新颖。奥布拉赫特在这部小说的艺术语言方面的努力使他接近了万丘拉。然而他的句子结构不象万丘拉的那样复杂，奥布拉赫特的语言要通俗易懂得多。

奥布拉赫特的艺术语言的重要特色是简练。他也善于以鲜明朴素的语言描述年轻的艾尔日什卡：

"她骑在马上……颈上挂着五排黄红两色的珊瑚。她坐的不是马鞍而是一块花布，身上穿着硬麻衬衣，围着有绣花腰带的围裙，腰带在腰上绕了几圈。她十六岁，黑头发里插了几朵法兰西菊，样子十分俊美。"

作者甚至用希伯莱词语来唤起人们对科罗恰瓦环境的合乎实际的想象。

由于奥布拉赫特在艺术上作出这一切努力，他的《侠盗尼柯拉·舒海》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小说佳作的

行列。

在关于尼柯拉·舒海的小说中，犹太人虽然已是喀尔巴阡山下居民的一个明显的组成部分，可是到作者写三部短篇小说集《山谷中的戈莱特》(1937)时，犹太人才成为他关注的中心。

奥布拉赫特在外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居住期间，认识到犹太人怎样构成了居民中最保守的部分。在《群山与世纪》一书中，他不仅讲述犹太人古老的宗教观点，而且确定了犹太小贩和商人在经济上与社会上的作用。奥布拉赫特尤其仔细地观察了犹太居民的阶级成分，指出贫穷的犹太人民是怎样反对犹太教教士和若干富豪的。这是对现实的一个新看法。犹太人在捷克文学中一直常常被写成富人、工厂主。而奥布拉赫特却在这里向读者指出，即使是犹太人社会，也如同其它社会一样经历着分化的过程。但他们都对耶稣救世主抱有狂热的信仰和希望，对异教徒则充满着轻蔑。

在这个关于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基础上，奥布拉赫特创作了三篇技艺高超的短篇小说：《约尔恰的奇迹》、《米克维事件》和《汉娜·卡拉齐乔娃忧伤的眼睛》。

艺术上最成熟的是第三篇，《汉娜·卡拉齐乔娃忧伤的眼睛》。作者在其中表明，一个村子的两个世界发生冲突时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两个世界是：几乎是中世纪的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世界，和强调犹太民族主义纲领、并带领犹太青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把持的犹太人世

界。后者是富人企图消灭穷人的一个办法，富人把穷人送到别的国土，以缓和自己国内的社会紧张局势。破产犹太商人的女儿汉涅莱·莎法洛娃加入了俄斯特拉发的犹太复国主义村，她虽然避开了喀尔巴阡山下信仰东正教的俄国犹太人的仇恨，但当她爱上不信神的犹太人伊万·卡拉齐乔时，同样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仇恨与蔑视。于是她遇到了度过自己青春的世界和同她的恋人一起认识的世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当恋人来向她的父亲要求娶她为妻时，故事情节达到高峰。为了爱情，他当时不仅要和汉涅莱的父亲作斗争，还必须与整个信奉东正教的村子作斗争。最后汉涅莱虽已身死，仍被开除教籍，以示诅咒，因为她背叛了父辈的上帝。作者以令人信服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普通人与教徒村的僵化的传统之间的深刻矛盾。

奥布拉赫特一生的创作，是以他为青少年写书来结束的(其《古代故事》一书类似以前伊拉塞克谈民族历史的古老故事，此外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圣贤比特巴和他的动物的故事》)。他晚年的另一本书是根据普莱斯科特的《墨西哥历史》加工写成的长篇小说《征服者》，这是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为增强关于暴徒和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而写的。

奥布拉赫特的作品丰富多彩。作者从苏联回来以后，他的强烈的社会感受与青年时期的叛逆性变成了自觉的革命精神。奥布拉赫特叙述了祖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而且他又理解远比他故乡的发展落后的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的生活。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受苦人

身上，奥布拉赫特同他们一道寻求通向美好明天的道路。他通过无产者安娜，在无产者的战斗团结中找到了这条道路。描述个人主义如何转变为同志式的团结，描述这种团结的各种形式，这就是奥布拉赫特毕生的小说作品的主要意义所在。这些作品因其艺术成就而成为捷克现代小说散文的基本作品。

4　玛丽亚·玛耶罗娃

（1882—1967）

玛丽亚·玛耶罗娃通过她的作品证明，她是聂姆佐娃创作传统的后继人之一。她不仅象聂姆佐娃那样自觉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以便更好地了解复杂的生活问题，而且也和我国三月事件之前那些散文经典作家一样，非常关心人及其欢乐与忧愁。她的高深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生活经验，当然还有她所处的时代和正在展开的社会冲突，使她有可能去描绘出发展的革命前景。

玛耶罗娃原名巴尔托肖娃，一八八二年二月一日生于布拉格附近的乌瓦利。三岁丧父（一位屠宰师傅）。父亲死后，母亲和她艰苦备尝，体验到无产者的贫困滋味。她母亲改嫁给阿洛依斯·玛耶尔时，她一家便从布拉格迁往克拉德诺。玛耶尔是当地一名更夫，后来为冶金工人。克拉德诺成了玛耶罗娃真正的家乡。她终日生活在冶金工人环境里，了解了工人的贫困、罢工和大批被解雇的情况。这一认

识促使她直接走上了以马克思哲学为基础的、阶级觉悟的道路。

尽管玛耶罗娃在学校里已表现出她的天赋，但因经济拮据，未能继续上学，只得利用一切机会在空余时间增进知识。家庭的困境，迫使她离家到布达佩斯一位亲戚家当佣人。

玛耶罗娃回来后就读于工人学校和商业夜校。这一时期，她开始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在一九〇〇年罢工运动中支援过工人。

玛耶罗娃从这一工作转到新闻工作，特别是转到提倡妇女运动的文化杂志，并逐步成为《人民权利报》、《红色权利报》及其它一系列杂志的积极活动家。

一九一八年之后，玛耶罗娃成为著名左派文化人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后她成为一名积极的党员。

玛耶罗娃曾多次出国旅行，访问过法国、美国、英国、非洲，尤其是多次去苏联。这些旅行的印象反映在她一系列游记式的小品文集中。

由于她对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立下的功勋，她曾荣获国家奖金和“人民艺术家”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玛耶罗娃写过大量小说作品，那是我国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文学中的基本著作。

玛耶罗娃是以一系列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童贞》）进入文坛的。她的兴趣集中在妇女特别是女工的个人命运上，她们忍受着难堪的社会冷遇，而又必须在这些条件

下生活(如《受难的女人》)，让贫困去支配她们的命运。如同奥布拉赫特一样，她最初的文学生涯也受到本世纪初文学风尚的影响。当然，她那批作品还表现了克服这些影响的斗争。从探索中走出来的道路必然只是一种个人的行动。这些行动正因为只是个人的，所以没有成功。

小说《共和国广场》(1914)表现她已摒弃了狭隘的个人道路。在这部关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长篇小说里，作者描述了她在巴黎的经历，并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大部分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和她一样走过这条道路。他们已认识到社会的瓦解，但又找不到摆脱这种衰退的出路。俄国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鲁卡·沃尔辛①在巴黎的政治彷徨，反映了作者自身的许多经验。这部小说可说是作者走向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映。

长篇小说《最美丽的世界》(1923)是清算这条道路的最明显的证据。小说的主人公莱恩卡·毕兰斯卡，是一个没有知识、行为放荡的农村磨坊租用人的女儿。因为家庭气氛窒息着她的求知欲和认识生活的愿望，她便逃往布拉格她姐姐玛丽亚家。她在布拉格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在政治上受到教育。有一次，她在野战医院遇到她青年时代的朋友罗曼。他为她打开了观察新世界的视野，向她介绍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教育她深入思考我们生活中的阶级问题，争取她为建设最美好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而

---

① 《共和国广场》一书中的主人公。

工作。在他的观点的影响下，莱恩卡批判地接受了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国家政变，并为争取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

小说原来是让女主人公在这次斗争中死于枪弹。经过修改后，悲剧性的死由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所取代：莱恩卡伤愈，重新投入争取最美好的世界的斗争。

长篇小说《最美丽的世界》是第一次以小说形式描绘我国一九二〇年的政治事件。同时，玛耶罗娃在小说里善于描绘从战前到我国独立的头几年农村阶级矛盾的增长。

《最美丽的世界》这部小说，代表着玛耶罗娃在探索她独特的主题与表现方法时期艺术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高的阶段。

她的带有抒情色彩的散文集《来自草原与森林》(1919年；后来经过增补，以《我的祖国》为题出版，现名《故乡寻访记》)也写于这一时期。通过这本书，玛耶罗娃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所继承的斯美塔纳遗作[①]中的捷克特点，以及她对战争结束后世界的社会变革的信念。

玛耶罗娃参加了一九二一年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妇女代表团成员到莫斯科去参加会谈，这次逗留对于她在《最美丽的世界》中所表现的思想与艺术发展有着根本的意义。

对苏联现实的认识，加强了作者创作一部关于无产阶

---

① 指作曲家斯美塔纳的交响曲《我的祖国》。

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意图。小说《堤坝》(1932)实现了这一意图。《堤坝》的基本主题是布拉格的革命问题，但这场革命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对手的艰苦斗争，实际上是通过计谋来实现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们在布拉格散布一种说法：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的堤坝是用次等材料筑成的，所以到了汛期会被冲垮，布拉格将遭水淹。资产阶级为此惊惶失措，临时工人政府便乘机掌握了大权。这种解决办法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个思想上的缺点随即带来艺术上的缺点——缺乏说服力。与此有关联的是小说采用了乌托邦的形式，当时这不仅流行于世界文学，而且在我国也很受欢迎(如卡·恰佩克)。类似这种乌托邦式的解决办法，我们也许可以部分地用当年的政治状况来加以解释——鉴于当时的形势，作者根本不可能用别的方法来写作。当然，这部小说有些特点，如情节紧凑和富于诗意的写景，都证明玛耶罗娃在艺术上有进一步发展。

作者在艺术上的进一步成熟，很快在技艺高超的长篇小说《汽笛》(1935)中表现出来了。

这实际上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的主线，是叙述在克拉德诺由农业区变为工业区的广阔画面中霍德茨一家的命运。作者在小说中指出，地区特点的变化如何影响到人们性格的变化，小说主要描绘克拉德诺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

发明家霍德茨，原来是公爵的森林里一位很有技术才能的烧炭工，是霍德茨家族第一代的代表。资本主义的雇

主不打算重用他的才能，而是要使他丧失才能。这使得霍德茨极为不快，后来导致神经错乱。他的儿子风流汉贝培克在克拉德诺工作时已是克拉德诺钢铁厂大发展的时期，可干的活儿到处都是，所以工人收入不少。他们中间有些人象花花公子似的，有时在小酒店将自己的工资挥霍殆尽。贝培克也是这么生活的。他的妻子霍德佐娃出身农村，她反对他成天泡酒店和追逐别的女人，但是无效。在他悲剧性的死亡之后，她只得独自照看自己的孩子，抚养他们，教育他们热爱劳动，做个诚实的人。

孩子中最顺利的要算儿子约瑟夫，他就是小说里所谓的"警察"霍德茨。这个霍德茨在劳动集体中（当时一位因为向无产阶级散布自由思想而被开除的过去的教员卡德夏贝克也在其中）已经意识到，雇主们使用多么不光彩的手段来竭力摧毁工人阶级的意志。他亲身体会过这一点：工厂发生事故之后，一个工程师要求他按照雇主的需要来叙述这一事故的经过。当他拒绝背叛工人阶级的团结时，便被资本家列入黑名单，因而不得不到国外奥地利的施特马克和美国去寻找工作。回国以后，也只能在克拉德诺附近找个临时工作糊口；他用很多时间从事工人运动，在克拉德诺的劳动人民中帮助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关于他和他的同志们的工作成效如何，克拉德诺劳动者的阶级觉悟是怎样提高的，我们可以从克拉德诺两次罢工的比较中看得最清楚。玛耶罗娃认真研究当时的材料之后，根据自己的回忆在《汽笛》一书中对这些罢工作了生动的描绘。一八八九年

的罢工还只是克拉德诺无产者一次自发的运动。他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所以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一九〇〇年的罢工则不同，它已经是为争取工人阶级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在组织上已经有了明确的领导，并且依靠了同其它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团结。

玛耶罗娃从艺术上描述了克拉德诺无产阶级的命运，并善于通过这些描述来指出，没有组织的劳动群众是怎样由于阶级觉悟的逐步提高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作者基于对克拉德诺的阶级斗争的深刻认识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而得到任何东西，一切都必须通过斗争。

玛耶罗娃在她的小说中（也可说是全部现代捷克小说中）一个最生动的人物霍德佐芙卡①身上最清楚地表明：组成工人阶级的这些个人在这次斗争中应该怎样坚定不移才对。

霍德佐芙卡是农民的女儿，她体现了全体农村人民数百年来的智慧、坚强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她非常能克制，富于牺牲精神，但又很有主见。在婚姻上她很不如意，贝培克死后她的境况也未好转。她勉强地忍受着丈夫的任性，为了抚养和教育孩子，她不得不与生活搏斗。贝培克在钢铁厂一次不幸事故中死去之后，她必须千方百计使自己和她的孩子摆脱生活的贫困，她的生活充满着折磨、痛苦与不幸。

生活如同千斤重担压在霍德佐芙卡身上。有时教人感

① 霍德佐娃的爱称。

到她将被这重担压垮，但她重新挺直了腰杆，没有陷入绝望；相反地，她还有足够的力量帮助别人振作起来。例如对那些在罢工时期失去耐心的钢铁工人的妻子，她善于使她们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抱有新的信念。她这信念也包括在整部小说的结束语中：总有一天，水也会流到我们的磨坊里来的。她在一九一八年春寄给前线的孙子（即约热克，或"警察"霍德茨的儿子）的信中，也表达了她认为战争将很快结束、工人将有美好的生活的乐观主义信念。

在这个完美的人物身上，玛耶罗娃表达了她对所有工人的妻子的感激之情，这些无名女英雄以自己的坚强和信念，在面临着与强大的资本主义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困难，处于绝望边缘时，支持了她们的丈夫。

玛耶罗娃在刻画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时也显示了同样突出的艺术特色。她通过刻画这些人物塑造了鲜明的工人典型，借助于她的诗人想象力，根据作者在许多克拉德诺劳动者和他们的妻子身上认识到的性格特点，塑造了一些实际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新人物。但这些人物是在深刻认识克拉德诺生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所以很生动，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看作正面形象，因为作者有意识地将工人阶级成员的正面特征集中到他们身上。"警察"霍德茨就是一个正面主人公。但最符合这一特征的还是霍德佐芙卡，我们有理由把这个艺术形象与高尔基小说《母亲》的中心人物[1]相比拟。

① 指母亲尼洛夫娜。

玛耶罗娃在她的鲜明区别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特点的作品中，在反映克拉德诺经济与政治生活变化的富有表现力的画面上，显示了她高超的艺术技巧。同时，为创作小说的这些局部画面，作者使用了(与画面的不同特点相协调)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叙述手法。除通过对话来描述戏剧性地突然发生的过去情节(如《发明家》一章的导言部分)以外，玛耶罗娃还运用了记述的形式、新闻报道形式(如谢列克编辑的新闻报道)、编年史形式(英特拉·克莱恩矿工的回忆录)，乃至书信形式(克利斯丁杨·里恩兹、工人杨·切尔尼、霍德佐芙卡)。这种文体形式的交替变换，提高了《汽笛》的生动性和艺术效果。

玛耶罗娃的语言技巧也是她文体技巧的一个组成部分。玛耶罗娃不仅善于用色彩鲜明的语言来表现时代和环境，而且用以区别各种人物。在克利斯丁杨·里恩兹的信里有一些古词语。玛耶罗娃主要在刻画霍德佐芙卡时善于运用方言、各种俗语与谚语(在这一点上有点象《外祖母》)，以这种独特方式吸取了深刻的方言俚语中包含的民间智慧。为了表现捷克人聚居的美国环境的特点，作者运用了捷、美混杂语中的行话。

克拉德诺方言在小说中也被用来作为描写失业工人切尔尼的特殊手段。这种方言的运用，尤其系统地表现在克拉德诺的劳动环境的描写上。除这些个别词汇之外，玛耶罗娃还使用了词组(如“行贿”称“羊税”)或整个民间俗话(“谁是克拉德诺的冶炼工，他就是个大肚饭桶”，指饭量

大)。

自然，玛耶罗娃也相当频繁地使用矿工和钢铁工人的专门名词。

作者总是根据一定的艺术目的来运用所有不同的语言手段。例如，在经理巴赫尔的语言中用上几个被歪曲的捷克词汇，从而使这个人物与捷克环境的特点显得极不协调。

玛耶罗娃的《汽笛》是我国当今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经典作品。无产阶级的克拉德诺的现实是按照它的发展来写的，其证明就是小说的题材具有广阔的时间距离。劳动者的诗渗透着整个作品(如《十字路口的一个劳动班組》一章)，作品也贯穿着党性，因为对一切事都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评价的。与这党性相关联的是小说的教育使命(作者希望通过对过去工人阶级一代生活的认识，来影响自己同时代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提高)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乐观地看待无产阶级的未来(尤其是霍德佐芙卡，部分地还有她儿子“警察”霍德茨的乐观态度)。

由于所有这些优点，这部小说被广泛阅读，并被译成俄、德、波等多种外文。

《矿工之歌》(1938)则是这部小说的自然的继续。

这是一篇关于霍德佐芙卡的儿子之一鲁德尔的命运的故事。读者在《汽笛》中已经认识他。矿上的比列克让他学会了采矿。

在《矿工之歌》中，我们认识的鲁德尔 霍德茨已经是

一个残废矿工，只有当乞丐这条路可走。几年前他在家乡被列入黑名单，所以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他不得不悄悄地逃往德国，用杨·兹沃纳什的假名生活下去。他的女友米尔卡也到那儿去找他。

他在德国享受了幸福，也饱尝了贫困，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一九一八年，当德国战败之后出现内部斗争时，鲁德尔决定回自己的祖国。在新的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他和他的一家很快就认识到严酷的现实。最初鲁德尔·霍德茨和他的儿子们在拉柯夫尼克矿井劳动，可是矿井很快被采掘殆尽。矿工们失业，霍德茨一家惨遭恶运，陷于贫困。后来别无他法，只得去当小贩，叫卖扣子、鞋带，最后甚至行乞讨饭。

玛耶罗娃通过鲁德尔·霍德茨的生活经历，将霍德茨的家史一直叙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时期。

作者通过小说中紧凑的情节、起伏跌宕的戏剧性和惊险紧张的故事，描绘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矿工贫困图。整个故事的基调忧伤感人，这一点是借助于主题的特别的表现手法达到的。小说的三个篇章在风格上彼此截然不同。作者关于霍德茨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客观讲述，构成这几章里最中心的一章。与此相反，首尾两章尽管完全客观地描画了现实，但用的却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方法，如鲁德尔·霍德茨的回忆就是一种内心独白。又如第三章是他的妻子对老霍德茨的朋友米尔法特的叙述。这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当时有一位参加者是沉默不语的，那就是米尔法

特，他虽然在场，但一言未发。然而米尔卡在讲话中注意到了他的在场。从米尔卡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讲述是怎样对沉默不语的米尔法特起着作用。作者通过这种手法使得描述极为生动。这样，不管是霍德茨还是米尔卡说话的方法，都是表现他们特点的重要手段。

一九四五年以后，玛耶罗娃的小说创作集中写占领和建设的主题。属于这类作品的首推短篇小说集《闪电之路》(1951)。在这部集子里，作者讲述了占领时期的、解放斗争中的以及我国人民建设初期的事迹。全书是以书中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命名的，在这篇作品中，玛耶罗娃叙述了兹林水力发电站被春天第一次暴风雨的闪电毁坏以后，人们怎样用英勇的劳动去加以修复的情景。

在作者的国外游记(如《非洲的时刻》)中，关于苏联的报道尤其具有纪实的和艺术的价值，她第一次访苏后，出了一本《革命后的日子》。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访问苏联朋友的印象，收集在《苏联上空一万里》(1948)中。她带着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深刻理解，写了一本短篇报告文学集《歌唱的中国》(1954)。

玛丽亚·玛耶罗娃为各种年龄的青少年撰写的作品是她毕生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罗宾松卡》最为成功。作者用作品教育年轻人象生活所严格要求的那样积极投入生活，尊重体力劳动和培养责任心。

玛耶罗娃一生的作品非常丰富．她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热情地对待贫穷者与低贱者，为他们作为人

的和阶级的权利与要求而斗争。由新闻转向小说创作的玛耶罗娃很清楚地知道，每个作家都必须为某种事物而斗争。有一次她谈到她的一本名为《工场一览》(1929)的作品时，表述了她任何时候也没有背离过的纲领："我为革命而斗争，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争取新的社会生活组织时唯一可行的道路和新文化、新艺术的基础。"

5　卡雷尔·恰佩克

(1890—1938)

卡·恰佩克属于这一类捷克作家与世界作家：他们善于将人类对技术发展与滥用的不安情绪表达出来。他那建立在锐利的理智上的批判立场，促使他在生命终结之前清楚地认识到威胁人类文明的危险来自何方，并号召人们为反抗法西斯进攻而拿起武器进行自卫。

卡·恰佩克于一八九〇年诞生在捷克东北部一座矿工小城玛列·斯瓦托尼奥维采。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主要为《人民报》撰稿。他和他的哥哥、画家约瑟夫·恰佩克合写过几部作品。约瑟夫在法西斯占领后期死于集中营。

恰佩克兄弟的早期文学活动，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流派的影响。卡·恰佩克早在他的文学活动初期，就揭露过周围生活中的矛盾与缺点。例如他善于描述布拉格城郊的可怕的

贫困，却不能指出改变这种贫困的道路。

他的早期文学创作充满悲观主义情绪。他的短篇小说的经常性主题，是描写一个违背本人意愿、无法顾及自己的利益与爱情、终日为生活而辗转奔波的人的命运；或者使一个人陷于可恼的迷惘之中，而这种迷惘是恰佩克力图解决但又总是解决不了的。后来，转到现实生活中去解决这种疑惑，便成了他的著名侦探小说的主题。

恰佩克预感到技术在社会统治者手中可能朝着有害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他已经看出这一点，并意识到企图制止这种现象的人们的斗争很不完善。他这个预感使得他在有些长篇小说里用空想的形式提出警告，如同亚库普·阿尔贝斯一样，恰佩克在他的长篇小说(如《专制工厂》、《炸药》)里甚至还去解决现代技术领域内的问题。然而与阿尔贝斯不同的是，恰佩克总是把那些一直折磨着他的恼人的问题摆进作品里。他意识到，现代技术已经进入死胡同，而人的脑力劳动的成果又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与原因。因此，在关于发明可怕的炸药的长篇小说《炸药》里，恰佩克规劝那些发明家不如放弃这类研究，去从事一些有关改善人类生活的细小的发明；同时恰佩克不相信革命，因为他害怕革命所招致的后果。他深信，革命的结果可能是不肯定的，革命后也许山河依旧，毫无变化。

恰佩克深知社会的弊端，他热爱人，但这种爱是抽象的。他不是从实际存在的人、例如从工人的立场观点出发来评判世界与现实，而是设想出一种非现实的、一般的普遍

公民，并要求社会按照这普通公民的利益逐步改进，这也是恰佩克（尽管他同情失业者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难儿童）实际上在捍卫第一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所在。就这一点而论，恰佩克与玛耶罗娃或奥布拉赫特相比，完全站到另一个立场去了。然而和他们一样，恰佩克也解决了一个如何使文学对尽可能多的读者来说通俗易懂，如何使它成为改正所认识到的缺点的有力手段的问题。他熟悉人民的生活、工作、娱乐以及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一切，他的作品的这一功能，正基于他对人民及其生活的透彻了解。此外，恰佩克还拥有卓越的叙述才能和运用生动的民间叙述手法的能力，这在他的童话里也可看出，比方说，他竭力利用童话的故事情节来说明现实生活中一些最常见的现象（如《为什么狗要叫唤，为什么它嗅觉灵敏》等）。

善于抓住生活中最细微的东西，也是恰佩克的技艺高超的游记小品的特点。在这些游记里，恰佩克善于以独特的手法，描绘出其他各族人民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与生活（如《英国书简》、《西班牙纪游》、《北方之行》）。

与恰佩克作品的思想基础以及他对生活的态度有关联的是他另一个显著特点：力图从多方面观察一件事。恰佩克认为，可以认识的真理不止一个，我们从多少角度来观察事物，可认识的真理就有多少。恰佩克对现实的这个哲学态度（所谓相对主义），主要反映在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霍杜巴尔》、《流星》和《平凡的生活》中。比如恰佩克在《流星》中指出，各式各样的人（护士、预言家、医生和诗人自己）怎

样根据自己的可能，竭力为一位同飞机一起坠地、一直失去知觉躺在病床上的飞行员重新安排命运。

恰佩克的戏剧也和他的小说一样从同一观点出发，来研究类似的问题。例如，有两个主要的话剧就表现了他对过高估计技术的批判态度：《万能机器人》与《昆虫生活》。

即使技术继续发展到完全由机器操作代替人的劳动，戏剧《万能机器人》还是对人类的这种未来表示忧虑。恰佩克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些名叫罗博特的机器人，他们与人不同的是没有感情。这些机器人代替人来从事劳动和战斗。后来他们把武器对准人，毁灭了一切，连设计师阿尔奎斯特也不例外。机器人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他找到生产那些已与人们同归于尽的机器人的秘密。经过多年试验之后，阿尔奎斯特看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幸而在试验过程中，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产生了感情——爱情。机器人这才成了真人，生活的车轮也重新开始转动。人造生物的伟大发明者实际上无能为力，对生活毫无帮助。

卡·恰佩克与约瑟夫合写的《昆虫生活》一剧，对当时的生活作了更严厉的批判。一个名叫流浪汉的人注意到一群虫蚁。蝴蝶专心致志做恋爱游戏，屎壳郎自私地滚动着它的家当小圆珠，蚂蚁的生活充满着连续的战斗。恰佩克让各类昆虫模仿人类社会的各种生动的典型，流浪汉在这些昆虫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但是徒劳无功，正如恰佩克自己无法找到它一样。当他把流浪汉派去跟伐木工人一起劳动时，作者才以新的形式减低了他这部戏剧的悲观

调子。他想以此证明，只有在为集体的劳动中才能拯救人们。

欧洲和世界的事态发展表明：恰佩克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法西斯上台以后，恰佩克开始意识到，这种残暴不仁的制度威胁着文明和他为之奋斗的民主与人道主义。那时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转折。他认识到不能宣扬一种笼统的、一般的人道主义，必须将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这个严重威胁。恰佩克的《第一救生队》就是他思想中这一变化的初步迹象（这一点伏契克已经察觉到了）。这是对于人们在井下遇难时的团结友爱精神的一曲颂歌。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新的主人公——矿工。大学生斯坦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们非常熟悉。这部作品正是一个例证，可以说明恰佩克认真思考过个人同社会的关系，力图从孤独中摆脱出来。

从《第一救生队》起，恰佩克的斗争性日益加强，在法西斯主义危险增长之际更是如此。面对法西斯和它所倚重的强权与暴力，恰佩克以自己的小说《鲵鱼之乱》向人类提出警告。在形式上，他又运用了幻想的手法，可在思想方面却是非常明确的。

鲵鱼的情况也同机器人一样。人为了追求利润和享受，把鲵鱼当作劳动力来养殖，却不知道为了使鲵鱼不致对人类构成极大的危险，就不得超过一定的限额。人出于天生的贪财之心，把鲵鱼武装起来，教会它们掌握技术（正如西方资本家武装希特勒纳粹分子一样），而最后鲵鱼却与人类

作对了。它们组织起来，向人类提出要求，鲵鱼头目用它的嘎嘎声在广播里号召人类为鲵鱼服务，向它们提供所需物品，与它们友好相处。它的号召以“你们将和我们一道为毁灭旧世界而工作”这句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鲵鱼之间发生了不和，这与人类的民族主义相类似。鲵鱼的统一体开始瓦解，从而出现了人类战胜鲵鱼的希望。恰佩克在他的小说里讲出了明确的观点：资本家们为了拯救自己而支持鲵鱼。

在一篇未广播成的讲话稿中，恰佩克就那种认为他所写的是一部幻想小说的论断表示意见，他说：“这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臆测，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的反映。”情况就是如此，这我们不仅从小说中讲述瓜分鲵鱼辛迪加——经营鲵鱼的资本家协会国际组织的利润的那些章节里可以看到，而且从企图在国际范围内解决鲵鱼问题的各种国际会议中也可看到。恰佩克描绘这些活动时的讽刺语调表明了他的一个信念，即认为这种国际会议只会掩盖现实，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支持法西斯的。

恰佩克又在他的下一部反法西斯作品里对人类发出警告，唤起人类的良知。这就是他的剧本《白色病》(1937)。

一个对本民族拥有无限权势的元帅，用强硬手段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他得了一种神秘的恶性的白色病，国内最大的医学权威企图制止这种疾病的传播，但是白费气力。他们不知道病原，所以无能为力。只有一个人——加伦博士懂得医治这种病，但他对元帅提出放弃战争与暴力作为治

疗条件。元帅拒绝这一要求，直到病情严重恶化时，才答应了他的条件。可是当加伦博士把药送到元帅府时，却被一群狂热分子所包围，这些被元帅的战争宣传煽动起来的狂人歇斯底里地喊叫着要战争，当加伦高呼反对战争要求和平时，竟被这群人打死了。

该剧就以这位能够反对时代潮流的人物的毫无出路的悲剧性之死而告终，以拯救人类免遭死亡威胁的人道主义者之死而告终，加伦作为被元帅的战争狂煽动起来的人群的牺牲品而死去。

因为恰佩克尚未成熟到能明确地认清现实，他还过分相信人的温良敦厚，相信有可能同他所十分蔑视的人们达成协议。

为了从自己的思考中得出明确的战斗结论，恰佩克还必须通过对新的暴力行为的认识来确立这样一种信念：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不能考虑温和的办法。

这一认识表现在他最后一个剧本《母亲》中。

恰佩克相信和平，宣扬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处，从不隐瞒自己关于只有在和平基础上才能解决民族之间、社会阶级之间的一切纠纷的信念，所以他是一个反对战争的人。

他的反战理由不少。这是通过这一剧本的主人公之口讲出来的。生命的赐予者——一位妇女在同她死去的丈夫与儿子们的对话中一再列举种种理由，只求保住她最后的儿子东尼。

这位悲痛欲绝的母亲生活在一个离作者很近的不点名的国度——恰佩克显然是指西班牙。在她国内，人们形成了自己一套关于荣誉与勇敢的观念。为了这些，他们把"民族"当作口头禅，不仅在海外为侵略政策服役时，而且在热带地区的科学试验中牺牲了生命。恰佩克给剧中的母亲取了个象征性名字，叫多罗列斯，是"痛苦的"之意。她每逢人家提起"民族荣誉"这一动人的观念，就不得不交出自己一名亲骨肉作代价，一次是丈夫，另几次是儿子们，结果她只剩下最后一个家庭成员东尼了。

她为了争夺东尼而与死去的家庭成员作斗争。这些死者常常在她极度孤寂的沉思中来访问她。恰佩克按照他们在世时的本来面貌把他们带上舞台。母亲在与他们对话时看到了大受赞颂与尊敬的英雄行为的真相，认为这种行为有时（象她丈夫死去时的情景那样）是白白的丧命。母亲对男人的荣誉感有她自己的看法，后来她与他们对抗，维护着她最后的儿子的生命，这个儿子要求作为志愿军报名入伍，以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进犯。

在这位一心沉溺于母性感情的母亲看来，就连民族自由受到威胁这件事，也不能成为同意东尼投军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必须来一个更深刻的震动，让她认识到：别的母亲也在失去自己的孩子。例如一位女广播员，在敌人的鱼雷击沉了船舰、有四百名海军学生遇难的事件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又如乡村的母亲们，敌人用炸弹炸毁了那里的小学，用

机枪扫射了她们的孩子。

直到她看见敌人在杀害孩子们，杀害不能自卫的小小孩子们时，她才作出了重大的决定。母亲从墙上取下枪，做了一个明确有力的手势，说了声“去吧！”，就把枪交给东尼。这一瞬间，她死去的亲人对她表示赞许。

母亲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也就是卡·恰佩克的斗争。他投入反暴斗争的决定，给许多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他这一决定是经过长期考虑，经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才作出来的。在未来的年月里，在纳粹侵入我们祖国，民族和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死存亡考验时，母亲的（也就是作者自己的）这一声“去吧！”，就是诗人对于自己民族的遗愿。

人民的权利不管在什么时候遭到威胁，都将响起恰佩克的这一声“去吧！”

于是恰佩克便加入了进步的反法西斯战士的伟大行列。

恰佩克一生的作品以《母亲》为顶峰，他除了以上提到的长短篇小说和戏剧之外，还有一系列著作细致地记述了作者最亲近的人的事情，他关于捷克语言的论述尤其精辟。恰佩克是捷克语言的伟大爱护者与宗匠。他对大众捷语的知识特别深广，他善于用来描写各种情节、环境与典型的捷克小人物，尤其是各类小知识分子。

恰佩克的作品闻名于全世界。直到今天他的许多作品仍然很有现实意义，能唤起某些人的良知，他们甚至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还不明白为什么当年有过斗争，而且现在仍要斗争。

6　尤利乌斯·伏契克

（1903—1943）

一提起伏契克的名字，就会使人联想起一位善于在占领时期的艰难条件下反对法西斯暴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一位在这斗争中英勇牺牲自己生命的进步的共产主义新闻记者的形象。

伏契克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布拉格。父亲是斯米霍夫林柯费尔工厂的工人。一九一三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伏契克一家迁居比尔森。伏契克在该地上中学。他当学生时博览群书，不仅读捷克作家特别是聂鲁达、捷赫、伊拉塞克的作品，而且还有世界主要知名作家的作品。

比尔森的居留对伏契克来说很重要，因为年轻的学生在这里熟悉了无产阶级的环境，开始有了阶级觉悟。

他十九岁时为比尔森的报纸写过关于捷克文学、特别是关于沃尔克和年轻的捷克诗歌的短评。

他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哲学，常和进步青年的代表在一起，与杨·史维尔曼以及伊万·塞卡尼纳合编大学生与工人的杂志《先锋队》，并随即开始给《红色权利报》、它的文化专栏以及《红色晚报》撰稿。有一段时期他编过进步出

版家的杂志《树干》，它主要是为一部分出版家所出版的图书做宣传。当他认识到自己的观点不能在该刊发表时，便退出了编辑部。

伏契克在《创造》杂志社的编辑工作对捷克文化很有意义。这个杂志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党刊物被封闭之后，沙尔达交给他经办的。伏契克成功地把《创造》杂志办成了一个有趣的、通俗易懂的杂志。在撰稿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最优秀的捷克青年记者的名字。

伏契克首先愿意献身于文艺评论，所以他注意学习文学著作以武装自己，但是政治形势使他承认必须献身于共产主义新闻事业，同时他一直关心着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生活。

一九二九年，伏契克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新闻记者参加捷克北部的矿工罢工，为罢工工人出版地下杂志，以其关于捷克北部矿区的惊人贫困的报道，促进了其他劳动者与罢工矿工的团结。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收集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代报道集》一书里。

一九三〇年，伏契克作为工人代表团成员首次访问苏联。他力图认识苏联，并将它的真实情况告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当时我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有意散布关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实之辞，以便使苏联的朋友感到迷惘。伏契克这次访苏之后，写了一本名为《在昨天已意味着明天的国土上》的书。在这本书里，伏契克展示出一幅五年计划的第二年的苏联生活真实图景，成功地描述了莫斯科、

列宁格勒、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地区的生活。书中也生动地记述了第聂泊机械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及其它大工厂的建设。然而不管在哪儿，作者的兴趣总是首先集中于人——所有这些伟大技术成就的创造者。

伏契克的书以及他所作的关于苏联的报告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作品指明了事情的实况。为此资产阶级对伏契克横加迫害，把他关进监狱。

为了逃避新的刑罚，伏契克于一九三四年再度前往苏联。这段时期，他几乎游遍了这个国家的全部领土，一直到达苏联的亚洲部分。这已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人都在努力使苏联人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伏契克所著《在可爱的国家里》一书中，在可以读到的报道中，都能看出他对工人、突击手、集体农庄庄员、士兵、艺术与科学人员的生活给了多么大的注意。

伏契克寓居苏联对他的文学发展有很大意义。居留期间，伏契克不仅扩大了自己关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素养，这尤其表现在他文章的鲜明、爽快的风格上。

他这两本书在扩大我们对苏联生活的认识方面有很大影响，在劳动人民中大大促进了苏捷友谊的加深。

除了政治领域的事件之外，伏契克还对文化界的事件给予很大注意。伏契克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当代文学作品和当代戏剧的评论文章。

在文学评论上，他从沙尔达的进步立场出发。尽管他

常常不赞成沙尔达的意见，但仍然怀着尊敬之情把他视为师长。当然，伏契克和贝特希赫·瓦茨拉维克一样，总是毫不妥协地将他的评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面。他从苏联文学理论中获得了教益，每遇一部文学作品，都要问它是怎样为社会进步服务的。因此，他对文化起了非常有益的影响。看看他对解放剧院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很有趣的。他善于让沃斯科维茨与维利赫深信，在法西斯主义威胁着人的基本权利的时期，他们必须放弃只为娱乐而演出，必须转向战斗的进攻性的戏剧。当时，伏契克按照党的路线，通过自己的评论活动，将所有进步民主作家聚集到统一的反法西斯文化战线上来，他在原则性上毫不放松，善于从这一原则意义上发现他们作品中与党所领导的斗争相结合之处。我们从如下事实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他善于在卡·恰佩克的《第一救生队》里，看出我们这位优秀小说家的态度起了变化。关于伏契克的这一部分活动，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的评论选集中得到了解。

在民族文化的根基受到威胁的第二共和国①时期和沦陷初期，伏契克无法写政论，便以各种笔名发表一系列文章来分析我国文学的发展。他撰文对捷克文学中的一些人物进行研究，因为他们可以加强读者对我国民族事业在反占领军斗争中必胜的信心。于是他写了关于达利米尔、巴尔

① 指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发展中，从一九三八年接受慕尼黑协定，到次年三月全国被纳粹占领这一时期。

宾、科拉尔、爱尔本、聂姆佐娃、聂鲁达和我国文学界其他人物的文章，今天已收入《我们热爱自己的民族》一书。

这些著作里最重要的是"三篇专论"，其中概括地评述了聂姆佐娃、萨宾纳和泽耶尔。

在专论《战斗的鲍日娜·聂姆佐娃》中，伏契克继内耶德利之后，提出对我国第一位伟大女作家的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看法，纠正了列丁格认为聂姆佐娃的作品基本上属于多愁善感，只是出于对受苦人的同情的观点。与此相反，伏契克指出聂姆佐娃的作品里有许多对她那个时代来说是非常革命的因素，指出她向自己的读者直率地讲了关于捷克社会状况，特别是关于人民贫困的大实话。在《论萨宾纳的背叛》一文中，伏契克分析了萨宾纳的行为，并得出结论说，萨宾纳实质上并没有向警察泄露什么重要东西，只是背叛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思想。在《泽耶尔的保姆》一文中，伏契克得出如下的结论：这个诗人关于捷克远古时期的概念得自一位捷克妇女的口述，她使孩提时的泽耶尔第一次认识了捷克人民诗歌的成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纳粹占领我国时，伏契克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他作为地下党中央委员，发行地下的《红色权利报》，以此接替一九四一年被暴露和逮捕的第一届地下捷共中央委员会。

可是就连伏契克的地下组织最后也被出卖了。化名为霍拉克教授的伏契克本人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被盖世太保逮捕。伏契克在布拉格的庞克拉茨监狱和布拉格盖世太保

司令部所在地佩切克宫[①]关了一段时期后，一九四三年八月被转移到柏林的监狱，在那儿被判死刑，同年九月在柏林的勒洛琛斯遇害。

我们对伏契克在布拉格监狱里的情况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狱卒中有一位名叫科林斯基的捷克人，他给伏契克送去铅笔和小纸片，一九四三年春天，伏契克在这些纸片上记下了自己的狱中生活，科林斯基又把纸片带出来，交给伏契克的朋友们。伏契克的妻子从集中营回来之后，将这些笔记整理成书，名为《绞刑架下的报告》。

伏契克这本《报告》，除了一篇介绍佩切克宫的小监牢即著名的“电影院”的短短前言外，共有八章，包括伏契克的狱中生活情景、囚犯及其折磨者的形象、囚犯间的对话以及他们思想的内容记述。

伏契克监禁初期，审讯是很严酷的。审讯时，被捕者遭受拷打、折磨，但他什么也没有泄露；后来才慢慢恢复了健康。他当时情况严重，连给他检查的医生都替他填写了死亡证。待到日益痊愈，伏契克已经习惯于他的新“家”——牢房了。那儿有老爹、六十岁的教员约瑟夫·佩谢克和机械工人卡雷尔·马列茨。新的审讯之后，不省人事的伏契克被送了回来，只有“生命的亲生姊妹——疼痛”大概还使他感到：他仍然活着。伏契克还弄清了（特别是在400号牢

---

① 佩切克宫是捷克百万富翁佩切克的住宅。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布拉格的德国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房时）逮捕的规模和被出卖的人数。但是那一次他也认识到人的英雄主义的伟大，纳粹分子用最残酷的拷打也摧毁不了它。博亨在贝特辛向伏契克指出布拉格之美时，试图动摇他的意志和逼他说话，但未能改变伏契克守口如瓶的决定。伏契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是由许多为无产阶级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战士的榜样培育出来的，他之所以是真正的英雄，还因为他知道，在斗争中他不是孤身一人，他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在斗争。他知道，当他倒下的时候，他的岗位会有别人接替，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支柱，是所有战斗中的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的后盾。因此，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用回忆莫斯科红场五一检阅来庆祝劳动节；因此，他们做操时也以斧头镰刀来象征苏维埃政权。对苏联以及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力量的认识，使囚犯们每次遭受德国纳粹的打击和每天受尽折磨之后，更加互相接近和坚强不屈。他们中间产生了友谊，这种友谊给他们补偿了连同自由一起失去的一切。监狱杂役斯科舍帕的每一声耳语，伏契克叙述自己经历的三言两语的秘密便条，和把他这些纸条带出牢房的监狱看守科林斯基的每一个更加信任的眼色——所有这些对伏契克来说，都证明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受奴役。在监狱的漫长日子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也表现在唱民歌上。歌曲是生活的表现，尤莱克[1]想通过歌唱给他的妻子古丝坦传递信息：他还活着。

① 尤莱克是伏契克的爱称。

伏契克在庞克拉茨的牢房里没有想到自己，却想着自己的斗争，想着同志、妻子，想着那些以他的充满信心的话语来加强自己的最亲近的人，这些话语是："……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报告》第四章的遗嘱里，伏契克还考虑到文学作品问题。他在此特别对杨·聂鲁达表示热爱与尊敬，说"他的眼光已远远超越我们这个时代，他看到了未来"。

伏契克遗嘱上标明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三天前对伏契克的审讯结束，审讯记录已签字。囚禁在庞克拉茨的时间缩短了。他知道，他的《报告》已完不成了。

最后一章(第8章)是伏契克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九日写的。这正是他被押赴德国的那一天。在这一章里，他为地下共产党反对占领者的斗争提供了最后的证据。

他这样结束自己的遗嘱：

"我的戏快要结束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揭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我们可以把伏契克的《报告》列入许多写于狱中或为反映狱中生活而写的捷克文学作品。这类文学，我们可以从胡斯在科斯特尼采监狱写给"所有忠实的捷克人"的书信算起。萨宾纳的作品里也留下了狱中生活的深刻痕迹(见他

的小说《复活的坟墓》)，狱中经历也产生了奥布拉赫特的《栅栏里的镜子》。可是在这些作者中，谁也不曾受过象反法西斯战士们(包括伏契克)在纳粹监狱中所受的那种凌辱。

因此，《报告》的产生也非同一般。它是由伏契克在狱中小纸片上秘密写下的记录构成的，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作品的连贯性。作者关于自己写得很简单，他绝不愿在自己身边制造一个殉难者的灵光圈。这是《报告》中的英雄即伏契克的一个鲜明特点。这是一位未加浪漫主义美化的现代英雄的典型。他的战斗决心是如此坚定，这本身就已经是英雄品格的鲜明特点。他的道德力量产生于对无产阶级最终必胜的深刻的政治信念。这一信念使伏契克受到自己的同狱难友的拥护，这一信念也使他能给别人以力量。

《报告》中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思想表达方面也有其特点鲜明的形式。《报告》是用明朗、易懂的文笔写就的，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词组，使人联想起沃尔克的描写("时间吞噬了一小块生命")。《报告》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伏契克以自己的生命，以他那同建立合理社会制度的斗争融为一体的文学著作，不仅为捷克人民 而且为所有的进步战士树立了榜样。因此伏契克的名字成了反对暴行的象征，不管这暴行采用什么形式，出现在我国的任何地方。在伏契克的乐观主义和他对正面力量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赢得胜利的信念的感召下，各大洲的青年团结得如同兄弟一般。伏契克的《报告》的结束语已成为世界和平保卫者的口号。

十二　人民民主时期的文学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这一时期给我国民族带来了一系列沉重打击与考验。

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即所谓合并）。同年十月，根据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割去了共和国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的一条边境带（苏台德区）。第二年春天，希特勒直接向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国土进攻。在过去分割斯洛伐克的基础上成立所谓"斯洛伐克国"（1939年 3 月14日）之后，三月十五日又占领捷克领土的剩余部分，并确立了所谓对捷克与摩拉维亚的保护。

事态很快表明，这些行动是更广泛的进攻计划的一部分。下一步便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对波兰的进攻，从而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波兰为纳粹德国准备了进攻苏联的基地。一九四一年六月便开始了这一进攻。

苏联进行的卫国斗争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战争，因为红军的目的是把一开始即以"闪电战"一直伸至内地的侵略者从国土上驱逐出去，消灭法西斯，而不是消灭德意志民族。法西斯进攻苏联后不久，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法国，后来还有美国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最初它们的支援实效不大，

特别是因为法国失败后，希特勒德国可以用全部军力来对付苏联。最后，有其它一系列国家参加的同盟国战胜了法西斯国家。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败希特勒军队之后，胜利地结束了战斗，将红旗插上了柏林的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废墟。

德国纳粹分子在占领捷克与摩拉维亚后，在我们祖国施行血腥的暴政。他们把不同意其统治的共产党人与其他公民逮捕起来，关进集中营和处死。

当时在各种反抗组织的领导下，我国发生了一系列反纳粹的示威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布拉格大学生为一个被纳粹分子打死的学生杨·奥布莱塔尔送葬时组织的游行。纳粹分子以集体逮捕学生、处死他们的领袖、将大部分学生送往集中营的办法来回答这些游行示威。因为这些反对学生的行动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所以这一天被定为国际学生日，全世界都举行纪念活动。那一次，所有捷克高等学校均被查封。本民族的知识分子遭到清洗。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各学校才得以开学。

对捷克民族的另一严重暴行是制造所谓海德里赫事件，由于一九四二年所谓帝国总督海德里赫被暗杀而招致大批捷克爱国者被处死。

然而这些旨在摧毁我们民族根基的打击，并没有成为致命的打击。

我们民族的大多数，特别是劳动人民与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对一切可能性作好精神准备，并以其健康的本能，迅速

找到了自己的武器。那种纪律性今天看来几乎带有传奇性质。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日子里，凭着这种纪律性，我们的武装力量才能动员起来。当时人民在决心抵御德国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中表现了团结一致的精神。

这个反法西斯的团结愿望，遭到那些与纳粹分子合作的人的破坏(但未受到根本破坏)。当然，这只是一些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个人或小组。

捷克人民既在国内，也在国外反抗纳粹主义。

国内产生了地下的反纳粹运动。运动的支柱主要是共产党的地下领导。纳粹的仇恨主要倾注在地下共产党领导身上，也主要是共产党人对纳粹作了斗争。

在国外建立了两个斗争中心。一是在苏联，拥有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大批共产党领导人；一是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捷克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在那儿进行工作。这两个部分都组织过对盟国的军事支援。在苏联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索科洛夫战役胜利后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旅，一九四四年改编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该军团在解放我们共和国时，曾非常积极地参加过红军的战斗。

斯洛伐克人民对法西斯政府的不满表现为一九四四年八月底的斯洛伐克起义，起义的领导机构设在班斯卡·比斯特利采。尽管它遭到纳粹军队的血腥镇压，然而它打乱了德国的作战计划，有助于战争的迅速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德军的投降而

告终，但是此后还有法西斯分子的个别小组织在继续负隅顽抗。

布拉格也是如此。人民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当别处已在庆祝胜利时，布拉格还在进行街垒战。布拉格起义扫除了一切投敌分子并向全世界表明：布拉格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拿起武器，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

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共和国政府随同红军来到本国领土。由所有未背叛民族并与纳粹分子合作的政党代表参加的政府，宣布了所谓科西采①纲领。

这个纲领，表明了获得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以民族阵线为领导的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对内政策上，科西采纲领的原则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银行和大工厂国有化的道路；在对外政策上，加强与加深同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

但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初年，反动派力图扭转局势，废除科西采纲领和削弱共产党在国内的影响，所以一八四八年政府工作中出现了危机，并导致政府的分裂。反动派想以这种办法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于是共产党和革命工会集中全部力量恢复民族阵线，加强人民委员会以及所有人民自治机构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权力，加速了社会主义的行程。这种政治力量的转变，也表现在哥特瓦尔德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萨波托茨基担任总理

---

① 斯洛伐克东部一城市名。共和国政府纲领是在此制定的。

一事上。

尽管有国内外反动派的进攻，这一对内对外政策的方向，在以后的年代仍然得到了巩固。

哥特瓦尔德逝世以后，安东宁·萨波托茨基当选为国家首脑，党和国家关心着广大劳动人民福利的进一步提高。

这反映到文化上，首先是日益增长的对文化财富，特别是对书籍的需求，观看戏剧、电影和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人数的增多。例如纪念伊拉塞克与赫维兹多斯拉夫的活动，也是人民文化需要日益增长的一个证据。

从慕尼黑协定开始的所有事件在文学上都有所反映。紧接在西方列强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捷克诗人便表达了在大动员时期激动人心的日子里的民族情绪、痛苦，以及对那些自称是我们的同盟者而又出卖我们的国家的愤怒；尤其是赛弗特和哈拉斯，在他们的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民的艰苦命运的悲痛。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特别是在法西斯占领时期，捷克文学处境很艰难。捷克文化与文学遭到占领者的无限控制，人民从本民族古典作家，特别是从聂姆佐娃、聂鲁达、伊拉塞克那儿寻求支持，以抗拒这种野蛮的压力。

大批现代作家的作品根本不允许付印，因此有的书籍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之后才得以出版(如诺伊曼的«难熬的年代»与«恶浊的年代»、内兹瓦尔的«历史的画面»、奥布拉赫特的«征服者»)。

出版的文学作品受到严酷的检查，因此作家们常常不得不转弯抹角地、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常常从过去历史中寻找正面力量与民族自豪的范例，如赛弗特和哈拉斯在他们关于聂姆佐娃的诗作中就是如此。此外，作家们还表达了使自己受到压抑的情感，忠于民族的人士内心当然是大都充满着这种感情的。连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醉心于表现自己的个人情感的诗人，也成了整个民族情感的表达者。出于对书刊检查的担心受怕，他们无法直言，只能采用比喻和象征手法，但对捷克读者来说这却是明白易懂的。捷克读者在大战期间已经学会从字里行间，甚至在书刊检查者第一眼看去无可非议之处，寻找更深的意义。

小说散文的情况比较艰难些。它无法使用所有这些比喻，必须在具体情节上进行加工。因此作家对一些历史资料作了加工，当然这也只能是那些“没有毛病可挑”的，也就是看起来至少不可能加强人民的斗争精神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念的材料。而产生得最多的还是长篇和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小说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上。尽管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只关心个人的狭隘利益，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找到一些主要针对现实、强调人们团结的作品，如巴斯的《洪贝尔托马戏团》、德尔达的《掌上小镇》。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的日子里，因民族解放而产生的欢乐情绪，在捷克文学中立刻以大量向红军致敬的诗歌，以

加强布拉格人民将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斗争决心的诗句表现出来。

这个时期，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不以歌唱来表达获得新自由的欢乐心情。赛弗特、哈拉斯、赫鲁宾、内兹瓦尔以及霍朗都写出了他们最美的诗篇。

用小说散文和戏剧来描绘新的现实则是稍后一个时期的事，因为小说与戏剧作品需要较长的酝酿时期。

一九四五年后的前一时期，捷克小说主要是描述集中营和纳粹监狱的经历、解放斗争的经历，最初主要采用回忆录和报告文学的形式。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回忆录才有了更富于表现力的形式，成为艺术作品、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材料，如德尔达的《沉默的防御工事》、马列克的《人们在黑暗中行走》，或卡雷尔·普塔契尼克的《二十一个年度》和诺贝特·弗里特的《活人的盒子》。

在新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建设或边界定居的问题，也常是写作的题材。但生活在其中的作者描绘这些现实时，间或有些简单化。他们不清楚（在那个时期实际上也不可能清楚）该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文学的思想倾向。这种文学不仅希望与我们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而且想要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但他们中间有些人如热扎契、贝尔纳什科娃、赛德拉切克、希哈和库普卡的作品，对教育广大群众仍然有很大影响。

这些作品在艺术价值上虽然相差悬殊，但都具有历史见证的价值，因为它们明显地表现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

路上的一段历程。连那些被天翻地覆的时代推到原先无法意料的生活中的个人，他们在私生活与观点上的深刻震荡也成了小说作品的题材与主题（如奥特切纳谢克的《公民布里赫》）。

假如我们再把对历史素材，特别是对胡斯革命时期和农民暴动的素材进行艺术描绘的尝试（如克拉托赫维尔、卡普利茨基）也算在内，就能绘出一幅从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捷克文学的绚丽多彩的图画。

上述作品大多使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其作者继承了我们民族文学的进步的伟大前辈的传统，特别是那些与工人阶级有着良好关系的老辈作家的传统。此外，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从描述苏联现实并取得伟大成就的苏联作家那儿获得教益。所有知名作家都站在新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边，又努力用自己的作品来巩固这一制度。他们竭力创造新的典型人物，并以最有说服力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新人物的性格特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力图积极参加新生活的建设，有着明确的教育使命，它致力于创造能起示范作用的正面人物。

作者们的贫乏的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整个社会发展理解不深，使作品中有些人物没有说服力，公式化概念化，从而未能正确反映出整个生活图景。所以有时候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写得似乎没有困难，在建设新社会时没有矛盾冲突。此外，文学也表现了所谓个人崇拜，过分强调个别

人物的意义。

一九四五年之后，捷克诗坛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战前一代的有些老作家还继续诗歌创作。他们真诚地为自己的思想更新而努力，力求对新制度持肯定态度。那些在较长时期保持沉默的人，也开始发表新诗作。属于这一部分的诗人有内兹瓦尔、赛弗特、哈拉斯、比布尔、扎瓦达、霍朗、赫鲁宾和布拉尼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或在占领时期进入文坛的一批诗人（杨·皮拉什、兹登涅克·克利贝尔、奥德希赫·米古拉谢克、米哈尔·赛德罗尼）构成了中年一代。随后还有一大群在一九四五年之后才发表作品的诗人（巴维尔·柯霍特、伊万·斯卡拉、米兰·古德拉、伊希·肖多拉等），尽管他们表达的基本上也是第一和第二批诗人那样的思想感情，尽管他们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但也必须解决关于诗歌使命和诗歌概念的无数疑难问题，必须努力寻求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1901 年生）是一位从无产阶级诗歌开始的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泪中城》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决心。诗人把苏联看作革命的国度，对它表示敬意。他的进一步发展把他引向了“纯诗主义”（如 1925 年的《在 T.S.F. 波浪中》）。然而在他的诗歌里占优势的倾向，是直抒聂鲁达式的朴素而富有旋律的感情。他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法，善于从最普通的事物和生活经历中创造出非常动人和

有特色的、然而实质上又完全新颖的诗一般的画面。

慕尼黑时期，赛弗特是最完美地表达人民决心保卫祖国的情绪的诗人之一(如《把灯熄灭》一诗)。占领时期，他在几本诗集中表现了一种普遍的信心，即相信世界和全民族中的进步力量一定能战胜暴虐和野蛮(如《披着光彩夺目的盛装》、《石桥》、《鲍日娜·聂姆佐娃的扇子》)。

解放后，赛弗特善于出自内心地表达享受新自由的欢乐以及对解放者苏联的感激之情(如《泥制头盔》)。近十年来他所写的诗，常常回忆无产阶级的青年时期，特别是回忆他的母亲(如《母亲》)。赛弗特也喜欢用自己的诗句，唤起、激发对美术作品的兴致，特别是对那些他认为富有捷克民族性与人民性的画家的作品（如阿列什的《穷画家沦落天涯》、拉达的《男孩与星星》)的兴致。

赛弗特的近期诗作，大部分以回忆特别是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为依据，这些作品常常流露出一种蕴藉而温婉的忧伤。

康斯坦丁·比布尔(1898—1951)则完全是另一种情调的诗人。在他的早期诗集《走向人民的大道》、《忠诚之声》和《转折》中，他为社会主义与革命而奋斗。但由于讲求华丽的辞藻，这位诗人离开了战斗诗歌的轨道，这从他的热带国家纪游诗里看得格外清楚（如1927年的《来自装茶叶与咖啡的货船上》)。他的诗歌发展的基本特点，是追求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不落俗套的诗歌画面。

解放后，比布尔又重新创作他的战斗诗歌，一九五一年

出版了诗集《无所畏惧》。这个集子具有反对剥削与压迫有色人种的鲜明基调(如《朝鲜故事诗》、《爪哇姑娘》)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比布尔这位诗人从不满足于自己能反映现实，并能敏锐地发现词与词之间的新联系。

有人感到世界即将毁灭,因而对它抱怀疑态度,诗人**弗朗季谢克·哈拉斯**(1901—1949)对此作了一场艰苦的斗争。这位出身于无产阶级的诗人从他第一部作品起，就经历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他的创作方法与纯诗主义派有某些共同之处，然而他不同意他们把人生视为一项美好的冒险的观点。相反地,他的诗始终回响着一种悲惨的生活情调。哈拉斯是用恐惧、崩溃与疑惑的概念表现这种情感的。哈拉斯的诗包含着他的复杂个性的两个对立面：有些诗几乎是用可怕的悲凉色调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与贫困的图画，此外还有些诗则显然表明诗人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例如献给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战士的诗)。慕尼黑协定之后，哈拉斯有时以自己严肃的乃至预言性的诗来加强民族的力量(如1936年的《敞开》、1938年的《破碎的希望》)。在占领时期,他同赛弗特一样,将聂姆佐娃看作民族与人的纯真的象征,写了一本有关她的诗集《我们的鲍日娜·聂姆佐娃女士》(1940)。他在法西斯占领期间的诗作,特别是为地下《红色权利报》所写的诗歌以及解放后的作品，都收进了诗集《在队伍中》(1948)。

赛弗特和哈拉斯的同代诗人中还有**伏拉吉米尔·霍朗**

(1905年生)。正当他的同辈诗人怀着积极的情绪,在现有手法的具体基础上进行创作时,霍朗却在通过思维的途径,创造一种极其抽象、因而常常是晦涩难懂的画面。

但一九四五年五月之后,诗人找到了一套方法来深刻表现他对红军解放的感激。他的《感谢苏联与红军》一诗(见《文献》一集),属于这段时期捷克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

威莱姆·扎瓦达(1905年生)的作品,充满着两次大战之间的生活中的恼人的矛盾。

这个在俄斯特拉发地区土生土长的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如何破坏生活中一切完美的东西有着敏锐的感受,从他的处女作《丧礼》(1927)直到诗集《起死回生》(1945),都渗透着这个世界的贫困与悲愁。早已酝酿着的变化,充分表现在他的诗集《光明之城》(1950)中。诗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有所体会,他相信生活中的不平事能得到改正(在诗人过去的集子里,对这种事情的认识却导致了他的悲伤情绪),因而给他的诗带来了比较明朗欢快的调子。这一过程在《田间的野花》(1955)中达到顶峰。在那里,诗人富有表现力的手法更加简练,内容主要是注重新人及其问题。

弗朗季谢克·赫鲁宾(1910年生)在对于人与诗的探索方面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他战前的诗常常力图摈除内心世界的问题与苦恼,但是没有结果,因此诗人陷入了忧伤与恼人的疑惑之中。特别是占领时期,在普遍的忧虑与

悲伤的重压下，他也找到了通向民族集体的道路。他对待现实的新态度和他的战斗决心，后来反映在他的两本诗集《面包与钢》和《约伯之夜》中。诗人将个人命运同祖国及祖国生活的命运相结合这一特点，在诗集《我的歌》(1956)中达到了顶峰。这本诗集已经表现出欢乐的生活情调以及对于人民走向美好未来与和平的道路的理解。赫鲁宾属于我国最伟大、最优秀的儿童诗歌作者之一（如《和我一道念》和其它许多诗集）。

当代捷克诗歌经过许多作者在观点上的摸索，终于找到了深切关心人、关心当前现实的道路，并以一批最优秀的作品来支持和加强它本身的建设事业。

当代捷克小说也是在与当今任务完全协调一致中成长起来的。

小说发展与诗歌发展的相同之处，在于大批作者的作品都与自己过去的作品互相衔接，但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在社会上影响更大。热扎契、普伊曼诺娃、库普卡、德尔达更是如此。除了这些作家以外，还有一批崭新的作家，他们是一九四五年以后进入文学界的几辈人的代表。属于这一部分作家的不只有阿·贝尔纳什柯娃、卡·弗·赛德拉切克、伊希·马列克，还有希哈和萨波托茨基。

在当代小说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作者要算杨·德尔达(1915年生)。他的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刻了解和同情。他的处女作《掌上小镇》，显示他特别在叙事体裁的运用上拥有巨大的才能。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卡·恰佩克的特

长，这种艺术是从几部长篇小说（«活水»、«彼得·赛德米尔哈什旅行记»）中成长起来的。他战后的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防御工事»在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捷克人民在德国占领时期和布拉格革命中的斗争构成这些故事的内容。德尔达在这些短篇小说里，特别清晰地表现了怎样从孤立的个人反抗走向计划严密的、以反法西斯斗争为广阔政治基础的战斗行动。此外，德尔达还指出了捷克的斗争计划与其它民族的反抗斗争的联系。«沉默的防御工事»是为那些在反法西斯暴政斗争中牺牲的普通无名人士所写的颂歌和竖立的纪念碑。

德尔达在其它一系列主要描写我国今天的建设的短篇小说和游记里，力求把握与表现出我国和世界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瓦茨拉夫·热扎契(1901—1956)创作了关于我国社会某一个方面的更新的长篇小说。这位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已出版过几部小说（«死胡同»、«黑光»、«证人»），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感受。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分界线»，热扎契在这部小说里探索了艺术工作以及艺术家与集体的关系问题。

热扎契在战后生活中，特别是在遣返德意志人以及在遣返后的边境生活中发现了新的题材领域，并打算以长篇小说三部曲来表现这些地区建设新生活的图景。但是热扎契只完成两部——«挺进»和«决战»。

小说«挺进»(1951)是一幅关于解放后最初几个月的捷

克边境的图画。到这儿来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真正打算在边境定居，建设新家园的；然而也有一种人只想在这儿追求利润，一心想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如特尔涅兹）。正直诚恳的劳动者的典型是共产党员巴格尔，他带着明确的目的来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目的是他千方百计必须达到的。此外，小说还展示了具有各种性格特点的新的移民的整个画廊，其中以无产阶级的移民的形象（波斯塔瓦）最为突出。作者对德意志居民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在德意志人中以战争残废者帕尔曼的形象写得最出色。他是德国共产党员，对所有纳粹的野蛮行为持批判立场，和捷克同志一道在波托契纳及其周围为建设新生活奠定了基础。

在这部小说的续篇《决战》中，热扎契将注意力放在新的定居地区的生活更新上。一九四八年以前，这儿也出现过革命与准备使国营企业复辟为私人资产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紧张局面，然而新制度的正直代表们的警惕性与奋不顾身的努力，终于带来了成果：人民的权利得到巩固，争夺边境和各个人的伟大战斗胜利结束，这要归功于那些普通捷克人的平凡细小的工作与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纯洁的良知。

热扎契这两部著名小说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写成的，两部作品的出色的方面和略嫌不足的方面，在捷克小说创作的这一发展时期都比较典型。肯定的方面是作者敢于抓住不久前我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来加工处理的勇气，以及他处理这个主题时的明确的思想观点。作品素材

的安排，情节的发展，对基本的和超出个人的分歧的掌握，某些人物、主要是反面人物的刻画，都证明作家热扎契很富有经验。但作品并不以极端简单化的眼光看待事物。

弗朗季谢克·库普卡（1894年生）给捷克小说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开始文学工作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只有他那与现实有着一定关系，或力求通过叙述历史来支持现今社会的作品，才具有较深刻的意义。库普卡在他的七部曲小说里，试图表现马尔丁一家从上世纪中叶至一九四五年的命运的画面。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为特鲁曼博士而写的小故事》和《毕加索的鸽子》，也负有明显的政治斗争使命。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将自己的艺术献给了反对战争与保卫和平的斗争。

博胡米尔·希哈（1907年生）的两部小说的主题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变化。《广阔大地》是一部描写迁到边境的农业移民新生活的小说。在小说《两个春天》(1952)和短篇小说集《林中相会》里，作者考察了从解放到建立统一农业合作社期间农村生活的深刻变化。

我们祖国当前生活的绚丽多彩的景象，在戏剧方面也得到了表现。

这个时期的捷克戏剧，一方面通过以工人斗争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通过某些重大迫切的现实问题的解答来完成它的战斗使命。

沃伊杰赫·查赫（1914年生）写过两部有关捷克北部无产阶级斗争的戏剧。他的《杜霍佐夫高架桥》和《摩斯特

罢工》两部剧作，力求正确反映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工人阶级斗争，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的教育与斗争中的作用。

瓦谢克·卡尼亚（1905年生）在剧本中描写老一辈与青年工人为工作方法而起争执这种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完成了一部分重要的教育任务。他的喜剧《磨工卡尔汉的劳动班组》不仅在捷克舞台上获得成功，而且还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演出。这部戏剧建立在一对矛盾上面：老一代在劳动中过分强调个人习惯，年轻一代则坚持整体观念。该剧还以老一代工人阶级所特有的责任感来教育青年。

另一戏剧家**米洛斯拉夫·斯特赫利克**（1916年生）的作品，着重描写农村生活的变化。这些剧本的戏剧性结构，特别是生动性方面，表现了作者的戏剧技巧。从他的剧作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戏剧家和导演。

斯特赫利克头两个成功的戏剧，表现了农村在占领时期的生活和一九四五年后阶级斗争尖锐时期的生活。两个剧本互有关联，剧中的出场人物完全一样。

他早期的剧本《摩尔多峡谷》的故事发生在捷克农村，这个村庄本应迁来一些德意志人。但村民受到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捷的消息的鼓舞，竭力破坏纳粹分子的行动。作者通过一个优秀的人民形象鞋匠海耶尔，特别成功地把人民对占领者的反对态度表现了出来。反纳粹斗争的组织者是有觉悟的共产党人，拖拉机手瓦谢克。

《春雷》一剧所讲的还是这个村子。可是村里的生活已

发生变化。作者通过三件大事写出了这一变化：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和取消土地分界线。无地农民与地主分别组成两个斗争集团，作者使双方的典型代表处于对立地位，并指出，小小的庄稼户没有那些表示要“慨然”相助的人的支援，却是多么善于经营管理。

斯特赫利克的《夏日天高》与《农家之爱》，是农村题材戏剧创作的继续。

斯特赫利克在他的《勋章获得者》中将注意力转向其它的题材领域：转向矿工的生活和问题。

米朗·雅利什（1913年生）在《宣誓》一剧中描述了一九三九年春那些艰苦日子发生的事件。一支孤立无援的驻防军是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意志的象征。由于希哈班长的影响，战士们即使在接到放弃阵地、向占领者交出武器的命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

在诗剧《博列斯拉夫一世》中，雅利什选用了从氏族制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素材。他的博列斯拉夫是一个力争国家统一、维护它的独立、反对德国皇帝的君主。

新社会的现实问题，给雅利什创作描写医务界的《知识分子》一剧提供了材料。

1　玛丽亚·普伊曼诺娃

(1893—1958)

玛丽亚·普伊曼诺娃是捷克最著名的现代小说家

之一。

普伊曼诺娃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查理大学法学院教授卡雷尔·海内尔家。“普伊曼诺娃”一名，来自她的丈夫、布拉格民族剧院歌剧导演裴迪南·普伊曼的姓氏。

这位女作家的早期文学作品一方面具有回忆录的特点（如《翼下》），另一方面又注重社会与道德问题（如《城市公园里的故事》）。社会小说《赫格尔大夫的女病员》写一个捍卫母性权利的年轻妇女的故事，在那里，普伊曼诺娃已经明确反对市民阶层的偏见了。

正当出版这部小说的期间，普伊曼诺娃的生活起了深刻的变化。在共和国国民经济发生危机、遭到破坏的时期，作者与工人阶级有了接触。科依诺矿井发生事故之后，她与伏契克以及其他作家一道，前往摩斯特了解罢工矿工的贫困情况。工业区捷克北部特别是利贝列兹之行，给她留下强烈的印象。她目睹了失业和工业危机带来的种种后果。

一九三三年的苏联之行，对于她用新眼光去看待世界，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关于她的感受及其在苏联的生活，她在《新型国家一瞥》一书中向读者作了介绍。

普伊曼诺娃就这样为她的大型长篇小说《十字路口的人们》作了准备。这部小说是一九三七年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前夕问世的。书名取自小说主人公卡姆扎博士向工人阶级说明时代特点的一句话：“同志们，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准备时期。你们大家一定也

亲身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都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人。一场战争结束了，另一次战争又将接踵而来。我们是生活在武装的和平之中。西方渐近黄昏，东方已出现曙光。哪儿也没有安宁的日子。苏维埃俄罗斯已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劳工革命也正在劳动中取得胜利。西方所处的思想状况——”

这是作者在小说中的基本思想，普伊曼诺娃通过多层次的故事情节和一系列来自捷克各种生活环境的特色鲜明的人物，表达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她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着小说中以卡兹玛尔的工厂、摩拉夫斯克·乌利市的雅费达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雅费达是一个巨型的纺织厂，它严密的组织总揽一切：不仅管工人“福利”，而且也管职工的私事和工厂所需要的新工人的教育。各种表面上的生活福利，是为了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从在苏联已经实现了的人类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中转移开来。

普伊曼诺娃通过工厂主卡兹玛尔这个人物，深入刻画了拔佳。雅费达就是他生产皮鞋的工厂，乌利市暗指兹林（现名哥特瓦尔德市）。

工人们在雅费达受到非人的剥削，可是工厂主还以友谊和关心工人来伪装自己，以掩盖他对利润的关注。这一切，工人阶级都已意识到，所以起来反对卡兹玛尔这一套。

小说中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在工厂发表革命言论的青年工人弗朗季谢克·安特纳，和内赫莱巴的工人领袖波朗

斯基。

小说也描写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布拉格的律师卡姆扎博士，作者根据伏契克的朋友伊万·赛卡宁来刻画他性格上的一些特征，他在法庭上捍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的阶级觉悟是从对生活的认识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中得到提高的。

年轻一代的代表是卡姆扎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和他小时的朋友昂德谢伊·乌尔邦。特别是还有卡姆扎的女儿赫莱娜。

昂德谢伊是典型的无产者，他因无钱上学，来到乌利，对卡兹玛尔及其严密的劳动组织表示惊叹，他钦佩“产业主”（指卡兹玛尔），甘愿竭尽全力为其保护财产。然而昂德谢伊在内赫莱巴居住期间看到了这种富裕的反面：饥饿与失业。警察在内赫莱巴罢工运动中袭击罢工群众，弗朗季什卡·波朗斯卡在一片血泊中死于昂德谢伊的怀抱。

就是在这个时刻，昂德谢伊与乌利彻底诀别了。他从一个顺从的劳动者变成了严肃的观察者，他已经知道何处是他真正的岗位。

他的朋友，大学生斯坦尼斯拉夫·卡姆扎逐渐认识到周围所见的事物的实质。他的道路当然不同于一个工人的道路。他曾受到只热中于描写个人颓废情绪的外国文学的影响，走过一段弯路，但他目睹了内赫莱巴的流血事件，这使他擦亮了眼睛。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不仅是个别人，而且是必须进

行生死搏斗的整个阶级。

在到达这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之前，欧洲资产阶级以法西斯主义为工具，表演了一出自我拯救的戏剧。

玛丽亚·普伊曼诺娃的第二部大型小说《玩火》(1948)，是三部曲的第二部，它描绘了从一九三三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军占领我国的其余部分，建立所谓捷克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制度的情景。

对处理所谓国会纵火犯的莱比锡审判的描述，是这部小说的中心部分。被告是愚笨的荷兰人万·德尔·留别，德国共产党人托尔格列尔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托涅夫。普伊曼诺娃在这部描绘案件经过的小说里指出，主要被告，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如何变成了对整个纳粹制度的控诉者。纳粹法庭在季米特洛夫的证据逼迫下，最后不得不宣布他无罪。

卡姆扎律师作为国际律师团成员之一，决定要为被告辩护，普伊曼诺娃通过这件事把莱比锡审判与整个小说结构联系起来。但纳粹法庭拒绝了辩护律师的要求，所以卡姆扎只能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审判。

"玩火"者不仅指纳粹分子，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也同样玩火。普伊曼诺娃通过自己的人物所观察到的生动场景，揭示了我国国内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人民徒劳地呼吁为国家的完整而斗争；他们相信苏联的援助，而资产阶级所想的却是利润，甚至想通过同希特勒达成协议来获利。慕尼黑的背叛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证明：真理

在人民一边。人民正确地预感到，纳粹政权将反对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的爱国主义者。

事实果真如此。卡姆扎律师就是被盖世太保逮捕的首批人之一。这就是纳粹分子给我国人民带来的“保护”。

小说三部曲的第三部《生死搏斗》，描述了从占领初期到红军解放布拉格的六年间的情景。

作者面前摆着一项艰巨的任务：用一部小说作品来描绘发生在国内外、特别是在苏联历史舞台上的涉及多方面的复杂事件，这些事件直接地、有时间接地关系到我国民族的命运。

因此普伊曼诺娃在小说中设置了几条情节线索：集中营生活；卡姆扎一家的经历；布拉格和乌利的生活；苏联发生的事件。这些都贯串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有时彼此交错，互相穿插，有时只有某些接触点，有时是毫无外部联系的平行发展。

我们在这里见到的卡姆扎律师，是奥朗宁布尔科监狱一名政治犯。作者利用这个机会，向读者介绍集中营的囚犯如何团结一致；同时也指出，纳粹分子以怎样的暴力来反对在杨·奥普莱达尔下葬时举行爱国游行的捷克大学生。这些事件，卡姆扎是从直接的参加者，特别是从大学生博热克那里获悉的，这位有政治觉悟的大学生已经知道卡姆扎的姓名和工作。作者就这样指出了卡姆扎战前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从事的政治活动，并未白费气力。

在小说中我们还遇到卡姆扎的妻子，特别是他的女儿

赫莱娜大夫。她表面上与丈夫斯克希万涅克离婚，参加了反纳粹的地下斗争。在海德里赫被刺事件中，她被盖世太保杀害于科比利斯刑场。她那震撼人心的就义场面构成作品的艺术高峰，这部小说是我国现代小说中最有说服力的令人激动的作品之一。赫莱娜的丈夫并不是他妻子所佯称的那样住在美国，而是化名布列什，在乌利工作。他的斗争带来的成果，是使雅费达工厂经常开工不足，使德国军用列车遭到袭击。

前两部作品中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章里马上出现的有昂德谢伊·乌尔邦。他现在已是第比利斯的社会主义纺织工厂中一名有觉悟的劳动者，他已经不再醉心于卡兹玛尔的事业，整个身心沉浸在新的祖国里，他准备同茶叶种植园的一位女工、格鲁吉亚姑娘克托结婚。纳粹分子之占领他的祖国、德国人对苏联的进攻，严酷地影响着他的命运。昂德谢伊和克托在红军中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昂德谢伊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经过长途的战斗行军之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乌利和布拉格。克托被捕，在拉文斯布吕克她与捷克斯洛伐克的集中营囚犯，特别是与利季采的妇女有所接触，最后在解放了的布拉格与她的昂德谢伊幸福地重逢。

作者刻画的这些人之中，有的未能保持民族尊严（如昂德谢伊的妹妹，即投敌分子霍斯列尔博士的妻子）；此外，他还刻画了整个一群人的命运。

普伊曼诺娃就这样来加强对一群人的命运的描绘，例

如利季采的妇女，尽管作者也叫出了两三个名字，但在她看来她们只是人的综合体，其命运是在同样条件下形成的。在描绘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或布拉格革命的章节里，也是如此。

普伊曼诺娃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时肩负了特别艰巨的任务，即要特别注意大部分人物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从整个社会广度上展示小说故事情节的可能性。大量素材、一系列活动地点和(已经叙述过的)几条情节线索乃至小说结构的特殊方法，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电影，普伊曼诺娃运用电影手法中的频繁交错的短镜头形式，因而有些重大事件只能略微提及。一系列世界和国内事件给予了作品以富有戏剧性的情节。

结构最完整的是三部曲的第一部。普伊曼诺娃在此不仅巧妙地使整个创作计划得以展开，而且展开的各个章节，特别是那些叙述乌利的生活的地方，写得生动而富于立体感。

普伊曼诺娃三部曲中的语言艺术特别出色。作者经常使用口语，善于通过它来突出整个环境的特点。作者需要使用集中营犯人的语言或工厂工人的语言成分，也是为此。另一些章节又把俄语与捷克语的成分混合使用，或者引用整句的俄语，这些语言手段都是为了增强特色而采用的；然而与此相反，有些地方用的是纯粹的书面语言（如关于赫莱娜死去的那一章)，有着鲜明的感情特点。

辞藻丰富也是普伊曼诺娃诗作的基础。在三部曲的第

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十一年间隙中，她全神贯注于诗歌创作。在此期间，普伊曼诺娃出版了她有关少女成长的唯一的中篇小说《预感》，这部作品证明她掌握了一个年轻人脆弱多变的感情状况。此外，她还创作过一系列抒情诗集。

玛丽亚·普伊曼诺娃的抒情诗，一方面注重作者内心的个人感情（如《母亲的诗》），另一方面（特别是1945年以后）又表达民族集体的感情。抒情诗中有献给祖国和英雄的社会主义斯拉夫国家、特别是献给苏联的诗（如《爱情的表白》）。普伊曼诺娃以其它的诗为和平而战斗（如《千百万只小鸽子》），歌颂共和国首都之美（如《布拉格》），还以诗的形式描述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的生平。

玛丽亚·普伊曼诺娃首先是现代小说的一位优秀代表。在艺术发展中，她成功地找到了同工人阶级的正确关系，而工人阶级则是当前使世界走向人类更大幸福即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正面力量。所以她的作品也是为新制度服务的，是为实现新制度而斗争的武器。为此，作者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2 安东宁·萨波托茨基

(1884—1957)

安东宁·萨波托茨基是共和国第二位工人阶级的总统，他所写的以捷克工人运动史为题材的编年史小说，成了战后捷克小说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

安东宁·萨波托茨基于一八八四年出生在克拉德诺附近的扎科拉尼，从小在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家庭里长大。父亲拉吉斯拉夫·萨波托茨基属于第一批工人阶级的组织者，一八七八年已是我国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宁·萨波托茨基学过石匠，但从青年时代起就为工人运动贡献力量。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该党议员，一九二九年成为党的哥特瓦尔德领导班子的成员。安东宁·萨波托茨基主要在工会工作，所以在占领结束后（在占领期间他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在担任这一职务时，以及后来当共和国总理、总统时，他都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人民尽过教育的职责，引导他们对劳动树立起新的态度，培育民族爱国主义。一九五七年底积劳逝世。

他的四部回忆性作品旨在向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向青年指出：工人阶级的坚强组织与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在付出多么巨大的人员牺牲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从时间上来说，出版最晚的《黎明》一书，打开了他回忆的大门。在该书中，萨波托茨基根据他母亲的回忆叙述了她一家人从克拉托夫区迁到布拉格小城区的情况。在小城区，他的外祖母特莱斯卡力求沿着社会阶梯爬上一级，可是徒劳，就连她的小店铺也未能使她成功，因为她不象某些人那样贪婪，甚至对最穷困的人也要偷上一把。在回忆的最后部分，我们已经可以遇到拉吉斯拉夫·萨波托茨基，一位有

觉悟的工人运动工作者了。他在布拉格小城区座谈会上结识了特莱斯卡的女儿，并娶她为妻。安·萨波托茨基将捷克小镇克拉托夫的生活画面，甚至在布拉格建造民族剧院的情景写进了这些回忆。在本书里，有关暂时还处于提高文化和组织互助会阶段的工人运动初期的篇章，是很有价值的。

下面三部作品包含着安·萨波托茨基的自传性回忆。

第一部《新战士站起来》取材于作者的童年时代，故事主要发生在萨科拉尼，他父亲曾被派往那里从事政治活动。作者描述了农村无产者的贫困状况，他们在庄园的小木屋里无条件地听凭庄园管理人与各种管家来摆布。拉吉斯拉夫·布德契斯基对这些无产者做启蒙工作，竭力唤起他们作为人的自尊心。作者通过捷克当代文学中最优秀的无产者形象之一科尔米斯特尔老爷爷的命运，说明了布德契斯基的工作成果。这位身居小木屋的老公民，能够在互助会里同农村富豪平起平坐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拉吉斯拉夫·布德契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做工作可不容易。奥地利国家机器，乃至意识到这一工作的效果的捷克资产阶级，都从中阻挠。克拉德诺区的工人候选人获胜证明了这些效果。这是该地区无产者日益增长的阶级觉悟的最初表现。

长篇小说《动荡的一九〇五年》是一幅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的图景。这部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布拉格，主要在日什科夫区。现在托尼克·布德契斯基（作者本人）已是日什科夫无产阶级青年的组织者，他就住在那儿一个租来的大房

间里。萨波托茨基通过房产主皮沃卡这个人物，刻画出一切行动都唯利是图的捷克资产阶级的典型，这种人在任何情况下只考虑积敛钱财。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后，布拉格沸腾起来，以致发生了骚乱和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布拉格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是自发涌上街头的无组织的群众，而是代表一种运动，这种运动以工人阶级政党在组织上的成熟与纪律性作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在发挥作用。

《红光照耀着克拉德诺》则是回忆录式的三部曲的终结。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克拉德诺和布拉格。作者在这里表明，工人阶级中左派的影响是怎样在不断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克拉德诺无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贫困，这一贫困又因农村富豪与磨坊主的贪心而更为加剧。所以克拉德诺的阶级关系的紧张程度比别处更甚，已经有了阶级觉悟的克拉德诺无产阶级，对国内和世上的政治事件也反应得更加激烈与富有战斗性。萨波托茨基特别指出，他们对俄国发生的事件，主要是对伟大十月革命的反应是何等强烈。由于它的影响，克拉德诺工人阶级左派成长了起来，肩负起克拉德诺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领导使命。因此，克拉德诺是使左派在社会民主党中获胜、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得以建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克拉德诺还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这就是托尼克，即作者本人。

在当代小说中，安东宁·萨波托茨基的作品有其非常显著的特点。作者本人认为它基本上是回忆录式的作品，

但又具有小说体的形式。因此他大多采用讲述式，有的地方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然而有时(例如在《红光照耀着克拉德诺》)又将整段整段刊印的材料(报纸、通告等)收进作品里，以期有助于人们了解情况。

萨波托茨基的全部文学著作如同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一样，充满着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的积极的乐观主义。再加上其它的特征，如对发展中的实际情况的现实主义描写、正面人物典型或人民性，就使萨波托茨基的编年史式的小说体作品，被列入了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富有特色的捷克小说名著。

3 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

(1900—1958)

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是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诗人之一，其作品的异常丰富而又独特的形象性使他蜚声于世。

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是摩拉维亚人，一九〇〇年生于特舍比契附近的比斯科普基。摩拉维亚的乡村生活是他创作的第一源泉。青年时代的印象，十年之后又在他的诗歌画面中再度出现。

内兹瓦尔在特舍比契读完中学后到布尔诺上大学，很快又转到布拉格学习哲学。在那里，他与年轻一代诗人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与伊希·沃尔克建立了私交。

在布拉格，内兹瓦尔成为文学小组“山菊花”的成员。

这个小组所宣扬的对文学创作的某些观点、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的整个社会形势，促使内兹瓦尔倾向于沃尔克逝世之后占统治地位的诗歌流派，即偏离具有鲜明战斗色彩的无产阶级诗歌的那个流派。

通过内兹瓦尔的作品，我们就可以说明当时整个诗坛的复杂形势。从政治觉悟来看，内兹瓦尔属于那些大胆承认自己的革命世界观的诗人之列；但他的谋求表达现代人感情的作品，不一定都符合他这个基本观点，因为他的革命性其实只不过表现在形式上而已。

这一点可以见于内兹瓦尔在潜心于纯诗派诗歌的时期的作品：内兹瓦尔不仅是这个流派的著名理论家，而且是它在实践上的代表人物。这种建立在形象性的基础上的纯诗派诗歌，当然正好适合内兹瓦尔所特有的才能。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这样一种诗歌形象性：它不根据诗的逻辑规律，而是通过概念的随心所欲的自动组合和对诗歌语言音韵的强调，将各个画面联在一起。这个流派实际上把诗歌当作一项游戏。想通过这种随意性把人从社会制度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并从日常生活本身中随意创造出诗歌。这种对形式的强调和形式的革命，一直发展到不带标点的诗歌。诗人想以此来表明，他不象其他诗人那样注重思想的逻辑联系，注重思想的优先地位。他所强调的是概念的自由流动和表现在诗的鲜明旋律上的声韵方面。

内兹瓦尔继他的处女作《桥》(1920）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带纯诗派色彩的诗集，其中最著名的是《夜之诗》。在这

一集子里，内兹瓦尔收录了他的纯诗派诗歌的压卷之作《爱迪生》（1924）。这首诗是诗人对于文明进步和人类思想的信念的表现。一个到了自杀边缘的诗人被人类劳动成果所吸引住，因此写出一首诗来歌咏他那时代最大的一位发明家。爱迪生的劳动是艰辛的，但是对于诗人来说却富有冒险的魅力。内兹瓦尔认为，发明家的创造性活动同诗人的劳动颇为相似。

诗人从爱迪生生活中的几件事出发："有一回，一位冒险家漫步纽约街头……；行人默默无言地在百老汇停下……，一个平常的礼拜天，啊，多少清脆的钟声……；一天只睡五小时——您就觉得够了……有一次您看到了宾夕法尼亚的黑夜和贝克的弧光灯……"。这些事在诗人的想象中引出一系列诗的画面，然而这已不再象以前的诗那样带有自在的目的，而是发挥了他的基本概念。

总是重新生活和满怀着热情，
有一回您看到了宾夕法尼亚
　　的黑夜和贝克的弧光灯，
您象我昨天那样，
　　为自己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页感到忧愁，
您象走过广阔田地的杂技演员，
您象生下了婴儿的母亲，
您象捕满一网鱼的渔民……

类似这种在"象"字后面跟上一个变换着的形象的句子

还为数不少。

同诗歌的其它部分一样，上述部分也是以互相呼应的两句作为结束的：

这里面却有一种美好的东西，
被生和死中的勇气与欢乐所粉碎。

这两句使人联想起诗的开头的两句（“这里面有一种悲伤的东西……”），并从这种克服个人痛苦之中认识内兹瓦尔的乐观主义。

然而就是在这个纯诗主义的时期，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与现实有直接关系的诗句，内兹瓦尔在这些诗句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社会属性：

给我武器吧，让我也站起来！
给我做一个最大的帽徽吧，
有的东西对我过剩，有的却还缺乏，
共产党宣言特别合我心意。

（《绝妙的魔术师》）

现代主义纯诗派的诗歌概念除有某些正面特点之外，还包含着一种基本的危险倾向，它在一段时期内使内兹瓦尔进一步脱离现实，偏向超现实主义，这是某些法国诗人所鼓吹的文学流派。他们还力图在理论上强调自己的革命性，渴望人的解放。根据超现实主义流派的观点，人在没有用纪律来约束思想的地方，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或市侩

道德的法规或偏见的地方，也就是在下意识或梦中，才能得到解放。超现实主义者认为诗歌应该写得同梦幻一样。这种梦幻将自身的因素和外界的刺激变了个样，它已完全不依赖于逻辑思维的规律，在概念的自动组合的基础上将这些自身的感觉和外来的印象串在一起。显然，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诗歌（尽管它们的作者也强调其革命性），比纯诗派的诗歌更加晦涩难懂。

内兹瓦尔虽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但他的诗还不是简单的超现实主义作品。首先，他那植根于农村的健康的感受力和形象性挽救了他，把他引导到写作近乎民歌的朴素小调，诗人的世界观也是他的重要支柱。因此，在他这个时期的诗集如《回程票》中，我们可以找到诗人一系列受当时经济危机和失业情况的影响而写出的诗，和反映内兹瓦尔对苏联的肯定态度的诗。诗人认为，"只要还有一人挨饿"，战争就不会结束，垄断帝国主义的代表罗希尔德家族[1]和福特们不垮台，就还得流许多鲜血。

但世界的一部分毕竟已经好转。为此诗人写了《催促启程》一诗，呼唤恋人启程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去：

在那里，人会找到工作，
在那里，工人不必挨饿，

① 银行家家族，发迹于麦·安·罗希尔德(1743—1812)在德国法兰克福开设的一个兑换所，是一个分支很多的财政寡头集团。

在那里，我们可以象鸟儿一般
生活、歌唱和相爱。

内兹瓦尔这首诗是在纳粹的危险威胁本民族的时期写的。内兹瓦尔对苏联的肯定态度和对法西斯的仇恨，使他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大相径庭。这是他鲜明的政治态度的表现，这种态度终于使内兹瓦尔认识到超现实主义理论的危险的政治后果，因此他公开与超现实主义决裂了。诗人象绝大部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样艰难地度过了这一时期。他对身患重病的母亲的担忧和对整个民族的忧虑已融为一体。这种感情状况使他创作出诗集《希望之母》。在诗集中，他作为儿子的忧虑与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心交织在一起。

随着纳粹危险的日益增长，国内一切进步力量的团结不断增强。捷克诗人，其中包括内兹瓦尔，站在最前列。

诗人在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生死攸关的年代里所写的诗，收入了诗集《城外五分钟》。在这里，内兹瓦尔以简朴的诗歌手段表现了对纳粹占领行为的反抗。

内兹瓦尔还将一部分描绘历史画面的诗收录在这本诗集里。这些诗表现了对祖国所处危境的担忧、保卫祖国的决心、慕尼黑协定后放弃边防所引起的悲伤、捷克人民在占领时期的希望，以及对一九四五年五月布拉格人民革命起义的歌颂。

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诗人也未曾灰心丧气，他凭着

对民族的信念生活着，并为加强人民的力量而斗争。

丧钟发出嘶哑的声音，
在钟声下，民族问它的男儿们：现在该怎么办？
响起的回声是：时间，时间，时间！

解放后，内兹瓦尔为新的胜利的现实而欢欣鼓舞，尽管他未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诗歌创作方法；他歌唱获得自由和建设中的欢乐，表达对解放者苏联的感激，抒发对祖国的炽烈的爱。这便是他一系列诗集和长诗《和平之歌》、《故乡》、《翅膀》、《矢车菊与城镇》的内容。

在他的诗篇《和平之歌》的每一节中反复出现的和平呼声极为强烈。该诗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年之后，世上又有人叫嚣新的战争的时期。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了斯德哥尔摩和平签名运动。诗人以自己这首伟大的诗篇参加了这次世界性活动。

在这首诗里，诗人列举了他拥护和平并高唱和平之歌的理由：为了让人能活得长久；让你的孩子不致面无血色；使蔚蓝的天空不变成凶手的降落伞；使巴黎、布拉格、罗马……不变成庞培[①]。诗人为合作化后的农户，为恋人的拥抱和亲吻，为每日的宁静的睡眠，为草莓一般亮晶晶的孩子的眼睛——为人生在世能幸福地劳动和享受爱情而高唱和平之歌。这里反映出了社会主义诗人对人的肯定态度。

---

① 意大利城市，于火山爆发时被掩埋。

内兹瓦尔把每一幅诗歌图画当作生活的具体概念，因此从祖国的概念（见《让在拉贝河岸种植树木的捷克园丁……》）转到苏联即全体劳动人民的祖国（“那早已存在的、梦和幻想已经兑现的国家，那个使人能象人一样生活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首抒情诗，内兹瓦尔在其中道出了他写诗的全部缘由，而每一部分又都再现着他的主要思想。

在这个时期的另一首以斯美塔纳的曲子为名的诗歌《故乡》里，诗人表白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伟大的爱，在序诗中他开宗明义表达了诗人在民族中的使命：

象牧童一样吹着短笛，
这就是诗人的荣誉和命运。

诗人必须将一个普通人的一切内心活动表现出来，内兹瓦尔追述摩拉维亚农村，歌唱它的生活中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一种正在诞生的更美好更幸福的新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人能享受自己作为人的命运的一切喜悦。

诗人在回忆中叙述他度过青年时代的农村，描绘它过去和现在的图景。他始终注视着未来，深信“人类终将消除苦痛，不会再受折磨”，必将出现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人将变得坚强有力，“碰上艰难险阻也决不会自甘堕落，或因苦痛而逃避生活。”

通过这首诗（就象这个时期他的其它诗作一样），内兹瓦尔创造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诗歌。他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力图大大增强人的欢乐和建设新生活的勇气。

内兹瓦尔的作品极其丰富和广泛。除诗集以外，他还试写过几部小说和剧本(例如《售货亭中的情侣》、《玛诺·莱斯科》以及《大西洋的太阳仍要落下》)。

内兹瓦尔走过一条漫长而复杂的文学发展道路。丰富的想象和由创作新的诗的画面、不倦地探索艺术形式而引起的无穷的欢乐，常常是他创作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创作方法不是不担风险的。然而内兹瓦尔在人民中扎根和他的政治觉悟，使他有可能克服这种危险。他的作品成了捷克现代诗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鉴于内兹瓦尔对捷克文学所作的贡献，一九五三年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斯 洛 伐 克 部 分

一　古斯洛伐克文学发展概述

古斯洛伐克文学史在时间上与捷克文学史的发展是相吻合的。它始于九世纪，终于十八世纪末。在为斯洛伐克和捷克创造了共同的知识文化基础的古斯拉夫时期之后，在大摩拉维亚公国崩溃约一千年之后，在匈牙利国家①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范围内，形成了斯洛伐克的文化生活。尽管斯洛伐克文学在另一种条件下走过了它独自发展的道路，但它并未中断与捷克的文化联系，在某些时期甚至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了这种联系。从胡斯运动时期起，斯洛伐克和捷克更是保持着一种活跃的文化关系。胡斯运动在斯洛伐克引起过良好的反响，大大促进了斯洛伐克的民族与文化生活的发展。从十五世纪起，斯洛伐克除拉丁文外，开始将捷克文作为自己的书面语言，这对斯洛伐克的知识民主化是个巨大贡献。许多斯洛伐克人也曾促进捷克文化的发展，他们就是著名的胡斯革命者杨·耶塞尼乌斯·叶森斯基，内多热尔人瓦夫希内茨·贝内蒂克迪、巴维尔·基尔麦采尔等。

---

① 从十一世纪初至一九一八年，斯洛伐克属匈牙利的版图。

封建社会的发展确定了整个文学的特点。在斯洛伐克，文学也是特权阶级的财产，宗教文学占统治地位。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世俗题材和现实主义因素开始渗入文学。

民间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上成为最进步的文学。斯洛伐克民间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证明斯洛伐克人民具有伟大的艺术天才。与那些低估我国文化的人相反，杨·科拉尔引用了民间文学（见《民歌》集中的讽刺短诗）：

外国人说，我们的人民没有文化教养，
什么话？你们应该为人民歌唱，
人民在为我们歌唱。

十七世纪，描绘农奴艰苦生活的斯洛伐克民歌有了发展。在侠盗歌谣中，反抗的特色最为明显。这些歌谣赞颂绿林好汉（杨诺西克），他们体现着人民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和对公正社会的设想。十九世纪上半叶，从民间文学的革命传统和艺术珍品中产生了创作文学。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匈牙利封建社会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开始兴起，这是现代斯洛伐克民族形成的时期。封建社会的领导阶层、贵族与上层僧侣参与了强大的匈牙利民族运动。市民阶层大多为德意志人，只有农村人民忠于自己的民族。斯洛伐克民族运动中唯一有觉悟的活动家是知识分子、传教士和来自民间的教员。他们竭

力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提高斯洛伐克人民的地位。使祖国语言经过规范化成为书面语言的行动，是斯洛伐克民族复兴初期最有意义的文化活动。首先尝试这项工作的是约瑟夫·伊格纳茨·巴伊扎，但他的书面语言未被采用。安东宁·贝尔诺拉克（1813 年卒）却获得了成功。他以坚实的语言科学著作支持了新的书面语言（见《斯洛伐克—捷克—拉丁—德语—匈牙利语字典》）。

斯洛伐克西部方言是这一书面语言的基础，因为斯洛伐克西部在匈牙利占有重要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地位。将民间语言用于文学这一行动，激起了保守集团的反对，它未能成为全民语言，在什图尔出现以前，人们一直用捷克语（所谓的《圣经》语言，传布福音者的礼拜语言）写作。

约瑟夫·伊格纳茨·巴伊扎和尤拉伊·方德利是斯洛伐克启蒙文学的主要代表。

约瑟夫·伊格纳茨·巴伊扎（1836 年卒）在其两卷本小说《少年列内的故事和阅历》中，真实刻画了人民的贫困与显贵们的奢侈生活。

尤拉伊·方德利（1811年卒）以其大胆的作品《修士与魔鬼的密约》进入文坛，它通过修士与启蒙思想的代表者——魔鬼谈话的形式，赞扬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改革。当教会把一些宗教书毁掉之后，约瑟夫二世便开始为人民出版一系列有教益的农业著作。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斯洛伐克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新时期，出现了杨·科拉尔、巴·约·沙法希克和杨·霍利一代

作家。前两位对捷克民族复兴也作过重大贡献，并且具有全斯拉夫的意义。而杨·霍利则是第一位伟大的斯洛伐克诗人。

杨·霍利(1785—1849)是别什詹附近的玛杜尼采一位牧师。他根据中古时期的范例，第一个用诗歌颂了勇士时代的斯洛伐克与斯拉夫的历史，如描写大摩拉维亚公国历史上的英雄的史诗《斯瓦托普卢克》、记述基里尔与麦托迪在斯洛伐克的活动的《基里尔与麦托迪》，以及反映斯洛伐克远古时期的史诗《光辉的日子》。霍利的史诗展示了斯拉夫的光荣的过去，增强了斯拉夫与斯洛伐克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自豪感。

除英雄史诗外，霍利还写过田园诗、悲歌和颂歌。他最早把斯洛伐克的民间人物形象写进文学，第一个歌颂斯洛伐克大自然的美。其全部作品都用格律诗形式写成。

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斯洛伐克爱国戏剧的萌芽，最有成就的斯洛伐克剧作家为杨·哈卢普卡（1791—1871)。他写过几部喜剧，以嘲笑小市民的偏见、贪婪、造谣中伤和缺乏民族觉悟(如《柯楚尔科沃》)。

二 什图尔时期的斯洛伐克文学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斯洛伐克民族运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十年中进入生活的新的一代，其文化与政治活动达到了高峰。这就是什图尔派一代，其名称来自他们的主要代表与新的民族运动纲领的起草人。

什图尔派继承了贝尔诺拉克特别是科拉尔时期的启蒙纲领。不同的是，什图尔派有意识地将社会问题与民族政治问题列入了自己的纲领。他们纲领的主要目的是把人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施以教育，提高其民族觉悟。因此什图尔派直接在人民中进行工作：在经济问题上指导他们，创办农民团体、互助会、粮仓和园艺协会，建立阅览室、礼拜日学校和禁酒协会。

由于启蒙和政治的原因，对斯洛伐克书面语言的问题不得不加以彻底解决。天主教徒至今还使用贝尔诺拉克作为书面语来宣传的斯洛伐克西部方言；福音教徒却使用兄弟会的《圣经》语言。民族运动的团结统一要求斯洛伐克人在使用书面语方面也统一起来，吕德维特·什图尔、约瑟夫·米洛斯拉夫·霍尔班和米哈尔·米洛斯拉夫·霍乔作为年轻一代的领袖，决定将斯洛伐克中部生动的口语定为

书面语。几乎整个年轻一代都接受了这一新的书面语，而杨·科拉尔为首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中比较年老保守的一部分则加以反对。科拉尔认为推行新的书面语不仅会破坏斯拉夫人团结，而且会玷辱文学，认为文学会因此而陷入“人民共同性和黑暗的泥潭”。然而科拉尔在这一问题上是大错特错、站到反进步力量的立场去了。后来的发展证明年轻一代是正确的。

新的书面语言成了反对日益加剧的匈牙利化的有效工具，成了报刊的语言。什图尔从一八四五年起发行政治报纸《斯洛伐克民族报》，并附有文学副刊《塔特拉雄鹰》。霍尔班用新的书面语发行了题名《心灵》的文艺作品丛书和文化杂志《斯洛伐克科学、艺术、文学概观》。

新的书面语言促进了斯洛伐克文学创作的丰收。文学成为人民的文学，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倾向上也是如此。什图尔派诗人和小说家从人民生活、革命传统和斯洛伐克大自然中汲取灵感。他们完全放弃了曾经盛行一时的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模仿，而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师法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的各种形式中，他们尤其喜爱民间故事诗。但并未停留在对民间诗歌的模仿上，而是创造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学形式。

除民间文学外，其它斯拉夫民族的革命浪漫主义者的作品对什图尔派作者也发生过有利的影响。在斯洛伐克，人们首先理解和接受了卡·希·马哈的作品，甚至进而反对捷克批评家和保卫诗人马哈。斯洛伐克浪漫主义先驱卡

罗尔·库兹玛尼写诗哀悼马哈的逝世，马哈的《五月》更是年轻的什图尔派最喜爱的作品之一。除捷克的浪漫主义者之外，亚当·密茨凯维支的诗，其后还有普希金的诗，都对他们起过作用。

什图尔派中最著名的诗人有萨莫·哈卢普卡、安德列伊·斯拉特科维支、杨科·克拉尔以及杨·博多。小说家有约·米·霍尔班和杨·卡林恰克。

1 吕德维特·什图尔

吕德维特·什图尔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斯洛伐克政治与文化生活的领导人物，在他的旗帜下为新的书面语言与新的斯洛伐克文学奠定基础的那一代人，已被载入史册。

什图尔以一八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诞生于乌赫罗夫采。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学习期间就开始从事社会活动，成为学生团体"捷克一斯洛伐克"协会的领导成员。在三十年代，这个组织不仅是布拉迪斯拉发中学生民族觉悟的源泉，而且用民族精神指导其它学校（如克日马尔科、摩德尔和其它地方）的学生团体工作及散布于斯洛伐克农村的爱国者的活动，从而形成斯洛伐克新一代的思想与组织的统一局面，以及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中心。

协会成员在会上朗诵爱国诗歌，讲授和评论他们的文学作品，彼此以兄弟相称，互相帮助，一同参观祖国的名胜古迹；什图尔以其无懈可击的生活与勤奋努力，为其他人树

立了榜样。一八三七年协会被取缔，什图尔成为布拉迪斯拉发中学捷克斯洛伐克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他在哈莱完成学业后，重新回到青年中进行活动，但满怀敌意的学校当局于一八四三年禁止他授课。部分斯洛伐克青年学生离开布拉迪斯拉发前往莱沃切，以表示对这道禁令的抗议。什图尔仍留在布拉迪斯拉发，完全献身于社会文化与政治工作。他撰写反对匈牙利化的小册子，又是使新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规范化的人物之一。他在《斯洛伐克方言和将它用于书写的必要性》一书中，阐明了推行新的书面语的理由，并在《斯洛伐克语言学》(1846)一书中创造了新的书面语语法。

一八四五年，什图尔获准发行政治杂志《斯洛伐克民族报》，在该刊发表了进步的社会与民族纲领。他要求废除劳役，向贵族征税，发展贸易与工业，普及教育，推广法治的民主原则。一八四七年，什图尔成为匈牙利议会议员，在议会演说中，他第一个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为斯洛伐克人创办学校。

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议会宣布废除农奴制与书刊检查，实行自由结社，什图尔同其他斯洛伐克民族运动领袖一样，满足于这种部分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未坚持人民的革命要求。当帝国境内的匈牙利当局拒绝斯洛伐克民族的要求时，什图尔、霍尔班和霍乔建立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捷克军官支援下展开反对匈牙利政府的武装斗争，这无异是帮助维也纳政府对匈牙利革命进行镇压。

革命失败后，什图尔住在摩德尔，受到警察的监视。他

在那里写成《斯拉夫各民族与未来世界》，以阐明他对斯拉夫问题的观点，对俄国表示信任。该书的俄译本在他逝世之后才出版。什图尔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归附俄国是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俄罗斯民族的伟大与力量是所有斯拉夫民族的自由与发展的保障。什图尔无疑把沙皇专制和俄国的宗教理想化了。尽管他因此掩饰了俄国沙皇专制的反动面目，但他仍然要求俄国废除封建制度，接受法国革命的社会成果。

什图尔在斯洛伐克民族与文化生活中的意义同他的文学作品是密切相关的。他不仅是语言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而且是诗人、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

什图尔的早期文学创作是一些用捷克文写成的诗歌，其中以组诗《黄昏中的小舍》最出色。这些诗表达了一种苦闷心情——不只是艰难的过去，还有贫困的现在、被奴役者的命运和农奴制所引起的苦闷心情。什图尔相信，只要团结起来，投入斗争，新的未来就为期不远：

> 高举吧，高举起斯洛伐克民族的旗帜！
> 你是真正的斯洛伐克人，就请紧握住你的利剑。
> 即使死，也该象自由人那样死去，
> 但我们要保卫祖国，摆脱沉重的锁链！

什图尔的情诗也别具一格。特别突出的是《离别》一诗，其中写诗人告别恋人，以便全力为民族而工作。在生活与诗歌中，他都用这种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目标的精神来

要求他的拥护者。

什图尔的诗歌收录在《歌与诗》（1853）这唯一的集子中，其中包括斯洛伐克语化了的捷克文诗歌、家庭回忆录以及取材于斯洛伐克历史的勇士歌。

什图尔不仅以自己的显然是向浪漫主义过渡的诗歌创作，而且以更为鲜明生动的讲演、以他的文艺观点影响着斯洛伐克文学。他要求文学履行重大的社会使命，为达到这一目的，文学必须在思想上、表达手段上借助于民间创作来复兴。做到这一点的一项必要条件，是进一步接受生动的民间语言作为书面语言。

什图尔在《论斯洛伐克部族的民歌与传说》(1853)一书中，阐述了他对艺术、文学和民间创作的观点。他把诗歌、主要是把斯洛伐克民间文学看作艺术的高峰。他相信斯拉夫人会创作出不颂扬个人，而是为全民服务的新的诗歌。正如其他民族各以自己的方式蜚声文艺界（如希腊人的雕塑、罗马人的绘画，以及日耳曼人的音乐）一样，斯拉夫人则以诗歌驰名于世，因为他们最善于用诗歌来从艺术上表现自己。

什图尔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他的同代人。他们接受他的文学观点，根据它创作出充满生活真实性并具有高度艺术效果的作品。

什图尔由于偶然的原因，在一次狩猎中不幸中弹，于一八五六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当时他还年轻。全斯洛伐克为他的逝世而悲痛，因为失去了一位无私的启蒙学者和整个

一代人所公认的领袖。

2 萨莫·哈卢普卡

萨莫·哈卢普卡(1812—1883)是什图尔一代诗人中第一个在创作上巧妙地吸收了民间文学的人。他写过情诗，还以历史上的和他故乡的民间故事为题材写过作品。他终生在他土生土长的地方——王岭下的霍尔纳·莱霍塔当牧师。

哈卢普卡的诗，最突出的特点是那民族自豪感与对为自由、为社会与民族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的战士的歌颂。战士这个形象作为诗人对自由、平等与正义的概念的体现，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诗中。他的诗再现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传统，描绘了侠客式的民间英雄。

在哈卢普卡的诗作里，杨诺西克的形象第一次照民间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出现于文学之中。这是一位劫富济贫、为社会冤屈打抱不平的勇士。他和他的王岭好汉们，都是为自由、真理的胜利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战士。

哈卢普卡的历史叙事诗《耶尔沙瓦的战斗》与《土耳其人的波尼昌》，是在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哈卢普卡将反土耳其的民歌片段如此巧妙地化为一篇具有人民精神的诗，以致它很快就变成全民族的东西了。

哈卢普卡最著名的诗为《干掉他!》，这是一首关于斯洛伐克好汉们的团结的英雄诗。据说四世纪时，罗马皇帝的

强大军队企图征服斯洛伐克领土，这些小伙子就在抗敌斗争中牺牲了。

诗的情节很简单。正当罗马皇帝怀着侵略野心，率领大军进逼斯洛伐克边境时，斯洛伐克好汉们给了他一封信，倡议修好。皇帝傲慢地拒绝了他们的问候，并宣布要将整个民族降为奴隶。好汉们高呼着“干掉他！”的口号向他冲去，在战斗中全部牺牲。

哈卢普卡在诗中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民主信念、民族自豪感和对斯洛伐克的热爱。他高度评价了为民族自由而作出的慷慨牺牲。哈卢普卡用来描绘斯洛伐克好汉的那些诗句闪烁着民族自豪的光辉。他们形象俊美，健壮如杉，坚强如崖石。他们不向皇帝卑躬屈节，而是以自由国土之子的身份，充满尊严地向他提出友好和平的倡议。哈卢普卡将现代的民主思想和关于自由和民权的革命概念移到了古代斯洛伐克。

哈卢普卡将他对古代斯洛伐克人生活的理想化的看法与斯洛伐克的大自然图景结合在一起。诗的结尾强有力地发出了为自由而奋斗的战斗号召。

《干掉他！》一诗获得了巨大成就。一代又一代的斯洛伐克人都能背诵它，在反对一切压迫的斗争中用它增强自己的斗志。该诗的革命效果在不久前的年代还有过令人信服的表现。哈卢普卡的《干掉他！》曾经是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时期人们互相间的战斗问候语。

哈卢普卡的作品不多，因为他太重视诗歌的精炼。他

尽力模仿民歌手，或根据忠于原作的精神对民歌残本加以补充。象民间诗歌一样，他的诗无论在思想发展或表现手法上都朴实无华。诗的语言明朗、准确。哈卢普卡使用含有一定数量音节的诗句和民间文学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法，常常通过诗句中词的形声排列来达到音乐效果。

3　杨科·克拉尔

杨科·克拉尔是什图尔派一位最革命的诗人。他的诗作代表斯洛伐克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峰。

克拉尔一八二二年生于利普托夫斯基·米古拉什。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学习期间已开始写作，什图尔被撤去教职时，克拉尔是签名向当局抗议并离开布拉迪斯拉发的学生之一。结业后，他在布达佩斯当律师。在革命的一八四八年春天，他向人民宣讲废除农奴制的新法律，唤醒人民起来反对贵族，为此遭到监禁。出狱后加入斯洛伐克起义者的行列，革命结束后任职员，在金摩拉夫采度过晚年，一八七六年逝世。

杨科·克拉尔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诗也是如此，充满着矛盾。他的生活与诗作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反抗精神。克拉尔是一位革命者，对斯洛伐克的民族与社会生活的观点非常激进。这就是他的大部分诗作未能发表的主要原因。这些诗包括对社会的批评，此外也是他个人的情绪、主要是悲伤情绪的表现，这可不符合什图尔对诗的要求了。

克拉尔十分熟悉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与情绪，在创作道路上他特别注意杨诺西克传统，将歌曲、童话和传说都记录下来。从对人民生活及其文学的透彻了解中产生了他的诗作。最初是一种民间诗歌的、主要是民间故事诗的回声，后来是关于斯洛伐克的现状、人民暴动（如《杨诺西克阶段》）和革命情景的思考，关于人类问题的思考（如《世界戏剧》）。

克拉尔的《回声》集里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民间故事诗《被妖魔控制在瓦赫河中的少女和古怪的杨科》，诗人在诗中刻画了他自己。他看到人世间的贫困与不平，所以才避开社会和这充满虚伪与敌意的世界，在友好的人们中寻求慰藉。克拉尔的其它民间故事诗，则是针对社会问题而写的。克拉尔逐渐从民歌的回声过渡到抒情诗，在抒情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情绪、不满与愿望。这是刻画浪漫主义诗人的灵魂的诗。从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哀伤、逃向大自然和悲观主义。他想逃离这个世界，因为“对他来说，自由的飞翔比那整个广阔的世界更亲切可爱”。克拉尔的不满不仅表现在心情缭乱和个人与社会的不融洽上，它还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即来源于人民的悲惨状况与不满情绪。因此从他早期的作品开始，在自觉的反抗与对现实社会的叛逆的题材中，就已饱含着他对现实的不满与逃避这敌意世界的浪漫主义愿望。

一个富有反抗性的诗人在他的作品中不可能不重视有关杨诺西克的题材。正是这些经过加工整理的诗歌最清楚

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态度。他的《杨诺西克阶段》没有把杨诺西克描绘成历史人物。诗人认为这个形象体现了从杨诺西克时期直至现在的人民的反抗斗争。克拉尔强调人民反抗斗争的社会原因:不能容忍的农奴制关系,主人使农奴遭受的非人待遇。本着这一反抗精神,克拉尔欣然迎接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春天。他的热情与战斗精神也体现在他的歌曲中,《春之歌》唤醒斯洛伐克人起来斗争,号召他们团结,因为他看到斯拉夫民族上空也出现了自由的曙光。

在《世界的戏剧》组诗中,克拉尔想解决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权利、正义、宗教、民族自由以及斯拉夫人在人类中的使命问题。但作品未能终稿。其中有些诗非常出色,表明克拉尔正确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并真正认识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如《恶神》)。然而他想通过世界的道德新生来纠正邪恶;与此同时,他强调斯拉夫民族的救世主使命。他期待着在骚乱与重大变革之后出现人类的新世纪,博爱、和平与正义的世纪。他认为这个世纪的领导作用正是要落在斯拉夫人的肩上。

杨科·克拉尔的诗在语言与形式方面同民间文学相近。克拉尔这样表达了他的诗作的本质:他说他有些诗好象是“从田野里,而不是从正在写作的艺术家手中传出来的声音”。克拉尔是浪漫主义民间故事诗的创作者,这种诗虽然具有民间情调,但同时解决着严肃的社会问题。克拉尔的诗惯用的艺术手法是对比。他的诗的词汇(表示亲昵的词或与之相反的乃至粗暴的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与哈卢普卡的诗相比，克拉尔的诗更富有戏剧性。克拉尔爱用第一人称和现在时来发抒情怀。

4　安德列伊·斯拉特科维支

安德列伊·斯拉特科维支是什图尔派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不仅从民间创作，而且也从本国及世界文学中获得启示。

他于一八二〇年诞生在克鲁宾纳，是一位名叫布拉克萨托利斯的教员的儿子，斯拉特科维支是他发表诗作时的笔名。学业结束后他在国内外任家庭教师，后为拉德瓦尼的传教士。一八七二年逝世。

斯拉特科维支的求学地点对他的诗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什恰夫尼采居住期间，他经历过一次最有意义的爱情；在布拉迪斯拉发时期，什图尔对他很有影响；在哈莱，他接触到普希金的作品。从这些启示中产生了他的诗歌创作，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抒情叙事诗集《玛林娜》和《杰特旺》。他的即兴诗也很出色，在这类诗中，他欢迎一八四八年春天的自由，捍卫书面的斯洛伐克语，宣扬胡斯运动传统，渴望友谊和睦。

在诗集《玛林娜》(1846)中，斯拉特科维支大胆地超越了什图尔为诗歌规定的题材范围（斯拉夫民族间的亲密关系、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在《玛林娜》这篇长诗中，诗人歌颂美和青春，倾吐自己对玛林娜的爱。《玛林娜》开头是一

系列欢快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抒情集锦，斯拉特科维支用这些画面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青春活力和他对青年时代的思绪。然而，当双亲强迫玛林娜嫁给一个豪富的求婚者时，斯拉特科维支将沉郁的民间故事诗的成分加进原来的结构，还将神话中的仙女、女妖之类的人物安排到作品里，从而更加突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玛林娜》首先是一篇歌颂美的热烈赞歌。亲爱的玛林娜对诗人来说是一切美的化身。他对她的爱情是美好而纯洁的；但对诗人的个人幸福来说，仅仅有对情人的爱是不够的，他希望在爱中拥抱一切人。正如科拉尔将自己的心分给祖国与米娜一样，斯拉特科维支也有"双重伟大的爱"，他渴望：

> 对亲爱的祖国的爱，寓于美丽的玛林娜之中，
> 对亲爱的玛林娜的爱，寓于美好的祖国之中，
> 二者融为一体。

然而斯拉特科维支对恋人、人民和祖国的爱并不意味着感情的陶醉，他的爱是能够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和情感，它能促使他去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同时，斯拉特科维支还歌颂青年时代。青年时代不只是生理上富有朝气的年华，而且意味着青春活力与战斗精神。青年时期不仅永远渴望爱情与美，而且渴望争得新生活与夺取新世界。

在斯拉特科维支与玛林娜的悲剧性分离以后，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帮助他得到了一些补偿。斯拉特科维支与科

拉尔不同：科拉尔将他的恋人变为一个幻影，并追随她一直走到阴间；而当玛林娜已成为斯拉特科维支生活中高攀不上的人物时，他却毅然放弃了对她的爱情。他战胜了玛林娜——女妖对他的诱惑，因为需要他的那个祖国是在人间。

在《玛林娜》中，斯拉特科维支刻画了他自身，表现了他自己的感情。与此相反，他的第二本伟大诗集《杰特旺》(1846完稿，1853出版)的主人公却是人民，即书中的主要人物杰特旺青年马尔丁和他的恋人艾莱娜。

《杰特旺》由五首歌组成，故事情节简单。马尔丁杀死一只鹰，当他得知这只鹰属于马蒂西什国王时，立即前往认罪。国王欣赏他的勇武精神，将他编入自己著名的黑衫团队里。

斯拉特科维支并未考虑要表现波里亚纳山下的真实图景，也不打算反映过去与现今时代的社会矛盾。他只想提醒大家把人民看作社会的健全基础，看到人民的才干是较为美好的生活的保证。斯拉特科维支赞扬民间艺术和杰特旺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认为人民是斯洛伐克艺术发展的保证和民族的支柱，斯拉特科维支的民族自豪感就是来源于他对人民的信任。马尔丁和艾莱娜是人民的形象，斯洛伐克精神的“固有的典范”。斯拉特科维支相信人民及其才能的观点，表现在他所编的故事的思想深度上。诗中对斯洛伐克美丽的自然景物，主要是马尔丁的故乡杰特旺的画面，描绘得非常出色。

斯拉特科维支的诗歌，就思想、政治和主题而言都属于什图尔派。他是什图尔派中唯一创造了并非由民间文学派生出来、而是有自己特点的艺术形式的诗人。斯拉特科维支创造了一种较为复杂的艺术形式，以便与其诗歌的复杂题材相适应（如带有复杂的句子结构以及复杂的韵律顺序的十行诗节）。因此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民间诗歌与文人诗歌的艺术遗产。《杰特旺》由于语言优美，被誉为斯洛伐克书面语言最出色的辉煌成果。

5 杨·博多

杨·博多是什图尔派诗歌四杰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以一八二七年生于维什尼·斯卡尔尼克，在莱沃切求学期间了解到什图尔的纲领，因为正当他求学时期，为什图尔被撤职而愤然抗议、离开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些大学生也到了那里。学业结束后他成为林业工程师。一八八一年在班斯卡·比斯特利采逝世。

博多在莱沃切已开始文学创作。他的诗的主要源泉是民间文学。他根据民歌和童话的主题创作寓言式的画面，将斯洛伐克描绘成一片曾经被妖术所控制而后由善的力量解放出来的土地。他还从对土耳其战争期间的民间故事诗和军歌中汲取素材与灵感。他创作过具有民间风格的、艺术完美的故事诗。

博多的主要作品是《杨诺西克之死》(1862)。博多这位

农民之子，在斯洛伐克诗人中对杨诺西克的民间传说感受最多，并用这种精神创造出了关于杨诺西克的最优美的诗歌。他把杨诺西克作为一个自由的英雄豪杰，然而博多赋予杨诺西克传说以民族的意义：将他当作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战士。

诗人称自己的诗集为浪漫曲。有序诗和九个诗章。在并不繁杂的故事情节里，穿插着若干推论、自然描写和插曲。因此这本集子使人联想起马哈的《五月》。

诗人没有讲述杨诺西克的整个生平，只限于写他的悲剧性结局。序诗维护王岭好汉们，歌颂自由生活。杨诺西克在第一诗章里就已被捕，在后面的几章里博多设想杨诺西克的狱中情境，他与情人的离别，对生死问题的考虑。杨诺西克在监狱里做着自由与解放的好梦。拂晓时他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在震撼人心的独白中问道：谁的罪恶更大，是他还是刽子手？他进行侠盗式的活动是为了捍卫真理，惩办犯罪的人，而“豺狼般的法律”却将他判处死刑。但是正义和清算之日必将来到：

上帝的勇士将要来到，一定来到，
在祭坛上将被践踏的《圣经》宣讲。
伟大的审判日将要来到，必须来到，
我们人民的真理将出现在审判台旁！

杨诺西克临死前辞别故乡，死后到处一片悲凄，如同一片被妖术控制的大地，任何地方也看不见一点新生活的征

兆。博多就这样描绘了当时即革命失败后斯洛伐克生活惨淡凄凉与毫无出路的状况。然而人民相信，杨诺西克没有死。因此博多在杨诺西克与王后结婚的最后讽喻画面中，预示了被解放的斯洛伐克人民和祖国的更大胜利。

《杨诺西克之死》在诗的技巧上是很成功的。博多往往将自己的诗置于尖锐的对比之中，他以丰富的比喻充实画面，用和谐的声韵加以润饰，他不用分节的办法，而是根据各节的题材内容（推论、歌的结构）自由地转换诗段。诗的韵律并不统一，以长短不等的诗句将抒情、咏怀、演唱诗和婚礼曲分别开来。最富于旋律性的是第六个音节之后、带有明显停顿的十二音节的诗句（典型的什图尔派诗句）。

6 什图尔派小说的发展

什图尔将诗歌视为艺术的顶峰，因此他那一派人大多写抒情诗，不十分注重小说。他们中成功的小说家仅有约瑟夫·米洛斯拉夫·霍尔班和杨·卡林恰克两人，其中以卡林恰克声誉较高。

约瑟夫·米洛斯拉夫·霍尔班（1817—1888）是什图尔时期斯洛伐克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为促进斯洛伐克书面语的规范化作过贡献。起义期间他任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是斯洛伐克文化生活卓有成效的组织者。他从一八四二年起出版《心灵》文艺丛书（该丛书1844年号是用斯洛伐克书面语撰写的第一本书），一八四六年起

出版《斯洛伐克科学、艺术、文学概观》。他还是杰出的文学史家，所写的引人入胜的吕德维特·什图尔长篇传记颇负盛名。

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以小说最有价值。他的小说作品运用了历史乃至现实生活的题材。历史小说取材于大摩拉维亚公国时期、马托乌什·恰克·特莱昌斯基[①]时期（如《卖油郎》），以及斯拉夫多神教时期（如《戈特夏克》）。这些作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霍尔班将他的主人公理想化，将当代的本民族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愿望写入了历史年代。

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他用讥笑、讽刺来鞭笞当时斯洛伐克社会的小城市的弊端。最成功的作品是短篇小说《从除夕到主显节》，它公开谴责那些荒诞可笑的人物如吝啬的富翁和爱诽谤的市侩，以及他们腐朽的道德和文化上的落后。他的作品（主要是描写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斯洛伐克社会图景。

7 杨·卡林恰克

卡林恰克是什图尔派最著名的小说家。描述小贵族生活的历史小说是他的作品核心。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小贵

---

① 马托乌什·恰克·特莱昌斯基（1260—1321），匈牙利贵族，从一二九七年起任西部斯洛伐克总督。

族家庭，一八二二年诞生于霍尔尼·扎杜尔奇。在布拉迪斯拉发和哈莱结束学业，先后在摩德尔和捷辛的中学任教师和校长。一八七一年卒于马尔丁，他曾在该地出版文学月刊《鹰》。

卡林恰克如同所有什图尔派文人一样，从写诗开始。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历史小说。他的小说分两类：一是浪漫主义小说，一是关于斯洛伐克小贵族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卡林恰克写过一些浪漫主义短篇小说。但不同于霍尔班的是，他不把自己时代的思想与风尚写入作品。他的短篇小说主人公，都是些被激情、爱情、权力欲、复仇心刺激得辗转不安的人；其情节都是借助于神奇的浪漫主义场面、谋杀与意外事件来展开的。自然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映斯洛伐克小贵族生活的小说，写了匈牙利小贵族站在进步方面作斗争的那个历史时期。他还喜欢触及马杰伊① 国王时期和反维也纳的拉科西起义② 时期。

卡林恰克描写斯洛伐克小贵族生活的最优秀作品、他的创作艺术的高峰是《选举》(1860)。在这部作品中他把握住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小贵族的生活，当时他们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崩溃，但在教区选举中，他们有时还能象回光返照似地重振一番声威。卡林恰克以选举为中心，提供了一

---

① 马杰伊(1557—1619)，从一六一一年起为罗马帝国皇帝兼匈、捷国王。

② 拉科西(1676—1735)，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领袖，曾领导一七〇三至一七一一年反哈布斯堡王朝起义。

幅"不久前那段时期的画面"。选举以前，扎霍尔教区的小贵族分成以贝谢尼奥斯基为一方和波托茨基为另一方的两个营垒。他们力争在教区职位中取得第一副职。双方都宴请贿赂选民。波托茨基方面获胜，因为他的党徒以各种营私舞弊，成功地阻挠了对方的部分选民参加选举。

卡林恰克通过马迪亚什·贝谢尼奥斯基，极其巧妙地刻画出一个为了纵酒与金钱而叛卖自己信念的穷贵族的思想与道德面貌。他是选举中的煽动者，但他绝不是出于信念而将选民争取到这一方或另一方，而是出于贪欲。谁行贿多，他就为谁效劳。其他小贵族也同样背信弃义和游手好闲。他们除了偏狭傲慢之外一无所有，既无财产，也无所谓人的荣誉与尊严。

对小贵族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表明小贵族阶层已是一个毫无作为的、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社会阶级。因此，《选举》便成为揭示腐朽封建制度的无能的、不道德的代表人物及陈旧习惯的一幅具有说服力的图画。

《选举》是一部著名的艺术作品。卡林恰克将书中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真实可信，使其成为一种典型。作者称为"图画"的短篇小说，在结构上是根据民间讲故事的习惯创作出来的。严肃的与喜剧性的情景相互交替，采用了不少笑话、幽默与欢乐的故事。对话趣味盎然，还利用了歌曲和童谣。

语言是卡林恰克一项重要的艺术手段。作者大量使用民间的对比与隐喻，尤其是成语和谚语，但也有民间的咒

语。

卡林恰克通过自己的作品，终于使斯洛伐克小说从以往的僵化停滞状态与书卷气的风格中摆脱出来。他的句子结构也非常接近生动的民间语言。就词汇的内涵与丰富多彩而言，卡林恰克是斯洛伐克语言最伟大的宗匠之一。

三　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民族运动与文化生活衰落。起义前站在民族运动前列的许多什图尔派杰出人物沉默了。什图尔本人和霍尔班受到警察监视。巴赫专制主义严重影响了斯洛伐克的政治与文化关系。

斯洛伐克民族生活的敌人企图削弱斯洛伐克文学对人民的影响，因此他们支持破坏语言统一的活动，这种统一是通过什图尔及其合作者的努力而达到的。他们宣布以“古斯洛伐克语”或半斯洛伐克化的捷克语为书面语，并且用这套生搬硬造的语言出版一种官方的、为政府政策服务的《斯洛伐克报》，引起了语言分裂。幸亏这个状况的持续时间不久。什图尔的斯洛伐克语已在民族中深深扎根。用这种语言创作出了哈卢普卡、斯拉特科维支和克拉尔的诗，什图尔的战斗性政治论文，霍尔班和卡林恰克的短篇小说。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文化人中，而且在普通人民中广为传播。建立独立的斯洛伐克语言这一思想已不可阻挡。一八五一年，所有文化人已统一到最后形态的斯洛伐克语上面来，接受按词源学加过工的什图尔语言为书面语。斯洛伐克语的

这一形式实际上一直保持到今天。

巴赫专制垮台之后，斯洛伐克才出现较为活跃的局面。一八六一年开始出版为争取匈牙利境内各民族平等而斗争的《佩斯布丁知识》。该刊对于组织一八六一年马尔丁大会[①]起过重要作用。大批城乡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汇集到大会上，向政府提出要求。这个所谓"备忘录"大会特别要求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领土确定为上匈牙利区（斯洛伐克领土），该区承认斯洛伐克语为官方语言。政府却拒绝了这个"备忘录"。

这次活跃的民族运动的唯一成就是建立了斯洛伐克"马蒂采"(1863)，它是斯洛伐克人最大的文化团体，在许多年里一直组织着斯洛伐克的文化与文学生活。六十年代，政府允许在雷乌采、马尔丁以及下兹涅沃的克拉什托尔开办三所中学。

我们把从成立马蒂采那一年到它被撤销的一八七五年称为马蒂采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更具有人民性。人民成了作家创作的对象，书籍也越来越多地传播到最广泛的阶层中。这一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首推约纳什·扎博尔斯基和杨·帕拉利克。

一八六七年奥匈实行所谓均衡化[②]之后，斯洛伐克的

---

① 一八六一年六月，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在马尔丁举行大会，会上通过《斯洛伐克人民备忘录》，要求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领土从匈牙利王国分离出去，实行自治。

② 即建立二元体制的奥匈帝国。

匈牙利化加剧。在短期内已将一切文化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斯洛伐克马蒂采，于一八七五年被解散，三所斯洛伐克中学也遭到同样命运，从此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事变，斯洛伐克竟没有一所自己的中学。

除民族压迫外，社会压迫也在加剧。一直是农业国的匈牙利，财富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穷苦的斯洛伐克人民无法用贫脊的小块土地养活自己人口众多的一家，纷纷迁往国外。留在国内的便成了本国剥削者、高利贷者和酒馆老板的榨取对象。农村阶级关系日益尖锐化。农村的贫困使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起来，工人阶级开始在整个匈牙利说话了。一八八〇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成立，提出了严肃的社会纲领。

在遭受民族与社会压迫的艰苦状况下，斯洛伐克文化人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的捷克兄弟。他们希望通过加强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合作，来抵御强制推行的匈牙利化。具有丰富传统的文学联系恢复了。斯洛伐克的诗人与作家常在布拉格出版作品，双方都出现了关心兄弟民族命运的作品。斯拉特科维支写过一首优美的诗《这是捷克营地》，歌颂进步的捷克传统。赫维兹多斯拉夫写了献给布拉格、献给伏尔赫利茨基和捷克兄弟的诗。鲍日娜·聂姆佐娃与斯洛伐克文化人有亲密关系，聂鲁达写诗献给斯洛伐克，海杜克的整本诗集《洋琴与小提琴》是歌颂斯洛伐克语言和斯洛伐克人民的。捷克文学在大批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中拥有读者。

国内压迫愈甚，关于斯拉夫人相互关系的思想在斯洛伐克愈发展，对斯拉夫东方寄予的希望也更大。某些斯洛伐克文化人，特别是瓦扬斯基，相信可以指望俄国带来政治解放。他们忘了俄国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压迫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对俄国的兴趣在文化领域表现很明显。斯洛伐克作家研究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典范，接受了俄国古典作家特别是屠格涅夫、果戈理和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

许多作家为可悲的民族处境寻找出路。他们强调知识分子在民族中的领导作用，并企图使逐渐没落和匈牙利化的小贵族阶层得到复兴。然而这个阶层当时确已成为真正"枯萎的树枝"。它异族化了，道德上堕落了，脱离了人民，它的崩溃已无法阻挡。现实主义作品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赫维兹多斯拉夫、塔约夫斯基、库库钦、季姆拉娃和其他人已看到这一现实。

十九世纪末，根据其所办杂志《呼声》而得名的"呼声派"青年文化人社团，起来反对对小贵族的不正确估计、对沙皇俄国的盲从和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呼声派"非常激烈地反对瓦扬斯基的保守主义。他们认为人民是民族的基础，但考虑到人民在物质上的贫困和落后，他们强调必须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反对酗酒，力求提高人民的物质与道德水平，强调知识分子在人民中的作用，在文学上则一贯为现实主义而斗争。

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特点：现实主义的与反现实主义的。一方面，文学中还存在着某些落后的浪漫主义，有些

作家将现实理想化，拔高小贵族阶层，在沙龙环境中寻找题材，以一种过于堆砌的、常常是用词华丽的风格进行创作，脱离了人民生活，瓦扬斯基、肖尔特索娃、万索娃的某些作品就带有这种逃避现实的印记；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取得胜利，它以正确的思想、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反映了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

斯·霍·瓦扬斯基(1847—1916)在十九世纪末的斯洛伐克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市民阶层保守主义社团的代表，先后当过律师和《民族报》编辑，是斯洛伐克民族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他将一生献给了争取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权利的斗争。但他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主张并不总是正确的，特别是因为瓦扬斯基不善于对人民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作出足够的估计。

作为艺术家，瓦扬斯基是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对斯洛伐克人民的爱、对民族与社会压迫的反抗。

他的第一部诗集为《塔特拉山与海》(1870)，这是俄土战争期间他在斯洛伐克南部居留时获得的创作灵感。诗集献给捷克诗人阿·海杜克，以答谢他在其《洋琴与小提琴》一书中对斯洛伐克所表示的特殊兴趣。在诗集中诗人以诗的艺术，成功地表现了瓦扬斯基对故乡的热爱。一首较长的抒情叙事诗《海洛德斯》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两个斯洛伐克孤儿的悲惨故事，表达了将斯洛伐克小孩驱赶到下柴姆尼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匈牙利化表

示了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抗议。

在诗集《桎梏下》(1864)和《诗歌》(1890)中，瓦扬斯基描画了斯洛伐克人民受难的情景。从这些诗集里，我们可以发现象《木筏工》和《小小箍桶匠》等这样的诗歌珍品。瓦扬斯基的诗歌以其有准确的规则重音的诗句形式和完善的韵律与节奏而出众。

中、长篇小说是他作品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以《飞影》(1883)、《枯萎的树枝》(1884)，特别是《根与芽》(1895—1896)最著名。在这些作品中，瓦扬斯基介绍了小贵族阶层的各类典型，表达了认为小贵族可能向往民族生活的信念。瓦扬斯基从农民与知识分子的联盟中，寻求提高农村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道路。尽管他有这个并不正确的设想，但我们仍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的明显抗议，他用艺术手法成功地刻画了没落的小贵族阶层、官僚界与整个统治阶级的典型。他的小说艺术风格常常有些言过其实、矫揉造作和雕琢粉饰。

在瓦扬斯基的小型散文画面如《巴什纳尔山冈上》、《鲁巴乔的妻子》等作品中，现实主义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瓦扬斯基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文学评论家。虽然他在小说中常常逃避解答和描述现实生活问题的任务，而倒退到理想主义的概念中去，但他的文学评论却传播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

这一时期，首批女作家也进入斯洛伐克文学领域。这与从西面的捷克土地上传到斯洛伐克来的妇女解放的思想

有关系。正如捷克文学界的卡罗林娜·斯维亚特拉是妇女平等思想的先锋一样，艾莱娜·玛洛斯·肖尔特索娃和特莱齐亚·万索娃是斯洛伐克妇女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这些女作家的作品还带有过分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对斯洛伐克生活的理想化。卢德米拉·波佳沃林斯卡所提供的农村画面有较多的现实主义，然而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所有女作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季姆拉娃，她属于斯洛伐克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现象。

艾·玛·肖尔特索娃(1855—1939)除了那些过于多愁善感的短篇与长篇小说之外，她的回忆录式作品和日记《我的孩子》最为出色。她在这些作品中描写了她的孩子艾莱娜和伊万过早夭折的一生，写得在心理上很有说服力，在艺术上又很新颖。

卢德米拉·波佳沃林斯卡，真名卢德米拉·利兹涅洛娃(1872—1951)。她写诗歌与小说，但她为青少年写的作品最受欢迎。“卢德米拉阿姨”成了斯洛伐克孩子们一个亲切的概念。

在她的诗作中，《民间叙事诗》(1930)首屈一指。这是一本根据民间文学题材创作成功的短诗集。

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她描绘了社会矛盾尖锐的斯洛伐克农村的图景。在她为少年儿童创作的作品中，动物题材的诗体微型小说(如《青青》)最为成功。

现实主义作品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学的基本部分。作家们真实地描写生活，离开了小贵族的圈子，即使涉及它，也

是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不相信这个垂死的社会阶层还能站在本民族一边。他们认为人民才是民族中基本的社会阶层。因为工人阶级在斯洛伐克还表现得很懦弱，还很少成为这些作家的艺术创作的对象(如塔约夫斯基的作品)。斯洛伐克现实主义文学最常见的题材是写农民。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认为农村人民是必须得到支持与发展的一支健康的道德力量。农村问题在各个艺术家那里当然是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有的地方(如库库钦的作品)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其它地方(尤其是季姆拉娃的作品)则对农村生活中的道德与社会问题表示出非常富于批判性的看法。

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代表，是赫维兹多斯拉夫、库库钦、塔约夫斯基、季姆拉娃和属于较年轻一代的克拉斯科。

1　巴维尔·奥尔扎格·赫维兹多斯拉夫

(1849—1921)

赫维兹多斯拉夫是最大的斯洛伐克诗人。他的作品从艺术上充分反映了上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社会与政治状况。他不仅是人民苦难生活的代言人，而且是为民族与社会正义事业而斗争的战士。

赫维兹多斯拉夫一八四九年生于上库宾，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小贵族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接触农村人民的艰辛劳动。父母为了让他学会匈牙利文，在他小学毕业后

把他送到米什科夫采上中学。这小小年纪的中学生由于勤奋，第二年就成为最优学生之一。在老师影响下，他甚至开始用匈文作诗。他喜爱裴多菲和奥洛尼[1]这些著名经典作家的诗，后来还译过它。在克日曼尔克学习期间，他继续用匈文、德文进行创作。异族化的危险威胁着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学生。但斯洛伐克作家与诗人的作品对他有过很大的启蒙作用。特别是霍利和什图尔派对他很有影响，同时科拉尔的斯拉夫人相互关系的思想也在影响他。他的生母帮他完成了这一转变。有一次这位年轻的诗人用匈牙利语朗诵诗歌，他母亲因听不懂儿子的朗诵而哭了，这一刹那的情景在诗人记忆中留下了牢固的印象。事后他写过一首极其优美的诗《世界曾把我引入歧途》，将这种记忆永远铭刻下来。

赫维兹多斯拉夫从普莱肖夫政法学院毕业后任律师，终生在奥拉瓦地区从事这一职业。他最初在下库宾，后来在纳麦斯托夫，最后一直到死都留在下库宾居住。他非常熟悉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钦佩他们的勤劳与美德，并为他们的贫困感到痛苦。他以自己的全部诗歌为他们服务。在与奥拉瓦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状况下，他写了一部可以称为诗人的思想感情日记的抒情诗集，和一些刻画自己人民的伟大叙事诗篇。

他很少远离自己的故乡奥拉瓦。最有意义的是他一八

---

① 奥洛尼(1817—1882)，匈牙利诗人。

七三年到布拉格参加纪念荣格曼的活动。赫维兹多斯拉夫在那里结识了捷克文化工作者。他的作品也反映了他的捷克斯洛伐克相互关系的思想，这在《献给捷克兄弟们》一诗中表现得最突出。

赫维兹多斯拉夫热情地迎接了斯洛伐克民族复兴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诞生。但他在新的国家里并未高兴多久，便在一九二一年逝世，葬于下库宾。今天，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所漂亮的博物馆，介绍赫维兹多斯拉夫的生活道路与诗歌上的丰硕成果。为了纪念赫维兹多斯拉夫，下库宾年年举行盛大的艺术活动，举办诗歌与小说朗诵比赛。

抒 情 诗

赫维兹多斯拉夫在他的一首诗中指出，他写的东西都出自一颗诚挚的心。这种诚挚与真实是他的艺术的典型特点。这不仅见于他描写个人情感的抒情诗，而且见于爱国主义的和社会的抒情诗。他的抒情诗的特征是诗人内心感情生活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尽管他写的是与个人最息息相关的问题，但他从未忘记，他是与本民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自己人民的使者”。他的作品的伟大道义力量和社会力量正在于此。

第一本诗集是作者在克日玛尔中学求学时以笔名出版的(《迎春花》，约瑟夫·兹布朗斯基，1868)，诗中歌颂了他的故乡、诞生地和奥拉瓦的大自然和人民。赫维兹多斯拉夫的这本诗集、他在普莱肖夫上学期间发行的《向前》丛刊

以及其它集子，特别是《圣诗与赞美歌》，都充分表现了他对民族的爱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

包括三个组诗的集子《嫩枝》(1885—1895)是诗人的日记。赫维兹多斯拉夫有着丰富的内心思想感情生活，他沉湎于生活中愉快与悲伤的时刻，他为姐姐与母亲的逝世而感到无比忧伤，对幸福的青年时代缅怀不已。但在组诗中斯洛伐克人民艰难处境的题材仍占优势。这里，诗人已不是在描绘，而是在批评、论断和警告。他对人民的炽烈的爱和对统治者的反抗，最成功地表现在《给你们，荣华富贵的人们》一诗中。这首诗由于它的战斗的声音而未被收入赫维兹多斯拉夫全集。诗人谴责绅士们蔑视人民，靠剥削人民过生活，他们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提高，只想到如何更有效地驱使人民。人民虽有其不足之处，却具有伟大的价值、伟大的天赋、纯洁的道德、文化财富和优美的语言。诗歌结尾指名对贵族老爷们发出了警告："滚开吧，无知的家伙！滚开！"

在另一组诗《春夏漫步》与《惆怅》(1898)中，诗人发挥了关于人民与青少年的思想。《青年人，到人民中去！》一诗强调斯洛伐克农民的美德与价值，提醒人们注意农民的美好品质、他们的歌曲、童话与歌谣，特别是他们为青年树立的勤劳的榜样。

然而，照赫维兹多斯拉夫的理解，人民的景况总是与大自然的图画紧密相连的。诗人缜密观察和了解大自然在所有季节中的魅力。他将人类的生活现象与自然界的现象相

比拟。他善于以寥寥数行诗句勾画出美妙的抒情场面。诗人从规律与秩序所支配的大自然中汲取个人生活和民族生活的教益(如《致塔特拉山》一诗)。

赫维兹多斯拉夫的全部抒情诗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诗人思考着权利、自由、人道的问题。他为本民族的艰难处境而悲伤,甚至还考虑到整个世界的公平合理的安排。他看到本民族的命运与捷克地区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对兄弟的捷克民族的热爱动人地表现在《献给捷克兄弟》一诗中。他将自己人民的命运与资本主义匈牙利境内其它民族的劳动人民命运进行对比,坚信终归有一天,各民族将象兄弟一样和睦相处。

赫维兹多斯拉夫关于民族与社会正义的思想、关于自由与各民族间的兄弟关系的思想,在优美的组诗《血的十四行诗》里达到了极致。该诗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刚刚爆发之后写成的。由于书刊检查的钳制,一九一九年才得以出版。赫维兹多斯拉夫以卓有成效的诗的手法,描绘出一幅骇人听闻的战场大屠杀的图画,这种屠杀毁灭了人类的精华,使文化衰退,母亲、寡妇、孤儿们悲恸。诗人就这样透过人的泪水来观察世界大战的恐怖。他从战争景象进而思考世界大破坏的原因。他揭露了"嗜血鬼"的自私贪婪、追求财富和统治者的贪欲。他对于在解释基督教时各取所需的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密切注视着那些玩弄基督教的空洞辞藻,而又将人们驱赶到血腥屠场的假仁假义的言行。整个组诗的高峰,是盼望一个没有压迫、不平和战争,

呈现出“和平、安宁”景象的美好世界。诗的结尾强有力地呼吁：啊，快快归来哟，可亲的和平！

这一组诗表明赫维兹多斯拉夫对生活抱着深沉的思想家的态度，同时也是用完善的诗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的典范。赫维兹多斯拉夫善于巧妙地描绘战争气氛。例如：他这样表现战争的喧嚣声：枪声响，炮声隆，大地震荡，大气呼啸，水浪翻滚……

叙 事 诗

赫维兹多斯拉夫是一位抒情诗人，同时也是伟大的叙事诗人。他题材宽广的叙事诗首先描述了人民的生活。他考虑人民的社会地位，并将它与小贵族阶层的生活加以对比。他的两部最伟大和最优美的诗《守林人的妻子》和《艾若·沃尔科林斯基》，探讨了小贵族阶层与农民的问题。

《守林人的妻子》（1883—1886）产生于诗人对奥拉瓦自然景色及斯洛伐克人民的赞赏。诗中叙述年轻的守林人米哈尔·恰依卡和他妻子汉卡的故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外来贵族阿尔图什·维兰尼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恰依卡继父亲之后被老维兰尼雇为守林人，他把年轻的妻子带到猎舍，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家庭幸福却被阿尔图什少爷破坏，他使汉卡不得安宁。他想破坏她的贞洁，直至逼得她为着自卫而杀死了他这个小贵族。丈夫米什科① 出于对妻子的爱，自己承担罪责，进了监狱，可是狂怒

① 米哈尔的爱称。

的汉卡解救了他。审判那天，汉卡冲上法庭，承认是她自己杀死了年轻的阿尔图什。法庭将米什科释放了。过了一段时间，汉卡恢复健康，守林人的屋子里一切又归于平静。

诗人以戏剧性的手法逐步展开故事情节。叙事与抒情交替出现。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各个季节的山林美景的描写。就连这个也与情节本身紧密相连，是悲剧性的或者和谐的生活气氛的陪衬。动人的歌曲，特别是采树莓者之歌，在抒情插曲中占有重要地位。诗人将深沉的思考，例如对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第七章对斯洛伐克人民与豪绅们的关系的思考掺进了情节。

故事中的人物一方面是人民的代表汉卡和米什科，另一方面是权贵们的代表，特别是少爷阿尔图什·维兰尼。诗人的同情是在人民这一边。他通过各种事情如工作、娱乐来表现他们，叙述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及其对豪绅们的态度。他强调他的主人公的勤劳和道德纯洁。米什科被描写成一个勇敢勤劳的小伙子，而从他的整个性格中又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所受的社会压迫。但米什科这个人物在诗中是不断发展的。狩猎时期他毫无怨言地忍受阿尔图什的耳光，在法庭上他却已经成熟，进行了具有反抗精神的控告。诗人通过汉卡来具体表现出斯洛伐克姑娘的一切优秀品质。诗人强调她的鲜明的道德特点，这与阿尔图什的道德败坏判然不同。

《守林人的妻子》在这里揭示了权贵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严重问题。它控告贵族阶层，指出它剥削劳动人民，满

不在乎地破坏他们固有的道德。这部作品同时是一篇对迷人的山间自然景色的颂歌。

在叙事诗《艾若·沃尔科林斯基》和《戛博尔·沃尔科林斯基》(1890—1897)中，赫维兹多斯拉夫解决了小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矛盾问题。他指出贵族阶层在消亡，未来属于人民，而他是维护人民的。

赫维兹多斯拉夫也写戏剧作品，其中的五幕悲剧《希律和希罗底①》(1909) 最著名。这是对古犹太社会道德沦丧的尖刻描绘和对社会不平的批评。诗人在施洗约翰②这个形象身上创造了预言家——先行者的典型，他反对不合理的制度，宣扬自由与人道主义思想。这份素材给了诗人一个机会，使他能以古代悲剧为掩护，表达他对当前社会状况的批评。悲剧《希律与希罗底》在当时斯洛伐克剧院演出，大获成功。

赫维兹多斯拉夫翻译了大量的诗。从斯拉夫语言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从德文译过席勒、歌德；从英文译过莎士比亚的作品。

赫维兹多斯拉夫的诗歌无论在思想或形式上都非常丰富多彩，但常常被认为晦涩难懂。赫维兹多斯拉夫自己在

---

① 据《圣经·新约》，希律为犹太王，因娶希罗底为妻，遭到义人施洗约翰的指责。后来在希罗底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莎乐美要求下，希律命人将约翰斩首。

② 约翰被称为先行者。他在耶稣之前传道，劝人悔改，并在约旦河里给人施洗，也曾给耶稣施洗。

《别难过，我的歌！》一诗中，对于为什么他的充满思想和问题的诗歌不能使人感到轻松和供人消遣，作过一番解释。他的词汇很丰富。诗人从人民的生活语言中汲取养料，采用新词或者恢复旧词（古语），他的诗歌广泛运用了譬喻与对比。

2　马尔丁·库库钦

斯洛伐克现实主义小说界最著名的作家为马尔丁·库库钦，他本姓马杰依·本楚尔（1860—1928）。

他出生于奥拉瓦地区的小村庄耶塞诺瓦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在该村当过很短一段时期的教员。他具有卓越的观察才能，并在他描绘农村生活的悲欢的早期短篇小说里使之得到了发挥。但他没有坚持教师的职业，而去布拉格学医。在布拉格期间，他在大学青年组织“杰特旺”工作，结识了当时捷克文化活动的领导人，后来一直与他们保持通信联系，到他逝世为止。他研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对他的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学业结束后，他以医生身份前往克罗地亚的布拉契岛。克罗地亚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根据那儿的环境，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山坡上的房子》。但他在布拉契岛也没有定居下来。当时，有大批穷人从克罗地亚移居南美洲，本楚尔① 大夫也随同迁去，

① 即库库钦。

后来在那儿的移民中行医和从事文化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返回斯洛伐克，以新的精力开始写文艺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当他看到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关系中夹杂着某种误会的因素，便写了长篇历史小说《卢卡什·布拉霍塞依·克拉索尼》。小说指出，两个兄弟民族在什图尔时期就已在文化上密切合作。但库库钦也没有定居斯洛伐克，晚年重返克罗地亚。一九二八年逝世，安葬于马尔丁。

库库钦的作品，内容广泛，丰富多彩。他将自己无限热爱的人民作为注意的中心，他看到人民的勤劳与能力，也注意到他们的缺点。尽管也指责贫苦人民的错误，但他的批评总是沁透着对他们的爱。他在自己作品里描写平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不仅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外表，而且仔细观察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他的农村小说中，《未觉醒的人》是一部有价值的描写心理活动的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库库钦提供了一幅关于没有文化的牧鹅人翁德拉什·马霍拉的可爱性格的图画，动人地写出了他的内心悲剧。

在带有幽默色彩的短篇小说《花乳牛》(1885)中，作者以清新的文笔刻画了农民兼鞋匠克尔特的形象，克尔特虽然勤劳，却有嗜酒的毛病。作者通过各种场合来描写他，例如一年一度的集市，怎样对待母牛，与特尔卡大叔在小铺里交谈，途中遇到鬼怪，与妻子吵嘴时的情景等等。作者以幽默的目光来看待这些场面，讥笑书中主人公的缺点（吵

嘴、酗酒、迷信)，但从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看出，他是喜爱自己的主人公的。库库钦的故事明显地表现了他对普通人，对实实在在、不加矫饰的人的爱。这一短篇小说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把看去似乎简单的情节安排得很巧妙。库库钦善于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这个来自民间的人物去观察周围的现实。短篇小说是用民间语言写就的。

除了描写农村生活各种事件的其它短篇小说如《愤怒的日子》以外，库库钦还在《霍霍洛夫村的老汉死去时》中，通过破落小贵族多玛尼茨基的故事，非常圆熟地刻画了衰落的小贵族阶层。《在波特科尼茨的舞会上》一书，则描述市侩们追求财富的荒诞可笑。

在反映学生生活的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规模较大的中篇小说《青年时代》(1889)。作者在两个男生与校长的女儿的恋爱故事的基础上，描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封闭前的列乌中学的学生生活。作品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非常出色，并以清新的幽默感分析了他们互相间的关系，以无与伦比的幽默笔调，刻画了使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他这个中篇小说常被人拿来同伊拉塞克的《哲学生》媲美。

他的长篇小说以《山坡上的房子》(1903—1904)最为著名。素材是从克罗地亚生活中汲取来的。在这部作品里，库库钦要解决地主阶层对农民的关系问题。他通过地主的儿子尼卡·杜希契支对村姑卡蒂采的爱情故事，指出两个阶层的对立和两个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深渊。小说对克罗地亚生活的描写非常生动。同库库钦的某些短篇小

说一样，这是他的小说创作的高峰。

库库钦的作品以优美的语言出众。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从民间语言宝库吸收来的大量词汇和美妙的句子结构，这足以证明，库库钦善于发现斯洛伐克人民语言的音乐性和绚丽多彩。

季姆拉娃和约瑟夫·格雷戈尔·塔约夫斯基的作品是斯洛伐克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

3　季姆拉娃—鲍日娜·斯兰契柯娃
(1867—1951)

她出生在诺沃赫拉特一个名叫波利赫纳的村庄，在这个穷乡僻壤度过她的一生。她文化程度不高，通过不断的自觉学习与阅读才获得了知识，却具有非凡的观察天才，能根据观察把实际情况描写出来。因此她的作品是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斯洛伐克农村生活的可靠的艺术文献。

最初她写了关于农村知识分子的短篇小说，她如同显微镜似地观察那充满苦闷、迷惘、虚假、伪善和无聊的生活，指出年轻姑娘们(校长和牧师的女儿)如何只会经常做做浪漫主义美梦，而她们的梦离生活又是如何遥远。在这个意义上说，她的作品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能教育人们脚踏实地生活(如«助手»、«困境»等)。

她的第二批短篇和中篇小说则注意到斯洛伐克人民的

生活。与库库钦不同的是，她还看到他们的消极面，决不想将现实美化和理想化。《加帕科维茨一家》(1914)就是对农村生活及其阴暗面的深刻剖析。季姆拉娃的作品以高超的艺术提供了一幅幅因循守旧图，说明一些农家正生活在物质与精神的贫困中而又无所作为。她把为了从这种家庭挣脱出来所作的努力看成一种革命行动。在短篇小说《迷人的大地》(1906)中，季姆拉娃描绘了由于贫困或对幸福生活抱有幻想而流亡国外的斯洛伐克移民的情景。

她的取材于战争的中篇作品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里，季姆拉娃表述了她反战和反统治者的思想。中篇小说《英雄们》显得更为出色。作者描绘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最初一刹那，一方面刻画出以公证人贝纳尼为首的傲慢的匈牙利爱国主义者，他们言必称祖国，但是需要他们把这种热情变为实际行动时，便退缩、躲避到公事房去了；另一方面她又刻画了人民，他们将帝国主义战争视为祸害，但又被迫为绅士们的利益而上前线流血。这部中篇小说充分表现了季姆拉娃的具有特色的艺术和色彩鲜明的艺术语言。

4 约瑟夫·格雷戈尔·塔约夫斯基

(1874—1940)

他是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戏剧家，出生于班斯卡·比斯特利采附近的小山村塔约瓦。作为手工业者家庭的孩子，他从小生活在凄苦的社会环境中，深知工人的

贫困。五一节时他甚至参加过工人游行队伍，这在他整个一生中留下了清晰的记忆，也给他的作品（如《五一节》）留下了痕迹。塔约夫斯基最初任教员，后来当银行职员。他是毕生热心加强捷克和斯洛伐克相互联系的一个先锋人物。

作为小说作家，他以描写普通穷人（如《面包》、《米肖》）的短篇小说而出众。他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风烛残年、孤独无告的寡妇、仆人，他们终生为富农卖力，他们的孩子在贫困的悲惨条件下生活。所有这些画面都反映了作者对穷人的无限的爱，以及对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情。侨居异国、变节和酗酒等问题使他苦恼不安。他痛苦地忍受着对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

《波斯特柯娃老妈妈》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通过她的画像，为典型的斯洛伐克人的正直勤劳竖了一块丰碑。这位在生活中饱经困苦与病痛的老妇人波斯特柯娃，以令人感动的诚实态度定期到银行偿还自己的一小笔债务。作者刻画了来自人民的卑微“英雄”的典范，她虽然受到生活的煎熬，却拥有巨大深厚的力量。

注重心理描写的短篇小说《马科·姆列支》，则叙述一个终身为富农卖命、连自己也没意识到富农是怎么剥削他的老仆人一生的故事，这篇作品以其外在和内在的特征而独树一帜。塔约夫斯基在这篇作品中已有意识地表现了农村的社会矛盾。

塔约夫斯基的戏剧作品也同样负有盛名。它们是斯洛伐克现实主义戏剧的顶峰。塔约夫斯基在剧作中提供了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斯洛伐克农村的真实画面。特别是《妇女的法律》和《田庄一混乱》，在正式剧院和业余剧团演出都收到极好的效果。

在《妇女的法律》一剧中塔约夫斯基幽默地描绘了富裕农民的生活片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他们所依附的财产来决定的。这部喜剧以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为基础。农村妇女的饶舌与诽谤阻碍了他俩的幸福。

《田庄一混乱》虽然是严肃剧的形式，但也采用了类似的题材。这个剧本通过夫妻不和的故事指出，对财产的过分追求如何破坏了年轻人的幸福和家庭的安宁。

在对社会状况进行社会性批评方面，塔约夫斯基在独幕剧《服务》中表现得最突出，剧中通过仆人这个形象，对贫困生活表示了一定的不满。仆人杨诺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激烈反对贪利的富农。

从塔约夫斯基所有剧作中，一方面可以看到贫苦农民与工人的痛苦生活遭遇、对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的批评，但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对普通人的无比热爱。塔约夫斯基并不掩饰他们的缺点，但他相信他们的未来。

塔约夫斯基的戏剧以其戏剧性、效果显著的戏剧结构、刻画生动的人物、特别是来自人民的丰富语言而别具一格。

5　伊万・克拉斯科

二十世纪初，新的一代作家以斯洛伐克当代文学的名

义，进入斯洛伐克文坛。他们面临着象征主义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寻求表现自己的外在和内心问题的新艺术手法，而当时的西欧象征主义却是一个没落的流派。这一派的诗人已在生活中陷入悲观主义，把自己同生活隔绝起来。斯洛伐克诗人以对贫苦人民与本民族的热烈关注，补偿了自己内心的不坚定性。

这一代人的代表为伊万·克拉斯科、杨科·叶森斯基、弗拉季米尔·罗依和其他人。

其中最著名的是伊万·克拉斯科，他本名杨·巴托(1876—1958)，有博士和工程师头衔。他生于格麦尔的卢卡维什捷，出身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他到布拉格学工程技术，在布拉格参加了大学生组织“杰特旺”的活动（几年前库库钦也在其中工作过）。那时他已开始写诗，起初师承赫维兹多斯拉夫的创作，可是后来便偏离自己的老师，在世界象征主义诗作的影响下，创造了一种独立的诗风。他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各地当过工程师。著有两部诗集：《黑夜与孤独》和《诗》。此后一直保持沉默。但这两本小诗集却使他驰誉一时，进入了斯洛伐克名诗人的行列。

他于一九〇六年以诗集《黑夜与孤独》进入文坛，诗人在诗集里表现了一个被迷惑的灵魂的悲伤、不满与痛苦的悲剧性感情。这种悲伤有两个根源：一方面是诗人自身的经历、失望、孤独、沮丧与心愿不得实现的感觉。这一部分诗篇中最优秀的是《礼拜日的黄昏》，诗人在诗中创作了一幅老母思念儿子的动人图画。这本诗集的另一部分是写民族

忧患引起的悲伤。克拉斯科对于贫苦人民的默默忍受感到痛心。在《叶霍瓦赫》一诗中他大声疾呼，假如再不醒悟，不去反抗奴役者，自己的种族就会受到报应。

在另一诗集《诗》中，克拉斯科更大胆地从个人问题转向以诗来描绘社会与民族贫困。第一部集子掺杂有许多个人的绝望情绪，在这本集子里诗人则意识到，不能把自己禁闭在个人悲痛之塔中，必须让自己的诗歌去为受难的人民服务。《生活》一诗表现了决心与生活进行搏斗的主题。

在这本诗集里可以看到克拉斯科最著名的诗作，诗中表现了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情景和反对无权地位的革命暴动，这类诗有《奴隶》、《父亲的耕地》和《矿工们》。

在《奴隶》一诗中，诗人的悲伤已转化为对所有奴役本民族的人的公开抗议与威胁。《父亲的耕地》一诗，描绘诗人出国游历后回到了人民自古受尽灾难的本国土地上。

《矿工们》一诗是明显的象征主义和讽喻性的。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忧虑。诗人期待着伟大的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到来，也表现了即将获得解放的信念。恶魔（民族与社会的剥削者）捉弄着诗人——人民与民族的代表。恶魔使用一切诱惑手段，企图迫使诗人叛变，但是诗人依靠自己的朋友，依靠决心开采金矿的矿工来争得民族的自由。

克拉斯科的全部诗作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超群出众。他给斯洛伐克诗歌增添了富有音乐效果的抑扬起伏的韵律。他的富于表现力的手法特点在于色彩与音调的多样

四　一九一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

斯洛伐克诗人和作家，兴高采烈地迎接了四年世界大战后奥匈专制王朝的覆灭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诞生。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与社会压迫之后，斯洛伐克民族已经能够自由发展，使自己的生活欣欣向荣。如同捷克艺术家一样，斯洛伐克诗人与作家也相信，这个新国家要比以前合理一些，它将会解决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然而当资产阶级将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之后就表明，抱这些希望是徒劳，未免为时过早了。

这些年月所有闹得沸沸扬扬的政治与社会事件，自然也反映在第一共和国的文化中。

同捷克一样，斯洛伐克作家与诗人按照所属政党、宗教信仰与辈分年龄的不同而结合起来，形成许多在思想与艺术观上截然对立的团体。除了极右（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代表以外，无产阶级诗人也建立了团体。这些团体彼此间进行着频繁的思想与艺术论战。作家和诗人们团结在一些杂志的周围，特别是经过停刊后从一八四六年起重新出版的《斯洛伐克展望》、《青年斯洛伐克》、《人群》和《篝火》等。

一九一八年的激剧变化①之后，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老一代作家开始以新的力量从事创作，马尔丁·库库钦从南美回国，开始写历史小说，指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兄弟民族需要密切合作，知识分子有责任在人民中进行工作。季姆拉娃写了一些反战题材的中篇小说和描述斯洛伐克战后生活的短篇小说，肖尔特索娃、卢德米拉·波佳沃林斯卡和约瑟夫·格雷戈尔·塔约夫斯基重新执笔。塔约夫斯基的剧本在剧院上演得最频繁。

中年一代作家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其中杨科·叶森斯基以自己的作品在斯洛伐克战后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耶格**（即拉吉斯拉夫·纳达什，1866—1944）的作品问世，首先用出色的历史小说丰富了斯洛伐克文学。《亚当·相戛拉》是写十七世纪的小说，耶格在这部作品里提供了宗教争论时期的斯洛伐克的生动画面，并以政教之间的权力斗争为背景，叙说了被奴役者的艰难生活。在长篇小说《斯瓦托普卢克》中，他把大摩拉维亚统治者描述得和迄今浪漫主义文学通常描绘的不同，不是把他作为英雄国王，而是作为一个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人来介绍的。耶格在历史小说中也首先致力于反映真实。

什特凡·克尔契麦尔（1892—1955）是著名的组织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他将大批斯洛伐克作家和诗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由他负责期间的《斯洛伐克展望》，提供了一幅关

① 指奥匈帝国垮台，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于斯洛伐克文学创作的丰富而复杂的翔实图景。

有些作家在其早期作品中真实地描绘了战时和战后的斯洛伐克农村生活。他们的作品为斯洛伐克文学作出了根本的贡献。但是后来他们在政治活动上转到保守的资产阶级方面，作品也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其它反动倾向。在他们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分明看出他们的艺术成就，但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视之为进步作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马尔丁·拉楚斯**的作品，他最初写些反战情调的诗（如《这就是战争！》），写了自传性的名著《马洛什科》，但其它小说却具有过分保守的特点。同样，**米洛·乌尔邦**在他第一部小说《活鞭子》里对斯洛伐克战时农村生活所作的剖析很有艺术价值，而在后来的作品中，乌尔邦却宣扬了装腔作势的民族主义。直到他写最后一部作品时，才又继承他早期创作的特点，对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政治企图持批评态度（《熄灭的灯光》），尽管这部作品并不十分成功。

斯洛伐克大部分作家出身农村，所以几乎都写农村题材。除了叶森斯基的《民主党人》以外，没有出现一本规模较大的关于斯洛伐克城市的小说。作家们一再描写斯洛伐克农村生活，描写山民，歌颂他们的严峻、勤劳、纯洁、刚强的性格。就这个意义来说，**卢多·翁德列耶夫**（1901年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即《勇士们的青春》和《耶尔古什·拉宾》，乃是描写斯洛伐克山村人的最优美的作品。翁德列耶夫刻画一个山村小伙子的典型，他生活在优美的大自然中，保持了未受市民道德污染的人们的纯洁本色。

出于对斯洛伐克文学的传统题材、特别是对爱国与宗教题材的反感，有些诗人力求在自己作品中表现战后一代人所特有的新思想。在艺术手法上，他们的作品流露了与当时捷克诗人相类似的倾向，其中以**杨·斯姆雷克**(1898年生)的诗最为明显。他写过充满活力的诗，中心题材是爱情和生活的欢乐(如《光阴似箭》、《只有一对眼睛》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洛伐克陷入法西斯海洋包围中的时期，斯姆雷克写了反对战争恐怖、反对德国扩张政策的诗作，并预言反纳粹的战斗力量必将胜利，这最出色地表现在《斯大林格勒》一诗中。《一九四二年的布拉格》一诗，表达了对捷克人民的钦佩之忱。诗中预言：这座遭受凌辱、但未被征服的城市，最后一定胜利。

与此同时，部分斯洛伐克诗人与作家把自己全部精力与作品，都用来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这批作家有意识地创造了党性的艺术，以便同其它文学团体的观点相对抗。这种艺术不仅描叙斯洛伐克的社会生活，而且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多种剥削形式进行有效的斗争，培养无产阶级的人，并准备重新安排生活。共产党员作家与捷克无产阶级艺术家紧密团结，从事创作。他们以苏联文学特别是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为榜样。首先，彼得·伊莱姆尼茨基和弗拉尼奥·克拉尔的作品就是如此。**杨·波尼量**(1902年生)的艺术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他也能与他们相结合，在未来派的影响下，他写了革命的、形式上也非常激烈的、但美学感染力往往不足的诗作。这些诗过于重视思想

方面，而忽视了艺术性。后来他在艺术表现上作了努力。最有价值的作品是描写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杨科·克拉尔的诗作（《古怪的杨科》）。

无产阶级诗人集中在《人群》杂志周围。他们的团体出现时具有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的正确思想纲领，但是后来它放弃了自己的革命思想，脱离了工人阶级，在艺术上倒向西方诗歌流派。**拉佐·诺沃麦斯基**是这个团体中最著名的诗人。在他的作品里，如果不谈他某些缺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思想与高超的艺术表现的有效结合。

斯洛伐克生活的活跃也表现在剧院的发展上。已有百年历史传统的业余戏剧网展开了。一九二一年在捷克演员与导演的帮助下，布拉迪斯拉发和科西采先后建立了正式剧院。在与捷克艺术家的紧密合作中，足足有一代戏剧艺术家成长起来，他们逐渐上升到了今天这种高度的思想与艺术水平。随着剧院的发展，戏剧创作也有所发展。几乎每年都有新剧作来充实这个时期的斯洛伐克剧院，最著名的剧作家是伊万·斯托多拉。

伊万·斯托多拉（1888年生于利普托夫的米古拉什）在自己的剧本里，首先嘲笑第一共和国市民阶层的缺点与错误。讽刺喜剧《议员先生的茶话会》、《约什科·普契克的生涯》等利用哈哈镜，照出了假仁假义的道德、对名誉和财产的追求、实用主义、对人道主义的错误理解等等。

本世纪三十年代，新的一代进入了斯洛伐克文坛

的诗歌与小说领域。他们的特点是抛弃他们认为过于偏重平铺直叙的前一代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力求有所创新。一股强大的抒情咏怀的激流涌进小说中，强调形式甚于内容。这一时期绝大部分作品的意义，首先在于使斯洛伐克小说的文体更新颖，语言更丰富。相反的一面是开始背离现实的艺术表现，逃到斯洛伐克文艺批评界称为“天使之国”的虚构世界中去。

在诗歌方面，当时有些年轻诗人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一流派对著名捷克诗人也是有影响的。在捷克诗人中，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对斯洛伐克诗人影响最大。解放以后，一批斯洛伐克超现实主义者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文学纲领。

德国占领期间，在所谓“斯洛伐克国”的年代，只有少数作家为德国与斯洛伐克的合作效劳。大多数人仍忠于自己的人道主义的进步思想。有些作家，特别是弗拉尼奥·克拉尔和杨科·叶森斯基，则从事地下创作。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爆发后，众多的斯洛伐克艺术家作为积极的参加者和战士投身于这次起义。后来他们的作品突出地反映了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 杨科·叶森斯基

(1874—1945)

叶森斯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马

尔丁一个破落小贵族家庭。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已了解市民环境及其典型特点：追求功利、虚伪、假仁假义的道德。后来在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中，小市民社会的面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叶森斯基应征入伍，后来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写了一些诗作，对贫苦人民表示深切的敬爱。最初他并不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尽管如此，革命时代对他的民主思想仍有很大影响，这特别表现在第一共和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叶森斯基毫无保留地站到进步与社会主义一边，向法西斯危害作斗争。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他出任国家高级官员，甚至当过斯洛伐克的副总统，这一职务使他有可能深入透彻地看到市侩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后来他才能在作品里切中要害地对它加以讽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过反法西斯的地下诗歌，但在全国解放时溘然长逝。根据他的作品，他第一个被授予斯洛伐克“人民艺术家”称号。

叶森斯基是以一九〇五年出版的《诗集》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这本诗集已经嘲笑了市侩的虚假感情，热烈赞颂人民之间的、超越物质利益的纯洁关系。在《被俘》（1918年才出版）里，诗人已从个人的情诗转向爱国主义诗歌。诗中倾吐了对被奴役人民的爱，表达了对暴行的抗议以及对民族的美好未来的信念。这种超越个人范围的题材与个人

的题材，同一个俘虏在遥远世界的悲伤回忆和对故乡的怀念交织融汇在一起。

在下一部即景诗集出版之后，作为诗人的叶森斯基沉默了较长一段时间。他写过一些小说，因为只有长篇作品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述他对市侩社会的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又开始写诗，在几部诗集里以讥讽的语调反对所谓德国与斯洛伐克亲善的思想，表达了自己坚强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信仰、对法西斯的反击以及解放的欢乐，表现出他是捷克与斯洛伐克兄弟关系的彻底拥护者。

叶森斯基在作诗的同时也写小说，这是他的主要意义所在。他在早期小说作品中用批判讽刺的态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个小市民的典型人物，展示了他们对财产、奢华和荣誉的拼命渴求、他们的诽谤伎俩、伪善的感情关系与无耻的自私自利。

叶森斯基的短篇小说以生动的笔调，将各个可笑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愿为女儿找个东床佳婿的职员、医生、牧师、商人、妻子与母亲，认为人生的唯一意义是梳妆打扮的城市小姐等等，这些短篇小说的一部分已用《小城传闻》的书名出版。

在中篇小说《拉菲科娃太太》(1898)里，作者用洞察隐幽的显微镜照出了一个副审判官太太，她的唯一愿望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把她那任性的宝贝姑娘嫁出去，整个访求女婿的轮子都围着她这个梦想而转动。

叶森斯基是刻画人物性格的大师。他通过幽默的外部

环境描写，也通过其复杂的内在关系来介绍他的主人公。他的叙述充满着幽默与讥讽的鞭笞。他最成功的短篇小说有：《什特沃利尔卡舞》①、《奴隶们》、《女婿》等等。

叶森斯基最优秀的作品要数他的长篇小说《民主党人》（1934—1937），这是一幅反映第一共和国时期上层社会生活的讽刺幽默画。作者还在这部作品里对政治、社会与文化形势作了深刻分析。他讥笑那使二十三个政党都不顾一切地为各自的"真理"而斗争的选举制度，指出在这个社会里就连感情关系也是以自私的物质利益为条件的。他介绍了空虚而轻浮的青年人的生活，暴露了一群力求尽早获得肥缺的政客。他用大量插曲显示了家庭生活、公共生活、感情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典型特点。

他把所有这些思想体现在朗吉克博士的故事里。这位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想以每天伴送女仆上街的办法来向骄傲的屠夫宣传自由与民主，他由于破坏市民道德而与官方代表（县长布里冈季克）发生矛盾，又由于他自己的过失而被调到布拉迪斯拉发。朗吉克在那里与政界人物佩特罗维支接近，进而转入政治生活。然后作者借用朗吉克的观点，评价并谴责了自私的、追求财产名利的资产阶级道德。尽管朗吉克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具有民主主义观点，但叶森斯基不善于刻画年轻的战斗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从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对社会进行批评的艺术家的立场

① 一种古代舞蹈。

来看待这个本质上是正面的人物的。善于钻营的政客佩特罗维支是小说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他的女儿热尔卡代表着大城市“豪门青年”的典型。大地主杜贝茨则是卑鄙的寄生虫典型。

小说很明显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发生在小城市的关于朗吉克及其情妇兼女仆汉卡的故事。作者借此机会指出小市民社会的一切可笑之处，首先是公事房里的官僚主义和以屠夫托尔科什为代表的小市民的傲慢；第二部分发生在布拉迪斯拉发市的政治生活环境中。这里没有集中的情节故事。彼此相衔接的新颖而幽默的片段插曲构成小说的吸引人的脉络。

2　彼得·伊莱姆尼茨基

(1901—1949)

彼得·伊莱姆尼茨基是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最杰出的代表。

他本是捷克人，出生于基什佩尔克—莱托赫拉特，学业结束后任教员。在斯洛伐克服兵役时爱上了斯洛伐克土地和人民。他服完兵役后在基索采当过教员，又在斯沃尔齐诺夫采和恰德茨活动过，更密切地接近了成为他所有作品主人公的斯洛伐克人民。后来他加入共产党，毕生与工人阶级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他常为党的机关刊物特别是《斯巴达克》和《贫民的真理》撰写文章。

一九二六年他去苏联加入“国际援助队”[1]，在黑海之滨克拉斯纳捷霍夫卡的旧捷克斯洛伐克垦殖区当教员。他从这个环境中为他的小说《脚步声响》汲取了许多素材。后来在莫斯科高等新闻学院学习，接触到苏联文学，特别喜爱高尔基的作品，后者对他的创作起过巨大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返回祖国后，他在各处任教，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圣约尔的时间最长。任教期间写了反映第一共和国时代的斯洛伐克人民生活的小说。这一时期他的长篇小说有《未开垦的土地》、《一块糖》和《我们的指南针》。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瓦解而所谓“斯洛伐克国”宣告成立之后，伊莱姆尼茨基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斯洛伐克，在集中营度过他那失去自由的年代。解放后，他立即回到斯洛伐克。他游历起义地区，从关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谈话与经验中汲取素材，写成最后一部作品《编年史》(捷克文译本名为《风又吹了回来》)。

一九四八年，他担任驻莫斯科使馆文化专员，但一年后患心肌梗塞逝世。安葬于斯洛伐克的斯拉维纳。

伊莱姆尼茨基的全部作品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作品描绘了斯洛伐克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受苦图，并指出，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人民艰苦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也将发生变化。

这些思想，在他以战后最初几年的故事为内容的第一

---

① 国际援助队是侨居苏联的捷克工人于一九二五年成立的一种生产合作社，后撤销。

部长篇小说《胜利的倒台》中就已得到发挥。书中的人民代表是马杰依·霍洛尼，他奋起反抗不幸的生活，但他的反抗是不自觉的、自发的。通篇小说渗透着抒情风格，这影响了作家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在《脚步声响》里，伊莱姆尼茨基想要解决一个他所不熟悉的问题。本书描述了他在克拉斯纳捷霍夫卡的经验，提出农村的社会主义化是在艰苦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

在《未开垦的土地》(1932)一书中，基索采地区的贫困问题重又成为他注意的中心。这已是一部显然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小说。

作品描绘了斯洛伐克农村在经济危机初期的情景。作者看到大资本家及国内一般剥削者对农民的剥削，他不相信通过普及群众文化工作或采取关闭酒馆的办法能解决基索采地区的贫困问题。他明白，只有同各种剥削形式进行斗争，通过革命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才能改变不平现象。

小说的主人公是人民，人民中出了象巴洛·霍什恰瓦这样的人物。他看到父亲的贫困，但他不象积劳成疾的父亲那样向贫困屈服，而是寻求一条解除这种贫困的道路。他离开这块贫脊的土地去到维特科维采工厂，在觉悟的捷克工人阶级环境中完成革命变革。他作为觉悟的工人回到他的家乡农村。霍什恰瓦是个正面形象，人民的典型代表。然而作者不只介绍他的斗争性和他作为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的活动，而且反映了他的纯个人关系，例如以非常优美的笔触表现霍什恰瓦对舒兹卡·楚德拉娃的态度。舒兹

卡是个青年妇女,丈夫在美国,村长和店主利用她的孤独,想夺走她的一小块土地。在这艰难的时刻,霍什恰瓦帮助了她,在他对她的关系上,正好表现了一个具有新道德的人的品行。

这部小说描写了众多的正面与反面人物,其中以寄生虫酒店老板马戛特和伪善的村长西朗茨刻画得最生动。伊莱姆尼茨基善于从小人物中创造典型,通过小小的场面表现真实的生活,例如描绘基索采地区青年生活的场面就很动人。书中小箍桶匠的命运非常悲惨,他们受着富农的剥削,当他们返回家乡时,看到比离家时的状况更为凄凉。

在《未开垦的土地》中,伊莱姆尼茨基在语言方面已经摆脱了过于晦涩的比喻的雕琢文风,让作品的所有组成部分服从于创造一幅广阔鲜明的人民生活画面这一主要意图。伊莱姆尼茨基实现了这个意图,他的《未开垦的土地》属于斯洛伐克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顶峰作品之列。

在《一块糖》(1934)中,伊莱姆尼茨基着力描写工人与农村贫民的生活。作品涉及制糖与种植甜菜的环境,非常清晰地显示出现实中的两相对峙的阶级:一方是地主耶夏贝克和哥摩利,另一方是以马列克·巴仑特为首的工人队伍。巴仑特这个人物在这里有点类似《未开垦的土地》中的霍什恰瓦。在创造这个形象的同时,伊莱姆尼茨基显然想把母亲巴仑特卡塑造成高尔基的《母亲》中的母亲那样的典型。《一块糖》这部作品里的巴仑特卡,也是由于儿子的关系而有了阶级觉悟的。除了主要问题之外,作者也很关心学生

的问题。他介绍了劳苦的无产阶级青年的命运，他们在中学毕业后无法就业，扩大了待业知识分子的队伍，而老爷们娇生惯养的子女，尽管碌碌无能，仍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职位。

伊莱姆尼茨基的创作艺术顶峰是《我们的指南针》，这是一部有着非同寻常的结构的长篇小说，由六个中篇组成。一方面写斯洛伐克的环境，一方面写旧俄和苏联的生活，两者由作者与吉尔吉斯朋友的对话这根线串连在一起。所有的中篇都通过具体描述，回答了人的幸福何在的问题。中篇《两兄弟的故事》（兄弟俩没有互相认出来）以动人的故事证明，在财富的聚敛中不可能看到幸福，而吝啬和人的复杂关系恰恰是可怕的生活悲剧的原因。在中篇小说《艾娃·布尔多维案件》里，作者展现了苏联的生活图景，建立在物质利益上的旧道德同年轻人之间建立的纯洁关系发生尖锐的冲突。中篇小说的三对男女是这样回答人的幸福问题的：人身上有个指南针，引导他走向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人们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能获得幸福，那就是他们的关系将建立在更持久、更自然的感情上，而不是建立在金钱与财产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十分圆满的幸福当然不存在。人将始终渴望更完美的生活，并为之进行斗争。

在艺术方面，这部作品以刻画人物、描写他们处在复杂关系中的深刻心理、引人入胜的结构和富于感染力的诗的语言而独树一帜。

伊莱姆尼茨基最后一部作品是《编年史》，这是一部没

有中心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伊莱姆尼茨基本人写道:“我想写一本这样的书,那儿不光是由作者讲述,而是男人、女人、整个村子的人都在讲述。”守林人戈达什在讲起义事件,通过他的回忆,起义从准备到发生的经过,直至苏联军队的胜利到来,都一一再现了。在故事情节中,游击队斗争的场面、反抗德国人的冒险行动、孩子们参加起义等场面写得很出色动人。各个故事情节在读者眼前串成一幅巨画,表现了对压迫者和法西斯分子怀有仇恨的人民的起义。

小说的不落俗套的结构,使得守林人戈达什只限于讲述切尔尼·巴罗克的事件,或者只局限于一个相当小的部位。然而主人公们的行动、事件、斗争的图景和英雄场面非常典型,因而伊莱姆尼茨基能创造出整个起义的真实画面。

作者选用的由一个人物来讲述所有事件的方法,使得我们对守林人戈达什所讲的一切体会得非常直接,似乎我们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都曾身临其境。

伊莱姆尼茨基的作品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进步传统,成为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艺术的非凡榜样。今天,最优秀的当代斯洛伐克小说家都继承了伊莱姆尼茨基的宝贵遗产。

3 弗拉尼奥·克拉尔

(1903—1955)

弗拉尼奥·克拉尔是伊莱姆尼茨基的朋友、同事、战友,斯洛伐克文学中第二位著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

人物。

克拉尔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巴顿。他的父亲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是迁到国外去找工作的。但是弗拉尼奥童年时就和母亲回到祖国，在利普托夫的小村庄斯姆列昌尼开始他孩提时代的艰难生活。他从小就得干活，当过牧童，学过粗工木匠，为卑贱的活计操心劳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求学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弗拉尼奥上的是师范，后来任教员。

然而童年的艰难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肺病。他在各个村子里当教员，因为他思想进步，不得不四处流转。可是克拉尔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整个的一生是与工人阶级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在所谓“斯洛伐克国”的时期，他退了休，过着隐居生活，撰写地下诗歌，为斯洛伐克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工作。解放后又热情地投入工作，积劳成疾，遽然早逝。

克拉尔的诗将个人题材与超出个人的题材结合在一起。早期诗集《调色板上的黑色》和《明信片》表现一个病人的忧伤，但他同时又为人民的困苦境况而烦恼，他的个人痛苦因社会的苦痛而加剧了。但为斯洛伐克的美好生活作斗争的决心压倒了他这种悲痛，克拉尔的诗的革命性便来源于此。他把诗当作为斯洛伐克社会生活健康化而斗争的武器。

在早期的写诗尝试之后，克拉尔长久地转向小说创作，这是他创作的重点。解放后才又回转来写诗。在《从黑夜

到黎明》中，克拉尔以激昂的诗句，体现了对法西斯的反抗，表达了对暴行的抗议，他谴责战争恐怖和法西斯的残忍。与此相反，他歌颂举行起义、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的斯洛伐克人民的英雄行为，赞扬胜利的苏联军队，并为新的自由日子的到来而欢欣鼓舞。

克拉尔在诗中首先表现出他是一位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战士。他的诗歌的形式方面也服从这一意图。对他来说，主题思想比诗的艺术纯熟更为重要，然而在许多诗中，他却成功地将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容与锐敏的艺术表现结合在一起。

弗拉尼奥·克拉尔的小说作品，一方面是对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斯洛伐克人民生活的艺术描画，另一方面是对解放后的建设的热烈记述。

他最成功的作品是《被堵塞的道路》(1934)，这部长篇小说用艺术画面表现了经济危机时期的斯洛伐克农村生活：失业人数增长，贫困袭击着斯洛伐克的农民与工人，木棚中忍饥挨饿。一方面，小说中以公证人霍莱茨与地主波里昂为代表的，人民的剥削者在加紧压迫，另一方面，农村无产阶级已对这些剥削者有所认识，并公开起来反抗，这种反抗场面在罢工中达到高潮，因为工人受了骗，他们修路所得的报酬不是钱，而是冻坏了的麦子。作者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行动至少可以获取部分胜利。

教员巴利扎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克拉尔在他身上摆进了许多带自传性的成分。教员巴利扎刚从学

校毕业出来时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实际生活的影响下，在与日益贫困的农村的紧密联系中，他意识到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起来捍卫人民的权利，因而激怒了绅士们。他被迫离开农村，但这时他作为一名有觉悟的政治工作者，已经知道他的岗位是在劳动人民方面。

在许多农民与工人形象中，悲剧性的人物约英卡·扎布莱尔卡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人物和她的儿子杨柯一样，成了劣绅恶霸道德的牺牲品。书中描述杨柯为了保住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命而决定自杀的场面，属于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文学中最震撼人心的一个画面。

在另一部小说《冲突》中，克拉尔从斯洛伐克南部人民中汲取素材，通过无产者的儿子博戈维支的冒险故事，说明知识分子达到社会主义觉悟的复杂发展过程。

解放后克拉尔写过自传性编年体小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这对了解作者本身的生活与作品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他还写过有关建设的长篇小说《空前的景象》，作者在其中描绘了斯洛伐克工业化的艰难历程。

他的两部篇幅较小的作品《琴柯维家的孩子》（捷译本名《苏萨娜·琴柯维的孩子》）与《杨诺》，在青少年中获得最大成功。《琴柯维家的孩子》这本小说描绘慕尼黑协定以前共和国时期的青年生活图景，写了琴柯娃寡妇的三个孩子的悲惨命运，她穷得被迫卖掉了他们。作者谴责老爷们的假人道主义和粗暴自私，对无产阶级青少年的贫困表示同情。他以毫不留情的真实性，描述了卖在鞋匠卡斯佩家的

米谢克、卖在偏僻的匈牙利人居住区一个富农家的汉卡，以及卖在娇生惯养的小姐家的最小的帕莱克的悲惨命运。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但都有着同样的结局：孩子们遭遇不幸，只得回家，使琴柯娃寡妇的困苦更加深重。和这本书一样，作者在《杨诺》中描写了孩子们在精神上逐渐成熟，从羡慕老爷们的世界发展到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并有了阶级觉悟。

五　一九四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

一九四五年解放之后，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之后，整个斯洛伐克文学面临着新的社会任务。它不再是个人、社团和一代人的事业，而成了整体的事业。文学进而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虽然这个时期的开头还传出了衰落文学的回声，但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以后，作家和诗人的基本部分都拥护工人阶级的纲领，拥护共产党的思想方针。

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得到发展。图书馆和各种活动的普及网把书籍送到人民群众读者手中。固定的剧院网也得以扩展，已有十二个专业文工团；斯洛伐克音乐、欧根·索霍尼（《漩涡》）和杨·齐克尔（《尤罗·杨诺西克》）的新歌剧取得很大成就。几个成功的艺术团，特别是“斯洛伐克民间艺术团”传播着民间艺术。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在弥补过去因为条件不顺利而耽误的工作。

新文学有意识地继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先锋伊莱姆尼茨基和克拉尔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艺术的传统。与变化了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新题材进入了文学，这首先是指关于起义的题材。许多诗人与作家以伊莱姆尼茨基为榜样，描写了

斯洛伐克民族生活中历史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几乎每个诗人在自己的诗集中都接触到这个题材。小说，特别是弗拉季米尔·米纳契的长篇小说《死神走遍群山》、约瑟夫·霍拉克的长篇小说《群山沉寂》、卡塔林娜·拉查洛娃的《从天而降的特洛亚》，都是这样。

从前绝大多数是具有主观特色、常常抛弃社会使命、逃避生活的诗歌，如今却以建设、农村社会主义化、青年、军队、和平建设等题材为重点。按照这个方向指出斯洛伐克诗歌道路的第一部诗集，是米兰·拉依恰克的《同志，我的祖国》，诗中最年轻一代的成员第一次以健康的激情，唱出了解放的欢乐、对苏联的感谢、鼓励建设的热忱。毫不奇怪，诗歌的这一新倾向在斯洛伐克产生了很大的回响。诗歌不再深锁书斋，而来到工地，在读者中激起向往美与进步思想的热情，对培养新人的特点起着作用。这场诗歌运动中当然也隐藏着危险，它很快就露出来了。那便是在描写现实时的公式化，以肤浅的、过于美化的眼光去看待旧的生活模式，在有限的题材范围内反复兜圈子。人们很快就对这种过于单调的诗歌产生反感，发出扩大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的呼吁。这使得斯洛伐克诗歌的新声大为丰富和增强。

在当时许多诗人中，以杨·柯斯特拉、帕沃尔·霍洛夫、沃依杰赫·米哈利克、安德列·普拉夫卡、什特凡·日阿利等最为著名。

杨·柯斯特拉（1910年生）在第一共和国时已开始写作。那首先是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和爱国主义的诗。一

九四八年以后属于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他已放弃原来的主题，而写些有关社会主义现实的诗歌，表达他对工人阶级的忠诚，他思考着两个世界的和平共处，对苏联表示感谢，抒写出深沉的、毫不虚假的爱国主义感情。他这个时期的高峰，同时也是他迄今创作发展的高峰是诗集《枫叶》。我们可从中看到四个部分的组诗，其主题如下：农村故乡的图景、对苏联的感谢、和平以及诗歌的使命。《多年后的访问》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枫叶》属于其中最优美的诗篇。第一首诗用生动的画面将新旧农村生活加以对比，思考生活中的变化，表达了一个村民的思想。第二首诗产生在他访苏期间，在伟大作家、思想家列·托尔斯泰生活过的雅斯纳雅·波良纳。战争期间德国人闯进该村，捣毁博物馆，给托尔斯泰的坟墓换上德文标记。柯斯特拉在优美的图景中点出了法西斯的野蛮暴行，把托尔斯泰作为俄罗斯爱国主义热情的象征，同入侵者作斗争的决心的象征。

柯斯特拉是语言大师。他创造了迷人的画面，他的诗歌由于非同一般的具体性和想象力而享有盛誉。

帕沃尔·霍洛夫(1914年生)最初写些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诗，这些诗的特殊手法同超现实主义者惯用的手法相似。以《我的中午》与《大地的阳光》两诗集为顶峰的、歌颂故乡斯洛伐克东部地区的诗，是他的创作向新时期的过渡。

在这两部诗集中他克服了内心矛盾，以唯物主义艺术家的眼光来看世界。首先是从思想上与自己过去那些逃避生活的诗歌加以比较，探求艺术的社会使命，提倡处于我们

社会注意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敏锐地反映了他接触到的各种事件。例如，《献给妈妈》一诗大声疾呼，反对将世界引向新的战争冒险的人们的一切企图，坚持保卫和平的立场。在《基索采》一诗中，他将基索采在解放前的箍桶匠和解放后的箍桶匠相比较。前者流浪他乡，后者满意而成功地在工厂里工作，不再漂泊流浪。这首诗以它的感人的现实主义图景与健康的乐观主义而著名。

沃依杰赫·米哈利克(1926年生)是从神秘主义诗歌转向社会主义抒情诗的。由于他对现实的深刻研究与注意，他精心描绘了过去和现在的图景，从深刻批判旧社会和权贵们的道德、从描绘自己的无产阶级童年时代转而在诗集《歌唱着的心》中颂扬今天的建设。这本诗集取得很大的成功，因为米哈利克在斯洛伐克诗人中第一个证明：即使是有关建设、争取和平以及青年热情的题材，也可以写得感情诚挚，没有口号，没有矫揉造作的装饰语，也没有不自然的言过其实的词句。按照这条路子，他又继续写了诗集《军人的爱》，那是诗人在捷克服役期间写成的，是到今天为止把军队题材表现得最鲜明的一本诗作。诗人作为一名军人和公民，站在保卫和平的岗位上。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在《摇篮曲》一诗中，它表达了对女儿的爱和对她的命运以及全世界孩子们的命运的忧虑，同时也表明了对世界进步力量定将保卫住和平的信心。米哈利克的诗歌富于旋律性，优雅悦耳，画面动人。当他的诗表达关于幸福的思想时，它温柔而宁静；当它发出保卫和平与幸福的声音时，又是那样激烈而

有鼓动力。

安德列·普拉夫卡(1907年生)在他的几部诗集中保持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特色；它们首先歌咏故乡利普托夫的风光。他的诗集《绿色的嫩枝》取得了特别的成就，诗人在那里设想出各种人的命运，并通过他们之口表示了对和平的渴望。

斯洛伐克的小说用艺术手法描绘了当前的实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人的道德转变。最有成就的是弗朗季谢克·赫契科、伏拉吉米尔·米纳契、卡塔林娜·拉查洛娃、彼得·卡尔瓦什和多米尼克·塔塔尔卡。

弗朗季谢克·赫契科(1905年生)从写诗开始，后来转向小说，这是他艺术创作的重点。他出身于种植葡萄的家庭，对这一环境很熟悉，从他的著名长篇小说《红葡萄酒》中就可以看出。他通过哈布日多夫一家有吸引力的故事，描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战中和大战后斯洛伐克西部的葡萄园主的生活。赫契科善于将许多激动人心的情节组成一个故事，他对农民和葡萄种植者的生活了解得非常细致，所以他的作品非常富有说服力，使人感到新颖。

在长篇小说《木舍小村庄》(1951)中，赫契科绘制出一幅当代农村图。作品描写了奥拉瓦地区的小村庄斯托多利什杰从苏军到来直至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变化。小说还反映了解放初期我国生活所经历的一切政治事件。赫契科注意政党间的斗争和农村里展现的阶级搏斗，但他首先指出人们怎样在共同劳动中改变观点，怎样把反对进步与社会化

的凶残公敌中的一些人改造为劳动者。赫契科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尤其出色的是该村战后生活的组织者老普卜拉瓦，和赫契科头一部小说《红葡萄酒》中就已出现的人物帕沃。帕沃具有正面人物的典型特征。作者给他描绘的优点多得近乎公式化。然而《木舍小村庄》在典型塑造与风格上大体仍是一部显示了特殊才能的作品。作品的语言也是丰富多彩的。

卡塔林娜·拉查洛娃(1914年生)写过两部关于起义的书，但她最著名的作品为《黄蜂窝》。和赫契科一样，她也描绘了斯洛伐克尼特拉地区的农村生活，但比赫契科更富于批判精神。她不仅表现热情的建设者，而且揭露人民与合作社思想的凶恶敌人，这些人甚至常常钻进领导班子来。她的全部作品都是真心为了我国社会生活的道德上的纯洁而写的。

弗拉季米尔·米纳契(1922年生)继有关起义的小说(名为《死神走遍群山》)之后，写了一部关于斯洛伐克农村的长篇小说《昨天与明天》，它反映了从解放到胜利的一九四八年二月的斯洛伐克农村的生活。故事情节集中在主要人物、从集中营回到农村的彼得·罗塔尔的内心转变上。作者描写主人公在备受精神折磨之后，要恢复他作为一个积极活动家的正常生活是多么困难。

米纳契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集《在分界线上》。作者不满足于铺叙事件，而是深入到内在世界，指出农村怎样破除对新事物的成见，在人的内心世界展开新旧思想的

搏斗。

多米尼克·塔塔尔卡(1913年生)在长篇小说《教士共和国》中对于所谓“斯洛伐克国”的气氛的反映，可算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他批判地揭露了当时统治思想的真面目，并利用梅基纳教授的故事说明，在当时的道德中有多少伪善、反动和虚假的东西。主人公是动摇犹豫的，作者要通过他来描绘一部分反对法西斯、寻找和人民接近的岗位的知识分子。长篇小说《第一与第二次打击》描写人民在起义中的英雄行为，以及战后在恢复工作中的努力。

除了这两部长篇小说之外，塔塔尔卡还创作过几本写农村环境、青年建设的作品和一部优美的游记《途中人》。

约瑟夫·霍拉克(著有《矿井》)、马·菲古利(著有《青春》)、彼得·卡尔瓦什(著有《这一代》)和卢多·索贝克(著有《耶塞纽斯博士》)，都写过著名的小说作品。

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家以外，一些年纪较老的作家在这个时期也写过作品。如**索斯卡·兹古利什卡**写了许多关于科巴尼恰尔地区的幽默短篇小说，**杨·霍鲁肖夫斯基**写了大战前和大战后时期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小故事。

戏剧文学也有所发展，但仍然赶不上斯洛伐克戏剧事业的发展与需要。解放初期，在当代剧作家的作品中还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一九四八年以后，戏剧文学初见成效。首先是**拉吉斯拉夫·姆尼亚契科**、什特凡·克拉利克及彼得·卡尔瓦什的作品。拉吉斯拉夫·姆尼亚契科在《东方的桥》中表明，建设题材(友谊线的桥梁建设)也大有可写的。

他不只看到表面效果，也注意到人们内心思想成熟的过程。剧本的主要思想是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问题和对集体持不正确态度的人的改造问题。这个戏剧的优点，首先在于作者在舞台上介绍了一些不仅有长处，而且在摸索、犯错误的有血有肉的人，使他们在面临严重的任务时能继续前进。

什特凡·克拉利克的《波特波利扬山毛榉林》要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小农联合起来反对剥削者，以及青年人离开农村上工厂的问题。《圣巴尔波拉》一剧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汉德洛夫的矿工反煤矿主的起义。

彼得·卡尔瓦什以小说家著称（他的《风云莫测》是迄今当代斯洛伐克最优秀的讽刺小说），他也写过许多剧本，其中最成功的有取材于斯洛伐克民族历史的三个阶段（三次起义：1631 年矿工起义，1848 年霍尔巴诺夫起义，1944 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堡垒》、反映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思想转变的《我们街上的人们》与《充满欢乐的心》，特别是解决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思想成长问题的《113号病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简史
作者＝（捷）巴拉伊夫等
页数＝４７３
ＳＳ号＝１０４７１８５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第１版

书名
版权
目录
五　封建制度巩固与专制统治时期
的文学（从捷克丧失独立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1　　流亡人员中的捷克文学
2　国内文学
3　民间文学
从胡斯运动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的捷克文学小结
六　民族复兴时期
1　　从民族复兴初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复兴时期的戏剧（６４）——捷克新诗的开端
——为人民创作知识性散文（６７）——为捷克现
代语言的规范化而斗争（６８）——政治反动时期
的民族复兴运动（７０）——《王室手稿》与《绿
山
手稿》
2　杨·科拉尔
3　　弗朗季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捷克文学小结
七　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民族复兴文学
1　　卡雷尔·希内克·马哈
2　约瑟夫·卡耶坦·狄尔
3　　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
4　　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
5　鲍日娜·聂姆佐娃
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捷克文学小结
目次
捷克部分
一　　封建社会早期的文学（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初）
1　古斯拉夫文学
2　拉丁文化的胜利和捷克语逐渐渗入文化领域
二　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文学
1　十三世纪初到查理四世时期
2　从查理四世到胡斯的出现
从开端到胡斯时期的捷克文学小结
三　　胡斯时期的文学（封建社会危机时期）
1　从胡斯的出现到利潘尼战役

2　杨·胡斯
3　胡斯运动时期的文学
4　从利潘尼战役到十五世纪中叶
（胡斯运动沉寂时期）
四　封建制度中兴时期的文学
（十五世纪中叶到白山战役〔１６２０〕）
八　六十和七十年代
1　杨·聂鲁达
2　维杰斯拉夫·哈列克
九　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文学
1　斯瓦托普卢克·捷赫
2　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德克
3　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
历史小说
4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
5　卡雷尔·瓦茨拉夫·拉伊斯
十二　十世纪初的文学
1　彼得·贝兹鲁支
2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
十一　两次大战之间及占领时期的文学
1　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伊曼
2　伊希·沃尔克
3　伊万·奥布拉赫特
4　玛丽亚·玛耶罗娃
5　卡雷尔·恰佩克
6　尤利乌斯·伏契克
十二　人民民主时期的文学
1　玛丽亚·普伊曼诺娃
2　安东宁·萨波托茨基
3　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
斯洛伐克部分
一　古斯洛伐克文学发展概述
二　什图尔时期的斯洛伐克文学
1　吕德维特·什图尔
2　萨莫·哈卢普卡
3　杨科·克拉尔
4　安德列伊·斯拉特科维支
5　杨·博多
6　什图尔派小说的发展
7　杨·卡林恰克

三　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
1　巴维尔·奥尔扎格·赫维兹多斯拉夫
抒情诗（４３１）——叙事诗
2　马尔丁·库库钦
3　季姆拉娃—鲍日娜·斯兰契柯娃
4　约瑟夫·格雷戈尔·塔约夫斯基
5　伊万·克拉斯科
四　一九一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
1　杨科·叶森斯基
2　彼得·伊莱姆尼茨基
3　弗拉尼奥·克拉尔
五　一九四八年以后的斯洛伐克文学